

兰州文史资料选辑(第22辑)

# 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考

主 编 武文军  
主 审 王家珞

兰州市政协文史资料和学习委员会

二〇〇二年元月

甘新出 002 字总 108 号 (2001) 013 号

---

工本费：22 元

# 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考

兰州文史资料选辑第 22 辑

兰州市政协文史资料和学习委员会编

---

印刷：兰州市政协办公厅印刷厂

装订：兰州市政协办公厅印刷厂

开本：850×1165 毫米 1/32

印张：8

字数：200 千字

插页：12

印数：1—1200 册

版次：2002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

甘肃省内部图书准印证 甘新出 002 字总 108 号 (2001) 013 号

主 编：武文军

主 审：王家珞

秉	笔	直	书	信	史
填	补	国	史	真	空
透	视	历	史	悲	剧
探	究	济	民	方	略
总	结	历	史	经	验
为	国	为	民	立	鉴

## 序 言

这本书名为《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考》。二十世纪60年代的大饥荒离我们已经四十多年了。四十年是历史的一瞬,但四十年前和四十年后的反差何其之大!那个时期中国的工农业总产值不过几百亿,职工年均收入在300—400元之间徘徊,农民年均收入一直在100元以下。1958年为了炼出1070万吨钢铁,就动员了9000多万劳动力,结果劳民伤财,没有完成任务。今天,经过20多年改革开放,我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有几个举世瞩目的数字可以反映这一历史性的变化,2001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95933亿元,已突破了10000亿美元的大关,进出口总额达5000亿美元,外汇储备2122亿美元,仅次于日本,居世界第二位。前三年我国的钢产量已突破1亿吨,连年居世界第一。居世界第一位的还有煤的产量、彩电的产量、粮食的产量等等。中国已真正成为一条巨龙屹立于世界东方。

中国有句古话:“前世不忘,后世之师”,也就是要人们以历史的经验教训为镜子,遵循历史规律,寻找未来发展的正确道路。中国共产党人是善于总结历史经验的,1980年在“关于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对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和1958年的大跃进,以及之后的左倾路线进行了深刻反思,并从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中提出了正确路线和政策。一些老一辈领导人也不断采取写回忆录的方式总结造成60年代大饥荒的经验和教训。然而,我们还会看到另一种态度:一些人乐而忘忧,甚至乐极生悲,他们忘记沉痛的教训,继续吹牛皮,搞浮夸,欺上瞒下,贪污腐化。这些人的作风和一

九五八年大跃进时期一些人的行迹如出一辙。可见，总结60年代大饥荒前后的历史经验，告诫人们实事求是，艰苦奋斗，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是多么的必要，是多么的有针对性。这就是《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考》写作的由衷之言。

这本书既不是报告文学，也不是一部单纯的考证资料，而是出于民族责任感和社会责任感，用心血写成的历史经验教科书。这本书是笔者历经三载，行程万里，查阅数千份文献，访问数百名亲历者的产物。作者先后到甘肃、宁夏、青海、河南、四川、云南、福建、浙江、山东、广西等省的图书馆、档案馆、地方志办、党史办及其他文献收藏单位，查阅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和重要文献的原件，同时，在许多单位进行了访问和调查。因而说，这本读物可以算是一部亲身考究的“信史”。

这部读物展示了三年困难时期中国历史的主要社会风貌，对一九五八年以来流行于社会的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平调风、瞎指挥风造成的恶果作了真实的描述。作者破除了“为尊者讳”的封建习俗，对于造成三年大饥荒的原因进行了忠恳的分析。这本书从多角度总结了历史经验。其中：理论的反思，揭露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唯心主义认识论，主观主义的思想方法；政策的反思，对1958—1961年期间的左倾路线和政策进行了多方面的分析，揭露了左倾路线的恶果；干部体制和作风的反思，对于从上层领导到基层领导的不良作风和不良学风予以充分暴露和分析。在多角度的反思中，总结出了一系列历史经验和教训，其中概括为：勿画空想共产主义蓝图；“大”字哲学应当收敛，生产关系万能论必须休矣；防止阶级斗争斗垮经济；要分清经济规律和战争规律的差异；防止政治路线背离认识路线的陷阱等。这些具有普遍意义的经验教训对我们今后制定正确路线和政策是有借鉴意义的。

本书的前三章主要记载和描述三年困难时期中国人的不幸遭

遇。四、五、六章以甘肃、青海、河南的饥荒史实为例，分析一些省区引发灾难的主要原因和教训。七、八、九、十章分析了困难时期的一些特殊现象，如公共食堂，人口的大逃亡和劳民伤财的工程。从十章开始的以后各章，主要是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其中有些是具体问题的教训，如吹牛吹出了灾难，对吹牛造成的恶果作了经验分析和理论分析。多数篇章分析 1958 年至 1961 年期间的普遍经验教训，其中有左倾路线的理论基础是超越论，左倾路线“实证”方法是吹牛和说假话，左倾路线的实施工具是无休止的斗争。在“七分人祸”形成的三步曲一章中，对反右派斗争、五八年的“三面红旗”、五九年的反右倾斗争这些左倾运动的本质作了深入的解剖，指出由于这些政治运动才造成了三年大饥荒的悲剧。在三年大饥荒引出的理论反思这一章中，着重从经济理论方面剖析了左倾路线关于“快速消灭剩余价值剥削”，“消灭资产阶级法权”等曲解马克思主义的荒诞观点。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衰。目前，我国对总结当代历史经验方面还有许多空白点，三年大饥荒就是其中之一，愿这本书能够引起人们对当代历史的深刻反思，促进人们广泛总结经验教训，为后世的发展提供可借鉴的精神财富。

## 资料 收集

武文军	王家珞
冯小平	张金生
李俊霞	韩晓东
张玉斌	邓生菊

## 校 勘

武文军	王家珞
胡春兴	张西原
张 瑾	李俊霞
邓生菊	

# 政协兰州市第十一届委员会文史

## 资料和学习委员会委员

主任：王家珞

副主任：邓明 陈琳

委员：武文军 李孔亮 王家珞 邓明 陈琳

吴季康 李建国 李培生 周厚炘 杨晓文

杨诚 金耀东 马志荣 刘芳 张俐

岳荣欣

# 目 录

- 一、中国历史上最悲痛的一页····· (1)
- 二、重灾区的死亡惨案····· (16)
- 三、天涯何处无饥寒····· (31)
- 四、陇上大饥难····· (41)
- 五、涕笑皆非的青海····· (65)
- 六、陷人大跃进泥沼的河南····· (85)
- 七、共产主义怪胎——公共食堂····· (92)
- 八、流亡者的命运····· (109)
- 九、是造银河天池还是劳民伤财····· (116)
- 十、吹牛吹出了灾难····· (125)
- 十一、左倾路线面面观····· (139)
- 十二、“七分人祸”形成的三步曲····· (147)
- 十三、前辙之鉴警示后人····· (154)
- 十四、三年大饥荒引出的理论反思····· (169)
- 十五、历史断笔实可哀····· (178)

# 一、中国历史上最悲痛的一页

## 引 子

中华民族是最富于创造性的民族，在世界历史发展的各个阶段给世界文明发展都做出过巨大贡献。中华民族也是多灾多难的民族。这种灾难有的来自战争杀戮，有的来自民族冲突，有的来自外贼侵扰，如日本对华种族灭绝就如此。还有一个重要的灾难因素是自然灾害，而尤以旱灾造成的灾难最深重。历史上不乏对这类灾难的记载。

我们先看看明代朱由俭登基当年（公元1627年）的灾荒惨景。历史学家柏杨引用当时给事中马懋才给朱由俭的奏章，可看到饥荒造成的民不聊生的血淋淋的镜头。奏章翻成白话文如下：

我是陕西安塞县人，地方官员的报告中，常说：“父亲遗弃儿子，丈夫出卖妻子，或挖掘草根吞食，或挖掘白石充饥。”然而所形容的距事实仍远。我的家乡延安府，自去年到今年，一年没有落雨，草木枯焦。八九月间，乡民争着采集山中的蓬草，虽然勉强也算作谷物，实际上跟糠皮一样，味道苦涩，吃了仅能免死。到了十月，蓬草食尽，只有剥树皮来吃，所有树皮中唯榆树皮最为上等，仍要混杂其他树皮同吃，也不过稍稍延缓死亡。到了年终，树皮又被吃完，只有挖掘山中的石块来吃，石块冷硬，其味腥膻。只一点点，即可吃饱。但数天之后，因不能消化，就腹部发胀，无法大便，下坠而死。一些不愿吃石块而死的乡民，只好集结起来当强盗。另一些稍有积蓄的家庭，被抢劫一空，也变成饥饿的群众。他们知道当强盗是犯法的，非死不可，但他们

与其坐着等死，宁愿当强盗犯法被处死，即今当鬼，也愿当一个饱死鬼。最可怜的是，在安塞城西一带地方，每天必有一、二婴儿或幼童被遗弃在那里，哀号唤呼爸爸妈妈。在力竭肚饿时，就拣吃地上的粪便。到明天，全都饿死。更可怕的，幼年人或独行人，一出城外，便告失踪，以后见城外的贫民用人的骨头当柴烧，烹煮人肉，才知道失踪的人，都被饿民吃掉，可是吃人肉的人也不能维持残生，他们用不到几天，就头部肿胀，浑身燥热而死。<sup>①</sup>

展现在我们面前是饥荒造就的一幅地狱图。饥饿中的安塞人在吃蓬草、白石，剥光了树皮，也难免一死。尤其悲凉的是饥饿使人的伦常丧失殆尽，人兽化了。“不愿吃石块而死的乡民”集结为盗，挺而走险。父母抛在城郊的婴幼儿在拣食粪便，终于一个个饿死，而年幼者和独行者都被人吃掉的不在少数，剥人骨以为薪，烹人肉以为食者屡屡发生，不过值得钦佩的是“评议委员”马懋才还有斗胆，敢于向皇帝秉笔直书安塞的惨状，而没有昧着良心歌颂安塞的“形势大好”。还值得一提的是没有记载因马懋才揭露明王朝的阴暗面而被投入监狱。当然，我们也不能为此就证明朱由俭是一个现代民主的化身，实际上他对那些集结起来的饥民，当作流寇而予以征剿。安塞县的饥荒惨景仅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例，同样的悲剧往往发生在各个时代的各个地方。再以民国时期西北地区的饥荒为例，看看其惨景。民国十七、十八、二十一年发生在甘肃等地的饥荒令人心惊胆颤。民国十七年（1928年），甘肃发生大旱，伴有雹洪和霜、虫、瘟疫。当时的情况是：“春不能下种，夏旱寸草不生，颗粒未收，粮价昂贵，积尸梗道，人相食，甚至有掘尸、碾骨、易子而食者，灾民多达244万人。”人们看到“掘尸、碾骨、易子而食”这些文言字眼，

---

<sup>①</sup> 柏杨《中国人史纲》下794—495页。

就可以想到“人非人也”。能把坟墓中的死尸挖出来吃，把人骨磨成面粉去吃，可以想到饥荒达到何种程度。由于存在怜子之心，不忍心亲手杀死自己的子女去烹食，只好让别人去杀害，自己又杀害别人的子女，所谓“易子而食”这是什么样的人道，饥饿已经把人性摧残到何种程度，这类惨相在清代也经常出现，康有为在其《大同书》中记载：“若光绪二年，山西全省之大旱，饥人相食，易子而骸其骨”，这里的骸其骨，是指把孩子的肉吃掉，而把骨头又互相归还，这是不忍心的奇异表现。然而，民国十七年比之民国十八年，真乃小巫见大巫。请看《甘肃民政志》对民国十八年饥荒的描述：

18年（1929年），全省又有58县大旱。春夏之际，树皮、草根、油渣等，食之殆尽。人相食，甚至有易子而食者。人民妻离子散，倾家荡产，十室九空，哀鸿遍野，积尸盈道比比皆是。有卖子女为奴者，有全家外逃被饿死野外者，有白骨暴日无人掩埋者，饿倒未死而被狼、狗活吃者，更有饥民争食未死之体。年底全省重灾民250余万人以上。其中：饿死者140余万人，死于疫病者60余万人。甘肃省政府主席刘郁芬电呈南京政府：“甘肃各地，连年天灾兵祸。田庐毁没，村落焚毁，树皮草根俱已食尽；人相争食，死亡枕籍，山羊野鼠均已啖罄；既乏籽种，又缺耕牛，度时不遑，失时谁计？虽有沃壤，终成石田，似此惟势，将坐谈春耕，无望秋收。灾民失离流所，无家可归者，在百万以上。哀此边民，宁可同归于尽”。

这段记载够悲惨了，尤其省主席刘郁芬的电呈有凄凉万古之情感。人相食，易子而食；狼狗吃已倒未死之人，卖子女为奴，积尸盈道，山羊野鼠均已啖罄，饿死者140余万，疫病者60余万，无家可归者百万以上，一个省竟被饥荒征服惨绝人寰的地步，人们不得不惊叹：此乃至悲哉！这里引人肃然起敬的是省主席刘郁芬良心尚未泯灭，还敢将如此惨象通电国民政府，并发出

“哀此边民，宁可同归于尽”的呼声。事实是国民政府尽管已知人相食，仍救灾乏力，甘肃饿死者有增无减，刘郁芬虽有侧隐之心，能将陷于灭顶之灾的甘肃实况报告于上司，但他的责任不能说已做到尽善尽美，为什么在“树皮草根食尽”之时，才报告国民政府呢？为什么不在饥民开始觅食草根树皮之际就报告国民政府呢？发出“宁可同归于尽”，其惜民爱民之情可佳，但怎么解决民众吃饱肚子的问题，刘郁芬似乎一筹莫展。

民国十九年、二十年无灾害记载，而国民二十一年灾难又降临到甘肃等地民众的头上。这次灾难是由大旱加兵匪双重魔怪所为。1932年甘肃省府12月16日函告各界称：“甘肃连年大旱，秋夏无收，加以兵匪蹂躏，劫烧杀戮，惨无人道，破坏至50余县，死亡达300万，其幸存者，衣食居住，一例荡然”，省政府能堂而皇之地将300万死亡数字和民不聊生之窘况告诉民众，表明政府尚有诚实的一面，然而兵匪任意杀戮，人民“衣食居住，一例荡然”，民啼饥号寒，表明政府财力之匮乏和官员救灾之无能，达到了极端。

新中国建立后，虽然灾害、饥荒和大量死亡现象在局部地方并未间断，但1956年以前，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有明显改善，农民用“芝麻开花节节高”来比喻土改后生活的改善和提高，城市居民用“蒸蒸日上”表达自己对生活的满意感，但好景不长，经过1958年开始的“共产主义”实践运动，苦难立即降临中国大地，历史上的最悲痛时期，三年大饥荒时期出现了。这次主要由左倾路线造成的经济灾难，其范围之广，时间之长和死亡人数之多，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按我们的愿望来说，也应当是绝后的。由于国内报刊在人民大量死亡的情况下，屈于政治压力，依然歌颂太平和幸福，所以在我们的公开读物中是不存在大灾难的。改革以来全国各地开展“修志”工作，然而绝大多数各类志书，都隐讳了三年饥荒的真象，似乎这三年在中国是不存在的。

这只有靠好事者来考证这一段真实的历史了，但由于资料的保密和三年困难时期人口统计的“崩溃”，对这一时期的惨重灾难的描述，和死亡的估计难度很大，各方研究的方法和结果差别很大。

尼克松在其著作《1999：不战而胜》一文中关于中国自30年代以来人口死亡有一段描述其中有关于中国1960年大饥荒的死亡结论：

在30年代，中国饱受日本强暴的侵占之苦，据中国政府称有2200万人死于非命，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另一场内战中和1949年毛泽东的部队击败蒋介石后巩固共产主义新政权时，又有500万人丧主。50年代末1960年代初，在工业化运动和强制实行的集体化运动中，2700万人饿死。中国领导人当时却称之为“大跃进”，岂非怪事！几年后毛泽东发动了文化革命，对全国进行严格的思想审查。这使数以万计的中国人民不聊生，在知识分子中造成的创伤至今还没有消除。

西方社会学家彭尼·凯恩在其著作《中国的大饥荒1959—1961》中曾列举了许多学者对中国1960年前后大饥荒造成死亡的估计数字。其中科尔估计1958年至1961年间中国有1650万人“过量死亡”，艾尔德则认为1960—1961年间共饿死2300万，莫舍估计1960年饿死人数在1100万至3000万之间，李成瑞认为1960年饿死人数为1000万。杰勒德·卡罗特则利用别人整理后的数字，认为1958—1963年，有3200万婴儿没有出生，有2800万人“过量死亡”。此人在后来的一篇文章中作出结论是：1960年，死亡人数为4090万。<sup>①</sup> 由于中国没有完整的统计数字，加之，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一度为禁区，就只好由外国人根据部分统计资料、人口普查资料，用多种分析方法去做很不准确

---

<sup>①</sup> 彭尼·凯恩著《中国的大饥荒1959—1961》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

的结论了。而研究 60 年代饥荒的国内学者，反而用进口洋人的成果，来分析中国这一历史时期的问题。为了填补中国人对这一悲痛历史研究的空白，我个人根据各种统计资料、志书记载和实地考察，对三年困难时期中国人的损失及教训作出了自己的独立分析和判断。

### 三年饥荒时期的亡灵知多少

国外对 1960 年中国人饿死的数目有各种说法，有的说 5000 万，有的说 3000 万，这些猜测的数字大体上是扩大了。根据后来我国政府的统计资料表明，1960 年我国人口的死亡率高达 25.43‰，人口的自然增长率呈负数，为 -4.57‰，1959 年我国的总人口为 67207 万，而 1960 年，我国的总人口减少为 66207 万，人口净减少 1000 万。按照正常的生活条件，人口不可能出现锐减，在中国没有实行计划生育的条件下，人口出现微小增长也就很不正常了，必然有非常特殊的原因在作怪，而 1960 年出现 1000 万人口的净减数量，这就更不正常了。究其大量人口死亡的原因就是饥饿所致。但实际饿死者远远高于 1000 万，因为 1000 万的人口净减数，并不是当年的人口死亡数，而按照当年 25.43‰ 的死亡率，当年人口死亡达 1683.6 万，因为统计系统失散，死亡漏报比比皆是，死亡人口至少在 2000 万以上。而这些死亡者多为饥饿致死，只有少量才是年老多病和其它因素导致的死亡，因此，实际死亡者要高于 1000 万，国家统计资料表明，1961 年中国人口仍出现净减，1960 年总人口为 66207 万，1961 年减为 65859 万，当年的死亡率为 14.24‰，死亡人数高达 937.83 万人，净减人口 348 万。因此，把 348 万的净减数全列入饿死者行列并没有扩大饿死的人数，而 1959 年在一些省份就出现饿死人的现象，通过上述分析，按缩小的数字

估算，1960年和1961年两年中，至少饿死了1348万，这只是以1960年和1961年人口净减数的总和来表达，三年困难时期，死亡人数总计为3602.02万人，这是舍弃了死亡漏报的数字，而实际死亡在4000万以上。饥饿致死者至少在40%左右。由此分析，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了1500余万人，大体上是一个至低的估算。

三年大饥饿造成的灾难是波及全国的，1960年全国大部分地区人口平均口粮在半斤左右，可见全国6600多万人口90%以上处在饥饿状态。当然，由于1958年以来执行左倾路线的程度不一，饥饿的状态有所不同而已，但总的情况是，政策越左的地方、人民的灾难越深，死亡人数越多。

死亡率最高、饿死人最多的省份主要有如下一些：安徽1960年死亡率高达68.60‰，自增率为-57.20‰，1960年人口净减384万，1961年净减55万，整个安徽在“三年困难时期”有400多万人饿死；河南死亡率高达39.56‰，自增率为-25.58‰，1960年人口中净减161万，1961年净减15万，“三年困难时期”有近200万人饿死；云南1960年死亡率高达26.26‰，自增率-20.7‰，1960年人口净减17万；甘肃死亡率高达41.32‰，人口负增长-25.79‰，1960年人口净减49万，1961年净减43万，“三年困难时期”，甘肃约有百万人饿死；青海人口死亡率为40.73‰，人口负增长-27.66‰，1960年人口净减11万，1961年净减38万；山东人口死亡率为23.6‰。自增率为-4.1‰，1960年人口净减185万；贵州人口死亡率为45.38‰，自增率为-19.41‰，1960年人口净减101万，1961年人口净减19万，至少在“三年困难时期”饿死120万；湖南死亡率高达29.42‰，自增率为-9.93‰，1960年人口净减122.58万，1961年人口净减61.39万；广西死亡率达29.46‰，减少人口33万；四川作为历史上的“天府之国”，

1960年人口死亡率竟高达42.24‰，当年人口净减277万，1961年又净减少161万，约有350万人死于饥饿。

1960年我国人口死亡率在20‰以下和人口出现微弱增长的一些省区大体上有两类：一类是农业的自然条件特别好的省区，一类是左倾思潮肆虐较弱的地区。例如，辽宁1960年人口死亡率为11.5‰，净增人口57万；浙江死亡率为11.18‰，净增31万；广东死亡率为15.24‰，1960年增加人口37.99万；陕西死亡率12.27‰，人口净增63万；江苏死亡率为18.41‰，但当年人口也减少了44万。以上这些省份其所以死亡率在20‰以下，有些呈微增长趋势，有些呈微减少趋势，主要是因为这些地区在历史上是渔米之乡或国家的粮食基地，人们容易在饥饿期间找到觅食的渠道。

1960年在一些偏僻落后的地区，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由于曾实行过一些特殊的政策，1958年的“共产风”和以后的残酷阶级斗争表现得比较缓和，因此1960年死亡率在20‰以下，人口出现微增现象。如西藏1960年人口增加了4万，宁夏人口也增加了4万，新疆人口增加了37万，内蒙增加了128万，特别是新疆在困难时期曾接纳甘肃、青海等地的不少逃亡人口，使人口在三年困难时期年年有所增加。

还有一些特大城市，1960年尽管处在饥饿状态，由于国家政策在极力保护，加强粮食的调运，所以人口的死亡率较低。例如北京1960年人口死亡率为9.14‰，当年增加人口46万；上海死亡率为6.8‰，当年增加人口27.91万；天津死亡率为10.34‰，当年增加人口16万。但这些城市多数居民仍处在半饥半饱状态，其城郊地区也有饿死者，1961年北京市曾给国务院的粮食告急报告中称，全市粮食库存仅够十天左右的销量，可见各直辖市并未处在温饱中。

## 惨痛的教训

统计工作者很轻松地把“三年困难”时期 1000 多万饿死者用“非正常死亡”的字眼轻描淡写地加以表达；“左倾”路线的推行者更惨无人道地称“这是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付出的学费”；更还有一些人认为三年饥荒时期饿死人的事已成为历史，无需再加过问。我们认为，以上这些说法和表达方式是对中国人缺乏任何责任感和恻隐之心的作法。实际上，在 1000 万饿死者的背后，存在着中国人悲惨的命运和残酷的现实。记载和分析当时的悲惨教训，警示后人永远不要让 1960 年的惨状重演，是每个中国人应有的责任感和正义感。

“人相食”是中国历史上灾害最严重时期的恶果。而我们翻开许多省的省志和县志，对 1960 年多有“人相食”的表述。有位新闻记者 1984 年曾在甘肃通渭县采访过 1960 年“人相食”的记载，该县就发生了许多起人吃人的惨痛事件，其中有一户农民因公共食堂关闭，家中断了烟火，在饥饿难忍的情况下，吃掉了自己 6 岁的儿子，女儿看到弟弟被吃，就向爸爸求饶说：“你不要吃我，我还替你烧火”<sup>①</sup> 但据说，女儿的结局仍很悲惨。在甘肃省的静宁县，有一山村的奶奶吃掉了自己的孙子，老妇人先被拘留，后在纠正“左倾”路线时被释放，同时在这个县还发生过一起贫下中农子女吃掉富农子女肉的惨剧。诸如这类惨案，在三年大饥荒的时期许多地方都发生过。

中国有句古话叫“仓禀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三年困难时期由于饥饿对人们生命和生存造成的威胁，使人间的礼仪廉耻丧失殆尽，人们几乎经常看到一些衣不遮体的饥民抢夺别人手中少得可怜的一点食品，不少饥荒严重的地区卖儿卖女成为

---

<sup>①</sup> 《啄木鸟》杂志 1984 年第 2 期《依稀大地湾》一文。

风气，抛弃父母子女的现象更习以为常，由于饥饿，成千上万的农户家破人亡。

饥饿年代，惨死在非人食品中的事例屡见不鲜。许多地方的饥民在食堂倒闭以后，就成天在山上吃苜蓿、野草，有的剥树皮吃，有的吃观音土、白土和玉米秸杆。这些非人食用的东西吃下去时可以缓解饥饿的煎熬，但为时不久，多数食者肠胃堵塞，肿胀而死。

饥饿是经济崩溃的一个标志，而在饥饿的背后隐藏着经济的全面崩溃，1960年和1961年期间，不仅存在着粮食极度匮乏，使人们在死亡线上挣扎，而且人们生存的一切日用品都感到奇缺。拿着定量的一丈多布票也买不到布，农民点灯用的煤油也长期断了供应，甚至连碗筷、扫帚都买不到。许多饥民在生产队长的驱使下干活，一百个人干的活不如正常年间一个人干的数额，耕畜有的饿死，有的被吃掉了，种籽也没有了，大片大片的良田荒废，当时的农村用“哀鸿遍野”、“万户萧疏鬼唱歌”来表述是不失实的。

在饥饿背后，党风的败坏也令人发指，在大饥饿的日子里，一些社队干部把农民仅有的一点粮食利用管食堂、招待上级和其他手段据为己有，许多地方的公共食堂变成了干部惩罚农民的“法庭”，有些干部看到食堂快断粮食，就把仅有的一些食品一卷而走，关闭食堂，让社员自生自灭。还有一些干部踏着人民的血迹往上爬，明明成千上万的人处在饥饿状态，他却给上级呈送的报告是“口粮已经解决”，“农民安居乐业”。例如，广西环江县有个县委书记洪华，从1958年就开始吹牛皮，声称放出了水稻亩产13万斤的大卫星，到1960年，环江县几个公社的公共食堂断粮停火，最多的长达130天，社员出现浮肿、肝炎、干瘦、子宫脱落和饿死的情况。三年困难时期，环江县总共饿死了5万人。洪华看到死人现象时还说：“这些人都是社会主义的逃兵，

死去几个不要紧”。洪华就这样成了红极一时的县委书记。

大饥饿时期，对民主和言论的践踏是无以复加的，尽管一些地区处于饿殍遍野，民不聊生的地步，但严格禁止人们谈论饥饿现象，更不能说饿死人的现象。因为如果暴露真实就“丑化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不少人因为流露出对饥饿的议论和不满情绪，轻则批斗，重则划成现行反革命投入监狱。还有一些人因为强烈不满现状，发表了自己的议论，落入被处决的噩运。当时一些“左倾”路线的执行者就靠压制人们的言论而维护自己的地位。甘肃是三年困难时期受害的重灾省，而当时面对成千上万人饿死的惨状，省委的主要负责人不仅不挽救人民的灾难，而且无视饥饿现象的存在，不断向中央汇报甘肃的“大好形势”和战天斗地的“成就”。他为了压制人们的不满情绪，竟提出了“三不彻底”口号，就是所谓：土改不彻底、肃反不彻底、反右不彻底。在干部群众中掀起了又一次抓地主，抓历史反革命，抓新右派的斗争，从而又使一些无辜的干部和群众被划在阶级敌人的黑圈内。青海省委书记在1960年人口大量死亡情况下，竟然断言，青海的“形势是极好的”，而不是大好，以此压制那些议论困难的干部和群众。

三年的大饥饿还产生了一个“怪胎”——穷社会主义。解放初期，人们谈论社会主义，认为到了社会主义社会就是耕地不用牛，点灯不用油，拖拉机代替了耕牛，电灯代替了油灯，还有“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说法，在这些说法中包含着社会主义要发展生产力，实现机械化，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而三年大饥饿时期，一些左派理论家为了为中国的悲惨现实辩解，公然提出了社会主义是一个上层建筑的概念和一个阶级斗争的概念，全盘否定生产力发展同社会主义的关系，认为社会主义就是要消灭“资产阶级法权，实现绝对的平等”，他们说60年代虽然出现了饥饿现象，但饥饿对大家都是公平的，人人都是饥饿的，没有穷富和有

无的差别，这就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甚至还有一些人讲“一穷二白”是中国最大的优势，如果中国富裕了，必然会出现剥削现象。与此同时，对当时世界上一些发达国家的财富增长和苏联的改革现象大加鞭挞，认为这些国家虽然财富不断增长，但却是“两极分化”的，是“富人的天堂，人民的地狱”，还是我们的“穷社会主义”好。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提出“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宁要穷社会主义，不要富资本主义”。“四人帮”的这些说法，其实在1960年前后已经有了这样的理论，“四人帮”只不过是故伎重演而已。

### 大灾难的缘由

“三年大灾难时期”，中国人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经历了史无前例的大死亡的浩劫。但试问，为什么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会出现如此的灾难呢？流行的解释是：由于三年严重的自然灾害和苏修卡我们的脖子两个因素造成。有些人承认还有我们工作上的失误，有些人连失误都不承认。现在来实事求是地总结历史经验，三年大灾难并非主要来源于天灾，也非来源于苏联从外部要帐和撤专家，而主要在于人祸，在于决策层的严重错误。

问题的根源集中表现在最狂热的左倾冒进路线。毛泽东有一句名言“冒进是马列主义的”，“反冒进是非马列主义的”。他对周恩来、刘少奇等人反对1956年左倾急躁情绪和1957年的冒进计划极其不满，指出计划经济不平衡是绝对的，平衡是相对的。他说“基本建设多花了几个亿，农业贷款多了一点，招收工人多了一些，调整一下就是了，但是不应该反冒进”。1957年底，党中央召开八届三中全会，毛泽东号召“必须恢复促进委员会”，毛泽东还说，苏联工农业在最重要的产品的产量方面，15年赶上和超过美国，我们也可以讲，15年后，我们可能赶上和超过

英国。1958年6月，毛泽东讲“超过英国，不是15年，也不是7年，只需两到三年，两年是有可能的”。1958年9月2日，毛泽东在一封信中讲，“为5年接近美国，7年超过美国这个目标而奋斗吧”。接着在1958年9月5日的国务会议上，毛泽东强调，“除了造船、汽车、电力这几项外，明年都要超过英国”。在毛泽东的这种左倾急躁思想的主导下，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在八届三中全会以后，又提出了“大跃进”的口号，修改了“二五”指标，全面提出了钢、煤、粮食等方面的超高指标。毛泽东继续强调“冒进是马克思主义的”，于是在全国出现了放卫星的高潮，报刊上竞相报道亩产万斤的水稻、小麦，亩产100万斤的洋芋，亩产30万斤的谷物等荒诞离奇的“卫星”。紧接着提出了“以钢为纲”的口号，制定了1070万吨的钢铁高指标，掀起了全民炼钢的高潮。在“大跃进”中，还制造“不怕做不到，只怕想不到”，“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理论，于是五花八门的假卫星、假成就、假事件层出不穷。而且掀起了轰轰烈烈的阶级斗争，到处搞“拔白旗，插红旗”，把那些说老实话、做老实事的人打成白旗、右倾分子残酷斗争。而把那些牛皮吹得天花乱坠的人个个提到要害岗位上。

1958年的“大跃进”，“高指标”，“全民炼钢”，对生产力造成了巨大破坏，成千上万吨煤白白烧掉，遍布全国的小炼钢炉破坏了巨大的铁矿资源。由于全民炼钢，农村的青壮劳动力都搞土法炼钢了，农业劳动力抽空了，大片大片的农田无人照管。水稻、玉米、小麦白白烂在了地里。就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又急于改变农村所有制性质，想把集体所有制快速改造为全民所有制。1958年8月6日毛泽东在视察河南新乡七里营人民公社时说“看来人民公社是个好名字”，1958年8月9日在视察山东历城县北园人民公社时说“还是办人民公社好”，于是在一两个月

内，全国的农业生产合作社都变成了人民公社。人民公社的特点是“一大二公、政社合一”，劳动方式实行军事化，是所谓共产主义的雏形。与此同时，提出了消灭家庭的口号，取消了一家一户单独开灶的传统生活方式，全国农村都开办了公共食堂，真正形成了“吃大锅饭”现象。许多地方在“吃饭不要钱”的口号下乱吃乱花，到年底时，全国农村的口粮已经吃得差不多了。

如果 1959 年悬崖勒马，彻底纠正左倾急躁情绪，以后的损失可能小一些。而可悲的是 1959 年一些地方又提出“特大跃进”的口号，高指标并没有纠正过来。7 月份召开庐山会议，本来是反左的，但因彭德怀提出了纠正左倾路线的意见，反而引发了大规模的反右倾运动，从而使左倾思潮更加泛滥。到 1960 年已经出现大量饿死人现象的时候，上半年还提“更大跃进”，把钢的产量规定为 1840 万吨，比上年增长 38%，1960 年 5 月，粮荒很严重，各省调出粮食任务只完成了一半，100 亿斤的出口收购计划只完成了 30 亿斤。6 月 5 日国务院财贸办给中央的信中说，北京、上海、天津、辽宁粮食库存非常薄弱，北京只能销 7 天，天津只能销 10 天，上海的大米已经销光。辽宁 10 个主要城市粮食只能销八、九天，当时山东、河南、山西、江苏、安徽、甘肃等省夏收刚过，就偷青、吃青，人口外流，饥饿致死者不断发生，但在这种情况下，决策层还执迷不悟，继续在维护“三面红旗”，开展各种类型的阶级斗争。由此可见，1960 年的大饥荒和 1000 万人的死亡是中央决策失误和左倾冒进路线导致的必然结果。

中央决策的失误为什么会如此重大的灾难，为什么在全国范围内会出现一些干部吹牛皮说假话，置人民死活而不顾呢？这同我们的吏制即干部体制是有关的。当时，许多地方任用干部的标准是只看出身或资历，而不看能力和品德。一些优秀的干部因出身不好或有“历史问题”而被清除。一些投机钻营分子仗着

自己的出身好，凭着空喊政治口号走上领导岗位。一些地方的领导层变成“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的局面，一些缺德少才的人一旦掌握一些地方的权力就更多地考虑自己的升迁，考虑投上所好，欺上瞒下，置人民利益而不顾。凡是三年困难时期饥荒最严重、死人最惨的一些地区，总有那么一些人从省委书记、地委书记到县委书记对上虚报浮夸，对下独裁专横，这些人甚至颠倒黑白，封锁言论，把饥荒说成是“丰衣足食”，把群众的饿死说成是“阶级斗争”，可见各地方的一些干部在制造三年灾难上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如果我们的干部都是坚持实事求是路线的，都具有说老实话、做老实事的高尚品德，就不可能使上层的错误得到恶性发展，就会有抵制和纠正的力量。当然，在左倾路线猖獗时，有一些德才兼备的干部抵制过左倾错误，可是他们的力量太薄弱。

注：部分资料来源

1. 国家统计局《历史统计资料汇编》（1949—1989），中国统计出版社，1990年出版。
2. 《大跃进狂澜》，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出版。
3. 《真相》，南方周末出版社，2000年出版。

## 二、重灾区的死亡惨案

我们这里说的重灾区是指从 1958 年至 1961 年期间，有些年份的人口死亡率在 20‰以上的省区。中国 1949 年的人口死亡率是 20‰，这样高的死亡率其原因除了疾病、饥饿外，战争中的死亡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到 1957 年中国人口的死亡率降到 10.80‰，北京的人口死亡率 1949 年为 11.9‰，到 1957 年已降到 8.19‰。由此看来 1958 年以后中国人口死亡率超过 15‰已经就含有相当数量的非正常死亡人数了，而一旦超过 20‰，即超过 1949 年的水平，说明有大量非正常死亡了。因而，20‰以上的死亡率就是地地道道的重灾区。

这期间已达重灾区的有安徽，1960 年人口死亡率上升到 68.60‰这个可怕的指数；山东，1960 年死亡率上升到 23.6‰；河南 1960 年死亡率上升到 39.56‰；湖北 1960 年死亡率上升到 21.21‰；湖南 1960 年死亡率上升到 29.42‰；广西 1960 年死亡率上升到 29.46‰；四川从 1958 年开始死亡率都超过 20‰以上，其中 1958 年为 25.17‰，1959 年为 46.97‰，1960 年为 53.97‰，1961 年为 29.42‰；贵州 1960 年死亡率上升到 45.38‰；云南 1958 年的人口死亡率上升到 21.62‰，而 1960 年则又上升到 26.26‰；甘肃 1960 年死亡率上升为 41.32‰，青海 1960 年死亡率上升为 40.73‰。当今世界这样高的死亡率只能在非洲最贫穷的国家才会发生。而 1960 年前后，有些县的死亡率有超 100‰的，多么可怕！

这里就一些重灾区的几个最为典型的死亡事件作以反映。

## 信阳严重死亡事件

河南信阳地区在 1958 年大跃进时期是一面红旗，在 1959—1961 年困难时期自然成了重灾区。

1958 年 2 月，信阳地委根据上级指示，制定全面跃进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对国民经济发展的各个方面提出诸多不切实际的高指标，后又一再修改提高，根本不能实现。如粮食生产要求 1962 年总产量达到 600 亿斤，亩产 4000 斤，是 1957 年实际产量的 10 倍多，还具体规划培养亩产粮 5000 斤的丰产田 300 万亩，6000 斤的 200 万亩，7000 斤的 150 万亩，万斤以上的 50 万亩。5 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通过“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6 月，全区组织 60 万人进行宣传动员，掀起波澜壮阔的“大跃进”热潮。8 月，地委公布全区夏粮总产 42.2 亿斤，放出亩产小麦 7320 斤（西平县）的高额丰产大“卫星”。于是高额丰产亩、丰产队、丰产社纷纷涌出，信阳县更喊出“鸡公山上红旗插，水稻亩产四万八”的口号。地委进而规定各级干部包种第二年小麦试验田，亩产 1~3 万斤。为此，各地掀起深翻土地和高度密植运动，普遍翻土 3~7 尺，多的超过 1 丈；每亩播麦种二三百斤，多的达 500 斤。各条战线跃进的声浪争相迭起，大建各类学校，大办化肥农药，大搞滚珠轴承等口号不一而足，许多地方一夜之间变成无文盲的社，无犯罪的县，无苍蝇蚊子的城市。人们敢想、敢说、敢干，豪情奔放，不可遏止。高潮声中，迅速实现人民公社化，掀起大炼钢铁运动与全国跃进汇成洪流，使人们的激情升温到沸腾的程度。

1958 年 4 月，遂平县山渣岬山率先将小社并大社，7 月，地委召开现场会推广经验。7 月 20 日，商城县城关田棚召开 10 万人大会，庆祝超英人民公社建立。法新社记者、苏联驻华使馆派

人专程参加采访，《河南日报》、《人民日报》以显著栏目报道，国务院还颁发奖状，此后，全区兴建人民公社运动进入高潮。8~9月，先后建成大型人民公社190个，其中最大的固始县“七一”人民公社，人社户数47800户。10~11月，合并建立更大的一县一社5个，县联社11个，人社农户占全区总农户的99%以上。人民公社实行政社合一一体制，工、农、商、学、兵五位一体，农、林、牧、副、渔统一经营。生产资料公有，劳动实行军事建制，大兵团作战；取消商品生产和集市贸易，劳动产品均由公社统一分配，实行供给制。还大办公共食堂，大人小孩都到食堂吃饭，连住在深山老林的孤门独户，也要到几里外打饭。与此同时，地委成立钢铁办公室，组织116万劳动力和5700多名干部投入钢铁生产。工农商学兵上山采矿，男女老少收集废铜烂铁，伐树烧炭，建起炼铁炉38061座，炼钢炉434座。“钢铁卫星”纷纷起飞，全区大部分山林遭到破坏。商城县放出日产钢铁万吨的超级卫星，冶金部来此开现场会，全国的钢铁元帅荟萃，激动得小山城沸沸扬扬。

1959年，跃进的声浪鼓得更高。批判干部中的所谓保守思想及观潮派、秋后算账派和农民中的自发倾向，使许多说实话的干部和群众遭到斗争。不少基层干部违法乱纪，迫害群众。跃进和斗争造成社会生活全面紧张。2月，商城县越美公社观庙、汪桥两管理区的78个食堂有74个先后断粮，以青菜充饥，病死饿死了数人。林湾生产队共产党员许学富两次给周恩来总理发电报反映情况，国务院派人调查，指示本地领导迅速解决问题。5月，许多商品脱销，城镇整顿口粮指标，农村食堂以人定量。7月，地委召开财贸会议，要求反右倾，鼓干劲，掀起高潮，开展节约运动。9月贯彻庐山会议精神，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有3300多名对大跃进、人民公社和浮夸风有微词的干部受到批判斗争。但是，就在这高潮声中，大自然降下一场百日无雨的旱

灾，秋粮减产，大多数食堂 10 月开始缺粮或停伙。而地委不看事实，不顾群众死活，大搞反瞒产运动。省下达信阳专区 9.7 亿斤的征购任务本已不能完成，地委却发出“过三关”（叫喊缺粮关、食堂停伙关、人口外流关）的命令，强迫各级党政超额完成。社队没有粮食，就召开假现场会，将稻壳稻草垫在仓底层让人参观，食堂不开伙，有人外逃谋生，被当作“流窜犯”看管起来，全区收容 46 万人次，其中致死一部分人。有的杀牛驴充饥，被定为破坏集体财产罪，全区因此而遭逮捕的有 2053 人，狱中死了数人。更有甚者，当山县白雀公社民校教师李玉伦、中共信阳县监委书记胡修玉、专区建筑局党员邢贵良等向中央写信反映实情，皆遭到审查、处分或下放劳动。人们普遍患浮肿病，非正常死亡人数日益增多。

信阳地区在困难时期饿死人口 40 余万。其中 9 个县的人口死亡率超过 100%。中共信阳地委在纠正左倾路线时向中央报告说，仅 1959 年冬到 1960 年春，正阳县就死亡 8 万多，新蔡县死亡近 10 万，遂平县岷蚜人民公社一个社就死亡 4000 人，占总人口的 10%。全地区一半人口处在气息奄奄之中。<sup>①</sup> 信阳地区的公共食堂都断炊了，最严重的村子 80 多天没有见过一粒粮食，浮肿病遍地皆是，农民大量外逃和饿死。有个叫李家庄的村子，原来 15 户人家，共 87 人。从 1960 年春天起，死的死、逃的逃。1961 年毛主席的秘书叶子龙调查对，该村只剩 32 人了。5 岁以下的小孩仅有 4 人，50 以上的老人仅有 1 人。“整个村子没有鸡叫，没有狗吠，一片萧条冷落，仿佛死亡的峡谷”。<sup>②</sup>

在困难时期，信阳地区的一些干部打着反右倾、抓阶级斗争的旗号，大肆迫害群众。例如 1960 年底信阳事件被揭出真相后，地委给中央的报告中说：罗山县竹杆公社同心大队五年级的贫农

<sup>①</sup> 《大跃进的狂澜》202 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 年出版。

<sup>②</sup> 见《渴望真话刘少奇在 1961 年》第 102—103 页。

女学生反映她的父亲、妹妹被迫害致死。商城县的贫农社员曹花荣的丈夫，1959年被小队长罗德卿逼死，而又霸占曹花荣为妻，新蔡县练村公社贫农社员赵化的儿子被小队干部打残。不仅农村如此，城市的学校、工厂残害人的事件也屡屡发生。光山县12个中学，有八个学校校长有人命案，城关的两个学校被打死逼死的学生教员达28人。报告的结论是：“不论淮南、淮北广大群众在经济上都遭受了极大的摧残，生活异常困难，真是十室九空，家贫如洗。”<sup>①</sup>这就是骇人听闻的“信阳事件”。当时毛主席都感到震惊，并亲自批示：“坏人当权，打人死人，粮食减产，吃不饱饭，民主革命尚未完成，封建势力大大作怪，对社会主义更加仇恨，破坏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当然，毛主席的批示仍然是从阶级斗争的观点看待信阳事件。今天我们看来，造成信阳事件的正是一条左的路线所致。

### 甘肃通渭死亡事件

1957年以来，甘肃通渭县的极左政策达到了疯狂程度。1957年到1959年批判富裕中农冒尖人物，错批错斗农民10360多人，1958年春，抽调劳动力17900人大办工业，5月抽调1.8万劳动力投入引洮工程，8月田黄在地，又抽调5万多劳动力摆成长蛇阵，应付水土保持检查团，1959年又抽调5万劳动力，兴修6个大中水库。由于接二连三地抽调劳动力搞大跃进，农业遭到严重破坏，1959年亩产只有49斤，1957年总产16423万斤，1960年降为3632.4万斤。而县领导人为了表功，就搞高征购，36%的粮食上交国家粮库。1958年春季开始，碧玉、第三铺、义岗等公社就发生了人口外流和饿死人的现象。1959年

---

<sup>①</sup> 《信阳地委关于整风运动和生产救灾的报告》，见中发（61）4号文件附件。

饥饿更为严重，全县 162 个大队中，有 102 个大队三个月没有给社员打过口粮，有些队的社员 40 天没有吃到粮食，靠野菜、野草、树皮度生。县委领导认为反映缺粮的人是“富裕中农”、“坏分子”、“反党分子”，是“五类分子搞鬼”。于是搞“千人斗争会”，“万人斗争会”，迫害了无数干部和社员。在农村大搜大查，拷打群众，翻箱倒柜，大挖粮食，不让社员家有一斤一两粮食。1960 年赵庄生产队饿死 50 多人，生产完全停顿，但却对上报告：“社员情绪饱满，牲畜体力壮，生产搞得较好”。有的公社提出“宁欠血债，不欠粮食”，迫使农民交粮。仅马营公社党委书记亲自主持毒打群众 160 多人。通渭县在搜粮中打死、逼死 1300 多人。通渭县经济上的崩溃加上县、社干部的法西斯作风，给该县造成了巨大灾难。困难时期，全县死亡人口 60210 人，死绝户 2163 户，1221 个孩子失去双亲变成孤儿，外流人口 11940 人，土地荒芜 36 万亩，牲畜死亡 3.3 万头，羊被宰杀 4 万多只，猪、鸡、狗、猫几乎绝了种。发生了多起人吃人的惨案。拆毁房屋 5 万间，砍伐树木 27 万株，学校、工厂关门。一幅民不聊生、哀鸿遍野的景象，这就是通渭大死亡事件的实况。<sup>①</sup>

### 青海湟中死人事件

据一位亲任县委书记的人讲，1957 年前的湟中县“是一个富饶繁荣的地方”，这是我国藏传佛教中的黄教创始人宗喀巴的出生地，是著名的塔尔寺所在地。1957 年 11 月份派了个县委书记柳一，此人到湟中的第一件大事是“反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倾向”。采取大打出手的办法挖农民的所谓“陈粮”，1957 年全县总产 8600 万斤，有 4274 万斤被征购，其中从农民家里搜出

<sup>①</sup> 《通渭县委关于通渭的历史教训》，见《甘肃省农业合作制重要文献汇编》，甘肃人民出版社，1988 年出版。

1200万斤，从此农民储备的一点粮食全部挖光了。柳一干的第二件大事，是在1958年提出“大战七天七夜实现全县水利化”，虽然真正距水利化差十万八千里，但报纸上却报道：“惶中苦战六昼夜，完成了888000亩水利工程，实现了全县水利化。”比原计划七天提前一天实现水利化，效率多么神奇！从这个数字看，柳一先生很有超前眼光，把888这个改革以来才象征发财的数字，到1958年就用上了，实在聪明绝顶。果然柳一先生得到了报答，跟着省委书记出席了中央北戴河会议。此人的第三件业绩是大搞“万斤田”，提出惶中1958年要搞30万亩“万斤田”，订出了34亿斤的粮食指标，并在全省介绍了实现“万斤田”的经验。此人第四件功绩，简直是一个创举，就是大挖坟墓作肥料。到处威逼群众把祖先的坟墓挖开，把腐烂的尸体当肥料上地，把棺材当粪厢。结果惶中的田野间出现了东扔一具、西扔一具尸骨的惨象。不过群众并没有表扬柳一的创举，而骂“共产党连先人都不要了”。柳一先生的第五件大事是“反瞒产”。尽管惶中县在柳一的领导下民穷财尽，但柳一不相信有这类现象，认为没粮的说法是“阶级敌人”在捣鬼。于是就召开“反瞒产”斗争会。斗争会是有效的，仅小南川和汉东两个公社就逼出两万多斤的假数字，在反瞒产斗争中沙尔湾的一位小队长上吊自杀，汉东的支部书记被整死，下洛马生产队的队长被毒打后死亡。柳一的五大创举带来的后果是什么呢？请看1960年底新任县委书记刘泽西的揭发：

全县163个队中有112个队大量死人，尸体成堆，有的队死亡达40%。汉东公社小磨石沟的一个水洞内就放了100多具尸首，黄鼠湾队有一天一个马车就拉出30多个死人。上新庄公社死亡1600多人，老幼堡大队死亡600多人。1960年惶中县饿死人15230人，占总人口的12.87%，死绝达1000多户，700多个孩子变成了孤儿。牲畜死亡4718头，占总头数的25.7%。

人吃人的事达 110 多起，汉东公社杨家滩生产队的一个妇女竟吃了 9 个小孩。不过柳一先生对吃人也是不赞同的，要把它提到阶级斗争的纲上来认识，如小南川公社群加生产队的李启梅吃了人，被柳一按“反革命分子逮捕法办”。<sup>①</sup> 笔者至今不明白李启梅要搞反革命，为什么采取吃人的办法，而不是聚众闹事的办法。这就是血淋淋的湟中事件，谁听了不齿寒。

### 广西环江县死亡事件

1960 年广西人口死亡率达 29.4‰，所以各地都有惨案发生。这里只举环江县死亡事件。

环江县位于广西西北部，总面积 4500 多平方公里，居住着毛南族、壮族、瑶族、仫佬族、水族、侗族等多种民族。这里原为产粮大县，畜牧业发达，森林资源丰富。自 1957 年 11 月洪华任县委书记后，环江县出现了大踏步蜕变。

洪华是一位在大跃进中“敢为天下先”的人物。他的口号是：“争全区第一，全国第一，天下第一”。他在 1958 年做了两个“壮举”，一个是放了一个亩产 13 万斤的早稻卫星，一个是放了一个日产 6 万吨钢的钢铁卫星。这两个卫星曾使环江县成了红旗县、上游县，县委书记洪华成了英雄人物。当他在地委介绍了先进经验后，回到县上时，组织成千上万人欢迎英雄的到来，洪华被人高高抬起，一直抬到县委会。不过洪华出行，这样的场面也是不乏的。如有次洪华要去山川公社巡视，晚上两点钟就组织社员在路边欢迎，全公社 18000 多人，竟出动了 11000 多人，欢迎洪华，欢迎队伍有 5 里长。

洪华先生是一个造假的游戏大师。他的亩产 13 万斤的高产

---

<sup>①</sup> 1961 年 7 月 1 日青海省《小组会议简报》，农业区小组第 14 号。此件藏青海省档案馆。

卫星是头脑设计出的，而不是稻田长出的。据后来揭发，是把几块稻田的稻谷堆在县委大院，冒充一亩田的杰作，且在过秤表演时，让挑担的人循环重复上秤，于是亩产 13 万斤的数字在众目睽睽下编造出来了，还编得天衣无缝，人民日报都报道了。

洪华还是一位搞阶级斗争的“勇士”。他 1957 年上台后，在县上清洗了一大批“右派分子”。1959 年他开始搞高征购。他能够无中生有，有中生多。1958 年实产 1.05 亿斤，他说成了 3.3 亿斤，竟接受了 0.71 亿斤的征购粮任务，是上年实际完成任务的 4.8 倍。他在县里连续召开“反瞒产”、“反右倾”的大会，采取批斗、“小劳改”、不给饭吃等办法，使 13 人被活活整死。他的阶级“立场”是很坚硬的，面对被整死的人，他竟说：“这些人是社会主义的逃兵，死去几个不要紧。”一些不甘心就地饿死的人，纷纷外逃，洪华下令追捕，在关押之中竟有 44 人连闷带挤而死去。在追捕外逃人员中，水源公社书记韩祖文按洪华的指示宣布：“外逃人员经动员还不回来的，就打死算了。”

洪华在环江县的创举带来的后果是什么？据曾任环江县领导的王定披露：

1959 年到 1960 年前后，环江县社员家中家家无炊烟，几个公社的公共食堂停伙，有的长达 1 个月，有的长达 130 天，饥饿造成的浮肿、干瘦、子宫脱落等各种疾病与日俱增。1959 年 5 月至 6 月间，环江县明伦公社病倒 1600 多人，其中重病 1004 人，浮肿 486 人，死亡 146 人。1959 年至 1960 年，城关公社的陈双大队的死亡率为 26%，即 260‰，付点公社的中川大队死亡率为 46.57%，即 465.7‰，驯乐公社的康宁大队死亡率为 45.5%，即 455‰。水源公社的龙树屯、驯乐公社训林大队岩口屯两个自然村的村民全部饿死。水源公社死去的 1706 人，其中 1500 人属饿死，15 人是当场斗死，82 人是斗争吊打致重伤而死，5 人被开枪打死，有 9 户全家死绝。据广西自治区的一位领

导反映，环江县在困难时期死去了35万多农民。洪华对环江县的死人的事当时是不让谈论的，曾下令：“凡是写给上级党委的信，全部扣留，送交县委审查”。洪华对死人的事大讲“辩证法”。他说：“死几个人值得什么大惊小怪，有生就有死，生生死死，死死生生，这是自然规律”。<sup>①</sup> 看，人们一旦遇到这样的县委书记，只有死路一条。

我们不要误以为广西只有环江县一县陷入灾难。这个自治区从1959年开始，人口就大量死亡，当年的人口死亡率为17.49%，1960年则上升为29.46%，1961年仍高达19.50%。

1961年3月30日广西壮族自治区民政厅的救灾工作汇报中称，经中央同意，减少了广西的征购任务，又增拨了8200万斤粮，平均口粮才达到20斤左右。据平乐、柳江、河池、马山、田阳、睦边、博白、凌乐、德保、大瑶山等县统计，有181361人需要救济口粮。广西现有99万病人，急需求助与治疗。其中浮肿病28万人，干瘦病人28.6万人，妇女子宫脱垂病10.2万人，妇女闭经病23.8万人，小儿营养不良3万多人，其他病人5万多。兴安、环江、三江、大苗山、苍梧等县不完全统计共建立孤儿院29个，收养孤儿1204人。<sup>②</sup> 1961年已经开始公开抢救人命了，广西仍有如此多的饥民和饥饿引起的病人，可想而知1960年的苦难有多深重了。

### 湖南宁乡县和湘乡县的死亡事件

宁乡县是刘少奇的故乡，湘乡是毛主席故乡韶山的近邻。两县在三年困难时期充满着死亡和眼泪，1961年刘少奇亲自到家调查“五风”危害及公共食堂问题。我这里引用的绝大部分是已

---

<sup>①</sup> 见《真相》一书1—14页，南方日报出版社，2000年出版。  
<sup>②</sup> 《广西自然灾害及救灾档案资料选编》，原件藏广西档案馆

披露的刘少奇调查的资料。

1961年2月12日宁乡县有一张统计表：

病人总数 73282 人

①水肿病 43512 人

其中 重 18134 人

中 13453 人

轻 11925 人

②妇科病 23068 人

其中子宫脱落 7464 人

闭经 8309 人

其他 7295 人

③小儿疳积 6702 人

宁乡县给刘少奇汇报时先说有 20000 多人饿死，而县委副书记何长友说：“不止这么多。据我在整风中掌握的情况，全县有 45000 多人，或因饥饿，或因疾病，有的是在修水库的工地上死亡的。”东湖塘公社望冲队第三生产队原有七人，由于饥饿跑了十人，有的跑江西，有的跑新疆，有的不知去向。还有七人死亡，死者除一位老人外，其余六人都是青壮年。有两个人死于水肿病。由于粮食定量少，没有足够的淀粉和蛋白质摄入，首先是夜里尿多，后来脚踝浮肿，并逐渐向上推移至腹部。肌肉渐渐没有了弹性，手指一压，肌肤表皮便出现一个小坑，几分钟后才慢慢复原。这两人就因为得不到及时治疗 and 营养，日益干瘦，心肾功能衰竭而死亡。这段记载，反映了 1960 年浮肿病人痛苦死亡的共象。有一个叫王四大汉的社员死于肛门脱落，他力气大，一肩能挑 400 斤，肚皮大，吃得多，有时一口气吃 14 碗长寿面，社员粮食定量一降再降，他忍受不了每顿清水煮萝卜的食物，就在山上挖观音泥，一直吃到肚皮鼓胀，解不出大便，肛门掉下来，抬到医院，两天咽气了，死的时候肚里全是鼓胀的泥土，另

一个妇女是投塘自尽的。因为她涉嫌多拿了食堂的一钵饭，队里开会批斗她，她想不通，投水了。时任小队长的张富纪给刘少奇说，全大队原来有 830 多人，现在剩下 740 多人，跑了 40 多人，死了 38 人，另外还有 100 多个病号。刘少奇在天华大队从他的外甥女口中了解到她们食堂死人的事，这个食堂这两月就死了 11 人，包括她的父亲吃“糠粑粑，屙屎不出，闭死了。”刘少奇为了解开社员吃的是什么，曾用脚搓开了一堆干了的人粪，发现里面尽是粗纤维，说明社员吃的已不是粮食了。刘少奇还在故乡炭子冲了解到 1957 年这里亩产 600 余斤，现在只有 280 余斤。过去每户两头猪，三只鸡，现在全队仅有一只母猪和一只鸡。这里的窘境使刘少奇心情十分沉重。特别是当他到了家乡的山坡，坡上有一片新坟，一数共十二座，坟堆上有红绿纸剪成的引魂幡，几只老鸦在坟头跳跃，凄怆地叫着。他想像到这些乡亲是因何而死的，身为国家主席的他，只有连声叹息。

关于湘乡县一些公社的死亡情况，1961 年 4 月 14 日胡乔木给毛主席的信中这样讲：

昨天，我和王力同志、毛华初同志、省农业厅贺炳贤同志等人去了一次湘乡县委，我们原听说邻近韶山的东郊公社现龙洞公社死人的情况（从一九五八年十月至一九六一年三月，三个大队死七百零七人，占现有人口百分之十三点五），拟去该处调查，结果因道路不便，临时到原东郊公社陈赓公社的楠香大队、七星大队、水底大队、石匠大队的几个生产队看了一下，发现这几个大队情况也很严重。楠香和石匠两大队三年约死三百人，去年约死二百人。而以去年年底最为严重，全县病人在去年年底达七万人，现已减到万余，但我们去的地方，有些生产队病情尚未停止……①

---

① 《渴望真话刘少奇在 1961 年》，珠海出版社，2000 年出版。

在人们的心目中，湖南湘潭地区，韶山地区，宁乡地区都是神圣的地方，因为它们同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人物毛泽东、刘少奇相联系，这是他们的故乡所在地，但没有想到领袖故乡竟同别的地方一样，在三年困难时期遇到如此大的灾难。其实这并不奇怪，哪个地方推行左的政策，哪个地方就会有同样悲惨的结局。正因为是领袖故乡，地方领导人更要表现左一些，以示“革命传统”不能丢。请看宁乡县委在王家湾用火烧的办法逼社员报告产量的一幕：

1959年9月底开会落实产量，县里的口号是：亩产双千斤粮，万斤薯；每个小队20头猪，10万尾鱼。公社派妇女主任到王家湾督阵，方针是“争当上游，火烧中游，油炸下游。”对那些产量报得少的，不是用竹片打，就是准备用火去烧。于是在全队掀起了报高产的高潮，20分钟，全大队14个小队都落实了双千斤。交征购任务时，出现了打人风，公社开会打人，队里开会也打人，干部打群众，大干部打小干部。有这类左的人左的政策，不出现饿死人的惨景才怪呢！

### 云南曲靖等地的死人事件

云南从1958年大跃进开始，就出现边跃进边死亡的悲剧。1958年人口死亡率已达21.62%。7月22日云南省委农村工作部向各地发电报，号召打破迷信，大放卫星。要求早稻放亩产3万斤以上的卫星，晚稻放“5万斤以上争取10万的卫星”，9个县的小麦卫星不少于亩产1万斤。9月6日报道了大理白族自治州漾濞县平坡乡平坡村放出了亩产稻谷33492斤的卫星，而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金平县卫星公社放出了亩产稻谷60479斤的卫星。在一些地方放卫星的时候，另外一些地方已出现严重饥饿现象。1958年7月27日云南省委不得不向中央报告曲靖等地人口

浮肿与死亡的情况。全省已有8个地州、50个县发生肿病患者14万余人，已死亡2.6万余人。到8月20日止，全省发病人数已达23.6万人，死亡3.4万人，尤以曲靖等地最为严重，累计发病14.1万人，死亡1.89万人。云南省委还检查了发生死人事件的原因：一是领导作风不深入，对大跃进中超强度的劳动者关心不够，造成许多人营养不良而发病死亡。二是对一些干部强迫命令、违法乱纪的严重情况估计不足，不敢正视粮食问题，对干部中浮夸、谎报的情况警惕不够。

1960年初，云南许多地方发生大量死人现象。3月28日省委批转的省委办公厅的报告说，至3月20日止，据7个专区统计，肿病人达19410人，比1月增加8000多人，比2月增1.2万人，累计死亡1400多人。思茅地委报告：景东县5个管区有30人发生肿病，9人已死亡。旧村管区第三生产队有10人患病，4人已死亡，大村管区发病10人，3人已死亡。4月17日云南省委向中央报告了剑川县金华公社人口大量浮肿和死亡的事件。这个公社从1960年1月到4月，患各种病的人达4080人，其中肿病占76.8%，已死亡1390人，肿病死亡916人，占死亡人数的66%。这个公社有总人口27000人，已有25~39%的劳动力患病。奇怪的是云南省委在寻找剑川县金华公社人口大量死亡的原因时，做了颠倒黑白的解释，说是“公社领导权被反党反社会主义集团所篡夺。”这个反党集团干的什么事呢？其罪行是公社把全部大牲畜和80%以上的猪下放私人养，把口粮下放在小队，鼓励私人开荒搞自留地，干部整改时走了过场，在反右倾机会主义斗争中敷衍了事，“不能有力地领导农村两条道路的斗争，”公共食堂名存实亡。<sup>①</sup>把这样实事求是的公社领导人打成反党集团，可谓太冤，而把真正造成剑川灾难的左倾路线则加以掩盖，可谓太奇。

---

<sup>①</sup> 《当代云南大事纪要》，当代中国出版社，复印于云南省档案馆。

附： 1958年—1961年全国各地区死亡率统计表 ‰

地 区	年 份			
	1958	1959	1960	1961
北 京	8.08	9.66	9.14	10.80
天 津	8.66	9.88	10.34	9.89
河 北	10.29	12.29	15.84	13.63
山 西	11.73	12.84	14.21	12.20
内 蒙 古	7.9	11.0	9.4	8.8
辽 宁	8.8	11.8	11.5	17.5
吉 林	9.1	13.4	10.1	12.0
黑 龙 江	9.17	12.76	10.57	11.13
上 海	5.9	6.9	6.8	7.7
江 苏	9.40	14.55	18.41	13.35
浙 江	9.15	10.81	11.88	9.84
安 徽	12.30	16.70	68.60	8.10
福 建	7.46	7.88	15.34	11.87
江 西	11.34	13.01	16.06	11.54
山 东	12.48	18.2	23.6	18.4
河 南	12.69	14.10	39.56	10.20
湖 北	9.60	14.49	21.21	9.08
湖 南	11.65	12.99	29.42	17.48
广 东	9.17	11.10	15.24	10.82
广 西	11.74	17.49	29.46	19.50
四 川	25.17	46.97	53.97	29.42
贵 州	13.69	16.18	45.38	17.73
云 南	21.62	17.95	26.26	11.84
陕 西	11.01	12.72	12.27	8.76
甘 肃	21.11	17.36	41.32	11.48
青 海	12.99	16.58	40.73	11.68
宁 夏	14.98	15.82	13.90	10.71
新 疆	13.00	18.84	15.67	11.71

### 三、天涯何处无饥寒

中国各地左倾路线肆虐的程度不同，各地粮食储存和生产的水平不同。三年大饥荒时期，困难的程度大不一样，人口减少和死亡的数量呈现出很大差异。

1957年全国总人口为64653万人，比1956年增加1825万人，自增率为23.23‰；1958年总人口为65994万人，因出生率下降了35‰，死亡率上升31.1‰，人口的增加为1341万人，比1957年少增484万人，自增率为17.24‰；1959年总人口67207万人，因出生率比1958年下降4.5‰，死亡率上升3.5‰，人口增长大大减缓，自增率10.9‰，增加人口为1213万人；1960年总人口降为66207万人，减少了1000万人，出生率为20‰，比1959年下降了3‰，死亡率上升为25.43‰，人口自增率呈-4.57‰；1961年总人口为65859万人，比1960年又减少348万人。由1958年开始的人口缓增长，到1959年人口增长继续下降，到1960年至1961年人口大规模减少，说明从1958年开始就有饥饿的袭击，而到1960年、1961年饥饿达到了顶点，如再不悬崖勒马，抢救人命，民族的存亡面临严峻考验。

全国的平均人口减少和死亡并不否定局部地方生活的相对温饱，人口的继续增长。前面已经讲了大约有三类地区情况好一些：一类为左倾蛮干缓和地区，如一些少数民族自治地区，一些为历史上的鱼米之乡，一些为国家重点保证的大城市。以最困难的1960年为例：北京市当年人口为732.1万人，比上年增加48万人，人口出生率为33.0‰，死亡率为9.14‰，自增率为23.89‰；天津总人口为584万人，比上年增加16万人，出生率27.38‰，死亡率10.34‰，自增率17.04‰；山西省当年人口为1703.02万人，比上年增36.45万人，出生率为27.33‰，

死亡率为 14.21‰，自增率 13.12‰；内蒙古自治区当年总人口为 1191 万人，比上年增加 28 万人，出生率为 29.4‰，死亡率为 9.4‰，自增率为 20‰；吉林 1960 年人口 1397.1 万，人口增加 84.1 万，出生率为 32.5‰，死亡率为 10.1‰，自增率为 22.4‰，该省 1961 年的情况不妙，出生率下降了 6‰，死亡率上升了 2‰，可见饥饿的反映凸显出来了；黑龙江 1960 年总人口 1807.1 万，比上年增加 125.1 万，出生率 32.57‰，死亡率 10.57‰，自然增长率 22.05‰，该省 1961 年人口增长放慢，增加人口 90 万，出生率 5.5‰，死亡率上升了 1‰，自增率下降了 4‰；上海市 1960 年总人口 1056.30 万人，比上年增长 27.71 万人，出生率为 27.6‰，死亡率为 6.8‰，自然增长率为 20.8‰；浙江省 1960 年总人口 2620 万人，人口比上年增长 22 万，出生率为 23.51‰，死亡率为 11.88‰，自增率 11.63‰；新疆 1960 年总人口 686 万，比上年增长 37 万，出生率为 28.13‰，死亡率 15.67‰，自增率为 12.46‰，该自治区 1961 年人口继续增加，共增 24 万人口，而 1962 年则出现人口减少，共比上年减少 11 万，这可能是从甘肃流入新疆的盲流人口，随原籍生活的好转而又流走，而并非饿死者增多所致，因为当年新疆人口的死亡率很低，仅为 9.71‰。

以上所列的是人口在 1960 年未锐减而略有增加的省区，但能否说这些省区的人民都已丰衣足食，而无饥寒之苦？我们的考证是否定的。

请看北京的几个镜头：

中共通县县委给北京市委关于代食品的报告中这样讲：

我县永乐店、牛堡屯和马驹桥三个公社都以种稻为主，吃的代食品主要是稻草粉。三个公社共有代食品原料 561 万斤，其中稻草 347.9 万斤，占 62%。据化验，稻草粉养份很少，吃后肚寒拉稀，影响身体健康。最近市里调给我县的 120 万斤豆腐渣，分配给这三个公社 110 万斤，调给我县的 5 万斤高粱糠，分配给

这三个公社 3 万斤，县里又发下 6 万斤细稻糠，35000 斤棉仁饼，9000 斤香油渣。这样，根据市委指标，自一月中旬已停止食用稻草粉。但公社原有的代食品加上市、县调拨的 21.22 万斤（豆腐渣按四比一折干），仅有 110.02 万斤，三个公社共有 110737 口人，按 20% 搭配代食品，只能维持 35 天，到三月底全部用完。从三月到六月尚需 116 万斤代食品，县里实无法调剂。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请求把市化工局冻结通县糠醛厂的 100 万斤玉米骨调给我们，以便加工淀粉，供应稻区社员食用。当否，请批示。

北京虽然 1960 年人口增加了 48 万，且死亡率为 9.14%，但并不能掩盖农民的极端贫穷与饥寒。从上面通县县委向北京市委的求救“请示”中，可知通县农民度日的是稻草粉、高粱糠、细稻糠、豆腐渣、玉米骨，这些东西正常年间有些可供牛马驴，有些这类大牲畜也难以下咽。而 1960 年堂堂首都通县社员竟将之视为难得之物，悲哉悲哉。

再看北京市城市职工生活困难的一角。市电业系统记载：“北京电业职工在 1960 年 11 月 26 日发生了首例浮肿病患者，到 12 月 2 日短短一周时间，浮肿病患者增至 144 人。其中职工 105 人，学生 9 人，家属 30 人，到 12 月底，累计发病职工 1256 人，占职工总数的 7%，已治愈 883 人，正在治疗的 373 人。”1961 年浮肿病人继续增加，同一个资料指出：

尽管如此，浮肿病在 1961 年春天还是继续发生了，一些治愈的病人也有所复发，3 月底累计发病 1505 人，4 月底累计发病 1514 人，直到夏收以后，才逐步好转。

北京市在困难时期实行全面票证管理，以维持最低生活标准。有本资料记载：

60 年代初的三年困难时期，口粮定量全面压缩，国人更视粮为宝。北京从 1960 年 8 月起全市饮食行业实行凭票用餐，食油、蛋、禽、肉、豆制品、蔬菜也实行限量供应，只剩下豆浆不

要票了。据 11 月 28 日统计，197 个单位约 6000 人因严重营养不良而造成浮肿。针对各种现实情况，增发了补助豆票、糕点票、饼干票、儿童食品补助票、侨汇粮油票、高级脑力劳动者补助油票、节日补助油票等，为了奖励农民发展生产，在农村还发行了收购猪、鸭、鸡蛋的奖励票，用于收购核桃、杏仁、栗子、蓖麻籽的奖励票和用于鼓励农民交售鸡蛋的鸡蛋面票。这一时期粮票种类繁多，面额两两计较。每当发粮时，家家都由当家人亲自去领，领回后甚至入柜加锁。<sup>①</sup>

从这里可以看出，北京成了票证世界，可见食品之匮乏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其实，在北京不仅老百姓实行定量票证管理，对最高领导层也实行定量和票证供应。有资料披露，中央领导自报粮食定量标准，周恩来总理报的是 15 斤，毛主席是 25 斤，贺龙报得最多为 32 斤，其他领导人也都报在 30 斤以内。这种与民同甘苦的精神可佩可赞，但国家总理日理万机，每月吃 15 斤粮，其身体饿垮对国家何益？三年时期在中央政治委员中没有饿死人的记载，但日子过得窘迫这是实在的。笔者看到一幅刘少奇主席和夫人王光美拣野菜以补充食品不足的照片，心里有些难过。我们还看到毛主席家里在 1960 年常不吃肉的记载。当李讷反映北京大学大师傅打饭不够量饿得学生发慌的事时，毛主席无可奈何地说：我管不了北大的大师傅。这里值得赘一句的是三年困难时期，中央政治局委员算苦度了过来，没有一位因饥饿而亡，但文革期间这类事却出现了。从刘少奇、彭德怀、贺龙等人惨死的记载中，这些领导人除了受造反派肉体折磨外，施以饥渴手段，也是这些领导人死亡的重要因素。如贺龙不仅不给食品，连水也不给喝，只能望水兴叹，与夫人画饼充饥。这些领导人熬过了三年困难时期，而却没有熬过文革的浩劫。

上海虽然 1960 年人口增加了 27.71 万人，且死亡率为 6.

---

<sup>①</sup> 《抚今追昔话北京》，510 页，北京出版社，1999 年出版。

8‰，但上海人也在忍饥忍寒。当时任周总理办公室主任的童小鹏回忆道：

“在三年困难时期，城市人民因缺乏粮食和副食品，普遍发生浮肿病，饿死了不少人，各地要粮的电报像雪片飞来，堆满了周总理的办公桌，使他难于应付。他只好要粮食部和铁道部准备好装着粮食的火车，哪里急需，火车就往哪里开，有一次，上海库存只够供应三天，这个全国最大的城市，一旦缺粮，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周总理就用这个办法解决了上海的燃眉之急。<sup>①</sup>

上海市民的饥饿这里暂且不谈，我们现在把注意力集中到孤儿身上。当时上海等地的孤儿院不断发出呼救：孩子营养不足，饥饿威胁着他们的生命。有一次康克清在北京对开会的乌兰夫说，请救救上海和华东几个城市的孩子，支援些奶粉。乌兰夫不仅答应送奶粉，而且有更良好的措施。他对康克清说，最好把困难的孩子送到内蒙古来。牧民们都喜欢孩子，把孤儿送给牧民不是两全其美吗？康克清给周总理汇报了解救上海等地孤儿的事，周总理说：“这很好嘛，内蒙古地广人稀，特别是牧区缺少孩子，牧民又喜欢孩子，多收养些南方孤儿，帮助解决燃眉之急。”最后终于把上海等地 3000 多名孤儿转到了内蒙古由牧民收养。

浙江是困难时期应引以为自豪的省，1960 年人口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 22 万，出生率仍高达 23.51‰，死亡率为 11.88%，自增率为 11.63‰，但笔者在温州档案馆查资料时，发现了许多记载粮食奇缺的报告。其中有份温州市委向浙江省委的汇报，大体反映了如下情况：

1961 年 1 月 26 日不完全统计，本市农村和城市发现浮肿病人 2472 人，其中农村 1982 人，不包括已治愈的 1399 人，城市 490 人，不包括治愈的 79 人。市属厂矿检查 348 个工厂，23011 名工人，有 43 个工厂有浮肿病人，患者 340 人。社办厂检查 6

---

<sup>①</sup> 见《三千孤儿和他们的草原母亲》，1997 年 8 月 13 日人民日报。

个，发现浮肿病人 17 人。教育系统检查了 39 个大中小学，有 22 个有浮肿病人，患者 66 人。商业系统检查了 2986 人，有 15 个浮肿病人。

原因：去年下半年不少工厂劳动 12 小时，连续几个月不休息。草席厂女工徐风珠是先进工作者，23 岁，经常劳动 12 个小时。一些人家庭生活困难，营养太差。草席厂运输工张成法 43 岁，全家 7 口人只有他 1 人 44 元收入，每月伙食费花五到六元，每天吃菜一角钱，劳动时间又长，睡眠 5、6 小时，这就造成了浮肿。一些人定量太少造成浮肿，如：造箱厂生产科长岁保友原每月 38 斤粮食，去年提为行政干部，定量 28 斤，食堂伙食差，经常不够吃，从而患浮肿病。

毛主席的秘书田家英 1961 年受毛主席指示组成调查组在浙江富阳县和嘉善县选了两个生产队去调查，其中发现了嘉善县和合生产队的严重问题：

嘉善县的和合生产队，地处杭嘉湖平原东部，土地肥沃，灌溉便利，是历史上的渔米之乡。解放后头几年，农村经济发展势头好，每年给国家提供大量商品粮。1958 年“大跃进”中，上面逼出了浮夸风，早稻亩产由 400 斤虚报到 600 斤、800 斤、1000 斤，实收只有 439 斤，1959 年“反右倾”一来，包括指标订到 979 斤，实收只有 439 斤。1960 年在公社党员干部宣誓大会上保证粮食产量达到 1800 斤，争取 2400 斤，而实际只收了 291 斤，比解放前的 350 斤还低。由于高指标带来了高征购，挖空了农民的口粮，1961 年春天，每人每天只有半斤米，只能喝三餐粥。有的小队断粮，出现了饿、病、逃和非正常死亡。有一天黄昏田家英和调查组的同志嗅到一股烟味，感到奇怪：农民已经食堂化了，谁家还在做饭，难道老百姓家还有余粮吗？就进了几户农家，揭开锅盖一看，锅里煮的是羊头草、胡萝卜加上食堂打来的稀粥。原来这里生产力破坏已很严重，猪、牛、羊大批死亡，农具大量损坏，土地肥力下降，劳动者体质大大变弱，社员

年收入只有 21.27 元，辛勤劳动一年成了“倒挂户”。

田家英在富阳县场口公社环二生产队的调查，看到的也是一副败落苦难的景象：这个队靠近富春江，自然条件优越，1956 年以前是富阳县农业先进单位。1958 年大跃进后衰败了。呈现在田家英面前的是村村看不到炊烟，听不见鸡鸣犬吠，老百姓瘦骨嶙峋，面有菜色，不少人逃到江西，好多农民得了浮肿病，有的已经饿死。田家英带领的调查组成员面对如此惨景，只有潸然泪下。<sup>①</sup>

这就是当时浙江曾享有“渔米之乡”的嘉善和富阳的惨状，可想而知条件差的社队更痛苦了。因此在统计表中显示的人口增长，不能掩饰农民实际的悲惨生活。

福建省的人口统计表明，从 1958 年至 1961 年人口每年都有增加，其中 1960 年人口增加了 29.5 万，人口出生率 25.11‰，死亡率 15.34‰，自增率 9.77‰。但误以为福建人在六十年代身卧福地了，那大错特错了。我们在福建省档案馆查到一封地委负责人刘建夫同志给地委及各县委的信，其中反映了南平花地大队生活困难的情况：

吃粮较紧，食堂缺油缺菜，生活搞得不大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劳动生产积极性，这个村几年来在粮食问题上不仅没有完成国家征购任务，相反地每年都得由国家供应 2 万斤左右，因是缺粮地区供应量当然比余粮村低，现在他们每人每月平均 26 斤，普遍反映不够吃，吃不饱。要求增加粮食定量才能早出工，晚收工，鼓干劲，赶季节。三个食堂普遍反映缺油缺菜，每天三餐只有酱油汤配干饭。群众说：这是最近几年来生活最苦的一年。食堂生活搞不好，后勤人员过多，第一食堂光后勤人员一年就从农业劳动上付出两万多个工分，第三食堂 20 头猪，就用了 5 个女劳动力。社员说，反正秋后没什么可分的，就慢慢干。

---

<sup>①</sup> 见《毛主席和他的秘书田家英》一书。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 年出版。

这里反映26斤粮不够吃，还有“酱油配干饭”使生活过得太苦，且不知甘肃、青海、河南、四川等省食堂每人供应不足三两粮的社员，怎么活下去的。这说明福建的穷队比之内地的还是好得多。不过这封材料是反映1959年5月的情况，1960年的福建情况更糟。因为从人口的死亡率上升就可以看出，饿死者不在少数。1959年人口死亡率是7.88‰，而到1960年上升到15.34‰，上升了7.46‰，究其原因主要是饥饿所致。

新疆在三年困难时期是个“模范省”，死人少，还接收了内地的一些饥民。1960年人口还增加了37万，死亡率由1959年的18.84‰，下降到1960年的15.67‰，但也不要以为新疆在三年困难时期就是天堂了，饥饿的袭击在新疆有些地方是严重的。例如哈密地区志书记载：“1959—1961年，经济困难时期，人口从20.2万人降至19.53万。”轮台县的志书记载：“从1959年开始，粮食减产，农村人均收入69元，日均口粮只有400克，群众生活困难。”新疆的伊犁河流域、巴音郭楞州、昌吉州等地，因干旱而粮食绝收，70%的居民每天的粮食供应不足半斤。

陕西省在三年困难时期情况比西北各省都好，也给甘肃借过粮，一些甘肃的饥民流落到陕西活下来的也不少。但是，陕西在三年困难时期也不得温饱。据《陕西农牧志》记载，1958年陕西的“共产风”、瞎指挥、浮夸风也很严重。1959年反右倾时，下达了360亿斤粮食的高指标，实际只完成94.8亿斤。1960年进一步强调大跃进，把公共食堂作为共产主义的“心脏”去办，89.6%的社员进了食堂，实行吃饭不要钱。1960—1961年农业大面积减产，而又高征购。1960年农村人均口粮347斤，比“一五”期间减少了15.9%，1961年农民人均只有180斤口粮。当时陕西在城乡普遍推行“派瓜代”，1959年全省粮食减产8亿斤，缺粮人口高达900万人，其中安康地区有16.2万人发病，有6032人因干瘦、浮肿病死亡。关中八百里秦川本是粮仓，这时期也有不少人出外换粮、逃荒，许多地方因缺粮发生了浮肿

病。<sup>①</sup>

内蒙古自治区，由于左倾路线干扰较弱，1958年以来农业的破坏较小，所以粮食还没有大面积减产。在三年困难时期，内蒙不断向外调出粮食。但不能因此就认为内蒙的人民就不受饥饿煎熬了。不少地方也出现了缺粮、断炊、死人现象，只是“不像别的地方大批饿死人”，但不排除没有饿死人的地方。

西安市的粮食供应在1961年都十分紧张。傅子和给陕西省委的报告说：

据西安市计算，三至六月全市需要销售贸易粮二亿四千六百六十八万斤，加上六月为七月加工的周转粮五千万斤，共需二亿九千六百六十八万斤，而现有库存和能拿出来销售的只有一亿六千八百万斤，相差一亿二千八百六十八万斤。建议停止迁入人口，不要在西安举办大型会议，动员城市职工回农村。

可见西安市的市民和职工生活也是十分困难的。

山东省的死亡率比其他重灾省低些，但从1959年开始上升很快。1958年死亡率为12.8‰，而1959年上升为18.2‰，1960年上升为23.6‰，1961年仍在18.4‰的高度。这里从1959年反映山东馆陶县的资料，可知当地人的贫困与饥饿的严重程度了。

馆陶县七个公社，已有六个公社发现有完全停伙或半停伙村庄。全县一千一百九十五个食堂，停伙者已有八十二个，半停伙者更多。很多地方的食堂从中秋节以后就没见粮，吃地瓜和萝卜已有四、五十天了。房寨公社芦里大队，有四个食堂在去年中秋节后全吃地瓜，十一月后全吃萝卜，十二月二十九日停伙，至中央转来人民来信后，才于一月九、十两日先后开伙。停伙或半停伙后，社员四处觅食，不能远出者就地拣食冻地瓜和萝卜度日，能远出者到河北邯郸、曲周、大名等地投亲靠友、逃荒要饭，有

<sup>①</sup> 《陕西省志·农牧志》165—166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

的卖儿女，有不少姑娘、老太婆出门求嫁，不正常的婚姻继续发生，如十四、五岁的小姑娘，嫁给三十多岁的人，不登记就结婚，甚至有人偷盗、自杀，因饿和因病加饿而死者已有二、三十人。有些村庄半劳动力全部逃光。1959年冬省上派去检查组调查群众反映的情况，发现很多吃奶的小孩身上一丝不挂，母亲整天揣在怀里，有百十岁的老太太没有棉裤，最近自杀的人当中就有三、四个是孤寡年老有病没人管的人。

在“特大跃进”年的1959年，山东馆陶县奉送在读者面前的是：人无粮吃全靠地瓜、萝卜为生，地瓜、萝卜没有了就停伙，像野人一样四处觅食；有的整半劳动力全部逃光；卖儿卖女，十三、四岁的姑娘嫁给三十多岁的人以保住性命；小孩子一丝不挂，百岁老太太寒冬无裤，有的不得不自杀了此残生。面对这种惨景，当地领导和干部是什么态度呢？有的社队领导干部在断粮的情况下，宣布食堂停伙，号召群众“愿拾愿偷自己办”；有的采取高压政策，“反瞒产私分”，挖老鼠洞，挨家挨户搜粮。多数社队干部命令社员封锁消息：对检查组只能说产量高，吃得好，吃得饱，不准说吃不饱，没饭吃，甚至威胁群众：“谁乱说，就是反革命”。“乱反映的不给饭吃，饿死你”。<sup>①</sup>这就是当年“公仆”对饥民的“服务”态度。

---

<sup>①</sup> 见《山东省委省政府关于馆陶县停伙、逃荒问题的检查报告》，藏山东省档案馆。

## 四、陇上大饥难

1959年到1961年是中国历史上的所谓“三年困难时期”，中国人经历了空前残酷的大饥饿与大死亡。甘肃是大饥饿的重灾区，陇上大地出现了惨绝人寰的悲剧：粮尽物绝，饿殍遍野，尸骨枕籍，人相吞食。而此时政策极左，人人处于“阶级斗争”的恐怖漩涡中。时已过四十年，但总结这段历史时期的经验教训，昭示后人循历史正道，谋人民利益，意义匪浅。

### 全省死亡记录

甘肃严重饿死人的现象不是从1959年开始而是从1958年就出现了，1960年则为死亡最高峰，1961年继续饥饿煎熬，成千上万人饿死，直至1962年死亡率才降下来。

从1958年至1961年陇上大地究竟饿死了多少人？各类统计资料和历史文献的说法是不一致的。例如国家统计局的人口资料将甘肃1958年的总人口定为1282万，而甘肃省统计局与公安局的资料将这一年的总人口定量为1308万，比国家统计局的多26万；对1960年的总人口，国家统计局定为1244万，甘肃的统计资料定为1254万，又多出10余万。如果把甘肃各县志的人口统计综合起来，又同甘肃省统计局、公安局的总计不相一致。但这些差异是可以理解的，有些是以年平均人口作为总人口计，有些是以年末人口作为总人口计，还有些是因为统计方法和角度的不同，会出现一定的差别。这种差别不是十分大的，利用各类统计数字都不会太影响我们对大饥饿时期历史面貌的认识。例如国家统计局对甘肃1960年的人口死亡率标记为41.32‰，而甘肃统计局标记为41.6‰，对人口的自然增长率国家统计局的资料为

-25.79‰，而甘肃省统计局的资料为-26.02‰，差别虽有，但很微小，不影响我们混合使用两类资料。

现在让我们看看总人口和总户数的减少情况：

1957年甘肃省总户数为2618180户，总人口为14531086人，而到1958年总户数为2327808户，总人口为13081007人，与上年比，总户数减少了290372户，总人口减少了1450073人，总户数减少了11.09%，总人口减少了9.98%。1958年户数的减少，其中重要的原因是一部分户数划到了宁夏，另有一个因素是搞“共产风”，几户人并在一起居住，可能将原来的两户或三户变成一户统计了，但相当一部分户数的减少，则是由死亡率增大构成的。1957年甘肃人口的死亡率为11.16‰，1958年竟上升为21.42‰，死亡率增长为10.26‰。可见，在减少的29万多户中，有些是属绝户，而减少的140余万的人口中，至少有11%是由死亡造成的，因为1958年机械变动造成人口减少的因素是很小的，当年迁入还大于迁出的人口。可见，在死亡人口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因饥饿而死亡的，因为当年从徽县等地上报省委的材料中，就有人口大量死亡的告急，主要是饥饿死亡的。当然不能忽视1958年死亡人口中的另外一些因素，比如说对右派、“白旗人物”的迫害造成死亡增加，大炼钢铁和各种繁重体力劳动折磨造成死亡增加，等等。

1959年总户数为2362648户，总人口为13281225人，当年的户数比1958年增加了34840户，人口比1958年增加了200218人，1959年人口户数的增加，不是人口增长的直接表现，而主要是1958年多户合一的“共产户”分离出来另立了门户，所以才多出了3万多户，而人口的轻微增加，主要是因为出生率较高造成的，当年的出生率是19.47‰，而当年的死亡率则高达17.46‰。可见，人口的减少主要是死亡因素形成的，而死亡的基本因素是饥饿。

1960年甘肃省人口总户数是2432823户，总人口数

12549961人，总户数增加37万多户而总人口则减少了731264人，当年户数增加幅度为2.97%，人口总量减少幅度为5.57%。户数增加这一现象完全不能说是因人口的增加所致，而是一些大户分离，或小户分家的结果，而人口减少了73万多，则多为饥饿而死。

1961年甘肃人口总户数为2488060户，总人口为12108174人，人口总户数增加了55237户，增加幅度为2.3%，总人口减少了441787人，减少幅度为3.5%，1961年总人口的减少仍然为饥饿死亡所致。

从1958年到1961年，其中有三年时间总人口呈减少状态，除了1958年总人口减少的因素之一是把原甘肃的一部分地区划归宁夏回族自治区外，其余的人口减少和1959年的微增长，都包含着大饥饿造成的死亡因素，在总人口减少中，隐含着巨大的悲剧。

我们再看看从1958年到1961年甘肃人口死亡的状况：

1958年甘肃人口的死亡总数为272425人，死亡率为21.42‰，自然增长人数为133576人，自然增长率为10.50‰，1958年的死亡率比1957年11.16‰的死亡率，高出10.26‰，死亡率增长了近一倍，这是很惊人的。从1957年到1966年的十年间，甘肃省人口按照当时的生活水平和医疗卫生状况、生育状况和生育政策，死亡率在11‰，可以认为是正常的，而高达21.42‰的死亡率则是非正常的。1958年比1957年的死亡率增长了10.26‰，这个指数是非正常死亡，那就是说在当时的情况下，是饥饿造成的死亡大于一般年份10.26‰的死亡率，就是因饥饿或其它非正常因素造成的死亡人数应为134211人。

1959年全省死亡人数为230375人，死亡率为17.48‰，自然增长率却降低为1.99‰，自然增长人数为26271人。那么，自然增长的人数和增长率为何如此之低呢？主要原因是由1958年的31.93‰出生率锐降为当年的19.47‰，死亡率几乎接近出

生率，为 17.48‰。按照我们依照正常年份的平均值确定的 11‰ 的正常死亡率的指数来推算，其中 6.48‰ 的死亡率为非正常因素的死亡，也就是说在 230375 人中，至少有 86000 人为非正常死亡，我们可认定这些人的死亡是饥饿造成的。

1960 年是甘肃大饥荒的高峰年，当年死亡人数是 538479 人，死亡率为 41.69‰，自然增长率为 -26.02‰，自然减员人数为 336097 人，如此高的死亡率和如此可怕的自然减员数说明人们的生活境况已经到了十分悲惨的极限，我们仍按 11‰ 的正常死亡率衡量，非正常死亡率则为 30.69‰，可以推算，至少有 385158 人为饥饿而死的。

1961 年全省人口死亡数为 141528 人，死亡率为 11.48‰，人口自然增长率为 3.28‰，人口自然增员为 40492 人，当年全省总人口减少 441787 人。可以认为当年 11.48‰ 的死亡率是在正常指数内，而人口减少人数则为 44 万多。当年外省迁入甘肃的人口为 71784 人，而甘肃省迁移外省的人口为 248860 人，这 24 万多流入外省的人数大多因为饥饿而出走的，有不少人死在途中，难以列入死亡统计中，而在省内流来流去的人口达 259984 人，这些人口在省内的流浪和乞讨中也有严重的死亡情况，而这些死亡人数在当年的人口统计中被计入了迁移人口，而没有计入死亡统计，可见，1961 年甘肃省仍处在严重饥饿中，抢救人命的政策仍难以解决大面积饥饿的问题，因此，保守的计算约有 20 多万人死于饥饿之中。

总体上看，从 1958 年至 1961 年直接因饥饿造成的死亡人数约为 605451 人，当然这个数字是一个最低限度的估算数，而从 1958 年到 1961 年总死亡人数为 1182807 人，这些亡灵中的 90% 以上是与饥饿的命运在一起的。所以，曾有一些渠道估算，在困难时期，甘肃省饿死百万人的说法不是没有根据的。

1960 年前后的惨剧是遍演于陇原大地的，全省处处断炊烟，县县在饥饿，社社村村饿得鬼哭狼嚎，饥饿死亡全面威胁着人民

群众的生命。

### 各地的死亡记录

从1958年开始，甘肃许多地区就出现了很高的死亡率。当时的张掖市死亡率高达27.31‰，死亡人数达9848人。酒泉市死亡率高达32.43‰，死亡人数9072人。整个张掖专区死亡率高达18.25‰，死亡人数39515人，这个专区的高台县死亡率高达31.43‰，死亡人数5222人；山丹县死亡率高达40.79‰，死亡人数7096人。武威县死亡率高达26.53‰，死亡人数15254人。天水专区总体死亡率为33.73‰，死亡人数114331人，人口自然增长率为-3.76‰，人口自然减员12748人，其中徽成县死亡率高达67.24‰，死亡人数达23392人，自然增长呈-40.37‰，自然减员14046人。天水市人口死亡率达28.31‰，死亡人数8459人。武都县死亡率高达40.06‰，死亡人数15774人，自然增长率为-3.01‰，自然减员1186人。西礼县死亡率高达57.69‰，死亡人数29048人，自然增长呈-20.29‰，自然减员人数10216人。清水县死亡率高达53.54‰，死亡人数13566人，自然增长率为-9.22‰，自然减员2336人。平凉专区整体死亡率为22.46‰，死亡人数49317人，其中平凉市死亡率高达51.79‰，死亡人数8700人；镇原县死亡率达31.20‰，死亡人数8369人；泾川县死亡率高达50.52‰，死亡人数为14052人，人口呈-6.00‰的负增长，自然减员1670人。临夏回族自治州1958年整体死亡率虽不高，为15.62‰，但有些县却呈现出很高的死亡率，如东乡族自治县人口死亡率高达56.8‰。当然，1958年还有不少县的人口死亡率在20‰以下，有的在11‰以下，但从相当一部分地区30‰—58‰的高死亡率看，却有不少县人口呈现负增长，说明1958年甘肃省不少地方还是出现了饿死人的现象。

1959年甘肃全省各地区人口的死亡情况也是严重的。死亡

率比较高的有张掖市，死亡率高达 19.32‰，死亡人数是 6787 人。安西县死亡率高达 52.89‰，死亡人数为 4315 人，人口自然增长率为-36.92‰，自然减员 2887 人。武威县死亡率为 19.78‰，人口自然增长率为-1.13‰，自然减员 667 人。整个定西专区死亡率高达 23.58‰，死亡人数为 53843 人，全地区人口自然增长率呈-2.21‰，自然减员 5047 人。其中定西县人口死亡率为 25.94‰，死亡人数为 6098 人，人口呈-1.97‰的增长率，自然减员人数 464 人；陇西县死亡率高达 45.13‰，死亡人数为 16429 人，自然减员 3781 人，人口自然增长率为-10.39‰；通渭县死亡率为 37.09‰，死亡人数为 10229 人，自然增长率为-19.92‰，自然减员 5495 人。天水专区 1959 年整体上人口死亡率不太高，但清水县却高达 23.81‰，死亡人数达 8041 人，人口自然增长率为-1.73‰，自然减员 585 人。整个平凉专区人口出现了-1.20‰的负增长态势，自然减员 2677 人，其中镇原县达 19.06‰，死亡人数为 4872 人，人口自然增长率为-8.06‰，自然减员为 2061 人；泾川县人口死亡率高达 28.11‰，死亡人数是 10356 人，人口自然增长率呈-5.97‰，自然减员 2200 人；静宁县死亡率高达 25.82‰，死亡人数是 12581 人，人口自然增长率呈-8.05‰，自然减员 3922 人。1959 年临夏回族自治州整体上人口的死亡率在 19.61‰的水平上，其中东乡族自治县死亡率高达 28.14‰，死亡人数为 3243 人，由于当年该县的出生率高达 30.77‰，所以人口的自然增长率未呈现负数。1959 年甘南藏族自治州人口自然增长率呈-2.33‰，自然减员 834 人，这个地区死亡率虽为 18.64‰，但因为饥饿的原因，人口出生率由原来的 40‰下降到 16.32‰，因而人口仍然是负增长。

1960 年甘肃是大饥饿大死亡的高峰，全省的各地区都呈现出死亡的恐怖和死亡的惨景，张掖专区整体死亡率高达 45.06‰，死亡人数 103217 人，自然增长率呈 -26.78‰，人口自然减员 61349 人，其中酒泉市死亡率高达 43.57‰，死亡人数

16129人，自然增长率呈-28.21‰，自然减员10442人；张掖市人口死亡率高达60.46‰，死亡人数20296人，自然增长率呈-45.62‰，自然减员15314人。安西县死亡率高达53.21‰，死亡人数20296人，自然增长率呈-45.62‰，自然减员15314人；高台县死亡率竟高达72.04‰，死亡人数11262人，自然增长呈-65.29‰，自然减员10206人。此外，张掖人口呈负增长的有永昌县，人口自然增长为-20.77‰，民勤县为-35.30‰，武威县为-26.78‰，敦煌县为-8.09‰，酒泉市为-28.21‰，人口死亡率均在25‰—43‰之内。定西专区1960年人口死亡率为59.04‰，死亡人数137248人，自然增长呈-43.44‰，自然减员100979人，其中定西县死亡率高达64.21‰，死亡人数为14611人，自然增长呈-47.50‰，自然减员10809人；会宁县死亡率达38.34‰，死亡人数9182人，自然增长率呈-21.73‰，自然减员5204人；通渭县的情况更为可怖，全年出生人口705人，而全年死亡人数竟为42838人，当年总人口为209743人，死亡率高达204.2‰，人口自然增长呈-200.84‰，自然减员42133人；陇西县死亡率高达62.24‰，死亡人数为21536人，自然增长呈-51.16‰，自然减员17703人；榆中县死亡率为28.10‰，死亡人数6006人，增长呈-13.85‰，自然减员2961人；岷县死亡率高达77.10‰，死亡人数29489人，自然增长呈-64.80‰，自然减员24785人。整个天水专区死亡率达54.54‰，死亡人数165904人，自然增长呈-43.16‰，自然减员131291人，天水专区的一市七县全部人口自然增长呈负数，死亡率最低的天水市为24.78‰，最高的西礼县竟达94.53‰，自然增长最低的西礼县为-84.39‰，最高的天水市为-8.44‰，这个地区死亡人数最多的西礼县有43793人。平凉专区死亡率为22.79‰，死亡人数为50253人，人口自然增长呈-7.79‰，自然减员17178人，其中静宁县死亡率高达54.19‰，死亡人数达24783人，人口增长呈-44.85‰，人口自然减员20513人。临

夏回族自治州死亡率达 53.61‰，死亡人数 46906 人，人口自然增长呈 -36.64‰，自然减员 32057 人，这个地区的一市两县死亡率都很高，分别为临夏 58.25‰，和政县 52.67‰，东乡族自治县 35.42‰。甘南藏族自治州死亡率达 49.56‰，死亡人数 18113 人，自然增长呈 -45.15‰，自然减员 15041 人，所有县市均为负增长，均出现大量自然减员。

1960 年从全省各地很高的死亡率和巨大的死亡数量看，甘肃省在这一年是充满饥饿的一个年份，也是遍地堆放饿死者白骨的省份，几乎没有一个县市无饿死人的现象，这种惨痛景象是亘古罕见的。

1961 年甘肃死亡率有较大的遏制，但是省内的一些地区和县市仍然存在着高死亡低增长现象，饿死人的惨状不时发生。例如金塔县人口增长呈 -4.27‰，人口自然减员 329 人；张掖县人口自然增长呈 -0.92‰；高台县人口自然增长呈 -6.58‰，自然减员 776 人。整个武威专区人口增长呈 -2.15‰，自然减员 2539 人，民勤县自然增长呈 -11.83‰，自然减员 2188 人。定西专区的通渭县自然增长为 -7.49‰，自然减员 1538 人；漳县人口死亡率高达 31.13‰，死亡人数 2447 人，人口增长呈 -22.85‰，自然减员 1796 人。秦安县死亡率达 20.78‰，死亡人数 5973 人，自然增长呈 -11.13‰，自然减员 3200 人。平凉地区的泾川、崇信、静宁人口自然增长均呈负数。甘南藏族自治州整体上人口增长呈 -2.36‰，全州自然减员 792 人，这个自治州除夏河县外，其它六个县人口均呈负增长。

### 悲惨生活

我们阅读统计表上的死亡统计和死亡数字，觉得并不沉重，甘肃饿死的低线为 60 余万，饿死的高线为 100 余万。然而，我们透过这些统计数字，看看甘肃人民群众的生活现实，展现在人

们面前的是一幅极端悲惨的图景。在许多数据和历史资料中，对甘肃人民悲惨的境遇，都有所记载。且看《甘肃民政志》从1957年到1961年对甘肃人民悲惨生活的概况反映：

1957年5月至9月，甘南、陇东、陇南等地既有山洪，又有瘟疫，出现严重死人现象。全省灾民上百万人。上半年中部干旱区人民缺粮面大，有些是吃变质的油渣，中毒身亡。仅徽县缺粮患浮肿、干瘦等饥饿症，死亡1113人。全省出现大量外流人口。

1958年第一季度全省春荒灾民缺粮60万人，其中1.2万青壮年劳力因饥饿而外流，近5万人得了浮肿、干瘦等营养不良症，徽县、秦安因饥饿致病者都在万人以上，全省春荒死亡5470人，其中外流死亡144人，食物中毒死亡33人。

据1959年9月份统计，近40个县缺口粮，缺粮灾民162万，浮肿病9.6万人，外流达7万人，饥饿致死者9631人，有2200人因饥饿逃亡有去无归，尤其陇西、静宁两县饿死的人口更多。

据1960年7月份统计，上半年100余万人缺少口粮，新增外流人员8.3万人，流外省的6.9万人。下半年，农民在集体食堂就餐，家中无任何存粮，因饥饿造成许多人气息奄奄，成千上万人死亡。

1961年虽开始抢救人命，但因前几年的左倾政策伤了元气，饥饿和死亡情况依然存在，上半年统计还有494万农民缺粮，下半年虽得到缓解，但饥饿和死亡仍在继续。这一年全省人口比1958年减少近百万人。大饥饿一直延续到1962年，1962年全省累计有457万人缺口粮，263万人缺衣缺被。

1960年前甘肃有些县的饥饿贫困已达到了空前惨重的地步，甘肃通渭县是其中最典型之一，该县的县志这样记载：

1958年秋，全县共有284000人，比1949年增长22.5%，但在极“左”错误的影响下，加之频繁的自然灾害，1958年冬，

全县出现严重的饥荒问题，不少农民以树皮、野菜、草根、禾麦充饥，身体浮肿，人口开始外流、死亡。至年底，外流 625 人，死亡 3687 人，全县实有 44592 户，279687 人。1959 年冬，饥荒更为严重，一些地方出现人相食现象，人口大量外流、死亡。至 1960 年初共外流 19081 人，死亡 42024 人，至年底，共死亡 60210 人，外流 1140 人。1960 年春节前后，有些通渭籍在外地工作的干部向中央和中共甘肃省委书面反映了通渭的问题。于 1960 年 2 月开始，中央、省、地先后发放大量救灾款物，派大批干部赴通渭抢救人命，才使人口非正常外流和死亡现象逐步得到控制。至 1961 年底，全县人口比 1958 年减少 78432 人，绝户 2168 户，有孤儿 1200 余人，寡妇 3000 多人。3 年多时间内，全县加上少量出生数共减少 72150 人，比 1958 年秋的总人数减少 25.4%。

1960 年前后，甘肃人民的苦难生活表现在各个方面，其中有：

1. 绝对贫困化。这段时期，甘肃多数地区人民的生活处于绝对贫困化状态，粮食指标由 1956 年 450 斤的标准逐步下降，到了 1960 年，全省人均日口粮实际不到半斤。在重体力劳动下，半斤粮是难以维生的。而在 1960 年一段时间，许多地区的公共食堂把口粮标准降至 3~2 两（16 两为 1 斤），实际上多数人在喝大锅清水汤。还有一些地方完全断粮，公共食堂关门，农民不是被饿死，就是象野人一样四处流散。而生活的其它方面同样是极端贫困的。1958 年搞“共产风”，几户农民归户住，许多房屋被拆，几户人拥挤在一户居民的院落里，住房破烂不堪，倒塌伤亡事故不断。衣不遮体的现象在甘肃农村几乎遍地存在，通渭、静宁、会宁、安西、张掖等县都曾反映，十几岁的姑娘和二十岁左右的年轻小伙子没有裤子穿的大有人在，在甘肃的一些贫困乡确有夫妻二人轮穿一条裤子的。此类惨状直延续到 70 年代依然存在。1961 年抢救人命过程中，解散公共食堂，实行分户吃饭，但因为锅、铲之类的金属品 1958 年被强迫炼铁了，而瓢、勺和

其它用具街市上又没有，因此出现了无锅做饭，无碗吃饭的窘境。在不少农村曾出现全家用一只破碗吃饭的情况，有些家户在土炕上挖个洞洞，用野菜擦后作为碗来使用。相当多的农村贫困人家没有盖的，有的则把草杆堆在炕上，晚上钻在里面过夜。有关方面在调查中部干旱地区的贫困状况时发现，许多幼童在1961年前后仍然不知道“馍馍”是什么，因为多年来一直用稀糊糊来度日，从来没有吃过“馍馍”。

2. 人相食的惨景出现。人相食现象在中国历史上曾发生过，这是饥饿到极限时人兽同化的表现。而在甘肃60年代确实发生了人相食现象。甘肃省委1960年底在逼迫向西北局作出的检查报告中，就反映1960年元月在甘肃发生了11起人相食的事件，报告这样说：“今年元月，公安厅报告发生了11起吃人肉的‘怪案’，不加重视，不作深入了解，即判断为反坏分子搞的鬼，要公安厅再查，就没见下文”。在甘肃通渭县也发生了多起人相食的现象，1984年我国的一家文学刊物《啄木鸟》就追记了通渭县某村一位父亲在死亡线上挣扎时，吃掉了自己5岁的儿子。在甘肃静宁县，一位奶奶竟然用菜刀杀死了孙子，将躯体的一半吃掉，后来被逮捕，1961年纠正左倾路线时被释放。有位当时在静宁县高界公社当工作组的干部亲自给笔者讲，这个县发生了一起贫农子女吃富农子女的惨案，他亲自作为难题去处理。这类惨案我们再不忍心追述，只是为那些至今仍用谎言掩盖真理的人们作些提示而已。历史应当永远记住人相食是人类的最大耻辱，但这种耻辱在极端饥饿状态下往往会现出，人类要消除人相食，必须首先消除极端的饥饿现象。人相食确实不只在甘肃发生，60年代在全国一些饥荒严重的省份，也曾发生过人相食的惨象。高晓岩在《民族大浩劫的前奏》一文中曾记述了刘少奇为人相食而痛心的事例。1962年6月下旬，毛泽东通知刘少奇见面，主要是要谴责刘少奇坚持包产到户的问题，刘少奇走到中南海游泳池，热情地问候毛泽东，毛泽东却声色俱厉地质问：“你急什么，

压不住阵脚，为什么不顶住”？刘少奇激愤地说“饿死了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可见，当时饿死人的，不仅仅是甘肃，人相食的惨景给全中国人的心灵造成了巨大阴影。

3. 全民大饥饿。甘肃 1960 年前后的大饥饿不是局部的。也不是有些人说的只是一个“指头”的问题。1958 年的大跃进搞得几乎民穷财尽，到 1959 年，已经出现了全面食物匮乏的惨状。当时极端困难的地区普遍出现吃草根、树皮、观音土、麸糠油渣，有的地方青苗刚出土就被挖光吃光，当这些所谓“代食品”吃光的时候，或坐以待死，或大流亡，多数人流亡不动，就只好想方设法找充饥的东西，当时连老鼠在一些地方也被吃光，至于狼、虎、兔这些野生动物也被一猎而尽。康有为曾在《大同书》中描述犬狐吃人的惨状，称“伏尸遍地而犬狐嗥啮”。而 1960 年许多地方饿死的尸体，连吃他的犬狐也没有了，因为犬狐已被人吃光了。在城市除了个别官吏尚能吃饱肚子外，绝大多数人也挣扎在饥饿线上。1959 年甘肃省委号召在城市的居民、学生、干部中开展所谓“小秋收”运动，就是动员这些人到山上把各种野生植物和树叶收集到单位以备食用。到 1960 年许多地方的口粮降低到半斤左右，不得不用“小秋收”拣来的这些野草、野菜、植物根当饭吃。当时在兰州的一些高等学校，食堂用树叶做饭的事是常见的。许多城镇的国营食堂几乎断炊，旅客们到一个地方吃饭是极其困难的，不少地方规定，在国营食堂买饭，除付出粮票、货币以外，还要出示介绍信、旅社发的餐证和工作证五种东西，才能吃一碗饭。尤其可笑的是，在粮路断绝的情况下，在甘肃出现解决口粮问题的“增量法”，所谓“增量法”就是将 1 斤粮做成重 2—3 斤的食品，开始是在包谷面中增加一些水量，弄成状似稀糊的馍馍，美其名曰“发糕”，后来增量法完全成为草菅人命的口实，一些地方竟报告用 1 斤粮食，可做出 40 斤重的“增量”食品，那当然 1 斤粮就可以解决 40 人的供应了，甘

肃的“增量法”直至1961年后半年才逐步消亡。

4. 劳动的折磨。1960年前后，公社完全采取军事化、集体化的劳动方式。尽管农民已经气息奄奄，食堂将近断炊，但仍然从县委到公社，到生产队，或派出工作组，或指定干部，迫使农民“大干快上”。当时几乎县县都提出了大办水利、大办农业的项目和指标，还有一些地方开展了毁林开荒的活动。甘肃的引洮工程在困难时期曾强行组织40余万农民进行劳动，有的就饿死在工地上，到1960年下半年，该工程的劳力大部分逃亡，工程不得不停下来。平凉地区在1960年曾提出了大开荒活动，学校命令停课，让成千上万的人去到盘岭等地毁林开荒，晚上将大片森林放火烧光，白天用泥土将树根盖住，谓之完成了多少亩开荒任务。当时居民、学生、干部中的口粮标准一降再降，各地也出现了大量城市居民浮肿，以至死亡现象。在许多县镇充满着饥饿的恐怖，成群乞讨者在街头抢食人手中寥寥无几的食品，有的为了争食而发生了凶杀惨案。由于劳动强度极大，而又在日夜奋战的口号下无限延长劳动时间，有不少人不是直接死于饥饿，而是死于苦役和疾病的折磨。不少人因吃“代食品”（实质上是非人食用的植物或矿物）活活胀死。有的因各种慢性病无医无药治疗，加之饥饿而很快死亡。有的因饥饿出现家庭崩溃，父子、夫妻因饥饿争粮，反目为仇，各奔东西，家破人亡。妇女在这一阶段遭受的灾难更为严重，许多人因饥饿而失去了生育能力。1961年5月9日，时已任甘肃省委书记的汪锋同志给毛主席的报告中讲到，在临夏调查时发现妇女的病症是严重的，报告说：我们调查了新一号生产大队4个生产队的妇女病和妇女生育情况，第九生产队有青壮年妇女25人，闭经的12人，占48%；在通经的13人中，今年1月后才通经的8人；一贯通经的两人，1个是女队长，1个是炊事员；1959年以来只有脱产干部的家属生了1个小孩。第五生产队有青壮年妇女26人，闭经的21人，占81.2%；全队1959年以来没生一个小孩。第六生产队，有青壮

年妇女 19 人，闭经的 13 人，占 68.4%；在通经的 6 人中 3 个是炊事员，两个是女队长，一个是脱产干部的爱人；1959 年以来生了两个小孩，1 个是大队保管员的爱人生的，1 个是生产队长爱人生的。第七生产队有青壮年妇女 24 人，闭经的 16 人，占 66.6%；在通经的 8 人中，有 4 人是今年 1 月后才通的；一贯通经的 4 人，一是炊事员，还有一个是生产队长的爱人兼炊事员，1 是脱产干部的爱人，1 个生产小组长的爱人；1959 年以来只有管理员的爱人生了 1 个小孩。从上述这个调查材料中，可以看出许多问题。

5. 阶级斗争的恐怖。1960 年前后的困难时期，甘肃的政策极“左”，以阶级斗争为名，对广大人民群众形成了政治高压和政治迫害。当时的甘肃省委把反映真实情况和申诉饥饿现象的人都看成阶级斗争的新动向，甚至把人吃人的现象说成是反坏分子搞的鬼，把严重的饥饿现象说成不是工作问题，而是阶级斗争问题，对人口外流、浮肿、死亡等现象采取层层封锁，不报实情反而说成是农民瞒产的表现，普遍地开展搜粮、挖粮，搞恐怖活动，出现了逼死人、打死人的惨境。仅张掖地区 1960 年 2 月 24 日的调查就反映出了骇人听闻的迫害群众事件，例如：酒泉县西峰公社香庄大队，在核实产量时，工作组干部陈鸿景召集了 32 人开会，其中积极分子 12 人，会议连续进行了两天两夜，共斗了 18 人，其中小队长 10 人。他们斗的方法是：交待问题的坐在房子里，不谈问题的拉到院子里，脱掉帽子，脱掉棉衣，结果无一人交待问题，在院子里站了 17 人，并把这些交给“红专队”管理，五更天上地，人拉大车，每车跟一名积极分子看守，吃过早饭又集合起来进行斗争。小队长于家康有病向支部书记请假，休息片刻，被陈拉下炕打了几个耳光，并将该小队长叫到庄外，用手枪对准于的胸口威胁说：“你不交待问题，就让你死到这搭”，该小队长吓得瘫倒在地。再如：山丹林阴农场生产股长朱贤庆带领一些人搜查了 184 户社员家，制造粮食上的恐怖。武威

古城公社兰青带领干部在社员家中搜查粮食，每到一家，把社员的房门、面箱贴上封条，在社员的院内挖了417个坑，打了20多人，逼得社员贾海一家5人全部外流，逼得贫农社员徐生元上吊自杀。

在整个困难时期，甘肃省不断开展反右倾斗争，在干部中大抓阶级敌人，制造了许多冤假错案。1960年仅天水地区就反映揪出了反党分子617人，蜕化变质分子195人，甚至在天水和秦安还制造了两个“反革命集团”，后来查证这些所谓的“阶级敌人”均为冤假错案。特别是在困难时期，甘肃对言论的封锁和控制是极其严格的，凡是散布不满情绪或反映饿死人现象的人，均要作为反党分子或者戴上其他什么阶级敌人的帽子加以批斗。对于一些地方农民闹粮或抢粮站的案件处理是极其严酷的，一般被定为“现行反革命”，有的还被处决，例如：甘肃泾川就曾对抢粮案件定为“现行反革命”，首要者被判重刑。困难时期对知识分子的高压是十分严重的，特别是对戴“历反”和“右派”帽子的知识分子，许多人被流放到最贫脊的地方去劳改。甘肃省的河西走廊有个叫“夹边沟”的地方，这里流放了许多右派，包括一些著名学者、作家，不少人就死在“夹边沟”。兰州大学历史系著名教授赵骊生在“夹边沟”劳改，变成了一个乞丐，当得知女儿1960年捡野菜从山坡上摔下死亡后，他披着一件破羊皮袄千里迢迢、沿途讨饭、爬火车来到兰州，不久又被遣送到夹边沟折磨。

### 大灾难的成因

对中国发生的三年大灾难，我们一贯的解释是自然灾害和苏修卡脖子两种原因所致，当然这是加剧三年灾难的因素之一，但都不是主要原因。我们从自然灾害的角度来看，在甘肃几乎年年有灾害，尤其旱灾是经常发生的。先让我们看一看50年代至60

年代的灾害记载：1950年旱灾，全省57个县受灾；1951年旱灾，局部水灾，56个县受灾；1952年旱灾、雹灾、病虫多种灾，68个县受灾；1953年则发生了以大旱为主的重灾，有72个县受灾；1954年以旱为主、兼有雹、洪、霜灾，受灾84个县；1955年旱灾较重、次为风暴霜冻，23个县受灾；1956年旱灾为主，兼风暴洪涝、病虫灾害，受灾79个县；1957年重旱灾年，全省半数县受灾。以上这些灾年虽有一些地方出现饥荒和人口外流，但却没有出现三年困难时期这样大规模的死亡和人口外流。而1958年到1961年四年间，虽有旱灾，但并不是历史上最严重的，例如1958年只有34个县受旱，1959年只有40余县受灾，1960年有47个县受灾，1961年60个县受灾，受灾的面积和数量并不比1958年以前大，但死亡却如此之惨重，这说明，灾害年年有，但并非灾年一定会大量饿死人，所以把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人的现象归咎于自然灾害完全是为了掩盖人为的罪过。至于苏联撤走专家与甘肃省及全国的“大饥饿”的关系更是搭不上边的。1960年夏季，赫鲁晓夫确实撤走了在中国的约200个企业中工作的1400名科学家和专家，我们的解释是撤走专家是苏联变“修”的表现，也是反华的举措。苏联官方解释说，苏联专家在中国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不管撤走的原因如何，撤走专家确实对苏联援建的工厂和基础设施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一些项目不得不暂时下马。但是，中国的命运没有拴在1400余名苏联专家身上，撤走专家的影响和中国缺粮关系更不大，甘肃省也撤走了几十名专家，但他们的撤离对甘肃省农业的影响几乎是不存在的，至于苏联要求中国急速还债，那主要不是给苏联运送粮食，因为中国还在不断地进口粮食，而甘肃省用粮食为苏联还债的事也未有记载。可见，自然灾害和苏联卡脖子这两个因素，绝不能构成甘肃百万人死亡的原因。

那么原因是什么呢？

我们认为祸源在于1956年后半年开始从中央到地方推行的

“左倾”路线，尤其是1958年确定的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三面红旗，是造成中国贫穷、甘肃赤贫的三大祸源，是夺走百万甘肃人性命的三大舞台导演。

让我们先看看“左”倾思潮泛滥的大背景。1956年在毛泽东的倡导下，开展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反右倾运动。中央的反“右倾”主要针对周恩来、刘少奇制止冒进压缩高指标的倾向。1957年，毛泽东进一步提出反右倾，他在八届二中全会上说：“我们的计划经济，有平衡有不平衡，平衡是暂时的、有条件的，而不平衡则是绝对的”，认为反冒进是向干部群众头上泼冷水。他在1957年1月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指责反冒进，指出：“前年反右倾、去年反冒进，反冒进的结果又出现了右倾”。1957年毛泽东采取引蛇出洞的办法，开展了反右派斗争，把55万知识分子和干部划成了右派分子，进行了残酷迫害，从此一切批评的言论被封闭了。这以后，毛泽东的指导思想更为左倾，他提出了要“恢复促进委员会”，认为“冒进是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是非马克思主义的”。从1957年底开始，毛泽东就产生了采取大跃进的方式实现中国工业化的指导思想，他在1957年11月18日会议上说：赫鲁晓夫同志告诉我们，15年后，苏联可以超过美国。我也可以讲，15年后我们可能赶上或者超过英国。现在英国年产2000万吨钢，15年后，可能达到年产3000万吨，可中国在15年后则可以达到4000万吨，完全可以超过英国。根据毛泽东的跃进思想，中国编制了1958年的国民经济计划，计划确定工业生产总产值725.6亿元，农业生产总产值642.5亿元，基本建设投资130.69亿元，钢610万吨，煤14872万吨，粮食3920亿斤，棉花3500万担，这些指标都超过了原来提出的控制指标。

1958伊始，在毛泽东的推动下，中央就不断推行冒进政策，1958年5月5日到23日，中央召开了八届二次会议，会议制定了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就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

建设社会主义”，在会议上确定了“一天等于20年”的建设速度。此后把我国钢的产量又调整为1070万吨，在全国各地开展了“拔白旗”、“插红旗”、“放卫星”的运动。将近1亿劳动力离开了农业生产和各条战线，开展了大炼钢铁的运动。这个时期又出现了一些离奇古怪的冒进口号，其中有：“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怕办不到，只怕想不到”，“日夜奋战，铁水奔流”。“群众运动触山山倒、触地地崩”，于是在全国各地出了许多假“卫星”，吹牛皮、浮夸风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1958年6月12日新华社报道：河南省遂平县卫星农业社放了一个亩产3530斤的卫星。6月30日，《人民日报》报道河北省安国县南娄底乡卓头村社小麦亩产5103斤。7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河南省西平县和平农业社“发射”“小麦高产卫星”的消息，宣称小麦亩产达到7320斤。8月13日，《人民日报》报道，湖北省麻城县麻溪乡和福建省南安县胜利乡“发射”早稻和花生“高产卫星”，亩产量分别达到36900斤和10000多斤。9月18日，《人民日报》又报道，广西环江县红旗人民公社“发射”的“中稻高产卫星”，亩产量高达13万多斤。当时的假“卫星”和浮夸风弄得中央领导也信以为真，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撰文说，自己亲眼看到了番禺县亩产100万斤番薯、60万斤甘蔗、5万斤水稻的“事实”。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发表题为《驳粮食增产有限论》的文章，认为广东的粮食亩产3000斤或4000斤以至10000斤是可能的。著名科学家钱学森撰文论证，如果植物能利用射到1亩地的太阳光能的30%，稻麦的产量就有可能达到40000斤。毛主席在各地视察时也受到了假“卫星”的欺骗，例如毛泽东8月4日视察河北省徐水县时，县委书记张国忠告诉毛主席：今年全县夏秋两季作物要拿到12亿斤。毛主席说：“你们夏收才拿到9000多万斤粮食呢！秋季要收11亿呀！你们全县31万多人口，怎么能吃得完那么多粮食啊？你们粮食多了怎么办啊？”张国忠回答说，要换机器，另外一个干部回答要制酒精。

毛主席说：“其实粮食多了还是好”，“多了国家不要，谁也不要，农业社员们自己多吃也行嘛！一天吃五顿也行嘛！”。毛泽东在群众放的一些“卫星”的鼓动下，头脑也更发热了，他在1958年一次会议上讲，“超过英国不是15年，也不是7年，只需2到3年，2年是有可能的”。1958年的9月2日，毛泽东在一封信中讲，“为5年接近美国，7年超过美国这个目标而奋斗吧！”

在毛泽东鼓动大跃进的同时，又展出了从制度上提前过渡到共产主义的蓝图。1957年冬和1958年春，毛泽东就提出了办大社的问题，4月间，中央正式发出小社变大社的意见。7月1日，陈伯达在北京大学做《在毛泽东同志旗帜下》的演讲，首次公开了毛泽东对未来社会的总体方案，这就是：“我们的方向，应该逐步地有次序地把‘工（工业）、农（农业）、商（交换）、学（文化、教育）、兵（民兵、即全民武装）’组织成为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为我国社会的基本单位”。此后各地自发地创办人民公社。8月6日，毛泽东在河南省新乡县七里营公社视察时明确表态说，“看来人民公社是个好名字，包括工农商学兵，管理生产、管理生活、管理政权”。毛泽东在山东历城县北园公社视察时说，“还是办人民公社好”。8月13日，《人民日报》刊登了毛泽东的“人民公社好”的号召，全国普遍开展了大办人民公社的运动，有的地方一个月实现了公社化，有的地方半个月、甚至十天实现了人民公社化。中央北戴河会议《关于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明确提出，人民公社要加快社会主义的建设速度，为过渡到共产主义做准备。《决议》还认为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当时毛泽东还倡导破除资产阶级法权，主张公社应当实行平均分配，认为工资制是向资产阶级让步，应当改为供给制。随后全国一哄而起，大办公共食堂，实行吃饭不要钱的供给制。

1958年的“三面红旗”，高指标，浮夸风，强迫命令风和共产风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损失，也给人民带来了巨大灾

难。1959年10月中央对大跃进带来的问题有所觉察。毛泽东在11月的郑州会议上指出，必须划清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界限，中国现阶段还是社会主义。八届六中全会后各地对人民公社进行了整顿，对一些地方的平均主义、共产风进行了批评。但是，这些纠正措施没有触动“左”倾路线的根本问题，高举“三面红旗”仍然不动摇，有些地方还在搞特大跃进，经济继续遭受破坏。1959年春天，全国经济严重困难的局面已经形成，全国在粮、油、副食品及其他生活用品方面十分短缺，缺粮成为全国的普遍现象。4月底至5月初，湖北、河北、广东三省向中央报告粮食缺乏情况十分严重，200万人口的武汉市一度粮食供应不上，河北省有30多个县缺粮，广东省全省库存粮只够几天用的。6月份全国粮食形势紧张，各大中小城市和工矿区的粮食挖空了库存，随调随销，食油供应近于脱销。中央决定从6月至9月停止对农村供应食油。1959年2月轻工部向中央报告：纸张、缝纫机、保温瓶、食糖、乳制品、搪瓷面盆、搪瓷口杯、胶鞋等都供应不上，原来不紧张的肥皂、火柴、皮鞋也脱销，沈阳、唐山、广东出现了买不到碗的问题。上海也反映，从5月份后，居民猪肉供应连6两也达不到（当时16两为一斤），5月份，浙江省的肉、蛋供应减少了60%—85%。1959年春天，全国农村普遍出现了饥饿、逃荒、死亡现象。山东省的馆陶县，仅到邯郸一地逃荒的就达13000多人，云南大批农民因饥饿而浮肿，广东省崖县、南雄、罗定、钦县等地，不但患浮肿病的达10930人，而且饿死了134人。面对这种严峻的形势，中央原确定要纠正“左”的错误，但九月的庐山会议因为彭德怀的意见触犯毛泽东，彭德怀等人被划为反党集团，在全国开展了反右倾运动。于是“三面红旗”更神圣化了，左的冒进政策进一步恶性发展，全国经济继续遭受破坏，人民的灾难愈陷愈深。

甘肃省1958年至1961年三、四年的大饥荒、大灾难就是在全国这种背景下形成的。

1955年升任甘肃省委第一书记的张仲良一贯推行极“左”政策，他不仅亦步亦趋地随着中央一些人的“左”倾口号起舞，而且在搞左倾冒险政策和开展大迫害活动中，还有不少发明创造。此人1957年就在甘肃大肆迫害知识分子，有12447人被错定为“右派”，其中将2369名“右派”发配到河西夹边沟劳动改造，其中有很多知识分子因饥饿、疾病和高强度劳动而死亡。与此同时，在全省各地开展大揭露、大批判，揪斗了一大批反映农村真实情况的知识分子。张仲良还连篇累牍地发表《农村见闻》、《蹲点报告》，掩盖农村的真实情况，把所谓“闹粮”的人进行揪斗，搞残酷斗争。

1958年，在大跃进运动中，张仲良主持政务的甘肃省委，不仅全面推行了中央的“左”倾路线，而且还进行了新的“发明创造”，例如：“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就是甘肃的创造。1958年召开的省二届二次党代会，会议修改了“二五”计划指标，提出了一系列高指标、大计划的“宏图”，把农业总产值定为年均增长23.51%，粮食总产量年均增长37.6%，棉花年均增长400%，地方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315%，这些增长速度，是“一五”增长速度的3至4倍甚至10倍，并且确定要上马“共产主义工程”——引洮工程。在大跃进运动中，省委组成“检查评比促进团”，到各地搞冒进和浮夸，对“吹牛皮”、放“卫星”的单位和个人插红旗，对坚持实事求是的单位和个人戴上“白旗”帽子进行批判，“检查团”走到哪里，“卫星”就放到那里。当时在甘肃编造了许多虚假的“卫星”。甘谷县在新兴乡和四十里铺乡放出小麦亩产2827斤和2910斤的“高产卫星”；陇西县文峰乡声称有一条60斤重的黄瓜；文县碧口乡报称有一条70斤重的豌豆；兰州雁滩乡传出结了一颗重4.5斤的辣椒。这场放“卫星”的浮夸风，越吹越大，越吹越离奇。武山洛门镇传说在一棵杨树上嫁接苹果，产量达千斤；礼县盐官乡一个农民把十多亩地里生产的洋芋堆放在一亩地里，经县、区领导“验收”，声称亩

产16万斤，还公开进行了报道宣传。这些离奇的传闻，使得许多人包括农业专家坐卧不安。省农科院的小麦丰产实验，当时亩产也只有600-700斤，放不出“卫星”，被指责为右倾保守的典型。

在工业方面也大搞浮夸，1958年1-3月，公布办厂1000多个，3-5月又建厂3500多个，5-6月全省厂矿企业数达220000个，出现了十多个“万厂县”，二十多个“千厂乡”，五十多个“百厂社”。当中央1958年8月提出钢产量1070万吨后，甘肃省委闻风而动，宣布甘肃要炼铁30万吨，钢10万吨，并且叫嚷，“一斤也不能少，一天也不能迟”，为此全省抽调了300多万劳动力，绝大多数是青壮年农民，到各个炼钢点去劳动，广大农村的大秋作物成熟在地里无人收割，结果只炼出了1.4万吨不能用的废品钢铁，而在这种情况下甘肃省委还继续提出到1959年要炼80万吨钢。因此，甘肃省在大跃进中，在各个部门都大搞浮夸，一时间出现了县县脱盲化、沼气化、滚珠轴承化，在教育领域也竞相放卫星，宣布在甘肃的70个县办了74所大学。

在1958年大浮夸的过程中，人民群众受尽了苦难，局部地区出现饥饿、浮肿和死人现象，到1959年已经到了民穷财尽的地步，但甘肃省委还在为“三面红旗”大唱赞歌。不少食堂出现了停炊、农民饿死的情况，但仍高唱“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公共食堂是心脏”。1959年7月，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去参加“庐山会议”，省委第二书记霍维德主持省委工作，随即给中央写了甘肃粮食问题的报告，报告说：“全省除兰州市外，在45个县、市中，完全没有问题的有19个县、市，部分有问题的19个县、市，严重缺粮的7个县、市，即武威、民勤、陇西、岷县、静宁等县和张掖市。严重缺粮地区的人口共154万。这些地区一般（一天）吃不到半斤粮。全省患浮肿病的有9.6万多人。据统计，因缺粮和浮肿病致死的有2200多人，非正常流入邻省的人口约有6万多人，本省境内各县互流的还有1

万多人。有些地方生产陷入停顿状态”。这份报告在庐山会议上遭到批判，被认定是为右倾机会主义反党分子“提供炮弹”，随即甘肃省委把霍维德等同志定性为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并在全省开展了反右倾运动。全省共受到批判斗争的有 1.009 万人，受到撤职留党察看，开除党籍处分的省、地级干部 65 人，县级干部 285 人，经过 1959 年的反“右倾”，甘肃省的“左”倾思潮更是甚嚣尘上，虚报浮夸继续升级，各地的公共食堂，人民群众虽恨得咬牙切齿，但作为“社会主义的心脏”却继续受保护。在粮食问题上张仲良把持的甘肃省委不断行骗术，先扬言 1958 年甘肃粮食产量为 222 亿斤，后又说 200 亿斤，最后说 185 亿斤，1959 年秋天又说是 110 亿斤。1959 年又提出甘肃粮食要产 400 亿斤，后来又修改为 370 亿斤，最后又修定为 270 亿斤，实际上 100 亿斤也不到。在粮食奇缺的情况下，还向农民高征购，更加剧了人民群众的灾难。

从 1959 年到 1960 年甘肃的粮荒越来越严重，人口外流，浮肿、饿死的人数不断增加，而当时以张仲良为首的甘肃省委却指责反映这种情况是右倾机会主义，粮食问题是阶级敌人制造的，对饿死人的现象，用正常死亡和非正常死亡来搪塞，甚至把人相食的现象说成是坏分子在捣鬼。张仲良在庐山会议上批判彭德怀，他当时说：“甘肃 58 年粮食落实数字是 120 亿斤，比 1957 年增长 41%，粮食真正紧张的只有 7 个县，主要是不会过日子，疏忽大意，对粮食问题抓晚了，对仓库也没有管好”，又大肆鼓吹 1958 年炼钢的成就，说我们“58 年炼了 5 万吨钢，建设了一批小高炉，培训了 1 万多名技术人员和工人，既炼了钢又炼了人”，对大跃进的成绩是“得大于失”，“把大跃进的成绩说成得不偿失是错误的，有得有失的看法也是不对的，大跃进的成绩和缺点不能等量齐观”。可见张仲良的极“左”思想是根深蒂固的，这种极左思想一直延续到他 1960 年底被降职为止，他的左倾思想和他对人民群众的冷漠与无情，是造成甘肃大灾难的重要指导

因素。

由上述分析可以看出，甘肃在困难时期出现的全民大灾难和百万人的饿死现象，它的大背景是中央“左”倾路线在甘肃的反映。总路线和大跃进是“左”倾路线的集中表现，这两个东西在全国直接掀起了破坏经济规律的各种盲目行为，浮夸风、瞎指挥、强迫命令、“放卫星”这些离奇古怪的东西，都是执行大跃进和总路线的具体表现。1958年人民公社的建立，是空想社会主义在中国的重演，它超越物质基础而变革生产关系，把经过百余年都难能施行的供给制、食堂制等等，把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的设想，竟拉到经济十分落后的历史时期来实践，这必然会造成生产关系的大破坏，进而破坏生产力。

在同样左倾路线的大背景下，为什么甘肃等一些省份受害最重呢？这主要是因为甘肃省委的主要领导是左倾狂，想通过跃进和超高发展的形式给自己捞取政治资本，而甘肃的基层干部和相当多的中上层干部，有不少人缺乏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科学意识，容易在上级的冒进口号蛊惑下和群众运动的鼓动下，头脑更加发热或迎合错误思想，或积极推波助澜、助纣为虐，或虚报浮夸、弄虚作假，置人民的死活而不顾。如果本省的各级领导中的大多数能坚持实事求是的路线，能真正从甘肃的实际出发，能关心人民的痛痒和疾苦，上面的错误决策会得到抵制，至少会大大减弱左倾错误路线的影响。可悲的是这样的领导干部在甘肃虽然有，但人数不多，力量很小，最终没有阻止错误路线和政策给甘肃人民制造的灾难。

## 五、涕笑皆非的青海

青海是祖国贫穷落后的边陲地区。1958年以来“创造”性地执行了一切左的政策和措施。1958年在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误导下，掀起了大炼钢铁，大办食堂、大办各种工业的群众运动。浮夸风、瞎指挥风、平调风、共产风、强迫命令风这“五风”吹得青海经济大溃退。而在民穷财尽的1959年和1960年，又按中央继续“大跃进”的方针，又干了一系列违反经济规律的蠢事，特别是59年在反右倾运动中一马当先，左的路线在青海有了恶性发展，一批左的干部置人民生活而不顾，采用高压手段，役使老百姓在贫瘠的高原荒漠地带创奇绩，也就是为这些长官创政绩。青海人民经受了一次空前的大灾难。

### 纸上的青海蒸蒸日上

当我们翻阅1958年至1961年期间《人民日报》对青海的报道文章，看到的是一个持续跃进和天翻地覆的新青海；当我们查阅《青海日报》和省地州县各级领导的讲话和各种发展规划时，看到的青海更是一个奇迹连篇，繁荣异常的人间天堂，全国有的青海都有，全国没有的青海也会独领风骚。

1958年青海省的吹牛也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跃进的奇绩、放射的卫星层出不穷，不仅《青海日报》连篇累牍在报道这些人间奇迹，而《人民日报》等国家报刊也多见青海的跃进喜讯。

1958年4月24日《人民日报》以《青海高原吹遍跃进之风》为题，报道说青海有七个区、十二个乡基本实现牧业合作

社，入社后牧民的积极性空前高涨，1957年已有八个社增产一到二倍，95%的社员增加了收入。青海省今明两年将大力扩建新建机械、冶金、肥料、电力、煤炭、食品等工业。同一天的报道指出，湟中县已集中了90%以上的劳动力，以速战速决的方式进行劳动抗旱，从17日到22日六天中修渠百条，全长1394公里，国家没有花一文钱。战斗场面十分壮观：东方发亮，十万男女农民组成的劳动大军，从山脚上千百个临时帐篷组成的村镇中走出，战斗在各个山头上。为了使妇女给幼儿哺乳方便，每个渠道工地都成立起临时托儿所。这个县的木匠、铁匠和医务人员都走上了工地，商业人员挑着烟、茶、点心在工地上串来串去，连小学教员也到工地上教课去了。从这篇报道中，可知湟中县家家无人了，人都到战天斗地的工地了，人人住临时帐篷，托儿所在工地上，小学教师在工地上上课，不知这是个什么工地，难怪1959年到1961年湟中的饿死人数在青海为首屈一指，因为该县的群众运动对生态、物力、财力和人力的破坏最烈，因而代价也最惨。

1958年10月26日《人民日报》专门有一版篇幅浮夸青海的成就。其中有篇《青海粮食产量跨过黄河》中这样吹嘘：

青海省的农牧业今年获得了空前大丰收。粮食总产量比去年猛增1.34倍，每亩平均达470斤，提前九年过了黄河。在柴达木盆地的赛什克农场，放出了全国小麦丰产冠军的大卫星，他们一亩春小麦产量达8585斤，油菜籽总产量比去年提高70%，平均每亩产量130斤。德令哈农场的油菜，有一亩收获菜籽2161斤，荣获全国油菜高产第一名。各种牲畜预计可由去年的1717万多头达到2000万头。如果按人口来平均，全省每个人可有粮食1300斤。牧业人口每个人可有牲畜50头左右。

看！由此篇报道，可知青海已是个富得流油的省份。

这还不算，美景还在后头。果然，时任青海省省委书记处书记的张同声在《后来者居上》这篇“佳作”中提出了青海将有惊

天动地的发展速度。其文曰：

今天青海比其他地区落后，不久就可能赶上甚至超过其他地区。根据我们的初步设想，到1962年我省的工业产值将等于1957年的90倍，农业方面的粮食产量将等于1957年的12倍多，工业产值将占工农业总产值的66%以上，这就是后来者居上的主要标志。

张同声在这段话后还描写了青海五年后的美景，说那时青海是“机器到处响，工厂遍城乡”，每个合作社都有工厂、学校和医院，工人、农民、牧民都“丰衣足食”。“人人将成为有文化的劳动者”。后来张书记的大话被现实否定了，到1962年时，青海的粮食不仅没有增加“12倍多”，而且由1958年的58亿斤减为41亿斤，人口由于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了16万，1962年比1958年减少25万。至于吹起来的那些所谓工厂、医院、学校，此时已化为乌有。

青海的奇迹在1958年举不胜举。例如说青海已探明的食盐资源，可供当时全世界27亿人口吃一万年；互助土族自治县，放下镰刀的农民在几个月内已建成了强大的“钢铁基地”；在开展“千里驹”运动中，每辆车一天一夜跑了一千一百公里；由技术员、炊事员、电话员组成的赵一曼队，“一夜试制成功了十二种新产品”。

著名诗人袁鹰当时相信了青海的农业高产卫星，在《人民日报》专为青海的卫星写了一首赞歌。其歌曰：

小麦卫星出青海，	青海小麦长得好，
亩产八千惊世界，	政治挂帅是法宝；
千里的雷声万里的闪，	多大的胆就多大的产，
带着喜讯传开来！	坐上火箭上云霄。
一望无边富饶地，	麦香随着黄河走，
沉沉睡了千万载，	麦圃比得昆仑高，
英雄的时代英雄的人，	再干上一冬又一春，

手把秘密来揭开。 更大的卫星看明朝！

看来诗人是受骗了，相信了亩产八千斤，<sup>①</sup>也相信了“多大的胆就多大的产”的格言，因而他的幻想翅膀也大飞翔，“坐上火箭上云霄”，“麦圃比得昆仑高”，“更大的卫星看明朝”。

1959年纸上的青海还是令人可敬可佩的。请看中共青海省委给毛主席和党中央报告中的自我表白：

1959年国民经济继续跃进，预计粮食总产量达到18.8亿斤，比1949年增长2.2倍，各种牲畜总头数达到1211万头，比1949年增长69.3%（因反革命叛乱而损失和叛匪赶往外省的509万头未计），工业总产值5.4亿元，比1949年增长23.3倍，几种工业产品的产量是：生铁1.5万吨，煤炭181万吨，电力4286万度，石油30万吨，机械制造2万吨。公路通车里程由1949年的472公里增加到13411公里，兰青铁路将于“十·一”通到西宁。在广大牧区和柴达木兴建了一批矿区和农场牧场，出现了新的城镇，修筑了上万公里的公路。资源勘探工作获得了巨大的成果，发现了金矿和非金属矿有石油、煤、铜、铁、锌、硼砂、镍、钾、镁、锂、石棉、水晶等七十多种，有些已经初步探明了储量。其他各方面的建设也都有了极大的发展。

上述情况表明我省的经济形势非常好的，对于今后迅速改变落后面貌是极为有利的，特别是兰青铁路通到西宁并继续西进，更将大大加速青海建设的发展。

这段纸上表达的青海还是全面兴旺的，<sup>②</sup>因而“报告”的结论是“青海各方面的建设都有了极大的发展”，“经济形势是非常好的”。既然是“极大的发展”是“非常好的”，那人民生活一定是幸福的，向上的，可惜的是对人民生活“报告”只字未提，而这里提出的工农业发展的许多指标经后来的核实，多为“吹牛”

<sup>①</sup> 《人民日报》1958年10月26日

<sup>②</sup> “中共青海省委关于今后三年青海省经济建设的方针和安排的报告”，青海省档案馆。

和瞎说，当然兰青铁路1959年“十·一”通车说的是事实。这段歌颂盛世的文字中有一个严重错误，就是把资源优势误当为经济优势，况且这里说的资源开发处在“发现”和“初步探明”阶段。为什么把这类深藏地下的东西当成“极大发展”和“经济形势非常好”的佐证呢？可见当时的官吏想欺上瞒下就什么经济学的常识也不顾了。

1960年青海的经济形势怎么样呢？当时的省委书记高峰1960年2月15日在州县委书记会上有一段昧着良心的表白：

当前的形势极好。在一九五八年、一九五九年连续大跃进的基础上，今年一月又夺得了“开门红”，工农牧业和文教卫生、财贸、政法等各部门，都取得了比往年同期更大的成绩，出现了一个空前良好的政治局面。农业战线在去年冬季取得开荒三百八十三万亩，新扩大灌溉面积二百余万亩的基础上，掀起了以水、肥为中心的全面备耕高潮。春耕准备比以往任何一年都抓得早、抓得快、抓得细。据最近统计，全省已经积造有机肥料一千四百多亿斤，上化肥三十一亿斤，平均每亩可施有机肥一万三千多斤，土肥二百多斤。秋翻、冬灌、打土保墒、籽种处理、耕畜饲养、农具补修、制造等，一般也都做得很好。现在部分较暖地区，已经开犁下种，连同冬播，全省已播种六十余万亩。这些，就为今年农业生产的全面跃进，创造了良好条件。畜牧业战线，冬春以来，牲畜普遍膘肥体壮，产羔多，成活多，据元月二十二日不完全统计，全省已产羔五十五万零六百二十九只，成活五十三万六千一百六十只，成活率达百分之九十六点五五，并出现了大量的高产畜群。柴达木海北、海南，黄南等四个州的七十二群适龄绵山羊，繁殖成活率达百分之一百零二点七，这是解放十年来空前未有的丰收景象，标志着我省的畜牧业生产进入高速发展的新阶段。

高峰还大谈工业战线的“开门红”成就和基本建设战线破“常规”冬季施工的“成就”。特别高峰大赞了政治思想战线的伟

大胜利：

在政治思想战线上，机关的反右倾斗争和农村的整社（场）运动，都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彻底粉碎了一小撮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一部分富裕中农向党、向社会主义的猖狂进攻，搞丑搞臭了资本主义思想和资本主义道路，深刻教育了广大干部群众，提高了阶级觉悟和社会主义积极性，进一步鼓足了革命干劲，人人力争上游，个个朝气蓬勃，树雄心，立大志，决心提前完成和超额完成今年的任务。

高峰对青海省的经济社会状况进行了多角度的包装，从农业到牧业，从经济到政治各个方面都进行了描绘，其结论是“当前的形势极好”，“整个政治经济形势，都是一个大好的形势，是一个继续大跃进的新形势”。从高峰的讲话中可以看到省委书记要管一切了，从秋翻、冬灌、打土保墒、籽种处理、耕畜饲养、土地施肥，羊羔成活率、冬季建筑行业施工都过问了，而且说他过问的这一切都非常好，从而说明青海人处在蒸蒸日上的经济环境中。但马脚还是有的，如说“适龄绵山羊，繁殖成活率达百分之一百零二点七”。繁殖了一百只羊羔，全部成活则为繁殖成活率的百分之百，应是到顶了，而当时青海的怪现状，一百只羊羔竟变成了一百只又加二点七的羊羔，是笔者缺乏牧区的统计知识，还是高峰书记故弄玄虚，抑或是当年的羊羔又生了小羊，这可能性极小，即使有也应算当年繁殖的数字内，整体上作百分之百计算，为什么又来一个“二点七呢”？此疑点留内行去评说。高峰好不容易在分析大好形势时，也提到了青海人的吃饭问题：“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生产队，生活安排已经落实，每人有粮二百斤以上，有洋芋和其他代食品数百斤”，这是用“二百斤以上”，“数百斤”这些不确定的数字掩人耳目；实际上青海人均粮食100斤都不足，至于代食品多为吃了殒命的野生植物和麸皮，实实在在是骗人的鬼花招。高峰提到的“反右倾”，反“富裕中农”的阶级斗争，在青海是“落实”的，数以十万计的干部群众以“右

倾”、“富裕中农”、“资本主义倾向严重的人”、“五类分子”的帽子，予以大规模迫害。

### 真实的青海无限凄惶

从1958年大跃进进到1961年纠正右倾错误，青海省委和多数地区党委的工作作风是：吹嘘成就欺上瞒下，层层封锁、隐蔽真相。按着报纸上、文件上描绘的青海已是一个富得流油的地方。而剥开被粉饰的画面，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真实的青海，充满着痛苦、眼泪和死亡的青海。

就粮食来说，青海省委给毛主席的报告说1959年就要达180万吨，实际上从1958年到1962年粮食出现连年减产：

1958年粮食产量 58.56万吨；

1959年粮食产量 52.13万吨；

1960年粮食产量 41.35万吨；

1961年粮食产量 39.15万吨。

这与吹嘘的180万吨的粮食产量相差5倍左右，可见吹嘘者何其大胆！

从1958年到1961年人口的减少也是惊人的。

1958年青海总人口225万，死亡率为12.99‰，人口自增率为14.98‰；

1959年总人口为260万，死亡率上升为16.58‰，自增率6.4‰；

1960年人口下降为249万，死亡率上升为40.73‰，人口自增率为-97.66‰；

1961年总人口减为211万，死亡率为11.68‰，自增率为-0.23。

而到1962年人口仍然是锐减的，总人口为205万，比1958年减少了20万，虽然当年保持了35.72‰的高出生率，但饥饿

年代造成了人口病殉的后效应仍然存在。因此人口仍在不断减少。

青海职工的年工资收入不是他们吹嘘的人均 2000 元到 5000 元，而从 1958 年到 1962 年始终没有突破 800 元：

1958 年 793 元；

1959 年 708 元；

1960 年 721 元；

1961 年 712 元；

1962 年 788 元。

该省的财政收入和支付情况也很窘迫：

1958 年财政收入 1.08 亿，总支出 3.24 亿，赤字 2.16 亿；

1959 年财政收入 2.57 亿，总支出 5.02 亿，赤字 2.13 亿；

1960 年财政收入 2.91 亿，总支出 7.10 亿，赤字 4.19 亿；

1961 年财政收入 1.30 亿，总支出 2.91 亿，赤字 1.61 亿；

1962 年财政收入 0.56 亿，总支出 1.28 亿，赤字 0.72 亿。

由上述统计数字看，青海的人力、物力、财力，由于 1958 年以来三年大跃进的破坏，已匮乏到令人难以忍受的程度，况且这些统计的真实性也是大打折扣的，总体上统计工作也是不敢否定成绩的。

关于粮食问题并不是人均 1000 斤以上的吹嘘指标，而是极端短缺。在 1961 年青海省委给中央的报告中称：1960 年估产 17.4 亿斤，征购任务定为 6.02 亿斤。1961 年核实总产只 8.3 亿斤，征购任务完成 3.519 亿斤。到 1961 年 2 月 10 日，库存粮食只有 2.4298 亿斤。在这种情况下，青海省全面贯彻“低标准”、“瓜菜代”的方针，组织群众捕鱼打猎，满山遍野搞代食品生产，原计划农村和国营农牧场年留口粮 155 斤，实际按 95 斤标准留粮。每人每天人均口粮二两七钱六厘。

由于食品短缺，甚至断绝，人口死亡问题十分严重，汇报材料这样讲：

目前，农村病人多，人口死亡还没有完全停止，有些地方病人死亡还是上升趋势。据二月十八日统计，1959年至1961年元月两年多来全省共死亡了十六万七千四百二十四人，占全省总人口的5.7%。其中农牧民十一万八千八百八十四人、国营青年农场农工八百一十人、国营牧场农工三百二十五人、在押犯八千八百七十五人、劳改犯劳教分子和刑满就业人员三万七千另九十一人、其他一千四百三十九人。按年度分，1959年死亡三万一千一百五十三人、1960年死亡十三万零一百三十一人、1961年元月分死亡六千一百四十人。在死亡的农牧民中多数是基本群众和青壮年，男人占60%。人口死亡以民和、湟中最为严重。民和死亡二万零九十六人，占该县人口的13%；湟中死亡二万零三百七十四人，占该县人口的7.5%。目前全省农牧民和国营农牧场尚有各种病人二十万二千八百七十六人，其中农牧民十万二千八百七十六人，国营农牧场十万人。体质严重瘦弱的十三万六千三百六十三人，由于人口死亡严重，生病和体质严重瘦弱的人数较多，严重地破坏了农业生产力。问题的严重性是：这种情况不仅没有完全制止，而且少数地区还有增多。二月上半月，湟中死亡九十七人，比元月份死亡九十三人多四人；黄南死亡二百二十九人，比元月份死亡三十四人多一百九十五人；海南死亡六十三人，比元月份死亡十八人多五十三人。病人在不少地区是上升趋势，二月十五日，民和县有病人五千二百七十三人，比元月底增加五百四十九人；乐都县有病人六千二百九十一人，比元月底增加三百三十四人；互助县有病人四千零三人，比元月底增加三百三十六人；湟中县有病人七千九百三十四人，比元月底增加二百四十三人。

青海一些州县的情况更为严重。民和县委1961年1月22日对省委的报告称：从1959年到1960年，两年全县共死亡16842人，男10137人，女6705人。其中1959年死亡3704人，占当年人口总数的2.14%。1960年死亡13138人，占当年人口总数

的 8.3%，死亡的婴儿有 2126 人，占死亡人口的 12.6%，儿童 3252 人，占 19.3%，青年 3274 人，占 19.4%，壮年 5393 人，占 32%，老年 2797 人，占 16.66%。

报告还分析了五种死亡原因：1. 因年迈体弱，久病不愈或急性传染病死亡的 10494 人；2. 因浮肿病死亡的 2665 人；3. 因体质消瘦染病而亡 1388 人；4. 因腹泻痢疾死亡的 1717 人；5. 服毒、上吊被坏人打死 338 人。这种死亡分析没有直述大部分人是因饥饿而死亡，这样的分析缩小了非正常死亡的数额，但实际上无论是浮肿病、还是痢疾、体质瘦弱都是因饥饿造成的，因而可以认定大部分是饿死的。同一统计材料分析了集中死亡的时间，认为 1960 年 3 月至 5 月死亡人口数最多，大约 7555 人，占全年人口死亡总数的 57.4%。因为这几个月粮食断绝。

青海化隆县志对该县 1959 年和 1960 年的农民生活的悲惨状况作了如下描述：

1959 年，继续“大跃进”，提出“粮食总产 4 亿斤”的高指标，以强迫命令、瞎指挥、浮夸风指导农业生产；同时，1958、1959 两年全县粮食征购 6458.37 万斤，油料 312.74 万斤，各占两年粮油总产量的 47% 与 81%，征购过头粮，加之由于遭受自然灾害，粮食普遍减产，导致农民生活极度困难，普遍以野菜、树叶充饥，出现人瘦、地瘦、牲畜瘦，部分农民出现浮肿，无法下地劳动，有些社队田园荒芜，人口大量外出逃荒、讨饭，甚至有饿死人现象。1960 年 3 月，省委指示搞反瞒产私分，层层下指标，对小偷小摸行为一律以“破坏生产”、“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罪名集中到公社举办“集训队”，集训时间 5 到 3 个月不等。在此期间，还普遍发生基层干部捆打群众的事。1960 年末，农业人口比 1959 年末减少 13514 人，其中劳动力减少 2918 人，到 1961 年，农牧业生产下降到解放后的最低水平。

青海湟中县三年困难时期灾难更为严重。全县 1960 年统计死亡 15230 人，占总人口的 12.87%，死绝 1000 多户，700 多

个孩子变成了孤儿，人相食的事件多达 100 多起，其饥饿造成的惨状目不忍睹。详情在“湟中事件”中已有叙述。

由于食物极端匮乏，饥寒交迫。从 1959 年开始，青海的难民就开始外流，其中不少人死于流亡途中。甘肃的甘南州和临夏州本来也是饥荒严重的两个州，而临近这两州的青海难民又不断流入，造成这两个州的巨大压力和恐慌。这两个州对甘肃省委的报告，充分反映了青海难民流动中的苦难。

甘南州委给甘肃省委的报告说：

近据洮江县委和玛曲工作组报称：洮江地区近由青海省之河南泽库等县跑来之河南县青年甚多，三三两两时有发现，先后发现六十余人，他们全系逃跑出来的，无衣无食、四处流落，沿途乞讨，有的甚至饿死道旁。玛曲地区发现由青海逃来之男女青年 32 人，并发现上扎寺路上有 2 人饿死（上扎寺系河南县管辖）。其中十四人留到玛曲不走，他们说：“粮食不够吃，饿得不行，连长、指导员都跑了，上扎寺已跑得没人了”（这可能与事实不符）。并提出“怎都行，死都不回河南县去”。另在科才、尕海、西仓、阿木去乎等公社亦先后流来 31 人，其中 6 人怕被送回青海，即又逃走。

临夏州委给甘肃省委报告了青海民和县与临夏市新寺公社人口互流的情况：

临夏市新寺公社与青海民和县的马营、川口、古山泽、龙治、慢平等公社相连，群众往来关系较多，新寺公社的 1732 户社员中，有 785 户占 45.3% 的社员与上述公社有亲戚关系，因此，从今年三月至六月农村粮食紧张之际，新寺流人民和群众 20 多人，民和县流入新寺的群众亦有百余人，发现三人已死（系疾病和生活问题），这些人有的是通过亲戚关系暗地寻找和赠送粮食、洋芋等，同时，民和县龙治、马营公社流入的个别社员也发生了偷盗事件十五起（新寺公社流人民和的个别社员也发生偷盗），由于这样，既影响到社会秩序也影响到两地之间的关系。

以上事实说明，三年困难时期青海省推行左倾路线的人及其舆论工具所宣扬的“形势极好”，“丰衣足食”是遮人耳目的谎言。

### 以穷治穷穷更穷

在粮食极度紧缺，饥饿笼罩大地的时期，青海省委和各级领导机关也都采取过一些摆脱困境的措施，但这些措施大都不是治本的措施，多为“以穷治穷”的措施或者叫作“漫天过海”的措施。概括起来青海采取解决饥荒饥饿的措施大体如下：

#### 1. 大反右倾大鼓干劲

青海省委的一些领导同志认为，青海实际上不缺粮，叫喊缺粮，吃不饱饭实际上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一部分富裕中农向党进攻的表现，因此，抓粮食和生活问题，就要反右倾、鼓干劲。青海省委书记提出了安排群众生活的方针是“一顶二抓”。就是要顶住那些叫喊粮食不够吃的吹冷风者。要开展对一小撮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一部分富裕中农的斗争，整顿农村党组织，造成人人争上游的局面，在顶住冷风的基础上，再抓生活安排。他指出现在局势很好，问题虽有，只要认真抓是完全可以解决的。在省委主要负责人的倡导下，各地都把粮食问题看成阶级斗争新动向来抓，乐都县洪水公社就批判所谓“粮食紧张论”。当时群众反映“三五天内就没有粮食”，“社干报的产量高实际打的少”，“为了放卫星不管吃饱吃不饱”，公社和大队领导针对这一种情况进行了批判，认为这是否定大跃进的成绩，是秋后算账派重新抬头，提出在粮食问题上分清大是大非，提高思想认识，然后发动贫下中农，查浪费，查漏洞，算细帐，盘典仓库，强迫农民重新估报粮食产量。

1959年互助县召开高额丰产运动千人大会，把粮食问题作为思想问题来解决。认为“叫喊缺粮的人是手里拿着馍馍，嘴里

说着饿话”，是富裕中农在作怪，是一部分贫下中农忘了本。于是，他们采取了忆苦思甜的办法解决吃饭问题，“让大家对比了解放前吃什么饭，作什么活，解放后吃什么饭，作什么活，以及解放前后的物质生活对比，人口增加和产量增加的速度对比。”

## 2. 开展反瞒产、反私分运动

从省委到县委及公社党委都不敢正视 1958 年以来粮食的虚报浮夸和粮食减产的现实，认为粮食不够吃，出现粮食危机是由于基层干部和社员的私分，因此，在青海开展了反瞒产、反私分运动，例如民和县从 1960 年元月开始在全县反瞒产私分，在五干会上迫使干部报告瞒产私分的粮食，号称报出了私分隐瞒的粮食 8408674 斤，洋芋 4482421 斤，油料 45234 斤，但结果都是逼出来的假数字，农民真正拿不出来所谓私分的粮食，绝大部分都落空了。湟中县采取“搜刮群众，大挖陈粮”的办法。1959 年粮荒开始，县委就认为完不成征购任务不是粮食问题而是思想问题，于是就挨家挨户在农民家里搜陈粮，连老鼠洞都要挖开大肆搜索，在挖陈粮过程中挖出了许多假数字。例如，小南川和汉东两公社就逼出 2000 多万斤瞒产私分的假数字。小南川公社有一小队长，因为交不出粮食而上吊自杀，汉东公社的一位支部书记一家五口在反瞒产中被活活整死。后来事实证明，反瞒产得到的粮食数字基本上都是逼出来的假数字，不仅没有解决粮食短缺问题，而且火上浇油，加剧了群众的困难生活。

## 3. 大搞代食品运动

所谓“代食品”指代替粮食的食品，青海省在搞代食品运动上非常出名。“代食品”的种类很多，包括山上一些植物的根茎叶、榆树皮、麦麸等原来只供牲畜吃的东西，这时要作为食品的代表来养活饥民了。据说青海的代食品在 1960 年已高级化了，用化学合成的方法来制造了。能够制造出人造肉、小球藻、链孢霉，1960 年 12 月 25 日，青海省委就“代食品”生产问题，向中央西北局和党中央写了报告，表达了他们用代食品改善群众生

活的作法。现将这篇“杰作”转载如后：

### 青海关于制造代食品情况的报告

西宁市委，柴达木工委，各州、县委，省级各党组、党委，并西北局、中央并请转高峰同志：

我省搞代食品以来，从省级和西宁市各机关十二月二十日汇报的情况来看，任何事情一再表明，只要那里的领导重视，那里的代食品搞得就好，并且对于改善自己的生活，增进身体健康有着重大的作用。到会的省、市级三十七个单位；其中西宁电业局、省地质局、水电厅等二十二个单位制出鲜人造肉一千五百三十九斤，省科学分院、地质局、农林厅等十八个单位，制出小球藻成熟液十五万九千九百三十斤，西宁市、铁路局等七个单位制出叶蛋白七百五十九斤，西宁市、商业厅等八个单位制出淀粉一百五十二万六千四百一十九斤，商业厅制出链孢霉一百五十斤。但是，仍有省邮电局等单位根本未搞，或者基本上未搞，对在粮食方面开辟第二战线按兵不动。为什么按兵不动呢？就是各单位党的领导不重视，这是十分错误的，应即纠正，立即行动急起直追，学习先进。

搞得好的单位日产量相当可观，并且用人造肉、小球藻在改善生活，医疗疾病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效果。如西宁电业局日产鲜人造肉四十至五十斤，省地质局日产四十一斤，并计划一月份日产一百斤，每人每天吃三两至五两，省机械厅日产十八斤，该厅有一百八十三人浮肿者，食人造肉七天后，即有一百四十六人消肿。农垦厅职工医院给十五名浮肿病人服用小球藻浓缩液二十一天后，浮肿消退，血浆蛋白增高，基础代谢升高，食欲好转。

最近在培制人造肉、小球藻方面取得高产、速成的几条经验：

#### 一、人造肉：

气象局已将人造肉的生产期由三天缩短了二十至二十四小时，其经验有三：1. 温度经常保持在三十至三十五度，湿度70%以上；2. 培养液用煮菜水、洗锅水等混合液比单纯液好，不要太浓，深度二公分；3. 播种量在10%最好。

## 二、小球藻：

1. 地质局研究出了培制小球藻的速成法，其方法为用6%的人造肉废液作为小球藻培养液，温度在二十五至三十度，并使阳光照射，三、五天即可成熟。

2. 水电厅研究成功了用电灯代替阳光培养小球藻的办法，在三千毫升水中加硫酸铵零点二克，硫酸镁零点一八克，过磷酸钙零点零三克，氯化钾零点零二五克，作为培养液，在十五平方米面积上安装二只日光灯和二只二百瓦的灯泡，夜晚进行光照，八至十天即可成熟。

## 三、链孢霉：

商业厅的露酒厂在综合利用原料方面搞得很好，方法系利用制人造肉的废菜叶，待温度降至30度时，将链孢霉种掺入、搅匀，堆成塔形，过二十四小时后，再摊平，温度始终保持三十度左右，再过四十八小时即成链孢霉，含蛋白质7—8%，脂肪5—6%。和人面中可做馍、可做饼子、花卷，味道香鲜可口。各州（市）、县搞代食品的进展情况，省委虽曾催要，但至今未见报告，现在再应明确确定：每月十日、二十日和三十日一定要报告一次，省级机关要有日产进度报告，必须执行，千万不得有误。日报内容只要代食品的名称和日产量即可，如有什么经验请及时上报。

以上报告妥否请西北局指示。

青海省委

1960年12月25日

虽然把代食品宣传得神乎其神，但由于有些代食品人们根本不宜食用，例如树皮、麸皮之类的食品，人们食后肚子肿胀，大

便不通，不是浮肿就是死亡，有些代食品如打猎捕鱼获得的动物是极其稀少的，根本解决不了大量人员的食品问题。有些代食品如人造肉、小球藻等类菌类食物没有先进的设备和工艺是不会大量生产的，况且还需要与粮食有关的原料。果不出所料，代食品并没有解决青海人的吃饭问题，1960年青海对中央的汇报中指出：“代食品生产计划的完成情况较差，只有20%的生产队代食品较多，50%的生产队代食品缺乏，30%的生产队代食品已全部吃完。柴达木和五个州原计划打猎2439万斤，到1960年元月底，只完成了984万斤；冰鱼生产计划2000万斤，到元月底只完成96.4斤；人造肉，小球藻和温室种菜因汽油、煤炭供应不足，生产受到很大影响。”

#### 4. 压缩口粮标准

在粮食减产和库存粮食很少的情况下，青海省对城镇粮食供应标准，前后进行了几次压缩，按人们的不同体力、职业分别规定了供应标准：特重体力分四十、三十九、三十八斤三等；重体力分三十六、三十五、三十斤三等；轻体力分二十八、二十七、二十六、二十五斤四等；运动员三十五斤；大学生三十斤；工矿企业机关干部职员以及城镇居民供应标准，西宁市区二十四斤、农业区二十三斤、牧业区二十二斤；三岁以下儿童八斤，三至六岁的十四斤；六至十岁的，西宁市区二十二斤、农业区二十一斤、牧业区二十斤，农村人口每人每天原粮三两七钱五厘，除去调运、加工、做饭等过程的损耗和有些炊管人员多吃多占外，实际吃到嘴里的粮食还不到三两七钱五厘。

在供应标准压缩后，并没有缓解人们的饥饿问题，反而是雪上加霜。农村病人多，人口死亡并没有完全停止，有些地方病人死亡还是上升趋势。1959年至1961年元月两年多来全省共死亡了十六万七千四百二十四人，占全省总人口的5.7%。在死亡的农牧民中多数是基本群众和青壮年，男人占60%。人口死亡以民和、惶中最为严重，民和死亡20096人，占该县人口的

13%；湟中死亡 20374 人，占该县人口的 7.5%。由于人口死亡严重，生病和体质严重瘦弱的人数较多，严重地破坏了农业生产能力。

### 5. 大办公共食堂

自从 1958 年人民公社化以来，青海就开始大办公共食堂。在 1959 年、1960 年大饥荒时期，从省级领导到县级干部异口同声强调粮荒和饥饿加剧在于“公共食堂没有办好”。于是，很多地方把已经解散了的公共食堂又重新操办了起来。到 1959 年底，青海的农业区和牧区已有 90% 的农牧民进食堂吃饭，但是事实上，在食堂粮食短缺、生产队干部贪污多占的情况下，每天人均口粮压到不到三两，人们的碗里盛着的不过是清水汤而已，解散公共食堂应是势在必行。但在青海同全国一样，公共食堂仍被看作是社会主义的“命根子”，是“共产主义的萌芽”。于是又产生了一些加强食堂的办法：例如，“书记进食堂”、“思想要挂帅”、成立群众监督组。还提出食堂种菜、养鸡、养猪，这些措施基本上都失败了，在没有粮食的情况下，只抓公共食堂的管理，实在是本末倒置，至于种菜、养鸡不是短期内就能见效，连养人的食物都没有，何谈养鸡、养猪？许多浮肿病、饿死人的事件都发生在大办公共食堂时期，因此，这一措施是完全失效的。

青海省在困难时期解决饥饿的上述办法，实际上是 1958 年大跃进以来左的政策继续。这些办法的严重缺陷在于忽视了解决吃饭问题要从物质基础着眼，要通过经济资源的开发，通过农产品的真正丰收来提高居民和农民生活水平。青海省的作法完全否定了物质资料的生产是改善人民群众生活的根本条件这一颠扑不破的真理，青海省的许多作法都违背了经济发展的规律，本来是欠收的，却认定是丰产的。不仅不让群众反映实际缺粮的情况，而且采取高征购、反瞒产、反私分的办法，使农村空空如也。本来是农牧民真真实实地饿肚子，他们却认为这是思想问题，是给社会主义抹黑。从来不是抓农民的实际问题，而是大抓

思想、大反右倾。本来是公共食堂这个所谓的共产主义新事物造成了粮食的浪费，并为基层干部提供了多吃多占的方便条件，但却大唱公共食堂的赞歌，把公共食堂当成解决吃饭问题的唯一阵地。青海省的各级领导如此解决缺粮的种种办法，实际上是火上浇油，雪上加霜的办法。不仅没有解决农牧民吃饱肚子的问题，而且使他们在饥饿的泥潭里越陷越深。

### 历史沉思些什么

从青海三年困难时期人们所经历的痛苦和经济遭受的重大损失，给我们提供哪些沉痛的教训呢？我们应当重点反思什么呢？

#### 1. 左倾路线是青海人民陷入灾难的祸首

三年困难时期，青海的自然灾害是严重的，然而，大饥饿的祸首不在自然灾害，而在一条疯狂的左倾路线。所谓“左”倾路线是以极革命的形式做出一些超越现实、超越理性的举动。在认识论上表现为唯意志论，忽视现实基础，忽视客观规律，强行推行某种经济路线。左倾路线的另外一种突出表现是对人的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以革命面目出现扩大打击面。青海在三年困难时期上述左倾路线的特征都有明显表现。1958年青海开始提出“后来者居上，要发挥共产主义的革命干劲，五年彻底改变青海面貌，提前超英赶美”。他们在三年困难时期，普遍推行伙食供给制，大办公共食堂，收缴农民的自留地和牧民的自留畜，从1958年秋到1960年大搞“一平二调”，将农村土地、房屋、牲畜、农具、粮食、资金、劳力等无偿调运。搞跨社跨县的大协作，一度“共产风”蔓延全省，造成经济上的重大损失。1958年大跃进中，把大批青壮年劳动力抽调到深山老林找矿、采矿“炼钢铁，秋田烂在地里无人收割，农作物受到严重损失，同时也延误了备耕，造成了春荒，这种超越历史发展阶段和物质条件推行供给制和共产制的行径，其后果就是既破坏生产力又破坏了

生产关系。

当青海省粮食奇缺、饥饿袭击民众的时候，省委及其他领导层的一些人不是从组织物资调拨、增加社会财富方面解决问题，而一味抓阶级斗争，在1959年和1960年几乎经常开展反右倾机会主义和富裕中农的倾向，对一些讲困难和说真话的干部和群众进行残酷斗争，有的被整死，有的被弄得家破人亡。青海省开展的阶级斗争不是促进了生产，而是斗散了人心，斗垮了群众，斗垮了生产。可见，“左”倾路线是青海大饥荒的祸首。

### 2. 假话与浮夸是青海人民陷入灾难的祸源

从1958年开始，青海省的许多干部背离了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原则，说空话、说假话成为“时尚”。虚报、浮夸成为工作的基本手法，1958年10月，青海省就吹嘘牧业人口每人有牲畜50头，农业增产要按倍数来计算，并且放出了8885斤的小麦卫星，把“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上升到经济工作的指导地位，1960年吹嘘粮食总产要达到17.4亿斤，实际不足8亿斤”在人口大量死亡和外流的情况下，仍然吹嘘形势极好，90%以上的生产队生活都安排得很好，号称每人有粮食200斤以上，还有洋芋和其他代食品数百斤。在灾难已经深重，人口大量死亡的情况下，从省到县社仍在说假话，大量缩小死亡的统计数字，而且提出了病人、老年人和工伤事故中死亡的人、因各种因素自杀的人，都不能统计在非正常死亡人数中，甚至还不断向上级炮制假经验、假材料为自己评功摆好，由于假话成分掩盖了青海省人民群众的实际困难，掩盖了青海各级领导工作上的严重错误，最终导致人民群众陷入饥饿的深渊。

### 3. 官僚主义的领导体制是青海人民陷入灾难的祸根

青海省的左倾路线都是由省地县社各级领导层推行的，而且对这条错误路线造成的损失又层层封锁，得不到纠正，这不能说同我们当时的领导体制无关，事实上，青海省的严重问题是当时领导体制存在弊端的大暴露，当时的领导体制是从上到下一切实

行高度集中的领导和管理，下级只能听命于上级，上面的政策真是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各级领导都好大喜功，愿听成就，不愿人说缺点，在这种“条条专政”的体制下，一级对一级只报喜不报忧，“抬轿子唱赞歌”。

同时，在党政关系和党群关系中以党代政、以党代群，一切决策由党委书记说了算，政府的职能被严重削弱，人民群众的决策权和自主权基本不存在，虽大搞群众运动，实际上“运动”群众，往往而把党委中少数人的主张强加到群众头上，并且宣传为群众自发的运动，无论是大炼钢铁、公共食堂和快速过渡到共产主义，都说成是群众的伟大创造。这种体制必然存在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瞎指挥。

## 六、陷入大跃进泥沼的河南

河南在大跃进年间是一个浮夸最利害的省份之一，因而，河南的百姓在三年困难时期所遭遇的灾难就较深重，特别是在河南的信阳地区，开封地区，群众的遭遇就更为惨烈。

### 一、大跃进的“红旗省”

大跃进一开始，河南一马当先，到处出现大跃进的“卫星”，第一个人民公社和公共食堂也是从河南发起的。1958年7月29日，《人民日报》报道河南有800万农民既坚持在田间学习，又坚持农业生产的大跃进，出现的景象是：村里不见人，田里人成群，黑板树上挂，遍地读书声。《人民日报》在1958年6月8日报道河南遂平县卫星公社5亩小麦亩产21050斤，这是当时全国最大的一个卫星，由于受这一枚“卫星”的启发，各地出现了一批亩产万斤的“卫星”。

在创办公共食堂上，河南也出现了成套经验，《人民日报》1959年9月8日报道河南农村人民公社化后已建立起32万个公共食堂，参加食堂吃饭的人数占全省农村总人口的99%。还报道广大社员热烈欢迎食堂，称其为“幸福堂”，“如意灶”，“大家乐”，并认为绝大多数食堂办得很出色，每天有馒头、有菜、有汤，还建立了“五味台”，每顿饭都有油、盐、酱、醋、辣，还声称把600多万妇女解放出来，积极参加生产劳动。

1958年11月6日河南孟津县横水乡红旗人民公社办了300多个人称赞，个个叫好的公共食堂，号称214个食堂在一个月

内 94 顿饭菜顿顿不重样。河南在开办食堂过程中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据说在食堂开办时有 150 多名地富反坏分子和有严重资产阶级思想的人混入食堂，党委会发动群众把这些坏家伙从食堂管理和炊事工作中彻底清理出去，并立即调配 32 名共产党员，63 名共青团员和 85 名积极分子担任炊事员和管理员。

在大炼钢铁运动中，河南几乎抽调一半劳动力去炼钢，炼钢战线上“卫星”不断出现。1958 年 10 月 6 日《人民日报》报道：河南信阳专区 90 万钢铁大军 5 日放出日产钢 9350.96 吨的大卫星，创造了全省日产钢的最高纪录。经过化验，钢的质量合乎要求。这是在炼钢工业方面大搞群众运动出现的新的奇迹。

1958 年河南省被描绘为一个富得流油的大省。河南省农业厅 1958 年 9 月 16 日在一篇《怎样攀登小麦丰产高峰》的材料中对河南农业战线的奇迹做了如下报道：

我省今年夏季获得空前大丰收。全省夏收粮食作物总产量达到 262 亿斤，较 1957 年 92.7 亿斤增长 145.7%；单产 274 斤，比 1957 年单产 114 斤增长 146.4%。其中小麦总产 189 亿斤，较 1957 年 75 亿斤增长 152.6%，单产 282 斤，较 1957 年单产 113 斤增长 149.6%；并创造出许多新的奇迹，从山区到平原，从沙区到碱区，到处出现高额丰产典型，亩产千斤、双千斤以上的高额丰产田，差不多县县都有，全省小麦亩产千斤以上的社 59 个，面积共 26 万多亩。其中，3000 斤以上的典型共 69 起，最高的是西平县和平农业社有 2 亩试验田，单产达到 7320 斤，创造了史无前例的最高丰产纪录，小麦大丰收的事实，充分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有无比的优越性，显示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伟大力量，彻底粉碎了潘复生等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农业生产悲观论，驳斥了农业生产只能渐进、不能高速度发展的右倾保守思想。在这篇经验材料中还总结了他们的成功经验，其中许多经验都非常古怪，例如，在思想统帅的经验中，认为理想亩产多少斤

就可以达到多少斤，敢想敢干是“卫星田”获得决定性胜利的关键，另外一条经验是深翻土地，认为土地翻得越深其产量越高，深耕1.5尺可亩产达1000—2000斤，深翻2尺亩产可达5000斤，深翻3尺以上亩产可达1万斤。

河南的大跃进和反右倾是连续性的，1959年在与彭德怀“反党集团”的斗争中，河南省委领导，用河南大跃进的奇迹来驳斥彭德怀。到1959年秋冬，河南发动反右倾、鼓干劲运动，提出要亩产增长500公斤的持续大跃进目标，在农村，结合冬季征购，开展反瞒产斗争，打击一大批说真话的干部和群众，在冬季大办水利中继续刮“共产风”，仅水利一项就平调了社队3亿元的资产，1960年虽遭到自然灾害及饥饿的袭击，但河南仍坚持持续大跃进的方针，贯彻以钢为纲的指导思想，千军万马继续大炼钢铁，农业生产又一次受到严重影响。

由于河南在三年困难时期不断创造“人间奇迹”，从而成了一个“红旗省”。而在“红旗省”的背后却隐藏着生产力的大破坏和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大下降。

## 二、饥荒时期的“灾难省”

凡是大跃进时期浮夸越严重，卫星放得最多的地区，也是三年困难时期灾难最深重的地区，河南省也不例外。

河南省连续三年大跃进，使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全省人民生活水平急剧下降。根据《河南省志》记载：1960年和1957年相比，全民所有制职工年平均货币工资由546元下降为451元，居民消费水平由68元下降为64元，按可比价格计算，下降16.1%。农民平均每人全年的粮食消费量由192公斤下降为120.5公斤。在这种情况下，河南省也采取了一些解困的措施，如停止招收新职工和合同工，允许各家养鸡、鸭、兔，腌制小

菜，还缩小了食堂规模，但这些措施基本上无济于事，河南伤了元气无法恢复过来，而左的政策还在继续，批判资本主义倾向的运动始终没有停止。许多地区在1959年就发生了断粮和人口严重死亡的情况，1959年1月20日有的群众隐名上书毛泽东和周恩来，反映河南省虞城、夏邑等县虚报产量，造成群众浮肿死亡的严重情况。当年2月17日周恩来总理亲自批示，责成“内务部、农业部和国务院派人限期复查”。河南省当时大事记中这样记载调查的结果：

1958年完成秋粮征购后，豫东农村粮食普遍紧张，部分农村群众口粮奇缺，到12月份以后，连红薯也吃光了，只能以野菜充饥；调查统计，1958年10月至1959年3月，全开封地区因饥饿而患浮肿病者达13.6万余人，因患浮肿病死亡7232人；最严重的虞城县杜集公社，因患浮肿死亡者达1143人，占该公社总人口的2.22%。实际情况比信中反映的更严重。3月28日，在省委书记处书记赵文甫指导下，开封地委召开常委紧急会议，研究制定了《关于当前群众生活问题的十项紧急措施》，并迅速组织调运粮食，派出医疗队，安排群众生活，抢救危重病人，较快地控制了粮荒、饥饿和浮肿病不断蔓延的严重局面。但是，省委及其主要领导人没有从中认真总结和汲取沉痛教训，导致1959年冬和1960年春又发生了更为严重，范围更大的人口非正常死亡事件。

河南的开封、信阳及其他经济困难地区，三年困难时期，人民群众遭受了极大的苦难，特别是信阳地区成为全国饥荒最严重，死亡最多的地区，这个号称水稻亩产4.8万的地区，1959年初就出现了大面积断粮现象，但该地区各级党委采取的措施是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斗争了3300多名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不满的干部，把饥饿外逃的人当成流窜犯看管，全地区收容46万人次，其中一部分人被迫害致死，1960年死亡48.39万人，

死亡率约达 119.50‰，全区出现 45648 个孤儿，50416 个孤寡老人，30% 的农民无被无衣。国家统计局资料表明：河南省 1960 年人口死亡率为 39.56‰，出生率仅为 13.94‰，自增率为 -25.58‰，1959 年全省人口 4979 万人，1960 年降为 4818 万人，人口减少了 161 万。<sup>①</sup> 这一统计数字表明，河南省在大跃进时期所遭受的破坏何等惨烈，三年困难时期人民群众的生活十分悲惨。

### 三、引人发省的问题

河南 1958 年的浮夸风和三年困难时期的大灾难，必须引起我们对一些问题的深入思考。至少有下列教训必须汲取。

#### 1. “左”的政策是误导干部蛮干的精神支柱。

河南省三年大跃进中，一些干部的蛮干和胡作非为达到了疯狂的地步。官僚主义、命令主义横行于各个社队，打骂群众，体罚群众的现象司空见惯，他们随意逮捕人，关押人，断绝群众的口粮。为什么会产生由“公仆”变“主人”的恶行，主要是由于左倾路线的误导。在河南左倾路线横行时期，只能讲成绩、讲优点，不能讲错误、讲缺点，往往把反映社会真情的人看成右倾机会主义和阶级敌人，而相反，把那些好大喜功者作为革命人物对待。在河南越是困难严重的地区越要掀起高指标、高征购的高潮。与此同时，从省委到县委、公社党委都要大谈形势大好，群众干劲冲天和生活的蒸蒸日上。在这种左倾政策的误导下，面对严重的经济困难，不是采取实事求是的纠正方法，而却采取以左治左的方法，例如在浮肿病发生死亡加剧的情况下，不但不解散食堂，反而提出巩固食堂，发展食堂的口号。由于左倾政策的误导，河南的不少干部脱离人民群众，有的甚至草菅人命，对人民

---

<sup>①</sup> 《历史统计资料汇编 1949—1989》，国家统计局综合司编，第 523 页。

群众直接造成很大危害。

## 2. 残酷的斗争只能斗垮群众、斗散民心。

在三年困难时期，河南省的一些党组织真正高举了阶级斗争的旗帜。在1958年大跃进时期，开展对右倾保守思想拔白旗的斗争，使数以百万计的干部和群众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和白旗人物。在1959年饥荒严重之时，河南省的许多农村开展了搜刮陈粮，开展反瞒产的斗争，在这个运动中，大斗大抓大捕，逼得不少人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甚至有的冤死狱中。就是在发现了河南省的严重问题，开展挽救人命的过程中，也没有忘记运用扩大斗争的手段，例如，1961年在解决信阳事件中，竟然开展了大规模的斗争、批判、逮捕活动。信阳地委在给中央和中南局的报告中表述了他们开展整风运动的情况：对于一部分有罪行和有严重错误的人已经集训了8000余人，特别集训5000余人，斗争和批判了约1万余人，有些罪大恶极民愤极大的已经作了初步处理，其中已经撤职查办管教反省的983人，逮捕法办的275人。已经有1327个大队的领导权被夺了过来，已在进行夺取领导权斗争的有1621个大队，其余大队正在积极进行准备，不久即可展开斗争。而且这种斗争，从省地县社一杆子插到底，是全民的斗争，是永不停息的斗争。斗争的结果是斗散了人心。斗垮了群众积极性，甚至一些人在斗争中丧失了生命，大部分地区的经济工作因不断的斗争而遭受巨大损失。

## 3. 弄虚作假只能穷上加穷。

大跃进以来，河南的吹牛浮夸，弄虚作假十分盛行，小麦卫星、棉花卫星、钢铁卫星不断从河南大地飞上天。有时候，弄虚作假的手法还十分高明，采取的是堂而皇之的统计方法，用统计的“事实”来证明其吹的牛是真的，例如河南农业厅在吹嘘的密植增产中，称47个双千斤以上的高额丰产田的统计，每亩播种25斤种子，单产达6541斤，如果播40斤种子，单产可达7320

斤，从而得出越密越好的“经验”，后来证明这种绝对化的密植法不是增产而是减产。实事证明哪个地方吹牛最利害，哪个地方的经济破坏就最严重，例如一天出钢 9000 吨的信阳地区，卫星放得最多，困难时期断粮的社队也就最多，死亡的人口也最多。

## 七、共产主义怪胎——公共食堂

人们对公共食堂并不陌生。追溯历史，在六、七千年前的甘肃大地湾和西安半坡村古人类遗址中，就可以看到原始居民在公共食堂吃饭的遗存。

然而，我们这里考察的公共食堂是在一个特殊的年代同“共产主义”生活方式相联系的、充满饥饿和死亡的那种公共食堂。它大约兴起于1958年夏，消亡于1961年底。

### 一、公共食堂的兴起

公共食堂不是孤立出现的，它是人民公社的伴生物。1958年8月全国出现人民公社，与此同时作为生活集体化的标志公共食堂应运而生。但在8月以前一些地方就试办了公共食堂。刘少奇1958年4月下旬在郑州考察时，省委书记吴芝圃就告诉刘少奇：“我们这里早就有了托儿所、公共食堂。生活早集体化了。”不久又传出了河南遂平县嵒嵒山地区的27个农业社组成了中国第一个人民公社，全社9369户，30000余人都进入公共食堂。《嵒嵒山人民公社简章》还登在8月初的《红旗》杂志上，其中有食堂如何管理的经验。

6月14日，刘少奇与全国妇联党组的同志在谈话中说，家务劳动要社会化，在农村可以大办公共食堂、托儿所。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在各地视察时，也都讲了办公共食堂和托儿所的主张。1958年7月8日《人民日报》登载了《农业社办食堂一箭双雕》的消息，说湖南邵阳、桃源县，湖北公安县和福建安溪县部分地区农业社在农业大跃进，农畜比较紧张的情况下，根据社员自愿参加的原则，经过试点举办公共食堂，受到群众的欢迎。这里说

的群众“自愿参加”，“经过试点”都是言过其实，从后来总结办食堂失败的教训看，公共食堂差不多都是适应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生产集体化形式，强制性办起来的。

1958年8月11日《人民日报》报道了毛主席视察河北徐水的情况。保定地委书记李锐农告诉主席说，这里的妇女都脱离了炕台、锅台、磨台、碾台这四台。主席说：“是呀，人人都吃食堂，社社都办幼儿园”。<sup>①</sup>毛主席在这里肯定了食堂解放了妇女，使妇女离开了“四台”，对人民公社大办食堂实际上给了很大鼓舞。1958年10月4日报道了毛主席在安徽合肥与妇女干部谈话时对食堂的赞扬。毛主席说：“如果每年每人没有一千斤、两千斤粮食，没有公共食堂，没有幸福院、托儿所，没有扫除文盲，没有进小学、中学、大学，妇女还不可能彻底解放。”看来毛主席把办公共食堂同妇女进各级各类学校都看成是妇女解放的必由之路。

由此看来，各地的农村公共食堂开始是基层办起来的，然后当地各级领导予以吹捧上报，最后引起毛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对这一“新事物”的支持和夸赞，从而食堂在中华大地铺天盖地兴办起来。

从1958年8月份开始全国出现了大办公共食堂的热潮，差不多到10月份大部分省区实现了“食堂化”。甘肃省8月份一月内每个县都建立1000个以上的公共食堂，甘肃通渭县一月内建了2759个食堂。一时食堂成为全国舆论的中心。《人民日报》11月3日载：浙江临安县天目山人民公社不仅实现了“食堂化”，还建立了公共食堂的试验田，解决了吃菜问题；湖南平江县开展改进食堂和托儿所的大辩论，全县9月底已办起4544个公共食堂，实行了粮食供给制，吃饭不要钱；湖北新洲县新洲

---

<sup>①</sup> 1958年8月11日《人民日报》康濯文章《毛主席到了徐水》

人民公社办起了 357 个农村公共食堂，有 47000 人在食堂吃饭，占总人口的 93.1%，并采取了三种形式，第一种是卖饭不卖菜，第二种是卖饭菜，不供应水，第三种是饭菜水同时供应。

1958 年 11 月 10 日《人民日报》报道了四川省富顺县卫坪人民公社三百多个公共食堂都建立了“蔬菜基地”。《人民日报》同版发了《再论办好公共食堂》的社论。介绍了湖南滑县 2900 多个食堂实行“八化”的经验。所谓“八化”，就是食堂有房子，有桌凳，厨房进行技术革命，炊事员提高工作效率，有花样翻新的菜、饭、汤等。

由于公共食堂于 1958 年后半年一哄而起，办得滥，浪费严重，有些食堂到年底已经无粮可吃，59 年上半年开始对公共食堂进行整顿。据 9 月 22 日的《人民日报》报道，经过调整后，河南省公共食堂共有 32 万个，参加食堂的人数占农村人口的 99%；四川农村有 59 万多个公共食堂；安徽农村有 25.5 万个公共食堂；上海市郊各县有 2 万多个公共食堂；北京郊区有 7 千多个公共食堂，而且在不断增加；还有湖南、云南、贵州等省公共食堂也办得很多；其他各省和自治区也都采取了措施巩固公共食堂，一些被解散了的食堂又恢复起来。国家统计局报告，1959 年底，全国农村已办公共食堂 391.9 万个，参加食堂吃饭的人达 4 亿，占农村总人数的 72.6%。

到 1960 年，全国处于大饥饿状态，农村更甚，但公共食堂还在继续发展，并且把它当作解决吃饭问题的法宝，哪里出现断炊、饿死人现象，往往指责为食堂解散的缘故。

## 二、公共食堂的神圣化

1958 年人民公社创办后，有一句流行的口号：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公共食堂是心脏。这里把公共食堂提到实现共产主义的心脏地位。为什么把公共食堂放在神圣地位呢？

其中一个重要的主导因素是毛主席和中央领导人对公共食堂

的肯定。前面已经讲到毛泽东主席、刘少奇副主席都视察过公共食堂，赞扬它解放了妇女，节约了劳动力。而紧接着 1958 年 12 月 10 日的中共中央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中，对公共食堂作了专门的要求：

**“要办好公共食堂。要保证所有的社员吃得饱、吃得好、吃得干净卫生，并且适合民族习惯和地方习惯。公共食堂要有饭厅，要经营好菜园、豆腐坊、粉坊、酱园、要养猪羊、养鸡鸭、养鱼等。饭菜要多样化，要有味道。要同营养学家商量，使食品中包含有生理上必需的含热量和营养成份。对老人、小孩、病人、孕产妇和哺乳的母亲，在伙食上给予必要和可能的照顾，并且可以允许某些社员在家做饭。公共食堂实行管理民主化。食堂的管理人员和炊事员要选择政治上可靠的人员担任，最好经过民主选举。”**

这段话对农村公共食堂的要求和希望是很美好的，如果食堂真如此的话，那就是天大的好事，人们会真正感到食堂是上“共产主义天堂的梯子”。可悲的是在当时物质财富极为匮乏的中国，对食堂提出这样的要求完全是一种“虚拟的经济”。事实上全国几乎没有一个食堂有如此的生活水平，不可能做到“吃得饱”、“吃得好”。至于要建立粉坊、豆腐坊、酱园之类的事，是需要以粮食为基础的，在粮食断绝的情况下，要食堂搞这些以粮食为原料的副食品生产那简直是“缘木求鱼”。关于同营养学家商量要农村公共食堂的食品有必需的热量和营养成份，这是离开农民实际十万八千里的空洞高调。在农业遭到破坏，粮食日益短缺，公共食堂以瓜代菜，以树皮、树叶和草根为食的情况下，冒出一位营养学家在饥民面前讲食品的热量，那不是天大的笑话吗？关于对老人、小孩、病人、孕产妇和哺乳母亲的照顾，在现实中是完全相反的。二十世纪 60 年代的死亡统计中，恰好这类人是最先饿死的，因为在一个粮绝物尽的环境中，人人面临着饿死的威

胁，尊老爱幼、扶弱济困这些道德格言是苍白无力的。当然，在大饥荒年代确实也出现过一批冒牌的“营养学家”，这就是那些鼓吹“增量法”、“代食品”以及老鼠洞可找粮的人物。

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反“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集团”时，把拥护不拥护公共食堂作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革命左派与右倾机会主义的分水岭。毛主席在7月23日的讲话中说“到郑州，以为我是不办食堂之人。食堂是个好东西，无可厚非。平江一个大队书记下令解散食堂，第二天群众自动集合办起来<sup>①</sup>。毛主席还在庐山会议期间对安徽省委书记张恺帆解散无为县公社食堂作了如下批语：“我怀疑这些人是混入党内的投机分子。站在资产阶级立场，蓄谋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分裂共产党，在党内组织派别，另立他们的机会主义的党。”张恺帆因此就被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既然毛主席对公共食堂如此明确的保护，那谁敢再非议食堂呢？于是在全国报刊上不断有批判非议食堂的言论，为公共食堂大唱赞歌。1959年9月22日《人民日报》专门为食堂发表了社论，题目是《公共食堂前途无量》，社论指出：

1958年中国出现了许多新鲜事情，公共食堂在全国普遍建立就是真中的一桩。在人民公社化运动前后，涌现出了数以百万计的公共食堂，受到几亿农民的热情赞扬。可是新生事物总是在斗争中生长起来的，农村公共食堂也不例外。当多数农民积极支持公共食堂的时候，不但远在天边的帝国主义者大吵大闹，就是近在眼前的一些死抱住习惯势力不放的人们，也借口某些食堂局部的暂时的缺点，指手划脚地议论起来。事实是公共食堂解放了大批的劳动力，他们却硬说多占用了劳动力；事实是公共食堂大大有利于生产，他们却硬说公共食堂妨碍生产；事实是公共食堂

---

<sup>①</sup> 李锐《直言》一书129页。张步真《渴望真话》一书55页

改善了农民生活、方便了多数社员，他们却硬说公共食堂降低了农民生活，对群众很不方便。在这样的思想影响下，在少数地区，有些农村工作人员甚至下令解散公共食堂。可是，群众坚决不散，或者过后很快又把公共食堂办起来。就这样，围绕着公共食堂开展了一场斗争。”

这篇社论写作的时间，正是中国绝大多数农民已经在食堂大饿肚，饱受痛苦的时期，也是农民咒骂“公共食堂是死人堂”的时期。而社论却迎合左倾路线的腔调，强奸民意，认为公共食堂是“几亿农民热烈赞扬”的新生事物，而把批评公共食堂的人同“远在天边的帝国主义”等量齐观。进一步用三个“事实是”美化公共食堂，而又用“他们硬说”来丑化反对公共食堂的人。并且以群众代言人的身份，倡导把解散了的食堂恢复起来。最后以围绕公共食堂，“开展了一场斗争”，来警告和恫吓反对食堂的人。这篇社论在以后的篇幅，逐条批判了否定食堂的观点。

食堂如此的美好，反对食堂的人如此的落后和反动，那谁敢再反对食堂呢？

于是在全国各地把办公共食堂提到了走社会主义奔共产主义的高度，放在至尊神的地位，只能说好，不能说坏。就在1960年大饥饿袭击全民的时刻，对公共食堂的赞歌和经验也唱个不完。《人民日报》3月12日以《公共食堂无限好》为题，系统报道了贵州赫章县委对本县一个妈姑人民公社的公共食堂的伟大事迹。说“公共食堂立下了汗马功劳”。一是“食堂把大批妇女劳动力解放出来”，缓解了劳动力的紧张状况；二是由于集体吃饭，“劳动效率大大提高”。其结论是“公共食堂的建立是生产大发展的结果，它的建立又促进了生产的更大发展。”

同时，在全国各地出现了成千上万赞美公共食堂的诗篇。例如1960年12月，甘肃大饥饿已到顶点，许多食堂停火时，还有人写了以《赞食堂》为题的诗作：

人民公社象初升的太阳，  
公共食堂闪耀五彩的虹光，  
亿万颗心迎着太阳的光芒，  
赞歌喧腾在每一个城镇村庄。  
公共食堂是幸福生活的家，  
它把幸福种子在人们心田里撒下；  
它卸下了妇女身上几千年的重压，  
摆脱繁锁的家务奔向集体化。  
万岁，我们亲爱的党！  
致敬，我们的红管家！  
办好食堂促生产，  
生产指标跨上了千里追风马。  
公共食堂是一朵跃进的鲜花，  
花红千里飘香万家；  
社会主义阵地一天天更加坚强，  
红色的土地上结出了灿烂的金瓜。

在数百万人饥寒交迫，一些人还可以在食堂喝些稀糊糊，很多农村食堂已经关门，大批人死亡的情况下，有人竟写这类诗，高唱“公共食堂是一朵跃进的鲜花”，令人齿寒。

保护食堂的舆论除了赤裸裸编造赞歌外，就是各地从省委、市委、县委到公社党委下发“巩固”、“办好”食堂的文件。把食堂提到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高度”来认识，把对食堂的一切“诽谤”看成阶级斗争的新动向，视为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

### 三、公共食堂的重大弊端

三年困难时期，农村公共食堂被一些人吹捧为“共产主义的幼芽”，“妇女大解放的象征”。但是，剥开公共食堂被美化的外衣，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饥饿的象征，是一个令人生畏的怪胎。

开办公共食堂的过程实际上是对农村生产和生活条件破坏的

过程。普遍的作法是在村里确定一个房屋较多的人家，把他的房子打通，挖掉土灶，把原来的锅灶和设备也都铲除，再找几个大铁锅和简单的灶具一安放，公共食堂就此定案。紧接着把千家万户的小铁锅小铁铲收集起来放在炼铁炉里熔化，以增加大炼钢铁的指标。同时又把许多人家集中在一户人家的房子中去居住，这些人家的原住房或挂托儿所牌子，或挂敬老院的牌子，或挂什么工厂的牌子，农民以家户饲养的鸡、猪、羊被集中起来，作为公共食堂的副食，供集体享用，不到月余宰杀尽净。农民种植的树木归集体，很快砍伐作柴烧，自留地的蔬菜也被集体共产。食堂一开办，农民的自留地、自留畜和其他财产一夜之间化为公产，农民自我经营的积极性丧失殆尽，连农民如何过日子的权利也被公共食堂吞灭。

农村的公共食堂从开办那天起，就有先天不足和后天失调的问题，大体上存在如下几个特点：

1. 低标准、瓜菜代。全国大多数省区 1958 年的粮食丰产都是吹起来的，实际上全国大部分地区粮食不足，加上按浮夸的指标提高征购，弄得社社都缺粮。食堂开办的初期曾提出过“放开肚皮吃饭”，但多数社队不到一、两月就发生了粮荒，因此很快就将食堂的定量标准降在了 1 斤以下。就是在 1958 年，有些地方的公共食堂在年底就发生了断粮现象。例如甘肃的徽县在 1958 年 12 月份，一些农村就断粮，浮肿病蔓延。当时统计，因浮肿而死亡者 744 人，该县的石柱、江洛等八、九个社的人因缺粮而吃树皮、草根，食堂只能供应大锅清水汤，后来连清水汤也不能供应了。到 1959 年，全国大部分食堂的定量标准基本上都在半斤以下。到 1960 年连半斤的标准都维持不了，有些食堂的标准降到名义上的二两，有些食堂干脆关门，让农民自谋生路，实际上是自生自灭。

2. 大机构、大舞弊。当初办公共食堂的理论是解放妇女、

节约劳动力，但实际上开办公共食堂的过程是一个劳动力浪费和营私舞弊的过程。一般一个公共食堂都要有七、八个做饭的强劳，还有四、五人要专职搞柴草和燃料，还要设保管粮食的保管员、算帐的会计员、主持食堂事务的管理员，另外还要抽出一部分劳力搞所谓养猪、种菜的副业。据甘肃平凉地区在事后的统计，有些村 20% 的主劳都放在了公共食堂上，河南、湖南大部分地区竟有 30% 的主劳直接或间接投入公共食堂。在困难年景，公共食堂是个肥缺，人们都想挤进食堂占一个岗位，混个饱肚子，然而食堂用人的标准是有倾向性的，一般是队长、支部书记及其亲属兼管理员和会计。其它食堂工作人员也是从乡村干部有亲戚关系的人中挑选。在这类办公共食堂的大军里多有营私舞弊多吃多占现象，在浮肿病人和死亡者的队伍里，队长、管理员及会计是不占位置的。

3. 大浮夸、大压制。在三年多的农村公共食堂的历史上，一直存在着浮夸和弄虚作假。当时，绝大部分食堂不顾群众的饥寒交迫，不断虚报食堂生活上升的成就，甚至把野菜烂菜装在口袋里，放在食堂的储藏室里，给检查团荒称是待用的面粉。有些生产队尽管猪、鸡杀尽了，群众连肉的影子都见不到，但食堂管理人员和社队干部为了应付上面的检查往往要绞尽脑汁，从其它村子借来几头猪或几只鸡放在食堂的院子里，以示群众的“丰衣足食”。甚至把吃食堂期间浮肿、饿死人的现象说成是“地富反坏右的捣乱”。群众在吃公共食堂的过程中充满着血和泪，生产队长、支部书记和管理人员贪污浪费了粮食，群众敢怒而不敢言。许多地方的食堂动不动采取扣饭、罚跪、捆绑、抽打等方式来对待有不满情绪的社员。当时甘肃临夏的群众就称公共食堂是罚庭，食堂成了惩罚社员的中心场所。

#### 四、公共食堂的消亡

农村公共食堂可以说是兴则何其速，亡则何其难。半年之内

全国几乎“食堂化”，一年之后有4亿农民在食堂吃饭。但解散食堂的举动却视为异端邪说，常常遭到惩罚，散了的食堂不得不又恢复起来。1960年底到1961年初，中央已发现了农村大量死人现象，在全国开始纠正左倾路线，但当时各级领导对食堂还不敢提出疑议，甚至以左反左，认为一些农村出现大饥饿是一些基层领导解散食堂所致，所以在抢救人命阶段，把“办好食堂”作为一项重要措施。

然而，严峻的形势逼得人们不得不对食堂的存亡重新考虑。

1960年仅一年全国人口死亡近千万，死亡率达25.43%，有些省高达60%以上，而信阳等地区竟高达100%以上，全国还出现死亡人口占30%的社队。1961年人口的死亡率增高趋势还没有完全遏止，农业劳动力遭受巨大破坏，农业生产的恢复步履维艰。在这种情况下，毛主席号召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领导人要下基层调查研究。从1961年4月开始中央领导同志大部分下到基层调查人民公社以来存在的问题，帮助解决群众的实际困难。

刘少奇1961年4月2日开始到湖南调查。先在长沙福临公社天华大队住了十八天，后到他的故乡宁乡住了六天，调查工作十分深入细致。

刘少奇在他的故乡宁乡县炭子冲调查时，问一位乡亲公共食堂好不好？这位乡亲回答：“好个屁！背时的食堂，害人的食堂，砍脑壳的食堂！”刘少奇还把在天华大队调查的情况，于1961年5月11日向毛主席写了报告。报告说天华大队在湖南虽然比较好，但粮食和副业生产比57年都降低了，社员生活远不如57年。这主要是由于社员过去都有自留地，还在山上开了些荒，每家都收有几千斤红薯和芋头，田塍上的豆子，都喂了猪和鸡鸭，都有肉油蛋供自己食用和出卖，而现在这些几乎完全没有了，只有定量的大米和小菜，因此，都感到不够吃。这个大队去年下半年有相当多的人害浮肿病，有二十几个人外流到江南，山林竹木

受到严重破坏，房屋拆毁三分之一，百分之六十的社员现住着别人的房屋，干部贪污多占现象也相当严重。

刘少奇还向毛主席汇报了这个大队在解散食堂中秩序混乱，干部多拿多占。于是他带的工作组召开队干部会议，提出了六条散食堂的保证条件。这就是：一不影响当前生产；二不妨害大小队的集体经济；三不许引起新的破坏；四是党员干部在散食堂时不许自私自利，食堂账目要清算；五是要把困难户、五保户安排好；六是社员的炊具要有领导地解决，不许乱拿食堂用具。<sup>①</sup>

刘少奇在他的故乡炭子冲调查时，发现问题更为严重，水肿病人很多，饿死人的现象令人心酸。有位农民对刘少奇说：“报告刘主席，今天我要讲几句反动话！”刘少奇笑着说：“什么反动话，你先说说看！”他就对刘少奇说：“再这么搞下去，不要很久，连抬尸掩埋的人都会找不到了。国家主席啊，人都死光了，这人民公社，公共食堂还办不办？”面对这种情况，刘少奇就主张解散食堂，于是刘少奇的故乡宁乡的食堂很快就解散了。

周总理 1961 年 5 月 3 日到邯郸去调查。有个叫张二连的社员在总理召开的座谈会上说：“总理，你叫我说真话，还是说假话？”总理说：“当然是真话啦！”张二连说：“要说真话，刚才说的食堂好，全是假话。食堂好，食堂吃不饱”。总理问：“为什么吃不饱？”张二连说：“总理，你算算，一共几两指标？司务长、饮事员多吃一点，他们的老婆、孩子、爹娘再多吃一点，到我们社员嘴里才三、四两，能吃饱吗？要是自己做，汤汤水水总能糊饱肚子。别看我死了老婆，一人拉扯几个娃娃，我还是愿意自己做”<sup>②</sup>。周总理还把在邯郸调查的情况向毛主席作了电话汇报。汇报内容有四点：

---

<sup>①</sup> 见 1961 年 5 月 11 日《刘少奇同志给毛泽东同志的信》，广西档案馆 29 集 47 卷。

<sup>②</sup> 《周恩来总理生涯》346—347 页，人民出版社，1997 年出版。

一、食堂问题。绝大多数甚至于全体社员，包括妇女和单身汉在内，都愿意回家做饭。我正在一个食堂搞试点。解决好如何把食堂散好和如何安排好社员回家吃饭的问题。

二、社员不赞成供给制，只赞成把五保户包下来和照顾困难户的办法。现在社员正在开展讨论。

三、社员群众迫切要求恢复到高级社时评工记分的办法，但是已有发展。办法是：包产到生产队，以产定分，包活到组。这样才能实现多劳多得的原则。因此，这个办法势在必行。只有这样才能提高群众的生产积极性。

四、邯郸专区旱灾严重，看来麦子产量很低，甚至有的颗粒不收，棉花和秋季作物还有希望。目前最重要的问题是恢复社员的体力和恢复畜力问题<sup>①</sup>。

毛主席在总理的电话记录上加了批语：“此报发给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参考”。

周总理在调查中还看了农民家庭的情况，“社员家里除了树叶、咸菜、野菜以外，就没有别的东西了，更是没有什么存粮”。当时总理没有宣布完全解散食堂，而采取让社员自愿入食堂的原则，不愿入食堂的可以把粮领回去，结果除炊事员外，社员全部退出了食堂。

胡乔木受毛主席委托到湖南调查。他于1961年4月14日向毛主席写了调查的汇报，其中有一篇解决韶山公社食堂问题的报告。其文曰：

在韶山公社干部和社员讨论六十条的时候，我们遇到的最突出的问题，就是公共食堂问题。从群众反映看来，大多数食堂目前实际上已经成了发展生产的障碍，成了党群关系中的一个疙瘩。因此，我们认为，这个问题愈早解决愈好。

---

<sup>①</sup> 同上书 350 页

食堂问题之所以成为最突出的问题，主要是因为它同工分值降低、社员收入减少和分配上的平均主义直接联系在一起，又在群众的每天生活中引起许多不便。分别说来：（一）办了公共食堂以后，砍柴、种菜、煮饭都占用劳动力，生活用工往往占生产队全部用工的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因而大大降低了农业劳动的工分值，直接影响了劳动积极性。（二）食堂不利于发展养猪等家庭副业，粪肥减少了，生产队的农业收入和家庭副业收入都减少了。（三）食堂烧大柴，破坏了山林，同时又减少了灰肥（因为大柴灰少）。（四）由于食堂实行供给制，许多辅助劳动力本来可以劳动的，也不劳动了。（五）很多社员感到吃饭“不自由”，粮菜难于调剂机动，而社员和食堂工作人员之间以及社员相互间的纠纷增多了。（六）基层干部在领导食堂方面，往往要比领导生产花费更多的精力。在这种情况下，大多数食堂势在必散，而且散了并不是什么损失，反而对整个工作有利。

毛主席对胡乔木的汇报信及四个附件阅后予以指示：“张平化同志：胡乔木同志来信一件及附件四件，送上请阅。我看可以印发你们的三级干部会议各同志，予以讨论。”

从毛主席对刘少奇、周总理和胡乔木报告的指示中，可以看到毛主席将要放弃“公共食堂是个好东西”的观点了。这无疑对全国各地解散食堂扫除了思想顾虑。

在中央领导同志亲临各地调查的同时，各省、市、自治区领导也深入基层进行调查。绝大部分人对公共食堂调查的结论同刘少奇、周恩来、胡乔木等人一样，就是公共食堂弊端丛生，非散不可。

这里再举时任甘肃省委书记的汪锋在临夏调查公共食堂时对毛主席的汇报。汪锋对毛主席的信这样写道：

“群众对食堂真是怕极了，恨透了。群众说：‘交朋友交个管理员，吃馍喝汤不作难’；群众说：‘炊事员的肚子，饲养员的热

炕，队长，管理员设定量’；群众说：‘勺把子上有刀子’；群众说：‘食堂是饭厅（打饭的地方）、法庭（炊管人员不顾群众困难，甚至打人、骂人、态度恶劣）和花厅（队长、管理人员专找漂亮年轻的妇女作炊事员，就在食堂里乱搞）。’例如，六队队长马培继和食堂管理员拜景义，贪污多占，克扣社员口粮，利用社员口粮诱奸、强奸妇女 13 人之多；1960 年在这个食堂吃饭的共死了 39 人。群众对这件事愤恨最大。这两个食堂确已成为破坏社会主义、阻碍生产发展和党群关系中的疙瘩了。”

汪锋调查的临夏新集公社新一大队，其中一个生产队 40 户社员，190 口人，愿意在公共食堂吃饭的只有一个 50 岁的单身汉，其他全体社员都愿意在家吃饭，停办食堂。

从上述领导人的调查情况可以看到，各级领导多数对农村公共食堂的严重问题有了共识，食堂是一哄而起办起来的，它并不是所谓社会主义的新事物，而是超越历史发展阶段的假共产主义，食堂成为浪费劳动力资源和公社粮食及其他财产的主要场所。公共食堂还给一些干部多吃多占，享受特权提供了条件，公共食堂给群众带来了灾难性后果。看来，解散食堂势在必行。从 1961 年 5 月份开始全国一些地方陆续停办了食堂，到 10 月底，除了个别生产队的食堂尚未解散外，全国百分之九十的生产队都解散了食堂。正如汪锋同志给毛主席的报告中写到：“食堂解散，大快人心”。全国农村的公共食堂就这样寿终正寝，它给我们留下了无穷的思虑和教训。

### 五、公共食堂的反思

三年困难时期的公共食堂离我们已经四十多年了，但公共食堂中饿死的亡灵难以冥目，公共食堂的受害者难以忘怀，历史上的悖理事件，需要后人认真反思。

#### 1. 扭曲的理论必须反正

中国农村的公共食堂其所以一哄而起而又顽固不散，这是有

一套理论在支持，在作怪。我们翻开当年称颂食堂的文章和社论，其理论主要有：

**劳动节约论和妇女解放论。**认为一家一户分散吃饭要有众多的灶具，花费众多的劳动力，一旦食堂化，花费在吃饭问题上的劳动力会大大节约出来，尤其会把妇女从锅台上解放出来。这种理论忽视了劳动的节约不单是靠劳动者的数量，而主要靠劳动组织形式的改进，劳动要素的质量，劳动创造性，科学技术在劳动过程中含量的增加等等。而这里以为把做饭的一些人抽出来，把做饭的一部分时间省下来，就节约了劳动力，提高了劳动生产率，这只是一厢情愿的说法。事实上在生产方式极其落后的农村，食堂办起了，不但没有节约劳动力，反而把主要劳动力放在公共食堂中，生产第一线的劳动力被挖空。过去家庭做饭的时间是利用生产之后或生产之外的时间，而现在大量强劳力则全日制参与做饭，脱离了生产，这是什么节约？至于妇女的解放更与办食堂关系不大，反而给妇女带来了更大的痛苦。一些当炊事员的妇女，虽然比别人多混些吃的，但十多小时围锅台转，而不做饭的妇女被驱赶到炼钢炉旁受苦难，不少人子宫脱落、闭经，有的累死，回到家里，四壁空空，食堂吃得不够，还要拣野草，这哪里是妇女的解放，这是把妇女往火坑里送。所以劳动节约论和妇女解放论为当年的实际后果所否定。

**大自由论。**一些文章批驳了“进食堂不自由”的观点。指出在家里做饭，虽有自由是“小自由”，而在食堂集体吃饭，整个队，整个社就可以统一行动，统一指挥，这就是“大自由”。这种理论荒唐至极。事实上，公共食堂办起后，把社员的命运挂在了食堂上，拴在了生产队干部和食堂管理人员的权力上，社员失去了一切自主权。给多少吃多少，不给就自生自灭，而且不时遭到扣饭、体罚之苦。这就是公共食堂给社员的“大自由”。

**共产主义供给制论。**这种理论是办公共食堂的指导理论。认

为公社化了，粮食大丰产了，人们的觉悟提高了，集体观念增强了，因而供给制的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具备了。公共食堂是生活集体化的好形式，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是向供给制过渡的好形式，是共产主义的萌芽。事实证明，当时实行供给制既无物质条件又无精神条件，从全国粮食匮乏，物资奇缺的情况，就可知离供给制的物质条件差十万八千里。从干部的多吃多占和对社员的虐待看，高度的共产主义觉悟还是一句空话。因为觉悟还要伴随“仓禀实”和“衣食足”，无此条件觉悟只是纸上谈兵。

虚假的经验必须识别。公共食堂是一轰而起办起来的，但还是以“典型”引路的，河北在1958年上半年就有零星的食堂，河南遂平办起了第一个公社，随之出现了第一个食堂。这些食堂一出现就在报刊上被鼓吹，由秀才们和一些创政绩的领导不断编造经验，大讲公共食堂的“五大好”，“十大优越性”及群众如何拥护新生事物的气氛。于是盲从风出现了，领导者包括一些中央领导人不断赞扬和肯定公共食堂，而千百万个公社和生产队更盲从了。有关食堂的假经验弄得全国一片食堂化。更为可惜的是在1959年和1960年，饥荒十分严重，食堂奄奄一息的情况下，为了巩固食堂各地仍在发表“公共食堂无限好”、“公共食堂前途无量”的经验，这等于火上浇油，把一些被解散的食堂又恢复起来。这一沉痛教训告诉我们，要学习和推广一种经验，这种经验必须是真实的，而不是编造的；而任何经验都有局限性，推广经验如果脱离当地实际，在彼地成功的经验在此地会宣告失败。至今，被拔高的经验仍然不少，人们要从办公共食堂的教训中，引以为戒，要识别真经验与假经验，学会有效地利用经验，推广经验，也要拒绝那些虚假的经验。各级领导不能投其所好，一刀切地强行推广某种经验。

唯书唯上的作风必须矫正。1958年以来在办公共食堂上唯书唯上的思维方法和作风被推到极端。本来大部分地方的群众强

烈反对办公共食堂，在食堂办糟后又不断出现解散食堂，分灶吃饭的事例。然而，由于办食堂的主张来自报刊的经验，食堂形式已被中央文件所肯定，毛主席等中央领导讲“食堂无可厚非”，那谁还敢非议食堂呢！中央和各地领导层在办食堂时也持唯书唯上的教条主义立场。当时中央编了一本书叫《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其中就有经典作家关于集体生活、集体食堂可以节约劳动力的论述，给各地群众制造办公共食堂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根据的。甚至中央的领导人还倡导学习康有为的《大同书》，按康有为《去家界为天民》的思想去办食堂及养老院、幼儿园。由于坚持唯书唯上的方法，食堂出了大灾难而又不予纠正或难以纠正。这种经验教训值得永远汲取。应经常重复不唯书，不唯上，只为实这一方法论。

## 八、流亡者的命运

关于人口的流动，因流动的动因不同就产生了各种不同的表达词语。从甲地迁往乙地定居的户籍变动称为迁徙流动；因出外打工的流动称为民工潮；因灾害所迫四处流动的称为流动难民；没有正当职业而到各地流动的人口往往称为盲流人口；逃学离家出走的孩子称为流浪儿。我不知对三年困难时期因饥饿而到处逃难的人该称什么，暂称为流亡者。这里说的流亡者三字不能解释为流动的亡命之徒，那是对流窜犯的解释，而应解释为死里逃生的流动者。

今天，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因劳动就业市场开放，劳动者跨地区的流动达到了空前的程度，1997年统计有8千万流动人口，目前已达1亿以上。这种流动是市场经济发展的表现，也是人才市场和劳动力市场开放的表现，它也特别体现出劳动者有了择业的自主权。而三年困难时期的人口流动同现在的完全不同，那时的流动是难民在避死求生，充满着痛苦和生命危机。

### 一、大饥荒时期人口流动的记录

1956年全国经济形势较好，没有出现大规模的因饥荒而产生的人口外流。但局部地区也发生饥荒与人口外流。如广西的平乐、荔浦等县出现饿死人的现象和人口逃荒外流。

1958年甘肃徽县发生饥荒。4月就反映银杏、石柱两乡缺粮户占50%，全县浮肿病患者达1621人，死亡者744人，有很多人外逃乞讨。

1959年开始，出现了全国性的人口大外流和难民潮，到处发生流动抢劫案件。当年大饥荒引起全国震惊，为中央亲自过问

的是山东馆陶县。这个县从1958年底到1959年初就出现了严重饥荒，其中到1959年元月已有八十二个食堂停伙或半停伙，出现了大量逃荒要饭，卖儿卖女的现象。中央收到了人民来信后，责令山东省委进行了检查。在山东省委、省政府给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报告中这样反映：有些村庄整半劳动力全部逃光。停伙或半停伙已久的村庄，生产全部停顿。房寨公社芦里大队，整半劳动力二千二百八十一人，除去早出晚归者外，到邯郸等地者六百三十人，全家外出者二十二户。其中党员三十人，占党员总数百分之十四点五。团员三十五人，占团员总数百分之四十，小队以上干部三十四人，占干部总数百分之二十五点七。全县据不完全统计，自去年七月以来仅到邯郸一地做工或投亲访友及逃荒者，到一月八日止已有一万三千多人，由馆陶魏僧寨、柴卜、潘庄三个公社到河北曲周梁儿庄、平谷店、马头、侯村四个公社的约计五千五百余人（其中讨饭吃的达三千多人）。检查组访问了五个公社，男女老幼哭诉饥饿，其情凄惨。<sup>①</sup>

在中央发现山东馆陶县的逃荒事件后，紧接着各地都反映逃荒问题，一些交通要道，如车站、铁路、码头都有大量农村社员乞讨，还有偷盗和抢劫的。内务部1959年2月7日向中央的报告，说明人口外流已相当严重。据统计部分省、区，外流人口达120多万。其中外流比较多的省有：山东32万，河北28万，河南21万，辽宁10万，四川8万，安徽、湖南、山西各5万，甘肃、浙江各3万，江苏只徐州专区的沛县和丰县就有2万多。如果把所有省份的都统计起来就更多。

当时人口的流向主要是向新疆、甘肃、青海、内蒙古和东北等地，仅山东、安徽、江苏、河南等省流向西北的达六、七十万人。一部分是流向大中城市、工矿区 and 国营农场，仅河南、湖南

---

<sup>①</sup> 《中央批转山东省委、省政府关于馆陶县停伙、逃荒问题的检查报告》附件，引自甘肃省档案馆1991-8-338卷。

两省流入湖北国营农场和武汉市的即达七、八万之多。当时新疆、内蒙古这些情况较好的自治区，区内也有一些贫穷农民向本区的城市流入，还有一些省特困地区的农村人口向困难较小的农村流入，如安徽、湖南流入江西农村的就有八万八千多人<sup>①</sup>。

当时内务部在分析原因时找出了许多条，其中有一些省区的人口有“闯关东”、“走西口”的传统；一些人想到城市当工人、学技术、当干部；有些单位不择手段乱招工，引起一些农民和城市人口流动。最后讲到有些社队生活安排得不太好，粮食不足，食堂停伙，职工工资太低又不能按时发放。其实前几条原因是“官话”，只能反映极少数人的流动动因，而这最后一条大概是真正的原因。内务部的报告在分析形势时，大大掩盖了当时农村极端困难的实况。其实人口大量外流是生活实在过不下去而铤而走险的行为。因为当时户籍和口粮管理很严格，一个人没有粮户关系就不会得到口粮。稍能过下去的人谁还去冒这个险呢？只有在饥饿严重供应无望的情况下，不得不出去乞讨、觅食，抱万分之一活下来的愿望。

全国重灾区从元月开始的外流状况比内务部掌握的更严重。前面讲到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的一些省份，人口向西北、东北流入，其中有青海和甘肃，这两省不是难民的乐土，其自身的缺粮和饥饿状况更为严峻，可能有些农民不知灾情而来冒险的。

甘肃 1959 年 7 月 10 日关于农村外流人口的报告中讲，从当年元月至六月底，全省外流人口达 86333 人，其中张掖专区 35413 人，天水专区 31830 人，平凉专区 9034 人，定西专区 8573 人，临夏州 1483 人。其流向是：流往陕西的约 30000 多人，新疆的 23000 多人，内蒙的 3000 人，河南的 12000 人，其余在省内互流，流入兰州市的 19203 人。从县的情况看，有 36

---

<sup>①</sup> 内务部党组 1959 年 2 月 7 日《关于农村人口外流问题的报告》甘肃省档案馆 1991-8-337 卷。

个县外流严重，其中有武威、清水 15000 人以上，静宁、山丹 5000 人以上，民勤、秦安、武山、西礼、通渭 3000 人以上，酒泉、武都、陇西 2000 人以上。外流人口中，男女老少，社员、干部都有。据清水、秦安、西礼县八个生产队的调查，在流出的 4643 人中，青壮年 904 人，社队干部 334 人。有一天在流入陇县的 1300 多人中 10 岁以下的儿童占 10%，携家带眷的占 20%<sup>①</sup>。

1960 年难民的数量远远高于 1959 年，但跨省区的大流动较少了，这是因为重灾区的生活更贫困了，许多地方的食堂断粮，多数人躺倒了，已经无力向远处流动。各省区自身难保，对流动难民管理更严。然而，在省界内，县界内和公社内的流动是极其频繁的。人们在四处乞讨，寻找野菜、树叶之类。一些地方食堂停伙后，一些人饿死了，一些人浮肿了，还有一些能挣扎的便出外逃生了。笔者从一些当年的文件及各省区的志书中，看到反映饿死和浮肿的记载较多，而对人口外流只是一笔代过。这不是表明逃荒者减少，而表明人们把逃亡已经不看成是大灾难，而无力逃亡坐以饿毙才是大灾难。而实际上外流和外流无归的比 1959 年严重得多。一般的外流规模是，口粮越低，食品越少，死亡越高，外流也越大。《敦煌志》记载 1959 年该县平均口粮 136 公斤，死亡 1285 人，外流人员 3429 人；1960 年人均口粮降到 84 公斤，死亡人口 1827 人，外流人员达到 3932 人<sup>②</sup>。甘肃武威人口减少 8 万，死亡 4 万多，逃亡 3 万多；礼县人口减少 4 万，死亡 3 万，外逃 7 千。1960 年还有一些省区和地县的人口统计显示，人口总量的减少大于人口死亡数，说明相当一部人口逃出本地，或流落他乡，或途中死亡而无法统计。因为 1960 年在一些重灾区，死尸塞道无人掩埋者多有所见。因此，我们的分析认为

<sup>①</sup> 《关于农村外流的情况》，供领导参阅件。甘肃省档案馆 128-2-364 卷。

<sup>②</sup> 《敦煌志》第 33-34 页，甘肃人民出版社，1994 年出版。

1960年外流难民是有史以来最高的一年。国外一些研究中国三年困难时期的学者估计1960年中国难民有2亿，而外流难民的人次高于2亿。这个估计有所扩大，但外流人口上千万是完全有可能的。

## 二、流亡者的命运

三年困难时期流亡者的命运是不一样的，但多数人的命运不佳。

流亡者中最幸运的是定居他乡能吃饱肚子的人。1959年至1960年流到新疆和内蒙的外流人员不少人得到了生活出路。中央当时关于对外流人员的政策是：流往边疆地区的农村人口不予遣返，包括地富反坏，都可予以安置，因为边疆需要劳动力，向边疆移民是既定的政策。新疆在困难时期从外地流入50余万人口，甘肃就有10余万人流入新疆，多数人成为永久定居者，1962年后又有一批回到了原籍。内蒙也安置了一批外流人员，特别是还接受了上海、浙江、安徽的一批孤儿。

外流人员的大多数命运十分不济。有些地方把外流人员当成异己分子迫害。泾川县有份文件对外流人员的遭遇有如下的描述：

口粮大幅度下降的结果，引起浮肿，干瘦等疾病和人口非正常死亡的大量发生，群众离乡背井，逃荒外流。对这样严重的问题，不但不加正视，严肃对待，反而掩盖真象，人饿死了还说与粮食无关。群众逃荒出外，还要给加上“逃避劳动，不安心农村工作”，“搞投机生意”，“冒尖人物逃避整顿”，“因家务纠纷逃流”，“五类分子畏罪外逃”，等帽子。这些外流人员回来以后，不但不从生产上、生活上妥善安排，反而进行批判斗争，甚至克扣口粮<sup>①</sup>。

<sup>①</sup> 摘自1961年《泾川县委扩大会议进展情况报告》甘肃省档案馆1991-10-338卷。

有些地方因饥饿而逃亡的人，处在生死未卜的状态下。例如由青海省河南泽库等县跑出来的“支建青年”，不断出现在甘南州的一些县，“先后发现六十余人，他们全系逃跑出来的，元衣无食沿途乞讨，有的甚至饿死道旁”。码曲地区发现由青海逃来的男女青年32人，有2人在上寺路上饿死。其实，甘肃、河南、安徽、四川、山东等重灾区，在三年困难时，许多流亡人员的命运都同青海的这些男女青年差不多。

还有一些外流难民，则变成危险的盗窃者。例如1960年12月甘肃省公安厅和兰州铁路局联合给甘肃省委的报告中指出，今年以来，铁路运粮的车被抢、被窃十分严重。据统计1—11月共发生案件782起，其中抢夺、偷粮436起，损失成包粮食13.3万斤，偷窃百货器材等物346起，估价有8.5万元。在这些事件中属于二、三人零星搞的595起，属于数十人成群上车抢夺的187起。在陇西、高台、武威等地，经常有数十人，最多有200多人，迂回车站附近，伺机抢夺。这些“自由流动人员”，因钻车、扒车、跳车，造成的伤亡也十分严重，1960年在甘肃一些路段发生这类伤亡82起，占行车伤亡总数的百分之二十。

还有一些外流人员，往往在异地他乡逼迫改嫁、早婚，组成不幸的畸形家庭。例如山东馆陶地区流入到河北地区的有的投亲靠友，有的十四、五岁的小姑娘，嫁给三十多岁的成年人为妻，有的老太婆也出门求嫁。在甘肃、河南等地都出现夫妻二人外逃，丈夫允许妻子外嫁，待生活变好后再逃回原籍，出现了一女二嫁的现象，也造成孩子有父无母或有母无父的家庭悲剧。

外流人口被遣送回原籍的占有量比较大。当时中央政策规定：“由这个地区的农村流往那个地区的农村人口，未定居者的要一律遣返”。全国的收容站差不多都遣返过数以千计万计的难民。兰州市收容站在困难时期就遣返过10万多外流人口。由于粮食奇缺造成遣返工作的困难，有许多地方的收容站，因无粮供

养难民而拒绝遣返，有的流动人口在遣返中因身体虚弱、疾病缠身而死亡。不少难民明知家乡已经断粮，回去只有等死，就在遣返途中逃掉。

还有一种流动人口可以说是遗弃者。就是一些困难家庭在无法生活的情况下把孩子和老人秘密送到收容站、政府大门或民政部门的门口，让政府去解难。例如，甘肃徽县有两个赤身婴儿被弃在县委门口，一直无人认领。这类事在饥饿年代是经常遇到的。

有一些有组织的属于公共工程上的人口流动也往往发生灾难和死亡。例如，甘肃引洮工程 1960 年在遣返民工中就发生许多不幸事件。有份报告指出：在几次精减工作中，都发生死人事件，三次精减死亡 21 人，2 人是中途被坏人打死，劫走钱物，19 人因暴食暴饮而死。有 500 人中途生病，造成行路困难。

三年困难时期过后，在重灾区都出现相当数量的外流人员，永远杳无音讯了，他们在逃亡中是怎么死的，人们很难预料，不过结局一定是悲惨的。

历史已成过去，教训焉能遗忘。我们从三年饥荒时期人口大外逃的事件中应当引出深刻的教训，应当认真反思。是什么原因造成如此严重的难民潮，而我们当时对这类现象为什么采取不正确的认识和手段呢！

## 九、是银河天池还是劳民伤财

1958年至1961年，全国在大跃进和特大跃进、持续跃进的口号声中，大搞水利工程的群众运动席卷全国。这些水利工程也有成功的范例，如北京十三陵水库，确系八个月建成，工程质量良好，至今仍发挥效益。然而，这一工程实际上是党中央、国务院亲自介入的工程，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几乎都去参加劳动。工程的财力、物力、技术力量都得到保障。可是，各省区及市县也动议上马了许多力不从心的水利工程，不少不仅没有取得成功，而且劳民伤财、令人心酸。这里就甘肃引洮工程和湖南省宁乡县的黄材水库工程的失败予以分析。

### 一、人间银河变成人间灾难

1958年全国的幻想工程很多，甘肃不甘落后，幻想的工程、惊人的卫星几乎县县都有。据考证，当时最时髦的理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是甘肃的处女作。产生这种理论的省份焉能够在设计幻想工程上落在别人的后面？果不出所料，一项幻想银河落地的工程问世了。

这项工程叫“引洮上山水利工程”，简称引洮工程。亲历过这一工程的人，一听说“引洮工程”四字会不寒而慄。

甘肃是一个干旱缺水的省份，尤其甘肃中部的十多个县几乎年年闹旱灾。渴望水利建设这是甘肃人早有的愿望。国民党时期，有人就提出过引洮河水到华家岭，变旱地为水浇地的主张和方案。但因技术落后和经济基础薄弱的原因，始终没有进入实施阶段，不过纸上谈兵而已。1958年据说中国人可以藐视自然界的一切了，这是一个“让高山低头，使河水让道”的时代。在这

种背景下，引洮工程的大戏上演了。

这一工程有人叫山上“银河”，有人叫山上“运河”，设计者，更确切说是“设想者”的胆量惊人。工程总干渠 1400 公里，称山上“运河”，支干渠 14 条，长 2500 公里，共计 4000 公里。这一长度的铁路也是少有的，从兰州到北京不过 2000 公里而已，兰州到上海不过 2300 公里而已。为了使这项水利工程象“银河”或“运河”，确定不是引洮河的一部分水，而是拦引当时流量为 35 亿立方米的全部水量。工程的水面宽要达 40 米，渠底宽 16 米，水深 6 米有余。水流量要达到 1500 立方米/秒。幻想者事先没有作详细考察，只是描述了这一工程的壮观，说它要辟山岭 2000 多座，跨河谷沟涧 800 多处，填土方 15 亿立方米以上，还有上千座水闸桥梁等建筑物。更为理想的是在引洮工程的沿线要造天上日月，当时称为“葡萄串”或“满天星”式的无数水库。当然，1958 年来说，上述这一切伟大的指标是不在话下的，有人说三年完成，有人说一年可以了，否则是“右倾保守”。

为了把甘肃人对这项幻想工程的幻想提得更高，就组织一些编造专家来写“民歌”，写得越神奇越为“优秀”作品。甘肃的省报和各地的报纸及广播电台，连篇累牍地宣传这项工程的幻想。当时没有电视，老百姓还不能直观吹牛者的形象，但电影片是拍了的。我这里从千百首对引洮工程幻想的“民歌”中摘录了一首，供我们重温幻想的历史。歌曰：

扛起镢头唱起歌，翻山越岭到洮河；  
洮水引上董志塬，搭上船儿游银河；  
万丈高山险又陡，千年岩石挡路口；  
十万民工从此过，岩石低头水长流。

为了早日到“共产主义”，为了相信“群众运动”，这项工程从 1958 年 6 月就开工了。当然，对工程未作认真勘测，对完成这项工程的技术、资金和物质条件也未予以过多的核复。在这样

的年头，不考虑这些物质、技术条件才是正常的，考虑了就会反常，领导者会掉乌纱帽，知识分子会成为“阶级敌人”。而当时有一点是充分考虑了的，就是如何搞人海战术，打一场“人民战争”。于是就把工程完成的基点放在组织民工上工地上。当时，采取强制性措施，从定西、平凉、天水三个所谓受益区（实则受害严重区）抽调大量农民，以县、社队组成兵营式的劳动单位，按团、连、排加以编组。农民的生产工具主要是镢头铁锹，当时架子车很少，算是先进工具了。水利工程的口粮是各地农民自带，有些是从全省各地平调来的。所有民工都吃大锅饭，睡大工棚或临时窑洞。工程的“战天斗地队伍”，有些月份达16万人，至少也有10万之众。

工地上充满着“阶级斗争”火焰和强制性劳动气氛。据一些人回忆，当时的主要劳动是挖山、挖洞、砍树、填沟、拆房子、背土、砸石头，每天要求“日夜奋战”，工时有时长达16小时，往往通夜都要抢战。工地上的打人、体罚和斗争会是一浪高过一浪，累死也不能说一句“落后话”，说了就是反革命，不说死了叫“殉职”或“阵亡”。1958年那年因为有放开肚皮吃大锅饭的政策，民工可以吃饱肚子。到了1959年春供应不济，饥饿威胁着成千上万的民工，口粮一减再减，有的减到每日每人半斤以下，有时干脆停伙。有时用野菜、树皮和各种非人食品“充饥”，有时连这些东西都没有了。工程上干瘦、浮肿、死亡的人数不断增加。到了1960年，民工为饥饿所迫和过度劳动折磨大量逃亡。工地上除了高音喇叭还在发出“战天斗地”、“引银河上山”的喧嚣外，只有饥饿和恐惧，只有斗争和迫害。

灾难已经降临，引洮工程已经是此路不通了，但甘肃的领导仍不丢面子，要把这项创巨大“政绩”的工程决心搞下去。口号叫做“挣死牛不翻车”，我不知道挣死的“牛”是指什么，从实际情况看恐怕是甘肃的老百姓，不是那些自称“公仆”、“孺子

牛”的“牛”。然而，不能说甘肃的领导不聪明，他们怕工程上人太多，粮食供应断线，一旦造成饥饿死亡人数增多，被上面知道真情，“政绩”就难创了。于是从1960年7月开始，进行三次民工精减，也就是把人海战术的场面缩小一些。引洮工程局曾这样报告精减人员情况：

全工程6月末共100633人，计定西专区60473人，平凉专区16273人，天水专区23887人，截止6月底，民工减后实留30500人，计定西专区减回44373人，留16100人；天水专区减回16087人，留7800人；平凉专区减回9673人，留6600人。

留下的30500人继续在死亡线上为省内的领导创“政绩”，走掉的70133人，并未回到极乐世界，而是由一个火坑跳到另一个火坑，仅就回去的路途上充满着痛苦与折磨。当时送民工回家时，也未忘记人民公社的“军事化”，成立了精减办公室，制定了行军纪律，安排了行军时间，设立9个接待站，还有收容救护车。但实际上回乡民工有的命运很不济。按工程局压缩的数字看，民工病亡者是很很多的。工程局的报告说，中途产生病号500人，造成行军困难，承认“在几次精减工作中，都发生了死人事故”。同一报告说三次精减死亡21人，2人是途中被坏人打死，劫走了钱财，19人是因暴食暴饮而死。又举例说定西有一民工，一次吃炒面4斤，生韭菜1斤，活活胀死。这位民工的4斤炒面从哪里来，质量如何，1斤生韭菜是谁称的，这一切暂且不问，为什么对他的结论是“活活胀死”，而不定性为饿死呢？60年代是抓言论罪的时代，“饿死人”的字眼是一个政治上忌讳的字眼，“社会主义不存在饿死人的现象”。从中国历史上看，饥饿的年代不少人在饥饿到极度时，肚里不知饥饱，不得不吃非人食品而胀死。形式上是胀死，实质上是饿死。且不要以为定西这位民工是非常富有的，也不要以为他有武松的大肚皮。让他不要在九泉之下背“胀死鬼”名声。留也惨，去也悲，当民工回到“农业第一

线”时，第一线的人多数处于饥寒交迫状态，有的食堂供应几两粮，有的停火断炊，农民在自生自灭，不少回去的人食堂连稀糊糊都不给，有的仍未逃脱饿死的厄运，有的带着病残的身子回来，既不能劳动又不能自理，连家庭成员也感到多了一个包袱。没有人追踪引洮民工以后的命运，但命运不佳者比比皆是。

此工程到了1961年6月，由于劳力逃跑难以补充，粮食特别缺乏，不得不完全停工。当然停工时已经撤换了左得要命的省委书记张仲良及其同伙，新任书记开始纠偏。那么，这项伟大的银河工程到底给甘肃人民带来了多少幸福呢？

可以简单地说，这项冒进工程对甘肃带来了巨大灾难，三年时间耗费了数以百万计的劳动力，浪费了大量资财，破坏了沿线的生态环境，造成人民群众的痛苦和死亡。1962年甘肃省委《关于引洮工程下马给党中央、西北局的报告》中这样描述：

引洮工程于1958年6月开工，事前未经过认真地勘察测量和请示，就仓促“上马”，施工期间常年动员民工10万以上，最多时曾达到16万人。1960年6月以后，由于劳力、粮食发生困难，逐渐减少施工量，到1960年6月以后，留部分人员维护古城水库和清算退赔。开工三年多来，先后完成土石方1.6亿立方米，仅占第一期总干渠工程30%。共花了劳动力6000多万工日（不包括后方支援工日），使用国家投资约1.5亿元，耗费了大量的水泥、钢材和木材。在此期间死亡民工×××，伤残民工400人，已经完成的工程，至今一无效益，浪费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给全省人民带来了很大损失，给党在群众中造成了极不良的影响，教训极为深刻。

改组后的省委发出的这份报告比过去省委关于引洮的各种报告、指示诚实多了，基本上符合这项劳民伤财工程的实际情况。但有些情况仍是禁区，例如工程上的死亡人数用某某某（×××）位数来标，据当时通行的保密制度，老百姓死了多少是不能

用真实数字来表达的，据说，让人知道死了多少人就是对社会主义抹黑了。而这里关于死亡人数用×××表示，并未对社会主义抹多少“红”。×××是三位数，但区间的绝对数差别很大，最少可能是100人，最多可能是999人。这三位数是指工伤致死，还不包括饿死者，如果把饿死者计算在内那不会是×××了，也许是××××了。不管怎么说，当时的省委能如此明确否定这项冒进工程，不能不说是甘肃人民的又一项救命措施。

引洮工程的“圆寂”离我们有38年了，但它在甘肃的冒进史上是名声大作的，它在甘肃人民心中是臭名昭著的。人们把它同古罗马奴隶修建罗马水道、斗兽场，中国封建社会修万里长城视为相似的劳民伤财工程。不过古代的这些工程还算修成了，为后人留下了名胜古迹，而我们的引洮工程则失败了，留下的是人们的白骨和怨恨。不过我国有一些“学费”论者，对此工程的灾难是百般掩饰的，他们认为这样的工程造成这样的损失，是为社会主义事业交了“学费”，应当说成绩是九个指头，缺点是一个指头。尤其自西部大开发以来，引洮工程的实施又提到议事日程，有人就更为1958年的那类引洮工程辩解了，意思是当初这项工程虽然失败了，但动机是好的，如果修成了，是功在千秋的事。这类辩解太缺乏常识了，无条件而凭理想拉出的劳民伤财工程，同有条件讲科学而准备实施的建设工程，怎么能同日而语呢？不能从名词的相似而类比工程的意义。即令是今后已经真正建成了一个引洮工程，我们也不能为1958年的那个令人痛心的引洮工程作辩解。1958年的引洮工程是脱离甘肃经济、技术的条件而凭主观愿望上马的工程。不要说这样巨大的工程当时根本无财力完成，就连主要的技术问题都一片茫然。省委的报告说这项工程“技术上对防治大滑坡和处理大孔性黄土渠道渗陷等主要问题，都未得到解决”，而今后我们所议论的引洮工程，则是在甘肃物质、技术条件发生了巨大变化后列入议事日程的工程。前

者是冒进工程，后者是能够有条件完成的开发工程。

## 二、黄材工程成为死亡的阵地

1958年，在离湖南宁乡县城约100华里的寨子山下，修建黄材水库。按照设计水库将蓄水1.5亿立方米，可灌溉农田30万亩，是人间天池，是当时全国大型土坝工程之一。库区淹没农田2000余亩，土石方约百万余方。这本来是属于县里的远景规划，但由于“大跃进”的号角吹响，在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工程便立即上马。

没有器材，全县征集。缺少资金，大搞摊派。没有施工机械，就搞人海战术。用最原始操作方法，一锄一锄地挖土方，一担一担地挑到坝上，四人一组抬着石夯砸地。全县84万人口，不管男女老少，能跑得动的都要上工地，经常在工地上的约10万人之多。那是一个号称敢想敢干的年代，一些带有浪漫色彩的口号，果真就付诸实践。比如，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工地上挑土的，搬石头的，就都得跑小跑，否则就是对大跃进有抵触，就得挨批挨斗，甚至于挨打。又比如冬季施工，指挥部提出的口号是：北风当扇摇，白雪当战袍。老的要学黄忠老来红，少年立志当罗成，妇女个个争当穆桂英。为了显示冲天的干劲。“黄忠”、“罗成”、“穆桂英”都要像戏台上一样画彩脸，而且要求一律打赤膊上工地。不少老者、少年、妇女在这种恶作剧中，冻死在水库工地！

还有“火烧中游”。在批斗会场中燃起一堆柴火，将那“中游分子”推入火中，有的因此而烧伤！

高压政策，加上过度的劳累和饥饿，工地上每天都有人倒下去，就再也没有苏醒过来！

最为惨烈的是1959年春节，正是在“反右倾”的大背景下，指挥部宣布：春节不放假，继续跃进再跃进。县里组织慰问团去工地，由县委副书记何长友领队，带着县花鼓戏剧团，还有

4000斤猪肉，试图把民工们稳住在工地上。然而，天公不作美，那几天雨雪交加，施工极为困难，粮食定量少，10万人吃4000斤猪肉，每人只能喝几口汤，还不知什么时候才轮得喝上，民工们冻饿得不能动弹。指挥部不得不改变决定，放假回家。

一些人没有力气走回家了。走着走着，就倒毙在路旁的草丛里。据当年侥幸活过来的人说：那个年三十夜，有上千人这样在悲惨中死去<sup>①</sup>。

### 三、两个工程失败的警示

引洮工程与黄材水库工程，两工程虽然相距两千公里之遥，但工作实施的作法和对人民群众造成的灾难何其相似，无独有偶。两工程的失败给人们的警示是什么呢？

一是反科学必须碰壁。引洮工程从设想到停工，许多程序和作法是违反科学常识，藐视科学精神的。边施工、边勘测、边设计这是引洮工程的作法，把施工放在勘测和设计的前面或同时，这在工程项目中是绝无仅有的。这是把“实践出真知”用到滑稽可笑的地步，是主观蛮干的极端行为。引洮工程伊始就在大面积黄土层上挖渠挖洞，拦河堵坝，但对黄土层的渗漏，黄土梁的滑坡，以及架桥、凿洞中可能出现的技术问题一无所知，而且不愿知道。这些作法是同科学常识、是同任何工程必须遵循的科学程序背道而驰的，最终不能不碰得头破血流。黄材水库工程，原为远景设想，是若干年以后的事，1958年突然上马，既无科学的设计规划，又无财力物力准备，仅凭人的两手在那里野蛮操作，焉有成功之理？

二是“运动”群众必然遭殃。1958年兴办引洮工程的唯一条件是党和政府有能力搞群众运动。然而，这种群众运动没有对群众任何利益和愿望的尊重，没有调动群众积极性的有效办法。

---

<sup>①</sup> 此记载见《刘少奇在1961年》第45—46页。

而在组织群众过程中，充满着强制和奴役，实则视群众如草芥。组织民工是按上级命令摊派，只能服从，不能拒绝，即令妻离子散也不能有任何疑义。工地上的劳动是军营式的，一声喇叭响，所有民工都得立即投入战斗，工时可以延长到最大限度，对劳动消极者可用打骂、斗争、减粮及其他五花八门的方式予以迫害。对强征来的民工想要就要，想不要象驱逐鸟雀一样赶回农村。农民的劳动力和命运是很不值钱的，领班的叫民工干什么就干什么，许多人的劳动白白损耗在无任何收益的挖山挖洞中。民工的伤亡可轻易用“已善后处理”几字而了结，对饥饿致死者用“非正常死亡”或管理不善“活活胀死”而予以搪塞。这样的群众运动实则运动群众，奴役群众，其结果必然是群众遭殃，人民的事业遭殃。

三是否定物质条件的存在必然失败。1958年的引洮工程不是建立在物质条件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胆量”、意志和“人定胜天”的比喻上。当时甘肃的经济实力、交通运输水平、施工水平、技术力量，都离搞引洮这样的大工程相距很远。可是，就是在这样“特穷特白”的省份，要造“人间银河”。这条银河的建造过程是一次违反经济规律的过程。把客观实际置之脑后，把取胜的希望放在“民众”的宣传鼓动、大轰大嗡上，把取胜的方式放在拔白旗、插红旗、掀起阶级斗争风暴上。自然规律、经济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违背了就要受惩罚，这是“老天爷”的惩罚，是看不见的一只巨掌的惩罚。

## 十、吹牛吹出了灾难

1960年前后的陇上大饥荒，是同1958年以来的浮夸风和大吹牛形影相随的。在竞相创高指标，放“大卫星”的鼓噪声中，造成经济结构极度紊乱，人力资源耗损殆尽，财富大浪费，生产大破坏。灾难就由此而生。

### 奇怪的“理论”导演出竞相吹牛

1958年是“吹牛风”空前绝后的年代，出现谁吹得越凶谁越光荣的局面。但是，决不要误认为1958年中国人疯了，或出现了整体更年期或什么突发性疾病。而我们仔细加以考察和分析，这是由领导层的偏激认识和奇异的理论导引出的异常现象。

1955年到1956年全国范围内出现了竞相提高计划指标，贪多求快，急躁冒进的倾向。针对这种冒进造成的基本建设规模过大，金融财政紧张，职工急剧增加的状况，周恩来等人提出了压指标，反冒进的主张。但当时的反冒进的口气很缓和，周恩来总理为了不给群众的热情“泼冷水”，在讲话中往往表达出一种既反左又防右的风格。例如，周恩来在1956年1月30日全国政协二届二次会议上指出：“我们应该努力去做那些客观上经过努力可以做到的事情，不这样做，就要犯右倾保守的错误；我们也应该注意避免超越现实条件许可范围，不勉强做那些客观上做不到的事情，否则就要犯盲目冒进的错误。”这一段话，对共产党人来说并非新奇，因为它表达了马克思主义对问题的辩证分析的一般方法论。但在实践上，周恩来等中央一些领导人确实也采取了

限制左倾冒进的措施。从1956年2月开始压了各专业会议上报的计划指标，5月，周恩来指示再不能继续“反右倾、反保守”了，6月，又下马了一些基本建设项目。

然而，对周恩来等人的看法和作法，毛泽东却看在眼里，气在心里，他有另外一套理论在心中酝酿。1958年伊始，毛泽东火山爆发似地开展对反冒进行为的声讨。他在1958年1月召开的南宁会议上指责，1956年的反冒进，是一个方针性的错误，它给群众泼了冷水，招致了右派的进攻，使我们的工作受到了很大损失。尤其令人惊讶的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提出了新的定义。他说“反冒进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冒进是马克思主义的”。还强调社会主义革命完成后，在经济建设里面，“真正的左比右好”。当时，对周恩来1956年6月20日主持发表的《人民日报》社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和李先念在1956年一届人大三次会议上所作的《关于1955年国家决算和1956年国家预算的报告》，作为反冒进的错误材料印发，供批判。为了丑化周恩来等人，会上还印发了战国时代楚国文人宋玉的《登徒子好色赋》，认为反冒进的人就像反登徒子的宋玉，其方法论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同时，毛泽东正告，反冒进者离右派只有50米远了，今后不许再提反冒进。

冒进是“马克思主义”的，“真正的左比右好”，这些令世界各国共产党人惊奇的理论一出现，在我国国内开始改写马克思主义篇章了。原来向干部普及的关于“世界是物质的”，“客观决定主观”，“正确的认识来源于实践”等观点不仅黯然失色，而且成为大跃进路上的思想拦路虎。为了扫除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这一年又抬出了马克思的半句话来大肆渲染，这半句话就是“一天等于二十年”。这半句话出自马克思给恩格斯信中的一个比喻，认为在革命运动的各个时期，解决任务的速度和效率是不一样的，有些时期运动只能采取缓慢变化的方式，也就是“进化

论”的方式，有时候在条件成熟时，可能出现快速完成任务的方式。他这样写道：“在伟大的历史发展中二十年等于一天，虽然以后会有一天等于二十年的时期”。马克思这里讲的“以后会有一天等于二十年的时期”是指在人类实现了共产主义的历史阶段，人类对自然和社会的改造进入了所谓的“自由”王国，这时，一天所干的任务是过去若干年甚至二十年才能办到的。“一天等于二十年”绝不能被认为是马克思的基本理论。类似的话列宁也讲过，列宁曾经说，在十月革命以后，俄国人每做一个月的工作，“等于我们历史的十年，甚至于二十年”。当然，我们也不能把列宁的比喻看作基本理论来加以运用。

在把“一天等于二十年”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观点的大舆论环境下，甘肃的“马克思主义者”也大显身手了。其中一个著名的论断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怕办不到，只怕想不到；只要能想到，一定能办到”。甘肃省委的主要负责人1958年1月与《中国工人》杂志记者谈话时讲：“紧张是革命的常规，紧张是大大地的好事”，同时提出了一个公式叫做“要革自然的命，必先革思想的命”，认为人们改造自然的障碍不在自然界本身和客观的物质条件，而根源在于思想，在于思想上敢不敢的问题，只要思想问题解决了，人都能敢想、敢说、敢干了，改造自然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在省委主要负责人的这一“大理论”的感召下，各地区竞相创造新的理论和新的公式。1958年7月，平凉地委在“大革思想命”的口号下提出了一个办事公式，这就是：“要把不能办、不去办、办不到的公式，变为能够办、马上办、办得到的公式”。这些理论产生的一个重大后果是引导人们搞浮夸、说大话、吹牛皮。因为客观的自然条件和物质条件发生变化要经过一个极其艰苦的改造过程，必须遵循客观规律，创造客观条件。如果不承认客观规律和客观条件，而把人们的思想凌驾于自然规律和物质条件之上，那就只能靠空

想、梦想和各种大话来解释自己的奋斗目标了。可见，吹牛皮的理论基础是极端唯心主义，甚至是唯我主义。

### 陇上吹牛五花八门

在“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口号下，从1958年的第一季度开始，在全国不断掀起了“放卫星”的高潮。6月12日，新华社报道，河南遂平县卫星农业社放小麦亩产3530斤的卫星，紧接着，6月30日河北省安国县卓头村社又放出了小麦亩产5303斤的卫星。7月23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河南省和平农业社亩产7320斤的卫星。随之又有广东番禺县亩产100万斤蕃薯的卫星。还有些科学家预言，如果利用好太阳的光能，稻麦亩产可能达到40000斤。除农业上的卫星外，工业、科教文化等领域都有许多卫星。在全国大吹牛的背景下，“陇上儿女”也不甘落后。从1958年春天起，甘肃各地出现了五花八门的大卫星、大牛皮。其类型大体上有如下几种：

#### 1. 思想要上天

1958年全国流行着一首人要上天当玉皇的民歌：“天上没有玉皇，地上没有龙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甘肃的一些人藐视天庭，想当玉皇的愿望同这首民歌所表达的一样强烈。从省委到各地县委，以及民间百姓都竞相编造思想要上天的神话，除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外，还有诸如“群众想移山，山走；群众想踏地，地动；只要革了思想命，无雨大增产，大旱大丰收；人可以让地球服、海洋降，强迫宇宙吐宝藏”。这类上天入地的豪言壮语曾铺天盖地笼罩陇原大地。

#### 2. 人能成神仙

1958年，在甘肃出现了许多人能成神仙的口号、谚语和事

件。当年的《甘肃日报》和各地的小报都不断公开报道了人成仙的谚语、口号和所谓“民歌”。有一首发表在《甘肃日报》上的民歌这样讲：“手执钢锹驾火箭，驾起青龙上云端，三山五岳听我令，玉皇下马我上鞍”。当年，《甘肃日报》还报道了一位哑巴变成文化战士的奇迹，是采用顺口溜的形式来报道的：

“各位父老听我言，  
有件事儿把它传。  
临洮县的店子川，  
东行五里宋家山，  
有个哑巴羊世忠，  
他是扫盲英雄汉。  
他虚心学来苦心练，  
一字一句记心间，  
时间没过两月半，  
识字已经过一千，  
他会写来又会用，  
文化战线走在前。  
旧社会把人变成鬼，  
今天哑巴开了言，  
甜水吐出比蜜甜，  
你看稀罕不稀罕，  
党的恩情万古传。”

我们打开甘肃省内各地的报刊，或翻阅一下当年的各种文艺作品，不少“艺术品”多讲牛郎织女下凡来，看到陇原大地比天宫好得多，还有陇原儿女到月宫与嫦娥欢庆放卫星的情节，嫦娥已后悔当年奔月的行为，而很想返回大地，下凡在董志塬或河西走廊参加大跃进。

### 3. 产量无限翻

1958年的大吹牛在农业和工业产量上表现得十分可怕。1958年7月23日新华社暴出了惊人的消息：“中国夏收作物空前丰收，小麦总产超过美国。”在夏收前后，甘肃的各个地区也竞相发出农产品放卫星的消息。榆中县来紫堡实验田放出了高产3283斤的卫星，过了七天，这个社又放出了一个小麦亩产4000斤的卫星。8月份甘肃省的领导提出了一个亩产无限的响亮口号：“土地潜力无穷无尽，亩产多少事在人为”。紧接着，在全省各地出现了亩产5000斤到10000斤的若干卫星。康乐县宣布，全县人均粮食已达到2000斤，临夏宣布，全地区1958年平均亩产已达到了5000斤。在工业上，全省放出的卫星更多，1958年元月，兰州市就宣布，五年内总产值要增长9倍，郊区要达到乡乡有工厂。1958年7月，静宁县介绍了如何变成万厂县的经验，宣布半年已建成了13422个工厂。当然，甘肃的农业卫星比外地有些放出的卫星稍逊色，例如河南在8月份就出现了玉米亩产12800斤的卫星，湖北辰春社放出了中稻亩产43869斤的卫星。然而，工业的卫星，甘肃一直走在全国的前列，甘肃省有关部门宣布，到1958年的6月，全省的厂矿数猛增到220000个，全省出现了10多个万厂县、20多个千厂乡、50多个百厂社。

#### 4. 赤手可移山

1958年，甘肃大浮夸的一个理论就是“人手论”，认为每个人都有两只手，这两只手在任何条件下都能够改天换地。7月9日，《甘肃日报》发表的一首诗，对人的双手作了高度赞美：“英雄渠，工程大，过黄河，穿石峡，我们民工有双手，什么困难都不怕。”1958年8月31日的引洮工程表彰大会对人的双手更赋予了神奇的力量。其口号是“鼓足干劲，山动弹；铁臂一挥，水上山。”当年有一篇在《甘肃日报》发表的《谈干劲》的文章，认为干劲就在于：朝气蓬勃，生龙活虎，排山倒海，乘风破浪，无坚不摧，无攻不克，让高山低头，让河水让道。

## 5. 一天等于二十年

1958年，以至1960年甘肃把“高速度”的口号喊得惊天动地，各条战线都出现了“一天等于二十年的速度”。秦安县从1958年1月就宣布，在一年内实现五化：水利化、绿化、地埂化、山地步犁化、良种普及化。平凉地区有关部门宣布，1958年1月，平凉已出现了800条幸福沟，所谓“幸福沟”就是把原来破烂不堪的水沟水渠变成花草树木遍地的新园林。定西1958年7月份宣布，全专区已变成无盲区，人人都成了文化人。1958年1月，兰州大学的领导宣布，苦战五年建成共产主义新兰大。1958年1月17日，省委作出决定，对所有的规划都要高速度完成，其口号是：“十年规划，五年完成，三年指标，一年达到。”1960年初，甘肃已出现了全面饥饿的状态，但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口号并没有停下来。《甘肃日报》发表社论说，“为实现今年更好、更全面的继续跃进而斗争”。在全省要掀起“一跨、二革、三超、四比、五成”的运动，要求全省人民都要“立跃进思想，抓跃进措施”。

## 6. 世界我为先

1958年开始，中央提出十五年赶上英国，后来提出“赶上英国不需要十五年，可能是三四年”。“七年可赶上美国”。而在甘肃，“超英赶美”的口号喊得更加响亮，在1958年7月份，兰州市和白银市都举行了盛大的庆祝游行活动，口号是“誓把英国远远地抛在后面”，报道了甘肃压倒英国的许多“巨大成果”。其中有：“七一”前夕，甘肃农具制造厂制成了世界上第一台自然汽油机；白银市建筑单位用废橡胶试制成功的橡胶沥青除苏联以外，所有资本主义国家都不会制造；兰州市石油公司制造的三用自行车不仅在陆上水上行走，还可在二三百公尺高的空中飞行；兰州大学化学系的师生试制成功的140种新产品中，其中有八种贵重化学药品已压倒了英国，正在试制的三百余种产品要誓把英

国远远地抛在后面。当然，超过英国的产品不止这些，当年超过美国的产品在甘肃也是不乏的。

## 吹牛吹出了大灾难

人们常说的浮夸、弄虚作假和吹牛皮，其含义有相同之处，都是属编造专家为了窃取某种职位或利益而进行的造假蒙人行为。但浮夸、造假和吹牛三者之间，吹牛可算造假蒙人行为的“最高”层次。浮夸，是把小的说成大的，少的说成多的；弄虚作假，是以假充真来蒙人；吹牛则是不顾任何客观事实，而纯粹海阔天空地乱吹胡诌了。我们的分析表明：1958年的吹牛同1960年的大饥饿成正比，那个地方吹得越凶，那个地方的灾难越重，死亡人口也越多。甘肃吹牛的结果也证明了这一结论。

### 1. 吹牛吹得农业大崩溃

1958年的大吹牛给甘肃农业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

由于在农业单产上大吹牛，号称出现了千斤亩，万斤亩，10万斤亩，从而使各地干部群众出现放弃对大面积作物经营的倾向，千军万马在制造的“卫星田”上作文章，认为种好几亩“卫星田”粮食也多得吃不完，何必在更多的地上吃苦呢。当年夏收时，许多地方的小麦和夏粮无人抢收，腐烂在地里，秋天洋芋毁在地里的更多。据粗略统计，1958年甘肃有占耕地面积25%的庄稼毁在地里，无人问津。

农业上吹牛的另一个后果是高征购，挖空社队粮食。既然每个社队报表的产量都是成倍增长，那对国家的贡献也应成倍做出，于是就普遍开展了高征购。甘肃1958年估产185亿公斤，后来修正为120亿公斤，其实丰收的1956年甘肃总产才38亿公斤，1958年实际低于这个数字。但1958年、1959年都在连年提高征购指标，1958年征购入库占粮食总产量37.5%，1959年征

购入库占总产的 47.6%。实际人均占有粮不到 100 公斤，但省委宣布 1958 年人均有粮 780 公斤。在有些地区和县社，农民的粮食实际 60% 的被征购了，到 1959 年已空空如也。

农业上吹牛的另一个后果是放开肚皮吃饭，刮粮食共产风，造成巨大浪费。甘肃在夏收以后，到处传达毛主席视察徐水县时说的一句话：“一天吃五顿也行嘛！”于是在一些地方无控制地用粮，尤其是一些地方还设立了大路食堂，供过路人吃饭。当然他们这样做也是为了“早日到共产主义”。山东范县 1958 年率先建立了“道路上的饭铺”，以显示已经到了共产主义。毛主席在 1958 年 12 月还肯定了马路食堂。毛主席在对陈寿著《三国志·张鲁传》写的批语中说：“道路上饭铺里吃饭不要钱，最有意思，开了我们人民公社公共食堂的先河。”

表面上大吹农业卫星，实际上农业生产大滑坡，大伤元气。据统计，到 1960 年甘肃“继续大跃进”的年头，农业总产值只有 1957 年的 67.62%，同期，粮食减产了 36.45%，油料减产了 52.76%。

在农业大滑坡大崩溃的状态下，出现了陇上大地的饥饿大死亡。那个 1958 年号称人均有粮 2000 斤的定西地区，人口死亡率升到 23.58%，有 5 万多人死于饥饿。号称 1959 年全区亩产 5000 斤的临夏地区，1960 年人口死亡率上升为 19.61%，有万余人死于饥饿。那个号称 1958 年建了 13000 多工厂已经完全工业化的静宁县，1960 年人口死亡率达到 25.82%，实际死于饥饿者约 8000 余人，出现了多起“人相食”的怪案。曾生产出一只豇豆重达 70 斤的文县，生产出一只黄瓜重达 60 斤的陇西县，生产出一只辣椒重达 4.5 斤的兰州雁滩乡，一棵杨树上嫁接苹果产量达千斤的武山洛门镇，亩产洋芋 16 万斤的礼县，无一免遭饥饿煎熬。这时，高产卫星一个个不见了。由于大吹牛，甘肃人口从 1959 年到 1961 年减少 90 余万，约百万人死于饥饿。

顺便说一下，就是在大饥饿大死亡的悲剧裹挟甘肃大地时，陇上高层领导也忘记不了吹牛。1960年1月8日《甘肃日报》谎称：“在公社化后的短短一年内，全省一万四千四百五十九个生产队，普遍赢得了增产增收的巨大胜利。原来的富队更加富裕；原来的四千一百六十五个比较穷的队，已经摆脱了贫困面貌，跨进了富队行列”。

## 2. 吹牛吹得经济结构大失调

吹牛的年代，在经济领域不是吹平均号，而是有些领域泛泛吹，有些领域则重点吹，有些领域则大吹特吹。1958年11月，毛泽东在郑州工作会议上重申了“三大元帅”、“两个先行”的主张。“三大元帅”：一为粮，二为钢，三是棉。毛泽东的本意是以极大的勇气开始纠正“三面红旗”招引来的太多的问题和矛盾，纠正两个急于过渡，但他却不愿放弃继续进行大跃进的初衷，以致造成了比纠“左”还“左”的“左”。农业上的粮食元帅怎么升帐，主要靠高产卫星。工业领域的钢铁元帅的升帐靠全民大炼钢和高指标的鼓动，至于棉花的升帐，主要靠想像的奇迹来实现。引起经济结构严重失调的是“钢铁元帅”。中央为了向英人挑战，不断修改钢铁指标。1957年制定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原确定5年内把钢的产量增加到1200万吨，这已经比八大二次会议的指标提高了许多。而到1957年11月底批判右倾保守之后，则把1958年钢的年产量确定为610万吨，1958年3月则把钢的产量定为624.8万吨，1958年5月份中央政治局会议认为这个指标是不够的、保守的，于是就把指标提高为1070万吨（或1150万吨，宣布为1070万吨）。

甘肃省在落实“钢铁之帅”升帐的目标上是一马当先的。省委于1958年9月4日要求全党全民紧急动员、大炼钢铁，宣布当年要生产30万吨铁、10万吨钢，而口号是“一斤也不能少，一天也不能迟。”当年甘肃动员了60%的劳动力参加大炼钢铁，

许多县参加炼钢的人员都在 10000 人以上。报刊上连篇累牍地报道出铁出钢的“胜利消息”，连那些没有铁矿的县也组织“远征军”到数百里外去炼铁。如宁县动员 1.2 万人，8700 辆架子车，到数百里外的华亭县去炼铁；秦安、礼县组织 1 万多人到徽县炼钢铁；山丹、永昌等县在城墙上挖洞装矿石点火炼铁，装一“炉”就上报出铁 5000 吨。省、地、县各级干部走出办公室在球场、后院建炉炼铁；大、中学校师生停课炼钢铁；解放军分赴各地支援地方炼铁。按照这种群众运动的方式来大炼钢铁，实际上炼出的 90% 以上是废渣，废料，成千上万吨煤碳烧毁在各种形式的土高炉中。与此同时，还掀起了收缴废铜烂铁的运动，农家的铁镬、门环、铁铲、镢头之类的金属品一扫而空，用来弥补炼钢的成果。全民炼钢的结果引发了经济结构的严重失调，农业生产的劳动力被抽光，轻工业日用品的生产被严重忽略，而“钢铁元帅”并没有发挥多大作用，从而整个 1959、1960、1961 年出现了各种消费品和生活必需品全面紧张的局面，不仅粮食奇缺，连肥皂、铁镬、铁铲、纸张等各类日用品都供不应求或中断了供应。

### 3. 吹牛吹得社会财富和人力资源大耗损

1958 年以来，由于严重的浮夸风和吹牛皮，从而造成了社会财富巨大浪费，仅甘肃煤碳的浪费就超过 100 余万吨，而由于放卫星，忽视对农田的经营管理，竟使近一半农作物毁在田间，还由于为了炼钢拆城门，拆庙宇，拆各种建筑物也造成了数亿计的财富的损耗，尤其在全省各地布建的各种幻想工程更是白白把社会财富填进了无底洞，仅引洮工程一项就浪费了国家 1.5 亿元的投资，白白花费了 6000 多万劳动工日。

从 1958 年开始，对人力资源的浪费更是惊人的，经常开展百万人上阵炼钢，百万人上山修水利，百万人在田间除四害，一切生产和非生产活动都采取军事化的组织方式，取消了人们自觉

自愿进行生产经营的一切方式，成千上万劳动力被驱使干那些毫无价值和效率的劳动。整个劳动战线和劳动过程对于干部群众采取高压甚至暴力手段，对参与这些运动不积极的人往往要扣不同的政治帽子。从1958年到1960年12月，全省有24万名工人、农民和学生被打成“反社会主义分子”和被戴上其它政治帽子。有4万名干部遭到严重的迫害，戴上了不同的政治帽子。武都县1959年就反映，当地干部采取军阀作风对待社员，经常任意打骂，不给饭吃，有个生产队从元月到3月连续死亡27人，有的是饿死，有的则是被干部打伤且经常扣饭而死亡的。1957年甘肃省人口死亡率为11.16%，1958年则上升为21.42%，死亡率升高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劳动的折磨和政治运动的迫害。当年因饥饿致死的人是不多的，1959年人口的死亡率为17.48%。当年的高死亡率除了因饥饿致死者外，还有一部分是死于过度劳动和政治运动。1960年甘肃人口死亡率升为41.69%，人口总数减少了336000人，这主要是由于饥饿所致。这些劳动力资源的损失，甚至生命的殒落不能不说与1958年以来的吹牛有直接关系。

### 不要忘记吹牛的教训

1958年的吹牛是空前绝后的，这种吹牛一直吹到1960年底才有所觉悟。然而不是党内的人都赞同吹牛的，就是在1958年的吹牛高潮中，胡耀邦同志却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他在1958年第二次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的报告中就反对吹牛。他说：“敢想敢说敢干既然需要和实事求是结合，也就要求我们必须养成谦虚谨慎的优良品质，科学的发展是没有止境的，只有那些永不自满，不断前进的人，才能在探求科学知识的道路上做出更大的贡献”。

1959年我们党内对浮夸和吹牛造成的恶果认识清楚的人就

更多了。1959年7月4日刘少奇在庐山会议上作了如下的发言：“去年大跃进，吃了前年的库存，预支了今年。凡事不要轻信。要有办法使人不说假话。一股风批右倾保守，拔白旗，使人老在帽子的威胁下，说老实话的人，去年不好混。领导看好的多，估计偏高。去年二类苗比一类好。红旗队低产，白旗队高产。十一、二月大吃大喝时，老农已提警告：今年不可乐观。大家挨饿给武汉调粮，去年的错误，对经济生活造成很大影响，决不可小视。”<sup>①</sup>

但可悲的是，1959年庐山会议的后期，又把反左转为反右，说老实话的人又遭到了攻击和批判，而浮夸和吹牛者又光彩了起来，自此以后，浮夸和吹牛风又在继续上演，党和人民的事业因为浮夸和吹牛而受到的损失是难以估计的。

大吹牛的1958年，离我们已经有43年了，但是1958年的浮夸和吹牛所形成的作风却阴魂不散，至今国内许多地方曾出现所谓“数字政绩”，也就是编造的政绩和吹牛的政绩。近在眼前的事例是《人民日报》2001年3月1日报道：四川剑阁县六个乡镇的领导为了创政绩，竟在数字上弄虚作假，上报的猕猴桃、优质梨种植和毛兔存栏数分别夸大了63%，47%，80%，其中武边镇实际只有51只兔子，却上报为158只，田家乡只有13只兔子，却上报为300只。据报纸披露，还有一个贫困地区还放出了一系列“数据卫星”，粮食平均亩产1875公斤，每亩鱼池产鱼4.6万公斤，谎称全乡人都脱贫，人均收入2200元。当人们问这些乡村干部为什么要编造这些数字时，他们的回答是：“我不说大些过不了关，甩不掉脱贫的帽子。”浙江湖州国有企业双林酒厂累计亏损4000万元，该厂厂长却虚报利润表，谎称年年盈利，骗取了19.9万余元的奖金。虚报浮夸不仅表现在经济上，而且在社会政治生活领域俯拾皆是。例如，在人口统计上，为了取得计划生育的先进单位，一些干部就编

---

<sup>①</sup> 李锐著《庐山会议实录》湖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出版。

造所谓“一孩率”、“节育率”、“计划生育率”等方面的指标欺上瞒下,仅广西省 1990 年——1998 年因弄虚作假竟有 76.77 万人漏报出生户口。全国浮夸和吹牛的情况经常发生,陇上人家的情况也并不乐观,笔者曾走访过几个甘肃的小康村,竟发现村内有大量贫穷人口,有的人家流亡在外多年没有归乡,村干部也不知道这些人的去向。我们还走访过号称有百万产值的乡镇企业,有的企业已多年停产,只留有一个看门人守着几间厂房,但在上报的材料中却被描绘为当地工业发展的一面红旗。因此,中国人永远要汲取 1958 年的经验教训,一不注意,浮夸风和吹牛皮的闹剧会再次上演。

## 十一、左倾路线面面观

1958年至1961年之间的这场大灾难,习惯的说法是“三年自然灾害”所为,但为时不久人们就认识到仅有自然灾害,不会形成近1500万人的死亡。刘少奇1961年在他的故乡调查时,乡亲们就对他说,看来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刘少奇表示赞同。在中央全会上毛泽东和刘少奇等领导人都认为造成灾难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当时把人祸的表现称为“五风”,即浮夸风、平调风、共产风、瞎指挥风、强迫命令风。在全国开展了“反五风”的运动,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当时讲反“五风”并没有认识到中央的路线是左的,即使有左也是下面的事,是下面违背了中央的正确路线,因而“三面红旗”是不能动摇的。今天看来,所谓“五风”正是左倾路线的具体表现,而“三面红旗”正是左倾路线的标志。

### 左倾路线的基础理论:超越论

为什么从1956年批判“反冒进”开始,就出现左的政策,直到1961年才开始纠正,后来又恢复左的路线和政策呢?其理论依据是什么呢?现在看来其基本理论或基础理论是“超越论”。这种理论认为在无产阶级掌握政权的条件下,在一切领域都可以“超越”,可以跨越历史阶段实现某种重大目标。当时超越论表现为:

其一,超越生产关系的发展阶段,提前过渡到共产主义。1958年在全国范围内反右倾,提出了“冒进是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是非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毛泽东主席就产生了早日实现共产主义“大同世界”的思想,甚至布置基层干部学习康有为的《大同书》。人民公社的产生就是在生产关系上寻找一条快速实现共产主义的捷径。果然,在人民公社兴起之际,就开展了大批资产阶级法权的

风潮，陈伯达、张春桥这些后来倒下去的人物，当年是撰文和作报告批判资产阶级法权的“英雄”。所谓批资产阶级法权，批的就是按劳分配、等级工资制、脑体力劳动分工、商品经济关系等。于是，在人民公社中不断注入“共产主义”因素，供给制、吃饭不要钱、公共食堂、财产平调、社员的生产生活资料收缴公用等，都认为是共产主义因素上升的表现。理论家吴传启在《从人民公社看共产主义》的文章中指出，我国社会已经有共产主义萌芽，这就是：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的过渡，全民所有制成分增长；“旧式分工”造成的不平等，正在被“工农商学兵”结合的形式所取代；生活的供给制，公社实行十包，即吃、穿、住、教、治病、死葬、理发、看戏、烤火费、结婚费等全包，这就是向按需分配的方向过渡。<sup>①</sup>

不只是吴传启的文章，全国各报刊充满共产主义说教的文章，如“半供给制就是共产主义萌芽”，我国现行生活的特征是“社会主义制度加共产主义思想”，“同资产阶级法权决裂，为共产主义呐喊”。李先念同志在视察了一些人民公社后写了《人民公社所见》的文章，其中就指出人民公社已经有了“共产主义萌芽”，具体表现为：消灭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某些最后残余。如小商小贩在有些地方绝迹，出现万人万户的大社办大事的现象。还有产品直接分配的部分扩大了，社队之间的商品交换，变成了内部直接分配和使用。此外公社还把评工记分，夏秋预分，年终决算改为“部分供给制加基本工资加奖励工资的办法”。<sup>②</sup> 这一切看法表明中国超越发展阶段早日过渡到共产主义不仅有可能性，而且已经正在变成现实。

其二，超越现存物质基础，可以人为地使生产力水平达到无限程度。1958年到1961年都在倡导大跃进，批判“生产到顶论”、“人口论”、“条件论”，认为只要思想大解放，就可以在各个生产建

<sup>①</sup> 吴传启：《从人民公社看共产主义》，人民日报，1958年10月1日。

<sup>②</sup> 1958年10月17日，人民日报，李先念：《人民公社所见》。

设领域创造奇迹。“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幻想正在变现实”。在这种主观唯心主义思想指导下，全国经济发展的总目标不断上升。原来打算十五年赶上英国，到1958年8月前后，毛主席认为赶上英国不需要十五年，七、八年可以赶上美国，两三年可以赶上英国。在全国的各个公社、厂矿及学校都出现了“超越世界”的经济“卫星”、科技“卫星”。在报刊上出现了许多经济指标压倒美英的“事实”，如新华社1958年9月30日报道“我国棉花总产量压倒美国”，美国只五千二百万担，我国则为七千万担。在粮食总产上，夏收后，就报道“压倒美国”，比美国多出四千亿斤。与此同时亩产千斤、万斤、数万斤的小麦、水稻的典型不断浮出水面，还有亩产百万斤的洋芋和红薯的消息。

全国各地出现鄙视物质条件和技术条件的舆论。宣传建厂、修水利可以“白手起家”，许多科技成果都是工人、农民在没有任何技术条件的情况下发明创造的。有些地方的群众半月干出了“四千年的成就”。“一天等于二十年”的事迹成为家常便饭。

总之，当时一些人认为生产力的发展问题，唯一的动力在于思想，有了高产的思想，就有高产的结果。

#### 左倾路线的“实证”方法：吹牛与假话

因为左倾路线是倡导离开物质条件而实现某种经济政治目标的，所以这些目标事实上是达不到的。但为了推行这种路线和政策，就只有激起人们吹牛和说假话的各种伎俩。在1958年和三年困难时期吹牛成了热风，说假话成了习惯。谓予不信，拭目以视。

吹牛首先是从放农业“卫星”开始。1958年6月12日新华社报道：河南卫星农业社放出小麦亩产3530斤的卫星。紧接着6月30日河北省安国县卓头村社又放出了小麦亩产5303斤的卫星。7月23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河南省和平农业社亩产7320斤的卫星。随之又有广东番禺县亩产100万斤蕃薯的卫星。还有些科学家预言，如果利用好太阳的光能，稻麦亩产可能达到40000斤。

此后,全国在农业领域把吹牛作为推动农业大跃进的基本手段,由个别公社吹发展到各个县、各个省都在吹。1958年10月6日《人民日报》报道:山东产粮已达800亿斤,宁夏夏秋作物增产一倍多,每人合粮1500斤。全国前九个月已产粮7000亿斤,产棉7000万担。如前所述,10月30日,又有一条震惊世界的消息说中国棉花总产量已压倒美国。美国8月间预测只产棉5000万担,中国则已达到7000万担。

在水利战线的喜讯更加惊人。水利部长傅作义在1958年2月7日指出,全国将近8000万人搞水利。“四个月的成就等于四千年的一半”。还报道谷城县一个队的群众几天来开渠穿过两座山。1958年10月14日《人民日报》报道:水利建设创世界奇迹,一年扩大灌溉面积4.8亿亩。1958年7月18日《人民日报》报道:连坂社早稻亩产五千八百多斤。7月23日报道:小麦总产量超过美国四十多亿斤。7月31日又有报道:春光社创10597斤水稻高产纪录。9月5日又报道一亩中稻产6000万斤。

在工业领域的吹牛不亚于农业领域。例如,安徽号称建成了800座炼钢炉,钢产量增长50多倍,1958年10月25日报道:中国在七天内产钢43.7万吨,实现钢铁高产满堂红。煤炭工业方面也吹的很厉害,新华社报道:全国产煤超过百万吨。煤炭工业部部长张霖之称,煤炭工业明年赶上英国。机械工业的卫星也很多。第一汽车厂生产能力由30000辆调整到70000辆。

科学技术战线也不讲科学而讲吹牛了。新华社在1958年10月份报道,中国科学院出现了2152项科学成果,其中167项达到世界先进水平,66项超过世界水平。科学院竟造出了一颗人造的小太阳。甘肃日报曾报道兰州还造出了一辆自行车,可以在地上跑,水上行,也可以在空中飞。大诗人袁水拍的一首诗,用诗的语言鼓动人们创奇迹:

工业殿堂气象宏,

不见神仙见英雄，  
发明创造破迷信，  
东方新生一巨龙。

钢锭三人难合抱，  
好比巨拳拄天空，  
东床机械超英美，  
个个金刚显神通。

有志能摘天上星，  
有力能优原子能，  
铁水奔流三江避，  
高炉烛天五岳惊。

六亿人民乘东风，  
天也摇来地也动，  
火箭速度办工业，  
飞向世界最高峰。

连扫除文盲都要搞浮夸和吹牛。

1958年8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一首诗赞扬中国扫盲的奇迹。诗名曰《嫦娥叹》，这样写道：

天风吹过月宫旁，  
传来人阅读书声；  
嫦娥听了泪汪汪，  
只有我还是文盲。

1958年8月11日《人民日报》报道：山西老羊工宁华堂当了大学教授，而且计划编写一本《新养羊学》，并在山西农学院登台讲课。

还有一则消息叫来自基层的“研究员”，说一位县委书记和四位农业社主任被中国农科院聘为研究员，这些人的学术成就就是批判马寅初的“人口论”和土地“递减论”，声明人越多越好，土地增产无止境。

1958年7月8日《人民日报》报道：山西70万人脱离文盲，甘肃23个县市不再有文盲，宁夏已普及中小学教育，一个月办起大专院校11所。

在吹牛破产后，为了掩饰其劣迹劣行，就开始说假话。比如当公共食堂出现，口粮标准极低，甚至停伙时，却在报纸上出现“刘家坪食堂越办越好”，“红旗公社食堂争上游，九十顿饭菜不重样”，“河南二十多个县食堂吃上了可口的红薯面包”等等，以此来巩固被群众憎恨的公共食堂，堵住不满意食堂的群众的口。当信阳出现严重饿死人的现象，上级来人检查时，信阳地区的各级领导又以假话来掩盖事实真相，大大缩小死亡数字。如正阳县饿死了八万多人，却报为1.8万人，新蔡县死了10多万，却报为3万人，遂平县山查峪公社死了4000多人，却上报为600多人。对于人口的逃亡，其主要原因是饥饿引起，但各地的文件中总要讲许多个别人的情况，说有的是为了“进城当干部”，有的是“搞投机倒把”，有的是逃亡的“地富反坏右”，只有少数是生活安排上的问题。以此否定饥饿是人口外流的主要因素。

总之，左倾路线的重要特征之一，是先浮夸吹牛，吹牛破产后，说假话掩饰，继续坚持左的路线和政策。

#### **左倾路线的实施工具：无休止的斗争**

左倾路线所推销的任务和目标，是离开客观条件的，因而不得人心，四处碰壁。在这种情况下，左倾路线的制定者和执行者就以革命者的面目出现，对那些对立的意见和行为实施“革命措施”。一般是拿起“阶级分析”的法宝，指控反对派、有疑义的人为“资产阶级”或“反对社会主义革命的分子”，并不断上纲上线，直至最后把

他们划成“阶级敌人”，予以专政或整垮。

毛泽东主席有一句名言叫“共产党人的哲学是斗争的哲学”。一些人把它发展为“不斗则退，只斗则进”，“一斗就灵”。这种用斗争和打击手段推行大政方针的作法，是从党的最高层做起的。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实际上打击了敢于讲真话，敢于发表意见的知识分子，从而出现了禁止思维、鸦雀无声，舆论一律的局面。1958年为推行“三面红旗”，在全面开展拔白旗、反右倾、批观潮派的斗争，当年还进行反右派和为民主革命“补课”，数以千万计的人挨批斗。特别是阶级斗争的声势在农田里，在炼钢炉旁，在水利工地上更为高涨。1959年由于彭德怀等人对1958年的左倾蛮干提出了纠正意见，从而被打成“反党集团”，全国又一次开展了大规模的“阶级斗争”，而且认为这是“生死大搏争”，又有数以百万计的干部和群众被整垮。于是出现了对大跃进、人民公社唱赞歌的新局面，左的政策又变本加厉了。1960年和1961年在大饥荒的阴影下，仍然掀起了斗争的风浪，把反映缺粮，农民外逃，饿死人的现象往往说成“坏人搞乱”，所以把批判富裕农民的资本主义倾向，打击地富反坏右作为稳定人心的主要手法。连公共食堂断炊这样的事，也说成是农民的“资本主义思想作怪”，便采取斗干部群众的办法来恢复食堂。

三年困难时期推行斗争的手法，在一些地区和基层表现得十分残酷和野蛮。例如广西环江县的书记就主张把那些外逃不愿回来的人一律打死，因为他们是社会主义的“逃兵”。河南信阳地区在1959年竟把48万外逃人员关押起来，有的死在监狱。青海湟中县竟把大量人口的死亡说成是阶级斗争问题，县委书记还说，“有生就有死”，“死是自然规律”。在阶级斗争的火焰中直接整死和逼迫自杀的现象在灾区普遍出现。

甘肃省酒泉县某大队在搜农民的“陈粮”中，两天两夜共斗十八人，斗争的方法是“交待问题的坐在房子里，不谈问题的拉到院

子里,再不交待,五更天由红专队监视,拉大车,早饭后再进行斗争。山丹县一些干部经常捆、绑、吊打社员,有些人活活被整死。陇西县的县委书记在开展对干部和群众的打击上还是个“发明家”。他的发明叫“炒豆子”斗争法,其办法是“政治与军事相结合”。就是先把被指控有粮不交的人定为“不法分子”,让其交待。接着把这些被斗的人围在众人中间,你推我打,直至打得遍体鳞伤,不得不认罪为止。以此办法,不少人被致残,有的逃跑,有的自杀。不独甘肃如此,广西、云南、河南、山东等省都不断创造出开展无情打击干部和群众的新花样,比如扣饭、罚做重体力劳动、打屁股、火烧、站雪地,还有直接被吊打而死的。

左倾路线和政策,对中国的带来的危害是巨大的、长期的、灾难性的。它以冒进蛮干的手法破坏了生产力的发展;以超越历史阶段提前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手法,破坏了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以残酷斗争的手法迫害了成千上万的人民群众。邓小平 1992 年南巡讲话中对中国的左倾路线有一针见血的结论。他说:“左带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它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邓小平同志说得何其富有历史经验,值得我们永远铭记。

## 十二、“七分人祸”形成的三步曲

造成三年大饥荒的原因如果按自然的因素和人为的因素两个方面划分,已经定论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1958年开始天灾确实有,1959年到1961年间还比较严重。而“七分人祸”则具有根本的因素。这“七分人祸”的形成有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从大的阶段上划分走了三步曲。

**第一步曲:一九五七年反右斗争是人祸的奠基阶段。**

1956年5月2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宣布中国要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1957年2月开始号召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采取大鸣大放的方式帮助共产党整风,并且提出了“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于是在中国出现了敢于发表不同意见的民主局面。费孝通等知识分子深感早春天气到来。围绕共产党内整顿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各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给党组织和党员提了许多意见。这些意见大部分都是善意的、击中要害的。这些意见归纳起来,大约有如下一些类型:以党代政削弱了政府职能的作用,党外人士权力小,应有职有权,共产党员有特权,有官僚主义,我国存在着形式上的民主,实质上的不民主;我国法律制度不健全,肃反中有扩大化倾向;不能一切照搬苏联,要有民族自尊心,党对教育工作的领导不能专横武断,而要发挥专家治校的作用;官僚主义操纵了文艺创作,西方作家应有创作的自由。

但是在报刊上和鸣放记录上把上述观点作了严重歪曲,采取断章取义的办法把一些人的善意批评曲解为恶意攻击。如说:张伯钧主张在共产党领导下建立各民主党派参加的议政体系,如设计院之类。反右派时把张的意见歪曲为建立政治设计院,不要共

产党领导。罗隆基在鸣放中说要建立专门组织给肃反中受冤的人平反,以取信于民。反右时却说罗隆基要建立平反委员会,要为一切反革命分子翻案。储安平认为政府和国务院领导岗位民主人士太少,应考虑有民主人士的位置,反右时却说储安平攻击我们的政权是“党天下”,要推翻共产党的一党专政。有个诗人流沙河写诗叫《草木篇》。其中多用植物来表达抒发自己的情感,有一首《仙人掌》这样说:“她似一把绿光炯炯的长剑,孤零零地站在草原,纵然死了吧,她的腰也不肯向谁弯一弯”。这被解释为右派分子要显示他的骨气,不肯向党和人民弯腰,而要对抗到底。成千上万的作家、学者、诗人和善于进谏的民主人士被划成右派,而且这些人都是主动要向共产党提意见,而是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党组织不断启发他们鸣放的,毛主席后来说这种启发叫“引蛇出洞”,然后歼灭。知识分子在反右斗争中经历了一场劫难。这场斗争造成的巨大灾难,时任中央统战部长的李维汉在回忆录中这样讲:

“这场反右派的后果很严重,把大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的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使他们和家属长期遭受委屈和打击,不能为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这不仅是他们本人的不幸,也是国家、民族的不幸。据统计,全国共划右派分子五十五万余人。其中,相当多的人是学有专长的知识分子和有经营管理经验的工商业者。全国五十五万余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人半数以上失去了公职。相当多数被送劳动教养或监督劳动,有些人流离失所,家破人亡。”

1957年的反右斗争同三年饥荒时期的“七分人祸”到底有什么关系呢?

1957年反右派斗争可以说是为三面红旗的出现,为五风的形成奠定了思想基础。当时中央对反右的评价是取得了思想战线上的伟大胜利。那么胜利了的是哪些思想和政治呢?大体上是:对党组织和党员提出批评意见,是反党的表现,从而再没有人直接对

党组织敢直接提出批评意见。苏联老大哥的地位不能动摇,谁对学习苏联有疑义,谁就是反苏反共。任何上级的指示只能绝对服从,不能有任何折扣、否则就是无政府主义。每个人只能低头劳动、不能追求个人的任何利益,否则就是资本主义。当然思想政治战线的胜利还有其他一些形形色色的内容。

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还给1958年以后推行左的路线提供了方式方法的示范。其表现为:

一是戴政治帽子的方式。1957年以前曾按家庭财产的多寡和有无剥削给一些打击对象戴了地主、富农的帽子。而1957年则不按财产给人戴政治帽子,而是按思想表现。右派这顶帽子就是按思想戴的,这一年有55万人“荣获”了这顶帽子。1958年大跃进伊始,就学步1957年以戴政治帽子推动各项运动。这年又开始了反右的“补课”。据说又有15万知识分子被戴上了右派帽子,右派队伍被扩大到70万。1958年直至三年困难时期,还给一些人带了五花八门的政治帽子,如“白旗”、“阶级异己分子”、“蜕化变质分子”、“反社会主义分子”、“新资产阶级分子”、“有资本主义倾向的富裕中农”、还有什么“观潮派”、“算帐派”、“促退派”等等帽子。这些戴帽子的行径都是对1957年戴帽子的发展。

二是讲假话不讲真话的风气。1957年讲真话、提意见的人多被打为右派。这一政治导向后患无穷。从此人们不敢讲真话,不敢对错误路线和政策提出任何疑义。1958年,搞浮夸、大吹牛。在各个领域左倾蛮干,劳民伤财。面对这种歪风邪气,不仅无人抵制,而且还出现了歌功颂德的风气。大家竟吹牛皮,说假话,一级促一级形成全国性的浮夸风。说真话者受害,说假话者升官,这是1957年反右的恶果。

三是残酷斗争的手段。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其手段是非常残酷的,被划成右派的人包括著名学者、教授和科学家都要进行人身侮辱,要不断地唾骂、批斗,罚站罚跪、戴高帽子游斗。最后这些

人有的罚做苦役、有的流放边疆、有的划为“现反”，投入监狱，有的被迫自杀，有的活活整死。而且把这一切迫害人的行为称为“革命”。1957年迫害人的这些手段，在“大跃进”和三年困难时期，被一些人熟练地掌握和运用。

一些地区为了放粮食、钢铁、水利卫星，不惜把老百姓赶到最严酷的环境中创奇迹。在这个过程中，斗争会、各种各样的体罚和各种各样的迫害活动都源源不断地出现。三年困难时期在搜刮农民的陈粮、抓捕逃亡社员中手段更为残忍，捆绑吊打、扣饭，不一而足。又有一批人被迫害致死。

第二步曲：“三面红旗”是人祸的实施阶段。

经过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中国多数人再不敢向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挑战了。只能是上级怎么说，下级怎么干，上面有什么眼色，下面有什么行动，于是一些凭主观愿望制定的政策和措施就在全国畅通无阻地被推行。

大跃进这面红旗出现，把中国的发展速度和发展指标推向了空想的地步。以超英赶美为短期目标，为了在经济发展的总体水平上缩短与英美的距离，竟然把各项经济指标提高到一倍至数倍。为了1070万吨钢铁竟然把9000万劳动力抽到炼钢炉旁，结果没有炼出什么优质钢，反而浪费了大量煤炭，破坏了铁矿资源，伤害了广大劳动人民，真是劳民伤财。为了显示中国有大跃进的速度就不得不发动全民大浮夸，由千斤亩、万斤亩到百万斤亩的产量卫星一时满天纷飞，号称在粮食和棉花产量上1958年秋天超过了美国，在许多指标上把英国远远抛在后面。

人民公社这面红旗一出现，把中国现存的生产关系完全否定了，不顾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和经济落后的现实，提出了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一系列蠢举。在“一大二公”的口号下，把人民公社的组织规模，提高到空前庞大的地步，甚至出现一县一社的生产规模。在县社之间，县县之间，甚至于省际之间都刮共产风、平调风，出现穷

社穷队大浪费、富社富队伤元气,还在全国各地搞供给制和半供给制,大办公共食堂,宣扬吃饭不要钱,甚至提出迅速消除三大差别,消除办法不是提高公民的知识水平,而是把知识分子驱赶到体力劳动岗位上。人民公社由于超越生产力发展水平,所以在生产关系的各个领域带来了破坏性的后果。

总路线这面红旗是一条劳民伤财的路线,在“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口号下,从中央到地方都推行高指标、瞎指挥、盲目上马各种项目,还制造“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胆量和干劲。在鼓干劲,争上游的过程中大搞群众运动,其中有炼钢的群众运动、修水利的群众运动、扫盲的群众运动、消灭四害的群众运动,而且宣称这些运动在几天内都取得了巨大成就,力争上游变成了自欺欺人,鼓足干劲变成了强制性劳动和无效作业。至于多、快、好、省的建设社会主义,其中快和多一般是靠浮夸、吹牛来实现,而好与省实为一纸空文。

可见,推出三面红旗这一步曲对中国当时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都带来了严重破坏。这种破坏在1960年底纠正左倾路线时湖北沔阳县的群众用大字报做了描述,其中有几张大字报如是说:沙湖公社的群众说:“天下雪,地下秧,谷芽落地一扫光,群众反映有困难,右倾帽子实难当。”汉江公社的群众贴:“稀奇稀奇真稀奇,那有小麦种这密,每亩下种一千万,害得群众饿肚皮。”沙湖公社杜窑管理区群众贴:“干部强迫命令大,整好熟田不插秧,一切停止把湖下,误了一年好庄稼。”杨林尾公社中心生产队群众贴:“干部主观主义大,扭转乾坤种庄稼,为了好看连片化,坏田也要种棉花。”

第三步曲:1959的反右倾是人祸的加油站。

1958年的浮夸风到年底已经被发现,在全国范围内开始进行纠正。1958年12月10日通过的八届六中全会决议。一方面高度评价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另一方面对急于过渡到共产主义的行径给予了纠正。指出,共产主义的分配制度虽然更合理,但这只是

在社会产品极大丰富以后才会实现。当然如果否定按劳分配的原则,会妨害人们的劳动积极性。决议更明确地指出:“企图过早地否定按劳分配的原则而代以按需分配的原则,也就是说,企图在条件不成熟的时候勉强进入共产主义,无疑是一个不可能成功的空想。”1959年第一季度又采取调低经济指标的措施,工业总产值由原定1650亿元调为1470亿元,农业总产值由1220亿元调整为738亿元。而且把1958年虚报浮夸的数字进行了核实,原来公布的7500亿斤的粮食产量仅为5000亿斤,6638万担的棉花产量仅为4200万担,这说明要压缩大跃进的空气了。

1959年6月中央在庐山召开会议,本来要纠正左倾错误。会议初期,大家对左倾路线进行了批评。毛主席在7月2日强调了十八个问题。其中有:批评浮夸,恢复农村初级市场等内容。刘少奇批评说去年大跃进吃了前年的库存,预支了今年的库存,一股风批右倾保守,拔白旗,使人老在“帽子”的威胁下,说老实话的人去年不好混。庐山会议开到中间,彭德怀给毛主席递交了一份反左倾路线的信,这封信在充分肯定大跃进成绩的前提下,对于浮夸风、瞎指挥和大炼钢铁的过左行为提出了善意批评。毛主席对彭德怀的信大为恼火,认为是右倾机会主义向党进攻,于是在庐山会议上由反左转到反右,最后把彭德怀等人定为反党集团,会后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反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在反右倾斗争中对三面红旗进一步提出了肯定和保护,对大跃进的成绩也给予了充分赞扬,面对批评大跃进的人进行了无情打击。各部门、各省区都抓出了一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例如第二机械工业部,竟然批判了472人,占干部总数的7.6%。浙江省批判的对象占处级以上干部的4.6%。四川省揭发出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达61人。广东汕头地区有3867个上中农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1959年的反右倾斗争是继续推行大跃进和左倾路线的加油站,1960年我国国民经济已经到崩溃的边缘。而却在上半年提出更大跃进的口号。在基

本建设、农业总产值、粮食生产、工业生产等方面都提出了比较高的增长速度，工业总产值的增长率定为 41.6%，农业总产值的增长要达到 77%，粮食产量增长要达到 74.7%，棉花产量增长 55%。钢铁的产量增长率定为 38%。这样高的指标实为冒进的指标，根本实现不了。

在反右倾的推动下，1959 年和 1960 年又兴起一阵共产风。继续倡导大办公共食堂，收缴农民自留地，还大办城市公社，对农民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进行无偿调拨，严重损伤了农民的积极性。

在这种情况下，中央被迫大刹车，在重灾区开始抢救人命，公共食堂在 1961 年也相继被解散。自留地、家庭副业、集市贸易也相继恢复。到 1962 年全国经济状况有了较大的好转。但好景不长，1962 年底提出不忘记阶级斗争，反修烈火又燃烧起来。1963 年开始搞社教运动，而到 1966 年初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左倾路线更疯狂了，人祸又登台表演了。左倾路线在文革中逞凶了十年，直至 1976 年“四人帮”倒台才寿终正寝。

## 十三、前辙之鉴警示后人

三年大饥荒离我们已经四十余年了。但其中的历史教训不是每个人都清楚的，那个时期的不良作风不是人们都注意警惕的。《荀子》“成相”篇说：“前车已覆，后未知更何觉时？”前面的车翻了，后面的人不知其翻的原因，自然不会觉醒，这是十分可悲的。

五十年代后期的极端主义冒进政策，引发了六十年代的大悲剧，其后果是十分严重的，其教训是十分沉痛的，我们应当吸取前车之鉴，总结历史经验，以防历史悲剧的重演。根据甘肃的情况和全国的一些共性问题，我们应当引出如下的经验教训。

### 1. 勿画空想共产主义蓝图

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其所以能出现，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从中央的领导层到地方的一些领导干部，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社会理想作了曲解，用落后的小农式的幻想代替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或者说冒充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把在全国范围内的蛮干，描绘为是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表现形式。毛泽东本人自参加革命以来，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成份很浓，他早年很崇尚康有为的《大同书》，康有为在《大同书》中发挥了儒家关于“大同世界”的理想，提出了一整套空想社会主义的蓝图。在他所设制的“升平”式的社会方案中，未来的社会是一个无差别的平等的“大公社”，世界没有国界的差异，人类没有种族的差异，社会没有阶级的差异，经济上没有贫富的差异。在他的“公社”里，大家都有活干，大家都有衣穿，不管工农商，均为公共事业服务。在这类“公社”中，人们实行供给制。妇女有孕者，进入

本院，婴儿出生送育婴院，到受教育年龄相继入小学院、中学院、大学院，凡人无家者入扶贫院，人若有病，公费入医疾院，老年人进养老院，人去世后都进老终院。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也提出了中国要走大同世界，他认为康有为的大同思想，应该是肯定的，问题只是康有为“没有找到一条到达大同世界的路”。在1958年八届八中全会上，毛泽东亲自推荐《三国志·张鲁传》等五本书，他对汉末张鲁推行的“五斗米道”中一些做法也很欣赏，其中就有“置义舍”，即住房免费，“义米肉”，即吃饭不要钱等做法都加以肯定。后来在讨论人民公社问题时，他说过这样的话：“空想社会主义的一些理论，我们要实行”。1958年办人民公社时，中央农村工作部的负责人曾把康有为的《大同书》和马克思主义《哥达纲领批判》一同送给徐水县的干部。可见我们的人民公社就是按照空想社会主义的模式设计的。

人们出于对剥削制度的憎恨，就产生“大同社会”的社会理想和社会方案，认为在这样的社会里，所有财产都是公共的，产品的分配都是平等的，人们的劳动是自由的，社会的分工几乎不存在，在这样的社会里，没有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差别。这种社会理想最能吸引劳苦大众，而有正义感的知识分子，也会发生共鸣。马克思虽然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但他在设计未来共产主义理想社会时，空想社会主义的成份还是不乏有之，例如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描绘共产主义社会时，就这样讲：“而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定的活动范围，每个人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随我自己的心愿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以后从事批判，但并不因此就使我成为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sup>①</sup>

---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十卷，第28页。

我们大办人民公社时，许多善于引证马克思早年空想社会主义理论的人，却对马克思关于实现共产主义需要充分的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很少钻研，以为只要有理想就能够实现。这就是所谓“不怕办不到，只怕想不到的”唯心主义哲学。1958年以来，空想社会主义左右了从中央到地方的领导同志，也激发了农民的空想意识。河南范县提出了从1958年到1960年要过渡到共产主义。他们对共产主义作了这样的描写：

人人进入新乐园，吃喝穿用不要钱，  
鸡鸭鱼肉味道鲜，顿顿可吃四个盘。  
天天可以吃水果，各样衣服穿不完，  
人人都说天堂好，天堂不如新乐园。

毛泽东对范县新乐园的报告很欣赏。他这样批示：“此件很有意思，是一首诗，似乎也是可以行的”。

甘肃省对追求这类空想蓝图的步伐是不慢于河南范县的。果然在全省范围内主持干部群众大写共产主义的美好远景，仅诗歌有数万首，其中敦煌群众的一首歌唱人民公社的新诗很有代表性，在这首新诗里人民公社被命名为“桂花园”，诗曰：

迈步走进桂花园，一枝更比一枝鲜，  
人人都说农业社好，谁知公社更非凡。  
上天梯子立得牢，一步更比一步高。  
生产思想齐跃进，共产主义早来到。

在贫困的甘肃，自1958年以来，“共产主义”的阴影一直伴随着人们，一有机会人们就动手搞空想式的共产主义。自1963年底开展“社教”以来，在一些地方又开始搞“队并队”、“社并社”的活动，收缴自留地，取消评工记分，实行“按口分红”，而且在各地培养共产主义的样板。文化大革命期间，甘肃省接过了“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和“提前过渡”的口号，大搞平均主义、大锅饭，在工业、农业领域一度淡化商品意识，实行无偿调

拨，无偿贡献，全省各地普遍出现了“穷社会主义”和“穷共产主义”的典型。我们要牢记这些沉痛教训，要根据国情、省情，建设实实在在的社会主义，再不能用空想共产主义的思想，把人们引向大破坏的邪路。

## 2. “大”字哲学应当收敛

所谓“大”字哲学是指我国左倾路线泛滥时期，一些人在经济建设和社会制度变革上一步登天、急于求成的指导思想和方法论。1958年以来这种“大”字哲学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甘肃省曾因这种“大”字哲学把经济带到崩溃的边缘。

“大”字哲学在甘肃以至全国的建设实践中表现为五方面的含义。

一曰大。1958年从提出“大跃进”的口号以来，什么都认为越大越好。其中有“大炼钢铁”，全国动员9000余万人齐上阵，甘肃动员100万左右的人到山沟沟去炼钢，可谓“大”也。1958年初又开始在所有制上讲大，先是要“小社并大社”，紧接着“大办人民公社”，两个月之内全省都大办了人民公社。而人民公社的性质也非大不可，即“一大二公”。在全国和甘肃都出现过“县联社”，即一县一个社，可谓“大”也。一家一户开灶太小了，于是出现了大办“公共食堂”，将全村人归到一个大锅里吃饭，谓之“共产主义供给制”。1959年饥饿已经威胁了人民的生命，又提出“特大跃进”，甘肃还提出了“无雨大增产，大旱大丰收”，直接用“大”来否定自然规律。此外，甘肃无休止地宣扬“大干快上”，而没有看到“大”字后面对自然界和物质条件的藐视。在经济、政治、文化领域都提出“大打人民战争”，且不知经济工作、文化工作、政治工作与游击战争时期大不一样。

二曰高。“大”字哲学的另一表现为高指标和高速度。指标高到什么程度呢？甘肃1958年的主要经济指标以3倍到10倍以

上的速度增长，粮食亩产由 200 斤提高到 2000 斤，后又出现了 10000 斤以上。甘肃一贯号称“高速度”，速度高到什么程度，高到令人难以相信的程度，例如将手工业的年增长速度规定为 400%。而且对扫盲、办学、普通话普及、卫生事业等都提出了高指标，诸如 100% 的实现这个“化”，那个“化”。

三曰快。认为中国一穷二白，甘肃更穷更白，越穷的变革意识越强，好画最新最美的画，因而认为一切以快为好。中国当时普遍讲“一天等于二十年”，甘肃一些地方提出“一天等于一百年”，可谓快也。不仅经济发展要快，而且社会制度的变革更要快。毛泽东在 1958 年讲赶上英国不需要十年，而是三、四年的事，赶上美国只需七年。甘肃也不甘落后，不少地方提出“两年超英”，“五年超美，三年实现共产主义”。在这个“快”字后面隐藏着奇奇怪怪的弄虚作假。例如，1958 年宣布甘肃的人均占有粮食已达到 2000 斤以上，实际上低于 1957 年的水平，而 1960 年的农业产值只有 1957 年的 67.62%，说三年过渡到共产主义，从 1958 年到 1960 年已经三年，不仅没有看到共产主义社会的影子，而且看到的是民不聊生。

四曰多，“大”字号人物非常喜好“多”。1958 年以后一直提倡“多快好省”，反对“少慢差费”。谁的人数多，产值多，搞的虚假数字多，就冠以“革命左派”，“英模”人物，成为一再提拔的对象，而谁的数字少，或者说实话，就犯了弥天大罪，成为“少慢差费派”、“促退派”、“观潮派”，大祸就要临头。于是乎，在全国、在甘肃，掀起了一个又一个的数字奇迹。“人多是好事”，“热情高、干劲大”，从而出现了高至 30‰，甚至 100‰ 以上的出生率，多年把中国的人口累增到近十亿。产值多是伟大的表现，于是乎全国的产值以近似 10 倍之速度增加，甘肃一些地方上报的产值和产量竟高于全国水平。全国有 9000 万人去炼钢，甘肃出动百万人炼钢。“大”字领导和“大”字“哲学家”把追

求“多”作为政治生命，但客观上要出现“多”是有难度的，于是把“多”完全建立在骗局上，建立在自欺欺人上。如甘肃1958年号称农业产量222亿斤，结果连百亿斤都不到，至于那些亩产万斤的“卫星”，10天变成无盲县，一月抓出了几百名“反革命”分子，一年办了1000多所大学，纯粹是胡编乱造的“天方夜谭”。追求“多”的流毒一直蔓延到改革时期，有些钻营“政绩”的人仍在以“多”为法宝，图谋升官发财。甘肃出现了不少因数字升官的脸谱。“多”与“少”存在着辩证统一的关系，有时候“多”是发展的表现，有时候则成为发展的障碍。例如追求人口多，在一定时期出现了人口压力，破坏了发展。追求产值多，开荒多，一度破坏了生态，只有产值而无效益，不能持续发展。况且主观上的“多”，思维上的“多”同现实的距离很大，一些人在计划、宣传上说的很多，但物质的发展程度不是意志和心愿完全左右的，于是就只好放弃实际统计，而在办公室里编“多”，把弄虚作假推向高潮。人为地追求“多”，到头来不是“多”而是“少”，不是上升而是下降。以甘肃为例，1958年在农业上什么产值产量都定额很多，结果出现了连年下降连年减少的局面。如1960年的产值只有1957年的67.62%，下降了32.38%，粮食减产35.24%，油料减产52.76%，棉花减产18.7%，大牲畜存栏数减少30.49%，生猪存栏数减少65.16%。<sup>①</sup>

看，这就是追求“多”的结果。可见，“大”字哲学中的重要分支“学科”——“多”字哲学害人匪浅，是应引以为戒的。

五曰超。“大”字哲学家和“大”字号领导好讲超高或超越。所谓“超”，在纵的方面要不断超历史水平，超现状；在横的方面要超左邻右舍，在周围的同类中要鹤立鸡群。中国在1958年

---

<sup>①</sup> 《甘肃四十年经济简史》，159页，甘肃人民出版社，1992年出版。

提出“超英赶美”，在全国掀起了“比学赶帮超”，在许多指标上要超解放前几十倍、几百倍。而在一些省份，出现了赶超的奇迹。甘肃在1958年奉行的是“登天”战略和“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胆子战略”，于是在放“卫星”上不断要比左邻右舍超前，在全国第一颗亩产5000余斤的卫星放出后，在甘肃各地随之出现6000斤、1万斤，5万斤，30万斤的超卫星“奇迹”。1958年有些省份宣传说，他们在四十天内实现了全民普通话。甘肃省很快超过了这个水平，宣布10天全省人人都讲普通话了，陇上的各类方言已“被扔进历史的垃圾堆”了，可悲的是在21世纪已经到来的时候，陇上的方言仍遍地皆是，不要说推广普通话已达标，就是各县区的内部，一乡一村都有自己的方言，领导去听汇报，还要有方言翻译。可见，当时的“超字战术”，说穿了是“超字骗术”，“超字权术”。经济的现实并未超，历史还在照旧进行。而超字哲学带来的另一种明显的后果，就是经济社会的后退和历史的后退。1958年以来的“超字战术”造成全国经济大衰退，人口大死亡，社会贫穷的大扩展，这才是“超越战术”的真实后果。说到此，目前一些地方领导和学者善于为一个地方制定“超越战略”，或“跳跃战略”，或“超前战略”，或“跨越战略”。越穷的地方这类战略越多，越“理直气壮”。理由是“不跨越，不超越，先进的地区在发展，我们永远落后”，这是立论者的根本论据。但经济的发展，社会的发展遵循的是马克思所称的“自然历史规律”，在其条件不俱备时，人们“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一个法令来废除自然的发展阶段”。<sup>①</sup>

在经济发展的现实中，确实有些地方出现突飞猛进的发展势头，如改革以来的深圳和目前的上海，确实有超常发展水平。但这些地方的高速发展绝不是领导者的“超越战略”带来的，而是

---

<sup>①</sup>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初版序言》，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

因国家整体上政策倾斜，大开放格局形成的，是国内外巨额投资以及科学技术力量的聚集等因素造成的。一味制定和追求所谓“超常规战略”、“超越战略”的有不少省、市、县至今举步维艰，历史没有按领导者和学者的意志而超越，而却在伴随着物质条件顺势发展。主观上不超越，客观上已形成更多的条件，可能会出现意想不到的发展水平，而且还是持续的发展。

从1958年以来的沉痛教训中，引出的另一个借鉴是要革除“大”字哲学，坚持“实字”哲学。一味的讲“大”字必然带来大话、空话，带来大破坏，甚至大灾难。领导者且不能置人民安危而不顾，用“大”字化妆自己。

### 3. 生产关系万能论必须休矣

物质资料的生产和发展决定社会制度的变迁及社会形态的性质，这在马克思前和马克思同时代的人中已有共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确立了这样几个科学概念，即：生产力，指人同生产资料结合起来推动社会发展的物质力量和物质因素；生产关系，指物质资料的生产过程中人与人之间形成的经济关系；上层建筑，指经济关系基础上形成的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和意识形态。马克思还揭示了三者之间的关系，指出生产力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决定因素，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和要求决定生产关系的变革程度，而生产发展和生产关系的变革会引起全部上层建筑的变革。为了交待这一唯物主义的常识，我不厌其烦地转述了上述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而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大灾难的教训之一，就是我们的国家从上到下违背了这一常识，把生产关系的变革放在决定地位，而贬斥生产力在社会发展中的决定作用和对生产关系的制约作用。

“生产关系唯一论”从1956年就开始了。毛泽东针对刘少奇、周恩来的所谓“右倾”，批判了先机械化后合作化的观点，提出了一个相反的理论，就是先合作化后机械化，认为先有合作

化，才能大规模地使用大机器。而社会主义总路线的目标“就是逐步改变生产关系”，“生产关系的基础就是所有制”。<sup>①</sup>

于是1956年在全国范围内实现了合作化，在初级社还未站稳脚跟的情况下，又快速建立了高级社，就是所谓全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所有土地和重要生产资料都归集体所有，生产资料再不分红，全部分配制度采取评工记分的办法。1957年毛泽东大讲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和决定作用，认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具有无比的优越性，能够允许生产力以与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尽管挫伤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特别是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全国出现了“雅雀无声”的局面，毛泽东却认为思想政治战线上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胜利，进一步变革生产关系已再无阻力。1958年建立人民公社就是要通过变革所有制的形式，“提前过渡到共产主义”，而这一年，把生产关系的变革，所有制的变革放在决定地位，力图通过快速变革所有制，早日实现共产主义。1958年以来毛泽东关于“社以大好”的指导思想，开始是小社并大社，后来在全国兴办人民公社，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全国出现了23384个人民公社，占全国总农户的90.4%，到年底全国基本上实现了人民公社化，人民公社是超越生产力发展进行所有制变革的典型。在公社里，土地、耕田、农具与其它公共财产，全部属于人民公社所有，后来农民的自留地及林木、牲畜等财产，转为公社所有，谓之“消灭了私有制的残余”。公社实行政社合一，工农商学兵五位一体，在公社的集体所有制经济中不断增加全民所有的成份，在劳动的组织方式和生活方式方面，实行所谓的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和生活集体化，公社普遍开办公共食堂，集体吃饭，还推行各种形式的供给制，在人民公社建立后，力图“跑步进入共产主义”。

---

<sup>①</sup>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123页，1977年人民出版社出版。

这种超越生产力水平，超越历史发展阶段的所有制形式，大大地挫伤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给生产力带来了巨大的破坏。1960年前后的大灾难，同这种快速变革生产关系息息相关。但这一沉痛教训，并没有被接受，到了1963年又开始批判“三自一包”、“四大自由”，又认为越大越好。到文革期间，又提出“消灭资产阶级法权”和穷过渡的口号，同时无休止地批判唯生产力论，这说明“生产关系唯一论”成为“左”倾路线推行者的顽症。这些血的历史教训，要求我们必须把生产关系的变革建立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邓小平同志“三个有利于”的理论是我们变革生产关系的正确理论，应当长期坚持。

#### 4. 防止阶级斗争斗垮经济

阶级矛盾的是社会矛盾的一种类型，但不是社会矛盾的全部内容，阶级斗争是在阶级社会中存在的一种斗争方式，而阶级社会的各种斗争并不都是阶级斗争。我国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大灾难，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抹杀社会矛盾的多样性，把社会矛盾简单化，把阶级斗争普遍化。甘肃省在这方面的表现尤为突出，把生产力的落后状态，把人民群众的谋生要求，把干部作风败坏引发的矛盾都归于阶级斗争。1957年部分农村发生口粮问题，甘肃省委书记张仲良等人认为，“粮食问题是阶级斗争问题”，是地富反坏分子在捣乱，于是在农村开展了大批大斗，结果掩饰了农村缺粮的现实。1958年在大跃进运动中，几乎天天在搞阶级斗争，把那些钢产量上不去的地方和单位，都认为是阶级敌人在捣乱，就大批大斗，用挂“白旗”插“红旗”来促进钢铁的高指标。1959年和1960年在甘肃出现了大批人口死亡和人相食的现象，当时的甘肃省委否认人相食是饥饿所致，认为是反坏分子在破坏，竟提出了在甘肃存在土改不彻底、反右不彻底、肃反不彻底的估计，在全省城乡开展了增划右派、反革命和地主富农的运动，把相当一部分饥民和诚实的干部划成阶级敌人。从后来甄别

平反的情况看，这期间所说的阶级斗争和阶级敌人全是虚幻的、捏造的。但是人为的制造阶级斗争新动向的恶习在甘肃并没有因为1960年的大灾难而终止，相反在“四清”运动和文革中，阶级斗争的“烈火”烧得更旺，这个时期的阶级敌人除了剩下的“地富反坏右”外，大部分则是贫下中农、广大干部、教师 and 各类知识分子。从甘肃情况看，批斗不仅没有促进大发展，而且形成了巨大的破坏。我们必须反思，昔日的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在许多方面背离了马克思主义，背离了真理。我们一度只承认在阶级社会，只有阶级性，而无人性，不断批判所谓“人性论”，结果把人们的“和平”、“勤劳”、“善良”、“忠实”、“友爱”等优良品格全部批完了，树立起来“猜疑”、“仇恨”、“陷害”、“谋杀”、“六亲不认”这些光怪陆离的东西。一度把生产问题、经济问题、困难问题、对外关系都说成是阶级斗争，从而把社会主义描绘成四处受敌、四面楚歌的局面，甚至还给进口机器和旧社会的土地这些属于生产要素的东西也戴上阶级的帽子，也要批判，而把农民养鸡、养羊、养猪说成是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进攻，于是出现了把猪羊鸡鸭杀光的穷社会主义的现象。今天回顾起来，我们的国家，特别是甘肃省多年来的贫穷落后和愚昧状态难以扭转，所谓阶级斗争在这里起了兴妖作怪的作用。

#### 5. 要分清经济规律和战争规律的差异

1958年以来，我国经济遭到的严重破坏，一个重要的教训是：无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而把某些军事规律和战争形式搬到经济过程中来。我们在1958年以后，经常听到对任何工作“要打一场人民战争”，“要发动群众打歼灭战”，“打一场大炼钢铁的人民战争”，“打一场消灭‘四害’的人民战争”，“打一场兴修水利的人民战争”，“打一场抗旱减灾的人民战争”，“打一场平田整地的人民战争”，等等。在把经济和战争等量齐观之后，往往不顾客观实际，用行政命令的方式，役使成千上万的群众从事

某些活动，以为人越多，建设会搞得越好，工程会完成得越快。在人海战术中，基本上否定科学技术的作用，藐视科学技术的力量，倡导人有两只手，“人多拾柴火焰高”，大批“白专”道路，强调“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不断地鄙视世界先进的科学技术，批判“洋奴哲学”，提倡各种土法作业。在经济战线和生产战线推行人民战争的方式后，把自然规律和生态规律置之脑后，把人的意志看成了顶天立地的决定因素。有一首所谓民歌就充分表达了1958年大打人民战争的狂热情绪。民歌曰：

天上没有玉皇，地上没有龙王，

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

喝令三山五岭开道，我来了！

在把经济当成战争去打的过程中，生态遭到了严重破坏，小麦种在山顶上，水稻种在湖中心，“五小”工业并起，围湖造田掀高潮，毁林挖山学愚公。这种愚蠢行为，弄得山河悲鸣，苍天叫苦。

我们一定要汲取1958年以来用“人民战争”方式开展生产的教训。在冷兵器时代可能是谁的人数最多，在战争中取胜的希望最大，但也不尽然，智谋在战争胜败中的因素也很大，以少胜多的战争实例是举不胜举。而现代战争是用更先进的武器作对抗，人的数量在战争中的作用那就非常之小了。既然如此，如果把打仗的方式搬到经济工作中，那更是荒谬绝伦了。当然，1958年前后，以战争对待经济工作是有其特殊原因的，因为我们党是通过游击战争和人民战争取得民主革命胜利的，这就形成了一个错觉，好象用人民战争的方式也可以实现现代化。这一沉痛的教训我们必须永远牢记，在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中，一定要遵循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要重视科学技术和人才的作用，要坚持可持续发展的战略。

## 6. 防止政治路线背离认识路线的陷阱

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社会主义胜利的目标，党和国家的政治路线是极为重要的，尤其在共产党一党执政的情况下，党的政治路线指导和影响着全国人民的一切行动。但是正确的政治路线，必须建立在科学的认识路线的基础上，对中国共产党来说，就是政治路线必须建立在实事求是的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础上，要不然，政治路线就会成为少数权力人物的政治愿望和政治游戏。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大灾难，是同 1956 年开始的党的某些政治路线背离唯物主义认识论有必然联系的。1956 年在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中国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消除贫困，发展经济。刘少奇等人坚持从中国当时的实际出发，提出我国的主要矛盾是解决先进的社会制度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而毛泽东等人则提出中国的主要矛盾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随着把三大改造作为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主要内容，三大改造也被认为是一场所有制领域的阶级斗争。改造得越彻底、斗争得越激烈，社会主义就来得越早。1957 年把中国的主要矛盾，看成是思想政治战线上的阶级斗争，制定了反右派斗争的政治路线，知识分子遭受了一场大劫难。1958 年“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也是当时的政治路线，它完全否定中国经济发展的水平和历史的、自然的、文化的客观条件，是在唯心主义指导下制定的政治路线，在贯彻这一路线的过程中对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进行了大扫荡。甘肃首先提出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张仲良创造的“要革自然的命，必先革思想的命”、“无雨大增产，大旱大增收”，就是这种唯心主义认识论的写照。

错误的政治路线，在推行过程中会遇到巨大阻力，而权力人物为了实现某种政治愿望，必然采取高压强制手段推行这种路线，这样以来就出现否定事实，编造谎言，提倡大话、重用奸佞

人物的行径。而相反对那些说实话，办实事的人予以打击，给那些脚踏实地，办实事的行为予以指责，从而使错误的政治路线向恶性方面发展。由此可见，我们在制定政治路线和执行政治路线过程中，都要坚持科学的认识路线，遇到政治路线背离客观实际，离开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背离人民意愿时，就要用事实，用真理加以校正，切忌强行推行四处碰壁的政治路线。

### 7. 要有一个健康的吏制系统

1958年以来的大吹牛和1960年前后的大灾难，其基本原因是人祸而非天灾。真乃“祸出萧墙”。而人祸主要是我们干部和领导层的恶劣作风所造成的。为什么错误如此之严重，灾难的面积如此之大而难纠正呢？这不得不看我们的官吏面目。

集体化和公社化时期，选择干部的主要标准是出身好、阶级立场坚定。而当时对干部的政治立场放在第一标准，所谓立场就是坚定地毫无疑问的执行上级的指令。真是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都要执行。因此，许多地方在贯彻执行政策上出现了教条主义、命令主义，甚至出现对群众的残酷迫害，什么“为人民服务”，只是宣传而已。不少干部对群众搞“阶级斗争”恐怖，一不小心，就把某些群众划到“阶级敌人”、“敌我矛盾”一边。

当时，把说假话，掩盖矛盾，制造阶级斗争的恐怖作为干部政治觉悟高的表现。应当说要做一个好的领导干部首先要做人，要有高尚的人格，完善的人性。而当时我们的有些领导干部被政治口号腐蚀得“人性异化”。例如，甘肃省委的主要负责人看到各地上报饿死人的现象就反感，否认饿死人的事实，要求下面在“正常死亡与非正常死亡”上划界，以抹杀饥饿而亡的事实。尤其当公安部门报来11起吃人肉的案件时，竟说这是坏分子在搞破坏。地、市、县也有不少领导在死人问题面前无动于衷，大谈“大好形势”，困难只是一个小指头。只有到了丢乌纱帽时，才不得不露出点人性来。如张仲良在1960年被迫作检查时才表示了

痛心。他说：“去今两年给了很大的破坏。农民遭到很大损失，伤了元气，大量死人，妻离子散，绝了后代”。“现在确实很痛心”。有一些地方的干部，在粮食奇缺的情况下，竟贪污私分公粮，关掉了食堂，让群众活活饿死，还有一些干部，面对群众的饥饿，他在花天酒地、挥金如土。后来开展“四清”运动，追查所谓“四不清”干部时，在全国竟有几百万多吃多占的干部，在甘肃竟有数万名在人民灾难中“懒”、“馋”、“占”、“贪”、“变”的干部。

毛泽东曾发现过干部的作风和品德问题，特别是随风倒和搞浮夸的问题，为此他曾提倡我们的干部要学习海瑞、敢于骂皇帝。而这不过是口号而已，后来学海瑞的干部一个一个被打倒，而讲大话、假话的干部则更吃香了。由此可见，建立健全我们的干部制度和选吏制度是十分重要的，要形成一个良好的干部能上能下的晋升机制，要有选贤任能的一整套干部标准和制度，要使我们的干部在做人做事上都体现出人民公仆的品格。

## 十四、三年大饥荒引出的理论反思

1958年之所以能出现大跃进，总路线和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由此引出1959年—1961年的三年大饥荒，这不仅有历史的原因，而且有深刻的理论根源。从理论上讲，从1956年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造完成后，就产生了一条为期很长，为害甚烈的左倾路线，而这条路线的理论基础，是对马克思经济理论的改装和扭曲。从1958年开始直到1976年“文革”结束，不断开展对所谓“资产阶级法权”的讨论和批判，同时吹捧共产主义供给制、倡导人手论、主张向共产主义提前过渡。当时把商品经济、商品交换都看成了产生资本主义和新资产阶级分子的经济土壤。近二十年以消灭剩余价值的剥削为主线，开展了一系列有巨大破坏性的政治运动。今天，在我们研究二十世纪60年代大饥荒的沉痛历史教训时，有必要进一步澄清重大理论问题，把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曲解进一步加以矫正。只有这样，才能在邓小平理论指引下，夺取现代化建设的新胜利，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

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无产阶级政党。建国后，在制定经济政策和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过程中，始终以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为指导。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自然被确定为中国生产关系变革的基本理论，也就是认为社会财富及其价值都是劳动者创造的，这就必须恢复劳动者的主人地位，使劳动者有掌握生产资料，积极参与各种劳动的权力和义务。与此同时，在中国不允许有剥削剩余产品和剩余价值的现象存在；把消灭剩余价值的剥削作为经济政策的基本点。固然，经过生产资料的公

有化和对剥削阶级的斗争，形成了新的生产关系，一个时期内生产力得到解放。但是，对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也进行过教条式的应用和对某些原理的扭曲，形成一套“左”的经济政策，对劳动者的经济利益和国家经济的发展都带来了严重危害。

### 一、中国消灭剥削制度的方针与进程

建国后，围绕消灭剩余产品和剩余价值的剥削制度，开展了一系列政治运动。

第一步在农村消灭地主和富农的剥削。对农村剥削制度的不消灭，主要采取了土地改革的方式，农村土改的阶级路线基本上是按照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的观点：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限制富农，消灭地主。把占有比较多的地产，并雇佣劳动力达到一定“剥削量”的划为地主，其财产全部没收，分给贫农和雇农。当时对地主的剥夺办法也采取强制性的暴力手段，这一步大体上在1953年底全部完成了。

第二步用社会主义改造方式消灭城市工商业领域的剥削。这种改造主要采取公私合营的办法把私人的工业和商业企业合并到国营的工商部门，并给私人参股的生产资料和资本给予一定的“定息”。他们按照国营职工一样，按月发工资，1957年以后，认为“定息”是剥削，于是就取消了“定息”。公私合营后的很多企业后来又变成了国营企业，当时以为这样做表明社会主义制度彻底战胜了剥削制度。

第三步开展大规模的农业集体化运动。土改之后，获得了土地的农民有了生产积极性。生活水平也有了初步改善，但因为土地和生产工具仍然属于农民私有，于是就出现了富裕程度不同的差别。按照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农村的土地私有制不消灭，仍会出现剩余产品和剩余价值的剥削，于是就在农村开展了大规模的农业合作化运动。1956年春天全国成立了108万个农业生产合作社，1.6亿农户入了社，占总农户的90%。与此同时，在

城市也开展了改造个体经济的运动，使小手工业者、小商贩及其他个体经营者都加入了城市集体经济组织。在农业生产合作社中，初级社阶段除了按工日参加分配外，生产资料也有部分分红；到了高级社阶段，取消了生产资料的分红制，纯粹按出工时间分红，这在理论上承认了只有现实的活劳动才能创造价值，因而，只有这类劳动才能分红，而生产资料是死劳动，不创造价值，故不能分红。

第四步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尝试。在实现了农业集体化和工商业的集体化后，认为中国有必要提前进入共产主义，由集体经济转向全民经济，由按劳分配转向按需分配。于是，1958年在农村大办人民公社，把合作社所有制变成公社所有制。公社的特点是“一大二公”，有的一个县就是一个人民公社，公社变成一个核算单位，在公社又大办公共食堂，实行生产军事化、生活集体化。在大办人民公社时，全国吹起了“共产风”，穷队共富队的产，穷社共富社的产。社员实行不计报酬的劳动，对劳动力进行指令性的调配，把全国9000多万劳动力调到“大炼钢铁”的战场，在城市职工和干部中宣传供给制，当时的口号是“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这使中国的共产主义制度尝试彻底失败了，按需分配的方式也彻底破产了，给中国经济带来巨大破坏，也给中国人民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第五步以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形式向共产主义提前过渡。通过上述四个步骤开展的对剥削制度的斗争，并未取得预想的效果。当时认为社会上仍存在私有制的残余，这就是为数很少的个体经济和农村的自留地、家庭副业。另外，还认为社会还存在商品经济的残余，新的剥削分子会在其中产生。针对这些问题，在三年困难时期和文化大革命中，在经济领域开展了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活动。“资产阶级法权”也称“资产阶级权力”，这是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提出的概念，主要指在按劳分配中

存在着等价交换的原则，因为人们的劳动贡献不同，得到的收入也有差别。所以，按劳分配体现了等价交换的原则，存在着实质上的不平等，因此，仍然是“资产阶级法权”。而我国限制的“资产阶级法权”是什么呢？毛泽东主席 1975 年讲的一段话大体上概括了当时要消灭的“资产阶级法权”是什么，毛主席这样讲：“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度变更了。”“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等等。”毛主席这里说的“资产阶级法权”显然有两个方面的基本内容，一个是商品经济，认为商品交换本身由于价值规律的作用会出现竞争和两极分化，通过商品交换得到更多的收入的人就会变成资产阶级，因此它是“资产阶级法权”，要加以限制。另一个方面主要指按劳分配，认为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使多劳者变成富裕阶层，少劳者变成贫困阶层，从而出现剥削与被剥削的对抗关系。在毛主席的另一些言论中，“资产阶级法权”还表现为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错误地认为脑力劳动者是脱离实际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范畴的人，它不直接创造社会财富，而享用工人、农民创造的社会财富。因此，限制“资产阶级法权”，要把改造知识分子作为一个主要任务。

在限制“资产阶级法权”这一方针的指引下，在我国的经济政策中出现了许多蠢事。当时在农村全面收缴自留地，禁止家庭副业。在城市取缔自由市场，限制个体工商户的经营活动。在农村，否定按劳分配，推行平均主义的分配形式。有些地方取消凭工记分，按人口实行分配，有的地方“干大概活，记大概分”，一般是“男八分女七分，老人娃娃五六分”。在全国城乡，提升所有制档次，把许多集体所有制企业变成全民所有制，全部生活资料实行调拨制，一部分生活资料在全国范围也实行无偿调拨。

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结果，实质上是限制了经济的发展和劳动者积极性的发挥。

## 二、极左的理论与悖理的实践

为了快速过渡到共产主义，毛泽东主席总是用左的立场来解释马克思主义关于劳动、劳动人民、商品生产、剩余价值、剥削、按劳分配等概念。而党内的一些左倾机会主义分子更把毛泽东对这些概念的解释推向了极端，制造出了诸多荒诞不稽的理论，并把它们付诸实践。

一是人手财富论。认为人是世界上最宝贵的财富。人多是好事。其理论根据是人有两只手，都能够创造财富，这是把落后的小农观点，搬用到解释社会主义的人口问题上来。小农的观点是一只羊有一把草，这里却变成了一个人有两只手。这一理论完全否认了这样的现实：创造社会财富的不是所有的人群，而只是具有一定体力和智力的部分劳动者。老人、儿童和病残人口，一般失去创造财富的能力。即使是创造财富的劳动者，他也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不能把他看成是只积累财富而不消费财富。由于坚持荒谬的人手论，把中国人口的增长速度推向了世界最前列。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有4.5亿人口。解放后在鼓励生育的政策下，1958年人口已达6.6亿。1982年，人口达到10.2亿。与此同时，人均占地面积越来越少，“人地矛盾”十分突出。1958年人均占有耕地3.45亩，1982年减至2.14亩，减少了61%。目前，城郊农民占地有的不足0.5亩。这就是鼓吹“人手论”造成的严重恶果。

二是生产力两因素论。生产力是由复杂的要素组成的。马克思早就指出：生产力不仅有生产对象、生产手段和劳动力，而且还有科学及其在工艺上的应用。斯大林把马克思的多要素生产力观简化为三要素生产力观，这就是：生产工具、生产对象和劳动者。而我们国家一度提出生产力的基本要素有二，一是劳动者，

一是生产工具。在这种生产力二因素的理论指导下，就不顾经济发展的自然条件、社会条件、科学技术条件，以及经济的组织结构。而把人力和工具抬到决定一切的地位，以为只要实现了生产资料公有制，劳动者拿着简单的生产工具就可以创造人间奇迹。在这一理论指导下曾经出现了 1958 年的亿万群众用土法大炼钢铁的运动。也出现了 8 亿农民用镢头、铁锹学大寨的运动。在中国曾广泛地批判唯条件论，倡导白手起家。这就是生产力二因素论的具体行为。在生产力二因素论的指导下，讲劳动者的因素只讲人的数量不讲人的质量和水平，所以无论在工业战线，还是农业战线都大搞群众运动，千军万马去干一件事，造成了人力、财力、物力的巨大浪费。只讲生产工具的作用，而又不强调生产工具的先进与否，从而把传统的、古老的生产手段加以神化。20 多年来，虽然也制造了拖拉机、机床、吊车、汽车等机械化的工具，但手工操作仍占统治地位。农村的牛拉犁、脚踏地和工业领域手工工具占有生产设备和手段的 50% 以上。

三是体力劳动创造价值的唯一论。在创造价值和财富问题上一贯强调，只有体力劳动和直接生产才创造价值，而排除其他劳动和生产各要素在创造价值当中的作用，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把体力劳动以外的工作都看作是脱离实际。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消灭所谓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就采取了一些消除社会必要分工的办法。其中有：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使一千多万城市大中专毕业生下放到农村，从事农业劳动；下放劳动的各级干部中，大约有三百余万干部到农村去接受“再教育”；为了充分体现只有体力劳动才能创造财富，甚至只有农业劳动才能创造财富的思想，提出了全民学工学农的运动，城市的大中小学和行政事业单位都在农村开办农场，有些工厂也办起了农场；原来以为把人力投向了农业生产，既可以消除城乡差别，又可以创造社会财富。但结果，对劳动力的滥用既破坏了分工所产生的高效率，又浪费

了巨大的劳力和社会财富。尽管全民都在从事农业劳动，但农产品的紧张局面并没有得到解决，生活日用品的短缺不断加剧，只好采取发放票证的方法进行生活必需品的配给。

四是知识反动论。由于把劳动看成体力劳动，因而导引出一个结论，知识分子是脱离实际的，是依附于资产阶级的。因而知识分子也是属于“资产阶级”范畴的。解放初期曾承认知识分子从事的脑力劳动是有作用的。所以对知识分子在待遇上有所照顾，例如对教授规定了较高的薪金，对作家、科学家的学术论文规定了较高的稿酬。而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反修、防修开始，把知识分子看成了脱离生产劳动的阶层，甚至指控为精神贵族。当时采取了许多改造知识分子的运动，使他们下乡、下厂从事体力劳动。在“四清”运动中，又有数百万知识分子在农村搞阶级斗争，为了缩小打击面，提出了“劳动知识分子”和“非劳动知识分子”的概念。但在文化大革命中甚至又把知识分子都看成资产阶级，当时的论断是“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高贵者”多指大知识分子，在这场运动中通过打击反动学术权威，使一批杰出的知识分子遭受了空前的浩劫，否定知识分子的作用，后来发展到铲除知识分子的地步。宣扬文盲主义，“四人帮”一伙提出了荒谬绝伦的观点就是“知识越多越反动”。在全国形成了推崇“白卷英雄”。在我国一度出现否定知识、技术和知识分子的荒谬观点，对我国生产率带来了破坏性的后果。

五是意识形态的革命论。在生产资料的所有制改革完成以后，中国事实上既不存在剩余价值的剥削，也不存在剩余产品的剥削。但“左”倾理论的制造者却否定这种现实，认为剥削问题在中国并没有解决。而此时的剥削已经不体现在现实的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而主要体现在剥削阶级思想的存在，意识的存在。被打倒的剥削阶级，人还在心不死。而劳动阶层中的一部分人在旧思想的腐蚀下，也会产生剥削的思想，向往剩余价值的剥削阶

级社会。于是就把消灭剩余价值的生产关系转到消灭剩余价值的思想意识方面。既然如此，也就自然地必然地掀起了一次又一次的思想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从对《武训传》和《海瑞罢官》的批判到开展文化大革命，都力图在思想领域扫除剥削阶段的思想意识。而且认为“革思想的命”同革地主、资本家和国民党的命具有同等地位。1968年4月10日，《人民日报》对思想领域的革命做了这样的评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这种在思想领域企图消灭剩余价值剥削的思想，不仅没有起到丰富中国人民的精神文化，提高中国人民精神文明水平的作用，而且形成了对历史文化传统的扫荡，对人们思想创新的禁锢，对人们不同观点的压制。这一举动还带来了另一可悲的后果，就是在中国出现了单一色彩的“左”倾文化。这一文化的特征是以阶级斗争为主线，充满着对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否定。后来竟发展到以“八个样板戏”为中国无产阶级文化的唯一存在。

六是商品孵化资产阶级论。在我国，长期混淆简单商品生产的界限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界限。马克思讲得很明确：简单商品生产在流通过程中不存在剥削现象。实际上是一部分劳动者以货币为中介，与另外一些劳动者的产品进行等价交换，其中不产生剩余价值。马克思用这样的公式表达  $W - G - W$ ，这里的  $W$  代表一方劳动者的产品同另一方劳动者的产品进行交换， $G$  是指起中介作用的货币。而只有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才存在剩余价值的剥削。当然简单商品生产在具备了条件之后也会转变为资本主义的生产，而这需要一个复杂的历史发展过程。列宁曾把个别小商品生产者致富的特例加以夸大，认为小生产者也会每日每时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这一本来带有片面性的观点，在我国被

加以神化和通用化。凡是认为只要有商品生产、交换存在的地方，就会交换出贫富差别，就会交换出新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在这种价值论的指导下，我国曾在 20 多年的时间内，进行了一系列限制商品生产和消灭商品生产的运动。1958 年的大锅饭和共产风对商品生产进行了一次大扫荡。文化大革命期间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活动，连自留地、小商小贩都在被扫荡之列。结果商品经济几乎被完全消灭，而与此同时，国家的贫困人口也在日益增多。到 1978 年三中全会以前，有 2.5 亿人口处在绝对贫困状态。

由此可见，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不仅被教条化，而且又增添了许多违反客观经济规律的内容。这些被扭曲的理论又在中国被强制性地推行。最终造成了劳动生产率下降，社会物质财富不足，人民生活水平改善缓慢的后果。

## 十五、历史断笔实可哀

我们会经常看到“历史之谜”的议论。所谓“历史之谜”，实际上是指某些历史事件和历史公案没有真实的记载或者还是一个空白，人们只能凭推理或某些片断发现进行揣猜，事件还是一个谜团。有关世界历史事件和中国历史事件的谜团或断笔现象屡见不鲜。

为什么会出现“历史之谜”或“历史的断笔”呢？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有历史资料的亡佚，散失，历史事件久远又无实物考证资料和文字资料记载，还有不少是历朝历代当事人为了隐恶扬善制造出诸多伪证，使后人难辨真假，历史事件的真相终成悬案。

文天祥在《正气歌》中有“齐有太史简”一句，赞扬春秋时期齐国史官维护历史真实而不顾杀身的英雄事迹。齐国大夫崔杼杀了国君自立为君主，史官真实地记录“崔杼弑其君”。崔杼怒而杀了太史官，由太史官的两个弟弟相继任此职，没想到史官的两个弟弟都继续记载“崔杼弑其君”，结果都被杀。可见崔杼为隐讳历史真实手段何其之毒，史官为维护历史真实行为何其之勇。

中国历史上的封建统治者，莫不对历史要制造些悬案，以利于自己留芳万世或在阴间尽享荣华。秦始皇死后，为了防止地宫珍藏被人挖盗，竟将安放珍藏的工匠全部活埋。《史记》，《始皇本记》载：“葬既已下，或言工匠为机，藏皆知之，藏重即泄。大事毕，已藏，闭中羡，下外羡门，尽闭工匠藏者，无复出者。

树草木以为象山”。就这样，竟把搬运葬器的工匠封闭在墓道中。这里的“羨”指墓道。没有一个工匠能够出来的。而且在坟墓的封土堆上种植草木，给人造成这是一座山，而不是坟地的印象。

元朝的皇帝其秘葬达到了极端化的程度。葬后不仅老百姓不知其葬地，连他的皇位继承人及其子孙也要在若干年忘记其先祖的葬地。葬俗大若如下：将死去的皇帝埋在一山谷之中，不堆坟丘，不设标志，只在埋葬时杀死一只小骆驼，让母骆驼在此悲鸣。葬后用万马践踏墓地，并种上草木，使人看不出这里有埋葬人的任何痕迹，以后皇室成员祭奠时，让被杀死的小骆驼的母亲带路，母骆驼辨别能力很强，一旦走到小骆驼被杀的地方就哀鸣不已，祭祀队伍就在此地举行仪式。元朝的任何文献和史书都不允许记载帝王陵的位置，也不让给帝王陵命称号，把所有陵只称为“鞞谷”。元代帝王墓葬的绝密制度真起了历史断笔的作用。至今人们不知道成吉思汗葬于何地。内蒙东胜的成吉思汗陵实际上是一个象征陵，陵里置放的是成吉思汗的衣冠、马鞍、奶桶等。成吉思汗的遗体与东胜陵无关，这就给后人留下了一个大的悬案；成吉思汗到底葬于何处？2000年中国考古学家在新疆青河县发现了一座人工改造的大山，推测可能是成吉思汗的陵墓。同年美国考古学家克拉维兹声称他带领的考古队已在蒙古乌兰巴托附近一个叫“穆里”的地方发现了规格很高的墓葬群，可能有一座埋葬着成吉思汗。

中国历史上的文献伪造案和断笔案也是不胜其数。中国封建社会历史文献只有与皇权无冲突时才允许存在，不然的话就要削减、增补和重写。司马迁的《史记》也有这样的遭遇。汉代史学家班固看到的《史记》“十篇缺，有录无书”，这缺失的内容有可能是不合皇帝的口味被清理。《汉书旧议注》中说，汉武帝看了《史记》里的景帝纪和对汉武帝自己的记述，觉得写得不合自己的口胃，便“怒而削去之”。在汉元帝和汉成帝时期，推出了一

位叫褚少孙的来补写《史记》，补的怎么样呢？一些人评价为“言辞鄙陋”，“狗尾续貂”。就是遭到删削和补写的《史记》也成为绝密文献，任何人难以阅读，只有皇家图书馆的几个人才能看到。有一次汉宣帝的儿子刘宇要看《史记》，大将军认为《史记》有战国纵横权谋之谋，汉兴之初谋臣奇策”以不宜诸侯王看为由，坚持太子不能看。中国历史上的巨大典籍《永乐大典》的失传，可能也与明成祖及其继承人的阴谋策划有关。《永乐大典》是明成祖朱棣命令太子少师姚广孝和翰林学士解缙主持，3000人参加修纂，永乐六年（1408年）修成的。它有目录60卷，正文22877卷，11095册，是内容丰富的百科全书，辑存了许多古代的秘典佚文。由于篇幅浩繁，从未刻过，只在明嘉靖年间重录过一副本。解放前副本已散失殆尽，目前分散在世界各地的副本约三百多册八百多卷，不到原来的40%。而《永乐大典》的正本自明成祖下葬后就渺无音信，至今仍是一个谜团。有史学家推论，正本可能秘藏在明成祖的地宫中。

以上历史事件的断笔说明中国历史上一些帝王总有隐瞒历史真实的劣根性。这种隐瞒行为给后人总结历史经验，研究历史发展的规律和趋势造成了莫大的困惑。

1949年，人民政权建立后，实行人民民主制度，人民有了知情权，旧社会对人民隐瞒的事件和资料重见天日。千年之久人们不敢涉足的帝王宫殿也向百姓开放，人民一时确感有当家做主的味道。

但是，自从政策和路线左转之后，绝密保密的事件和资料越来越多，对老百姓设置的禁区、禁令也不断加码。许多外国人已公布的资料和信息，对国内人还一再保密。三年大饥荒时期左倾政策造成的灾难比较深重，所以保密性也就更强。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发生饥饿、死亡和逃难之际，各地党委和政府都禁止谈饿、谈死、谈流亡。即使出现这类事件也要寻找其

他原因予以解释，如说死人是疾病流行造成，或是地、富、反、坏、右煽起的谣言，总不让人正视现实。1958年，对大炼钢铁和水利工程的伤亡，中央要求采取慰问、哀悼、抚恤的办法，但又解释说：“小的伤亡是难免的，群众并没有因此而沮丧”，以此来评析群众对伤亡事件的埋怨。有些事件不得不提出只能笼统谈，不能谈真象。例如在说到引洮工程死亡人数时用XXX来表示，而不亮出死亡的具体数字。而对一些地区发生的吃人惨案，一般是禁止统计和表述的。在县志里用“人相食”三字，一晃而过，不做实说。当时对说真话，说真情采取的措施是很严厉的，轻则批判斗争，重则定为现行反革命，投入监狱。全国各地对真象的歪曲和颠倒黑白的解释，比比皆是。例如1959年甘肃徽县因饥饿遗弃了婴儿，上报材料却闭口不谈群众生活的极端困难，而说是“阶级敌人在破坏”。1960年山东省饿死人的现象很突出，但省委给中央的报告中只谈牲畜的死亡而不谈人口的死亡，且把牲畜死亡的原因归为饲养员不纯。

粉饰阴暗面，回避阴暗面。这是左倾路线执行者的一个惯用伎俩。例如，上级在检查信阳事件中，他们采取只报少量死亡人数，掩饰人口大量死亡的事实。正阳县实死8万人，却上报为18000人。新蔡县死10万人，而所报数字缩小为3万人。青海湟中县1960年饿死15000人，而却采取原因分析法，把80%的死亡人口解释为正常死亡，只有20%的为非正常死亡。

六十年代大饥饿时期，一些地区制造的文件报告严重失实。隐恶扬善，曲解原因，抹煞灾难，这给后人研究这段历史教训，提供的是伪证，而不是可信的资料。

三年大饥荒已远离我们四十余年了，但这场灾难的真像相及其后果在一些地区始终作为“最高机密”予以封存。全国大多数省市和县基本回避三年困难的真相。我们查阅了近百部志书，对1958年浮夸风记载略为详实。而对六十年代的饥饿和死亡几乎

避而不谈，或用“严重后果”的字眼予以虚晃。紧接着用大量篇幅论国民经济调整的事，还有些志书竟然用当时左倾政策推行中所用的词语对“三面红旗”歌功颂德，赞扬六十年代的“重要成就”。当然，三中全会以后也出现了暴露六十年代大饥荒真相的作品，特别是一些党史大事记能坚持实事求是的方针，能较真实地分析三年困难时期的严重问题，也产生了一些深刻分析六十年代大灾难的优秀读物，如《刘少奇在1961年》就是一本坚持真理，认真总结历史经验的好作品，然而这类作品实在太少。中国人不认真总结这段历史就只有由西方史学家和政界人物信口雌黄了。

六十年代的当事人和悲惨事件的主角中不少人已作古了。亲历这一时期的绝大多数人已对左倾路线的危害有了共识，为六十年代左倾路线招魂的人不会有多少。在新的形势下，三年困难时期文献资料的解密应提到议事日程。事实上一部分地区的档案资料和文献资料已经开放，还有不少地区依然把这段历史作为“最高机密”，禁止任何人翻阅这一时期的文献资料。笔者在全国一些档案馆、图书馆和文献室查阅这类资料时，遇到的禁区五花八门，有的规定只有市委书记批准才能查阅，有的规定要省委书记批准才能查阅。有些资料连目录都不能看，而有些只能看目录不能看内容，有些内容可以看，但不能复印，也不能摘录，有些可以摘录但不能复印。由于有如此多的禁区和禁令，造成了历史研究的断笔。事实上三年困难时期的历史研究成为一个空白。在有些人看来似乎不存在这段历史，例如不少志书、党史研究的著作都回避了三年困难时期，有些人口统计资料对1959年到1961年的人口不予统计，如此多的现象说明当前仍存在着隐瞒历史真实，偏爱左倾路线的倾向。人们要写这一时期的信史实在困难。

刘少奇曾说过：“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历史的事实只能有短期的隐瞒和曲解，但不能有长期的埋没和断笔。一个时代的当

事人不论采取什么样的手段隐瞒历史真相，历史真相终究要解密，这只是时间的问题。前苏联曾对农业集体化运动中的大灾难，对斯大林三次大清洗中有组织的谋杀事件，当初也是作为“最高机密”严加封闭的。而今天这些属于绝密的事件都解密了，托洛茨基事件、李可夫事件、布哈林事件、瓦维洛夫事件、图哈切夫事件等等一一真相大白，历史恢复了其本来面目。我国改革开放已逾二十余年，人们的思想得到了大解放，物质生活条件发生了巨变。三年困难时期的历史资料已经具有开放和解密的条件了，愿这段历史走进我们的视野。

## 重要文献附件

1. 毛主席在郑州会议上的讲话
2. 刘少奇同志给毛泽东同志的信
3. 胡乔木关于韶山公社食堂问题给毛主席的信
4. 山东省委、省府关于馆陶县停伙逃荒问题的检查报告一件
5. 汪锋同志关于农村食堂问题向毛主席的报告
6. 通渭县委关于通渭的历史经验教训

## 附件 1:

# 毛主席在郑州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五八年，我们在各个战线上取得了伟大的成绩，不论在思想政治战线上，工业战线上，农业战线上，交通运输业战线上，商业战线上，文化教育卫生战线上，国防战线上，以及其他方面，都是如此。特别显著的，是工业和农业生产方面有了一个伟大的跃进。一九五八年，在全国农村中普遍地建立了人民公社。

人民公社的建立使农村中原来的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扩大了和提高了，并且开始带有若干全民所有制的成分。人民公社的规模比农业生产合作社大得多，并且实现了工农商学兵、农林牧副渔的结合，这就有力地促进了农业生产和整个农村经济的发展。广大的农民，尤其是贫农和下中农，对于人民公社表现了热烈的欢迎。广大干部在人民公社运动中做了大量的有益的工作，他们表现了作为一个共产主义者的极大的积极性，这是非常宝贵的，没有他们的这种积极性，要取得这样伟大的成绩是不可能的。当然，我们的工作中不但有伟大的成绩，也有一些缺点。在一个新的、象人民公社这样的缺乏经验的前无古人的几亿人民的社会运动中，人民和他们的领导者们都只能从他们的实践中逐步地取得经验，对事物的本质逐步地加深他们的认识，揭露事物的矛盾，解决这些矛盾，肯定工作中的成绩，克服工作中的缺点。谁要说一个广大的社会运动能够完全没有缺点，那他就不过是一个空想家，或者是一个观潮派算账派，或者简直是敌对分子。我们的成绩和缺点的关系，正如我们所常说的，只是十个指头中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有些人怀疑或者否认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

怀疑或者否认人民公社的优越性，这种观点显然是完全错误的。

人民公社现在正在进行整顿巩固的工作，就是说整社，已经或者正在辩论一九五八年有无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有无优越性两个问题。各级党委在整社工作中，按照六中全会的方针，采取了首先肯定大跃进的成绩、肯定人民公社的优越性、然后才指出工作中的缺点错误这种次序，这种作法是完全恰当的。这样作，可以保护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就干部来说，百分之九十几都是好的，都是应当加以坚决保护的。

现在我来说一点人民公社的问题。我认为人民公社现在有一个矛盾，一个可以说相当严重的矛盾，还没有被许多同志所认识，它的性质还没有被揭露，因而还没有被解决，而这个矛盾我认为必须迅速地加以解决，才有利于调动广大人民群众更高的积极性，才有利于改善我们和基层干部的关系，这主要是县委、公社党委和基层干部之间的关系。

究竟是什么样的矛盾呢？大家看到，目前我们跟农民的关系在一些事情上存在着一种相当紧张的状态，突出的现象是在一九五八年农业大丰收以后，粮食棉花油料等等农产品的收购至今还有一部分没有完成任务。再则全国（除少数灾区外），几乎普遍地发生瞒产私分，大闹粮食、油料、猪肉、蔬菜“不足”的风潮，其规模之大，较之一九五三年和一九五五年那两次粮食风潮都有过之无不及。同志们，请你们想一想，这究竟是什么一回事呢？我认为，我们应当透过这种现象看出问题的本质即主要矛盾在什么地方。这里面有几方面的原因，但是我以为主要地应当从我们对农村人民公社所有制的认识和我们所采取的政策方面去寻找答案。

农村人民公社所有制要不要有一个发展过程？是不是公社一成立，马上就具有了完全的公社所有制，马上就可以消灭生产队的所有制呢？我这是说的生产队，有些地方是生产大队即管理区，总之大体上相当于原来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现在有许多人还不认识公

社所有制必须有一个发展过程,在公社内,由队的小集体所有制到社的大集体所有制,需要一个过程,这个过程要有几年时间才能完成。他们误认人民公社一成立,各生产队的生产资料、人力、产品,就都可以由公社领导机关直接支配。他们误认社会主义为共产主义,误认按劳分配为按需分配,误认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他们在许多地方否认价值法则,否认等价交换。因此,他们在公社范围内,实行贫富拉平,平均分配;对生产队的某些财产无代价地上调;银行方面,也把许多农村中的贷款一律收回。“一平、二调、三收款”,引起广大农民的很大恐慌。这就是我们目前同农民关系中的一个最根本的问题。

公社成立了,我们有了公社所有制。如北戴河决议和六中全会决议所说,这种一大二公的公社有极大的优越性,是我们的农村由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的最好的形式,也是我们由社会主义社会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的最好的形式。这是毫无疑问的,这是完全肯定了的。如果对于这样一个根本问题发生怀疑,那就是完全错误的,那就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问题是目前公社所有制除了公社直接所有的部分以外,还存在着生产大队(管理区)所有制和生产队所有制。要基本上消灭这三级所有制之间的区别,把三级所有制基本上变为一级所有制,即由不完全的公社所有制发展成为完全的,基本上单一的公社所有制,需要公社有更强大的经济力量,需要各个生产队的经济发展水平大体趋于平衡,而这就需要几年时间。目前的问题是必须承认这个必不可少的发展过程,而不是什么向农民让步的问题。在没有实现农村的全民所有制以前,农民总还是农民,他们在社会主义的道路上总还有一定的两面性。我们只能一步一步地引导农民脱离较小的集体所有制,通过较小的集体所有制走向全民所有制,而不能要求一下子完成这个过程,正如我们以前只能一步一步地引导农民脱离个体所有制而走向集体所有制一样。由不完全的公社所有制

走向完全的、单一的公社所有制，是一个把较穷的生产队提高到较富的生产队的生产水平的过程，又是一个扩大公社的积累，发展公社的工业，实现农业机械化、电气化，实现公社工业化和国家工业化的过程。目前公社直接所有的东西还不多，如社办企业、社办事业、由社支配的公积金、公益金等。虽然如此，我们伟大的、光明灿烂的希望也就在这里。因为公社年年可以由队抽取积累，由社办企业的利润增加积累，加上国家的投资，其发展将不是很慢而是很快的。

关于国家投资问题，我建议国家在十年内向公社投资几十亿到百多亿元人民币，帮助公社发展工业帮助穷队发展生产。我认为：穷社、穷队，不要很久，就可以向富社、富队看齐，大大发展起来。

公社有了强大的经济力量，就可以实现完全的公社所有制，也就可以进而实现全民所有制。时间大约需要两个五年计划，急了不行，欲速则不达。这也就是北戴河决议所说的，将需要三四年、五六年或者更长一些的时间。然后，再经过几个发展阶段，在十五、二十年或者更多一些的时间以后，社会主义的公社就将发展成为共产主义的公社。

六中全会的决议写明了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和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所必须经过的发展阶段，但是没有写明公社的集体所有制也需要有一个发展过程，这是一个缺点。因为那时我们还不认识这个问题。这样，下面的同志也就把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三级所有制之间的区别模糊了，实际上否认了目前还存在于公社中并且具有极大重要性的生产队（或者生产大队，大体上相当于原来的高级社）的所有制，而这就不可避免要引起广大农民的坚决抵抗，从一九五八年秋收以后全国性的粮食、油料、猪肉、蔬菜“不足”的风潮，就是这种反抗的一个集中表现。一方面，中央、省、地、县、社五级（如果加上管理区就是六级）党委大批评生产队、

生产小队的本位主义，瞒产私分；另一方面，生产队、生产小队却几乎普遍地瞒产私分，甚至深藏密窖，站岗放哨，以保卫他们的产品。我以为，产品本来有余、应该向国家交售而不交售的这种本位主义确实是有的，犯本位主义的党员干部是应该受到批评的，但是有很多情况并不能称之为本位主义。即令本位主义属实，应该加以批评，在实行这种批评之前，我们也必须首先检查和纠正自己的两种倾向，即平均主义倾向和过分集中倾向。所谓平均主义倾向，即是否认各个生产队和各个个人的收入应当有所差别。而否认这种差别，就是否认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社会主义原则。所谓过分集中倾向，即否认生产队的所有制，否认生产队应有的权利，任意把生产队的财产上调到公社来。同时，许多公社和县从生产队抽取的积累太多，公社的管理费又包括很大的浪费（例如有一些大社竟有成千工作人员不劳而食或半劳而食，甚至还有脱产文工团）。上述两种倾向，都包含有否认价值法则、否认等价交换的思想在内，这当然是不对的。凡此一切，都不能不引起各生产队和广大社员的不满。

目前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向广大干部讲清道理，经过充分酝酿和讨论，使他们得到真正的了解，然后我们和他们一起，共同地坚决地纠正这些倾向，克服平均主义，改变权力、财力、人力过分集中于公社一级的状态。公社在统一决定分配的时候，要承认队和队、社员和社员的收入有合理的差别，穷队和富队的伙食和工资应当有所不同。工资应当实行死级活评。公社应当实行权力下放三级管理，三级核算，并且以队的核算为基础。在社与队、队与队之间要实行等价交换。公社的积累应当适合情况，不要太高。必须坚决克服公社管理中的浪费现象。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有效地克服那种确实存在于一部分人中的本位主义，巩固公社制度。这样做了以后，公社一级的权力并不是很小，仍然是相当大的；公社一级领导机关并不是没有事做，仍然有很多事做，并且要用很大的精

力才能把事情做好。

公社在一九五八年秋季成立之后，刮起了一阵“共产风”。主要内容有三条：一是穷富拉平。二是积累太多，义务劳动太多。三是“共”各种“产”。所谓“共”各种“产”，其中有各种不同的情况。有些是应当归社的，如大部分自留地。有些是不得不借用的，如公社公共事业所需要的部分房屋桌椅板凳和食堂所需要的刀锅碗筷等。有些是不应当归社而归了社的，如鸡鸭和部分的猪归社而作价。这样一来，共产风就刮起来了。即是说，在某种范围内，实际上造成了一部分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成果的情况。当然，这里面不包括公共积累、集体福利、经全体社员同意和上级党组织批准的某些统一分配办法，如粮食供给制等，这些都不属于无偿占有性质。无偿占有别人劳动的情况是我们所不许可的。看看我们的历史吧。我们只是无偿剥夺了日德意帝国主义的、封建主义的、官僚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和地主的一部分房屋、粮食等生活资料。所有这些都不是侵占别人劳动成果。因为这些被剥夺的人都是不劳而获的。对于民族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我们没有采取无偿剥夺的办法，而是实行赎买政策。因为他们虽然是剥削者，但是他们曾经是民主革命的同盟者，现在又不反对社会主义改造。我们采取赎买政策，就使我们在政治上获得主动，经济上也有利。同志们，我们对于剥削阶级的政策尚且是如此，那么，我们对于劳动人民的劳动成果，又怎么可以无偿占有呢？

我们指出这一点，是为了说明勉强把穷富拉平，任意抽调生产队的财产是不对的，而不是为了要在群众中间去提倡算旧帐。相反，我们认为旧帐一般地不应当算。无论如何，较穷的社，较穷的队和较穷的户，依靠自己的努力、公社的照顾和国家的支持，自力更生为主，争取社和国家的帮助为辅，有个三五七年，就可以摆脱目前的比较困难的境地，完全用不着依靠占别人的便宜来解决问题。我们穷人，就是说，占农村人口大多数的贫农和下中农，应当

有志气，如象河北省遵化县鸡鸣村区的被人称为“穷棒子社”的王国藩社那样，站立起来，用我们的双手艰苦奋斗，改变我们的世界，将我们现在还很落后的乡村建设成为一个繁荣昌盛的乐园。这一天肯定会到来的，大家看吧。

除了平均主义倾向和过分集中倾向以外，目前农村劳动力的分配也有很不合理的地方。这就是用于农业（包括农林牧副渔各业）的劳动力一般太少，而用于工业、服务业和行政的人员一般太多。这后面三种人员必须加以缩减。公社人力的分配是一个重大问题。争人力，是目前生产队同社、县和县以上国家机关的重要矛盾之一。必须按农业、工业、运输业、服务业和其他各方面的正当需要，加以统筹，务使各方面的劳动分配达到应有的平衡。公社和县兴办工业是必要的，但是不可一下子办得太多。各级工业企业都必须节约人力，不允许浪费人力。服务业方面的人员，凡是多了的，必须减下来。行政人员只允许占公社人数的千分之几。文教事业的发展应当注意不要占用过多的劳动力。公社不允许有脱产的文工团、体育队等等。

我们必须把安排人民生活、安排公社积累和安排国家需要这三个方面的工作，同时统筹兼顾。这样，才算真的作到了全国一盘棋。否则所谓一盘棋，实际上只是半盘棋，或者是不完全的一盘棋。一般说来，一九五八年公社的积累多了一点。因此，各地应当根据具体情况，规定一九五九年公社积累的一个适当限度，并且向群众宣布，以利安定人心，提高广大群众的生产积极性。

人民公社一定要坚持勤俭办社的方针，一定要反对浪费。在粮食工作方面；鉴于最近的经验，今后必须严格规定一个收粮、管粮、用粮的制度，一定要把公社的粮食收好、管好、用好。社会对于粮食的需要总是会不断增长的，因此，至少在几年内不要宣传粮食问题“解决”了。

最近各省都有干部下去当社员，这个办法很好。我提议各级

干部分期分批下放当社员，少则一个月，多则一个半月。一部分干部可以下厂矿当工人。这个办法在去年已经行之有效，今年要更好地加以推广。总之，一定要不断地巩固我们同广大群众的联系。

采取以上所说的方针和办法，我以为，我们目前同农民和基层干部的关系一定会很快地改善。广大农民从公社运动和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已经得到了巨大的利益，他们坚决要求继续跃进和巩固公社制度。这个事实，不是任何观潮派、算帐派所能推翻的。我们的干部在过去一年中作了很多很好的工作，得到了伟大的成绩，广大群众是亲眼看到的。问题只是我们在生产关系的改进方面，即是说，在公社所有制问题方面，前进得过远了一点。很明显，这种缺点只是十个指头中一个指头的问题。而且这首先是由于中央没有更早地作出具体的指示，以致下级干部一时没有掌握好分寸。如我在前面所说过的，这种情况在人民公社化这样一个复杂的和史无前例的事业中是难以避免的。只要我们向广大群众公开说明这一点，并且在实际行动中克服过去一段时间内工作中的缺点，那么，主动权就完全掌握在我们手里，广大群众就一定会同我们站在一起。必须估计到，一方面，那些观潮派、算帐派将会出来取笑我们；另一方面，那些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将会进行破坏。但是，我们要告诉干部和群众，当着这些情况出现的时候，对于我们丝毫没有有什么可怕。我们应该沉得住气，在一段时间内，不声不响，硬着头皮顶住，让那些人去充分暴露他们自己。到了这种时候，广大的群众一定会很快分清是非，分清敌我，他们将会起来粉碎那些落后分子的嘲笑和敌对分子的进攻。经过这样一个整顿和巩固人民公社的过程，我们同群众的团结将会更加紧密。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五亿多农民一定会更加心情舒畅，更加充满干劲。我们一定能够在一九五九年实现更大的跃进。人民公社的事业，一定能够在巩固的基础上蒸蒸日上，胜利一定是我们的。

附件:2

## 刘少奇同志给毛泽东同志的信

(一九六一年五月十一日)

主席:

主席五月六日给李井泉、陈正人同志的信,我已看到。

经湖南省委介绍,我到长沙福临公社天华大队住了十八天(其中两次回长沙耽搁五天),以后又到宁乡我的故乡住了六天,昨天到宁乡县城,准备听取工作组关于县社工业和手工业以及商业问题的汇报,然后转长沙回北京。

### 一、在天华大队

因发现天华大队领导核心存在着严重的问题,很有可能是被漏网的地主和富农分子实际上掌握领导(正在进行审查),故在天华住的时间较长。最后由长沙县委派工作组到天华进行整顿,张平化同志也到天华住了两天,共同决定改组党的总支委,将三个大队干部停职反省,重新由贫农下中农骨干掌握领导权。看来,天华大队不是什么红旗单位,总支书记彭梅秀也不是什么三好三有干部,在她的后面有几个坏人掌握实权,她同这些坏人密切结合,排斥较好的贫雇农干部,她是对外活动的一块招牌,长期欺骗着上级党委和外来参观的人。胡乔木和胡续伟同志在天华大队调查所得的材料,也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

由于我们在天华卷入了这样一个反对坏人的斗争,我们的调查研究工作不是很顺利地进行的,我们直到最后才了解一些这个大队的真象。这个大队的生产和社员生活,在湖南虽然算是比较好的,可以算作二类队,但是总算起来,粮食和副业生产比一九

五七年是降低了，社员生活远不如一九五七年，这主要是由于社员过去都有自留地，还在山上开了些荒土，每家都收有几千斤红薯芋头和田塍上的豆子，都喂了猪和鸡鸭，都有肉油蛋供自食和出卖，而现在这些几乎完全没有了，只有定量的大米和小菜，因此，都感到不够吃。这个大队去年下半年也有相当多的人害浮肿病，有二十几个人外流到江西，山林竹木受到严重破坏，房屋拆毁三分之一，百分之六十的社员现在住着别人的房屋，干部贪污多占的现象也相当严重。长期以来，这个大队的社员和干部不敢说心里话，乔木去调查时，大队已把一些乱说话的人调走，我最初去找干部和社员谈话，大队干部都在事先交代过。有些小队开会，我们工作组的人去参加，说的是一套，工作组的人离开后，他们又再开会说了另一套。因此，我在天华的前十天几乎不能同大队的人认真讨论问题，他们食堂的解散，也是背着我们工作组的人作的，因此，天华大队散食堂的秩序是不好的，并造成了一些新的损失。例如有些食堂养的猪，散食堂时，按每斤五角钱作价（自由市场价每斤二元五角）归干部私人喂养，但过两天就说猪已死了，实际是干部杀吃了。有些食堂的炊具，被干部和社员拿走，灶也扒烂。有些无炊具的困难户、五保户，无人照顾等等。

为了有秩序地把食堂散好，我们工作组在天华附近的赛头大队，由大队和小队干部开会，规定了以下六条散食堂的保证条件：一，不影响当前生产；二，不妨害大队小队的集体经济；三，不许引起新的破坏；四，党员干部在散食堂时不许自私自利，食堂帐目要算清；五，要把困难户、五保户安排好；六，社员的炊具要有领导的解决，不许乱拿食堂用具。

## 二、关于社员住房问题

在食堂拆伙以后，群众立即提出的一个尖锐的问题，就是社员住房问题；因为社员现在住得太挤，无法养猪、养鸡、积肥，

甚至难得作饭。为了解决社员住房问题，我们工作组在天华大队作了调查，并提出了书面的处理意见。这个文件虽然还没有经过社员大会和社员代表大会讨论通过，但可作处理这个问题的参考，湖南省委已将这个文件转发各地，并决定在省、地、县、公社、大队各级都建立房屋处理小组。现将这个文件送上，请审阅。

我们到宁乡以后，发现有些社员为了自己住回原屋，把现住在他那个屋子的社员赶走，有些社员的房屋被拆毁，就被赶得走头无路。据省委同志说，湖南房屋被拆毁百分之四十，此外，还被国家机关、企业和公社、大队占用一部分。有些被占用的房屋已经退还，少数干部领头，其他社员也无计划地抢着搬进这些退还的房屋。我在乡下看到几处这种乱搬家的现象。因此，建议宁乡县委立即发出一个文件，在电话上通知各公社和大队，以便停止这种现象。现将宁乡县委这个文件送上，请一并审阅。

### 三、关于退赔问题

食堂拆散以后，群众迫切要求供应炊具和其他生活用具，这些东西由于过去多次搬家，绝大多数已被破坏或被平调，需要多的一户有数十件，少的一户也要七八上十件，如锅子、锅铲、菜刀、柴刀、火钳、水桶、提桶、锅盖、炉锅、开水壶、水瓢、碗筷、刷把、桌凳、坛坛罐罐等。对于平调和破坏社员的这些东西，基本上还没有退赔，有些县和公社说已退赔了百分之几十的数字，据我在天华和宁乡所了解的情况，是完全不可靠的。在宁乡还发现，要社员登记平调物资时，要社员提出证明，无证明者不予登记。这样，许多社员也就不去登记了。但是，这些东西在社员分开作饭以后，几乎件件都是需要的，必须坚决退赔。现在省委和县委都在制造和下放这些东西。目前的退赔款，应该主要用来定制这些东西，或购买猪鸡种子退给社员而不要把钱发给社员化掉。为了使下放的这些东西迅速分配给最需要的社员，必须

随着实物的下放，向群众公布帐目，经过群众讨论来进行分配，避免有人从中贪污多占。这也在宁乡县委五月十日的文件上说到了。

#### **四、关于巩固国家、集体和社员个人的所有制问题**

现在乡村中乱拿别人的东西和小偷小摸现象相当多，引起群众的不安，妨碍生产。我曾问过社员，为什么不把山上荒土种上红薯、芋头、豆子等等，社员回答说，自己种了，横直自己得不到，所以懒得种。形成这种乱拿别人东西的风气，一是由于现在吃的东西太少，二是由于过去几年刮了“共产风”，首先是动摇了社员个人的那一部分所有制，也动摇了国家和集体的所有制。有的社员向工作组说，他们可以平调，乱拿别人的东西，为什么我不可以拿别人一点东西呢？你也拿，我也拿，就拿乱了。因此，过去平调的东西，必须坚决退赔，就是由于搬家、大兵团作战而破坏的东西，也必须坚决退赔。一年退赔不完，两年三年五年也必须退赔完。过去我们想在一次或几个月内退赔完毕，是办不到的，要制造被破坏的这许多东西，特别要建造被拆毁的那许多房屋，没有三、五年的时间，是不能作到的。

国家和集体拿了社员个人的东西坚决退赔，我认为社员拿了别人的东西，也应要求社员退赔，一次还不清，几次还，一年还不清，几年还，但是不可不还。只有这样，才能巩固国家、集体和社员个人的各个方面的所有制，安定社会主义的社会秩序，以利生产的发展。

#### **五、关于在一部分乡村中建立公安派出所和巡回法庭问题**

目前在一部分乡村中，首先是三类地区，社会秩序不安定，反革命活动也有增加，在撤消区公所和区派出所后，群众告状、打官司，很不方便。群众告发一件刑事案，要跑到县城去，还不一定告准，因此也就不告发了。有时，干部和群众就自己想法处理，把犯案的人打一顿或者赶走，也有因此打死人的。因此，目

前有必要在一部分地区适当加强公安机构和政法机构，设立公安派出所和巡回法庭，那里需要就在那里设，那里不需要了就把它撤回，看来，这样是便利群众的。最近湖南公安厅在个别地区设立派出所，群众反映还好，对于安定社会秩序有帮助。由于时间短，还没有什么经验。

#### 六、关于机关干部、军官和职工在乡家属问题

关于这些在乡家属是否算作困难户，是否应由公社和大队给予困难补助金或享受供给待遇问题，我们工作组在天华和赛头两个大队也作了一个调查，并提出了一些处理意见，现将这个文件送上，有暇时也可以翻阅一下。但这个问题牵涉到许多低工资的工人生活和县社工业问题，还不好解决。

信已写得太长。关于按劳分配和粮食问题，还没有写，只好等待以后再写。

祝

主席身体健康！

刘 少 奇  
五 月 十 一 日

附件 3:

## 胡乔木关于韶山公社食堂问题给毛主席的报告

在韶山公社干部和社员讨论六十条的时候，我们遇到的最突出的问题，就是公共食堂问题。从群众反映看来，大多数食堂目前实际上已经成了发展生产的障碍，成了党群关系中的一个疙瘩。因此，我们认为，这个问题愈早解决愈好。

食堂问题之所以成为最突出的问题，主要是因为它同工分值降低、社员收入减少和分配上的平均主义直接联系在一起，又在群众的每天生活中引起许多不便。分别说来：（一）办了公共食堂以后，砍柴、种菜、煮饭都占用劳动力，生活用工往往占生产队全部用工的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因而大大降低了农业劳动的工分值，直接影响了劳动积极性。（二）食堂不利于发展养猪等家庭副业，粪肥减少了，生产队的农业收入和家庭副业收入都减少了。（三）食堂烧大柴，破坏了山林，同时又减少了灰肥（因为大柴灰少）。（四）由于食堂实行供给制，许多辅助劳动力本来可以劳动的，也不劳动了。（五）很多社员感到吃饭“不自由”，粮菜难于调剂机动，而社员和食堂工作人员之间以及社员相互间的纠纷增多了。（六）基层干部在领导食堂方面，往往要比领导生产花费更多的精力。在这种情况下，大多数食堂势在必散，而且散了并不是什么损失，反而对整个工作有利。

但是食堂已经有了两年多历史，散起来当然要遇到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应该如何解决？是否难于迅速解决？这是目前必须答复的问题。在有张平化同志参加的韶山公社六个大队的汇报会上决定，每个大队除了研究一个可以办好的食堂之外，研究一个食堂的有领导的分散，以便取得这一方面的经验。根据这个决

定，我们和公社党委书记毛继生同志一起，研究了一个坚决要散的食堂。经过五个晚上的讨论，这个食堂在分散时遇到的种种问题，都一一得到了圆满的解决。这个经验证明，群众要求散的食堂不但应该散，而且可以散得很快很好。

这个食堂属于韶山大队旺冲生产队。旺冲生产队，有十四户，五十四人，除一户中农外，其余都是贫农，分居在旺冲和缺塘冲两个屋场。耕种水田五十亩，旱土五亩。这个食堂，是韶山大队的一类食堂。柴菜充足，并有少量出卖。养猪四头。积蓄一百多元。

这个生产队的社员在讨论六十条时，注意力首先集中在公共食堂的问题上。除了一户困难户和一户干部家属，其他人都主张分散食堂。他们算出了成立食堂前后比较的几笔帐：

第一，工分值降低了。在一九五七年，每个劳动日的工值是九角四分。今年该队包产每亩五百三十斤，包农业用工一千四百六十六个，每个劳动日的工值应合六角九分（摊上大队供给部分为九角六分），但是由于加上食堂用工一千八百一十二个，工值就降低到三角二分（摊上大队供给部分为五角九分）。

第二，一九五七年家家养猪喂鸡，全队共有五十四头猪，一百多只鸡。现在全队只有四头猪，十一只鸡。

第三，一九五七年，每家全年可积地灰（即柴灰）七八担，多的有十四五担。现在食堂烧的整庄柴，不出灰，只抵上过去一两户积的地灰。

第四，食堂烧柴浪费大，每人每天平均二十斤，家里还要烧一道。过去自己煮饭，每人每天平均五六斤，多数是烧柴屑子。

根据群众的要求，公社党委书记毛继生同志宣布同意旺冲生产队不办食堂，并提出了在分散时要注意：一、不影响当前生产；二、不影响生产队的集体经济；三、对困难户的生活，要妥善安排。生产队的干部和群众都兴高彩烈，一连几晚自动开会，

讨论散食堂以后的一系列具体问题。据群众说，热烈的程度，相当于土地改革和合作化高潮。他们说：“这样的会，就开通晚，也不会打瞌睡。”

经过反复的讨论，许多复杂的问题，都得到了妥善的解决。

第一，房屋问题。一部分社员提出，在散食堂之前，应该首先解决房屋问题，否则在自己家里不便作饭，不便养猪，更不便在屋前屋后种植树木。过去由于办食堂，集中住，房屋住乱了，变动面占到百分之三十以上，原主不能回原屋，就是住在原屋的人，也不能保障自己的所有权。家家户户都不定心，所谓“鸡不在自家窝里不生蛋”，不但房屋无人修理，屋前屋后的作物也受到了破坏。

这个看来很复杂的问题，经过群众讨论了一晚就解决了，全部房屋的所有权都固定下来了。解决的办法是，大队退还房屋七间，四户原主回原屋（搬到外队的两户），一户用退赔款一百零五元买一间屋，一户暂时租用别人的屋，由大队出材料和生产队帮助在最近盖屋。

看来，过去拆屋的退赔款，应该尽速还给群众，以前规定把这笔款项集中在大队手里，并没有好处。据毛继生同志说，有的大队已经把这笔钱挪作他用了，这个大队虽没有花掉，但也没有积极帮助群众解决房屋问题。群众在这个问题上，认为政府说话不算数。

在逐户妥善安排以后，群众提出了“屋必有主，主必有权”，并且要求领发房屋证。当场就有几户社员请求大队批准砍伐木料，搭盖和修整房屋。

第二，食堂的菜土问题。现在参加食堂的，每人可以有一分菜土，不参加食堂的，每人就只有五厘自留土，而且食堂占的，又尽是屋前屋后的好土。群众对这一点很有意见，说：“手掌是肉，手背也是肉”，“都是一个娘生的，为什么两样待遇？”

这个食堂的菜土，有二亩五分。经过社员讨论和领导批准，决定将这些菜土和社员远距离的自留土进行了等量交换，并且包给社员经营，大家才勉强同意。我们想，不办食堂而又不经营商品菜生产的地方，可以考虑把百分之七的自留土，全部分配给社员。因为现在食堂占有的菜地，都是高级社时代社员的自留土。在有条件集体养猪的生产队，可以保留一部分饲料地。

第三，柴山问题。过去破坏山林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没有划定社员的自留山。这个问题，经过群众讨论之后，决定作如下解决：一般以高级社的自留山为基础划分自留山，对搬出搬进的户，作个别调整。自留山每人平均一亩左右。当天，社员就去看山立界，并且公议，从即日起，任何人不准乱砍树木，违者处罚金五元至十元，谁检举，就奖给谁。这几天来，果真停止了乱砍树木的现象。

第四，养猪。食堂的四头猪，其中两头架子猪，转为生产队所有，交社员喂养，年底出栏，除了归还现在的重量之外，长秤部分每头猪定额交给生产队净肉十三斤。两头小猪，公议价格，卖给社员喂养，价款转归生产队所有，作为生产资金。

第五，鱼塘。食堂原有鱼塘三口，这几年没有放鱼。这次决定，鱼塘转归生产队所有，当晚公议，今春放鱼二千尾。第二天就去买鱼苗。

第六，茶苑果木，数量不多。公议随自留土，即土地为谁所有，菜苑和零星果木亦归谁所有。

第七，炊具什物。大型的如米桶谷柜大坛等，原系生产队所有，仍存生产队使用，小型的如锅子瓮坛蒸钵等，事先公议价格，优先卖给缺少什物的社员。这些什物原来是社员凑钱购置的，所有卖后所得价款，仍按食堂人数摊发。

第八，现金实物，盘存结算。库存现金一百多元，系出卖蔬菜所得，按劳动日进行分配，对搬离本队的社员，先发给其应分

得部分。

第九，春收作物，仍以原食堂为单位进行分配。

第十，一户困难户，大队决定秋后照顾五十元购买口粮，生产队在排工上，也给以适当照顾。

根据群众意见，食堂分散之后，在秋收以前，粮食仍由生产队集中保管，半月一发。秋收后，粮食如何分发到户，尚未议定。

关于分配问题，绝大多数人主张，不办食堂之后，生产队的收入，全部按劳分配，大队分配给社员部分，仍实行三七开。这样，实际上相当于粮食半供给制，两级分配的总额，变成了二八开，即供给占二成，工资占八成，将来生产队收入增加了，还会变为一九开。

由于散了食堂，没有生活福利用工，而且生产队增加了副业收入，预计每个劳动日的工值将不是九角六分，而是一元六角六分，比高级社时代的工值还大大超过了。

这个食堂的分散，做得很有秩序。他们第一步，分定菜土，以便下种；第二步，解决房屋问题；第三步，划定柴山；第四步，结清帐目；最后，再分炊具，分户做饭。由于各项准备工作都作好了，今天（四月十二日）已实行分户做饭。

我们看到，旺冲生产队的干部和群众，当决定分散食堂之后，都心情舒畅。生产队队长毛谷生（预备党员）认为，以后可以集中精力领导生产了。这个生产队已实行了定额管理，分段包工。在散了食堂以后，出工是否会不整齐呢？社员认为，现在的工分比高级社时还值钱，抢工分有意思，因此，已经不存在出工不整齐的问题了。在讨论发展生产队集体经济的时候，大家都踊跃发言，想出了八九条门路。我们问，为什么发展食堂经济没有发展生产队经济积极呢？他们说，生产队经济发展了，可以多分实物和现金，多劳可以多得，而发展食堂经济，结果只是大家吃

掉，所以两者完全不同。预计生产队这一级，全年可以增加可分配的收入一千多元，地灰将增加七十多担，烧柴将节省五万斤，牲猪只要有猪源，每户至少可养一头，鸡鸭将比去年增加四五倍，农林牧副渔，都将有所发展。

从以上事实看来，这个生产队解决食堂问题的经验是好的，是可以推广的。事实上，韶山公社各大队的食堂，在讨论六十条以前即有一半处于停顿状态，在讨论六十条以后，散的已经是绝大多数，而且散了以后，对生产只有好处。因此，我们认为，对于这个问题应该毫不犹豫，当机立断。如果群众确实要办的，也应该独立核算，同生产队的包工和分配分开，以便提高劳动日的工值和克服社员分配上的平均主义现象。

附件：4

## 山东省委、省府

### 关于馆陶县停伙、逃荒问题的检查报告一件

中央、国务院、并各地、市、县委：

省委接到中央转来人民来信及电话指示关于检查原馆陶县（现已合并于冠县）有些村庄食堂停伙，群众逃荒的指示后，即派正在济南开会的聊城地委第一书记李吉平及冠县县委第一书记韩哲同志回去处理，十号又派省委常委、副省长邓辰西同志率领农村工作部副部长李建修同志、政法部副部长王润斋同志、粮食厅副厅长李仲铭同志等十余人前往检查处理，地委派了两个书记和一个部长前往协助工作，国务院秘书厅及内务部、公安部的同志也同时到达。经过几天的了解，人民来信中反映的情况完全属实，而且食堂停伙、半停伙（一天吃一顿或只有萝卜吃的）的情况正在发展。截至十日为止，虽然还未来得及全面调查，尚难统计出准确数字，但这种情况已遍及全县（按原馆陶说），全县七个公社，已有六个公社发现有停伙或半停伙的村庄，其中以房寨、柴卜、魏僧寨三个社较多，潘庄、北馆陶、八岔路三个社次之。南馆陶公社虽然还未发生问题，但现在粮食（包括瓜干、萝卜）只能吃一个多月。据各公社党委自报，全县一千一百九十五个食堂，停伙者已有八十二个（据群众反映，绝不止此数），半停伙者更多。很多地方的食堂从中秋节以后就没见粮食，吃地瓜和萝卜已有四、五十天了。房寨公社芦里大队，有四个食堂在去年中秋节后全吃地瓜，十一月后全吃萝卜，十二月二十九日停

伙，至中央转来人民来信后，才于一月九、十两日先后开伙。食堂停伙或半停伙后，社员四出觅食，不能远出者就近拣拾冻地瓜和冻萝卜度日，能远出者到河北邯郸、曲周、大名等地投亲靠友、逃荒要饭，有的卖儿女，有不少姑娘、老太婆出门求嫁，不正常的婚姻继续发生，如十四五岁的小姑娘，嫁给三十多岁的人，不登记就结婚等，甚至有人偷盗、自杀，因饿和因病加饿而死者已有二、三十人。有些村庄整半劳动力全部逃光。停伙或半停伙已久的村庄，生产全部停顿。房寨公社芦里大队，整半劳力二千二百八十一人，除去早出晚归，今出明归者外，到邯郸等地者六百三十三人，全家外出者二十二户。其中党员三十人，占党员总数百分之十四点五。团员三十五人，占团员总数百分之四十，小队以上干部三十四人，占干部总数百分之二十五点七。全县据不完全统计，自去年七月以来仅到邯郸一地工作或投亲访友及逃荒者，到一月八日止已有一万三千多人，由馆陶魏僧寨、柴卜、潘庄三个公社到河北曲周梁儿庄、平谷店、马头、侯村四个公社的约计五千五百余人（其中讨饭吃的达三千多人）。检查组访问了五个公社的二十几个村庄，除少数村庄，由于还有点地瓜、萝卜或者已发给粮食者外，所到之处，男女老幼哭诉饥饿，其情凄惨。

馆陶发生上述问题的原因，主要是县委的麻痹自满，盲目乐观。该县今年生产不错，粮食确比往年增产，但增产并不像县委估计的那样大，仍有二十五万二千九百五十四亩地受水灾（占耕地的百分之二十五，其中绝产地即有十六万七千三百八十六亩），再加上该县自五三年以来连年受灾，元气未复。可是县委不接受社员和连排干部的意见，以假当真，按照自己估计错误的高产量安排征购和社员生活，结果安排给社员的口粮名有实无，或名多实少。干部脱离群众，不关心群众生活的情况，也十分严重。食堂绝粮后，有的叫群众自筹、挖潜力，有的说“愿拾愿偷自己

办”，有的开大会，干部问“没粮吃怨谁”，叫群众答复“怨自己没干劲，生产没跟上”。群众十分愤怒。有些村庄已经无粮，而干部不相信群众，不但不立即设法解决群众的吃饭问题，反而加紧核实产量，不报高产不散会，又发动群众反隐瞒、私分、挖老鼠洞（即小仓库），按家按户翻粮食，搞的群众十分恐慌。当然隐瞒私分还是有的，不但曾经发现过，而且从全县粮食产销情况看，也是证明这一点。一九五七年全县征购公粮三千一百七十万斤，统销二千一百万斤，粮食并不紧张。群众普遍反映一九五八年的粮食比一九五七年增产，现在才征购公粮三千一百万斤，而按公社现存粮食统计，把三千一百万斤公粮全部退回，还吃不到麦收，虽然粮食秋收粗糙，早秋后，吃用有些浪费，但也不致相差如此之大。所以瞒产私分，肯定不少。尽管如此，当县委已经知道有的地方食堂停伙，群众挨饿以后，还不立即停止查粮是不恰当的。县委也注意了灾区的问题，曾从非灾区给灾区调剂粮食，但调剂的办法是错误的，没有在安排好非灾村生活的基础上调剂，而是那里有现粮，就从那里调，结果有粮者也不敢说有粮，粮多者也叫喊粮少，有些本来还有粮食的也光吃地瓜或萝卜。现在有粮没粮真假难分，有粮没粮全面紧张。

群众有五大不满意，也就是说，我们在这五个方面严重脱离群众。第一，群众对干部虚报产量很不满意。群众说：“干部假报高产，争奖励，可是坑了俺社员，上级按干部报的产量要粮食，名义上给俺留够了口粮，可是俺吃的是个空儿。”干部弄虚作假是严重的。就在这次检查组检查时，几乎公社都在事先开了干部会和群众会，不叫群众向检查组反映真实情况，只许说产量高，吃得好，吃得饱，不准说吃不饱，没饭吃。有的公社或大队领导干部甚至威胁群众说：“谁乱反映，就是反革命”，“乱反映的不给饭吃，饿死你。”这虽然不能说是大多数干部都愿意这样作，但这种普遍性是惊人的。第二，对社干不关心群众生活十分

不满。群众说：“俺一年苦干，一天四晌劳动为啥不叫俺吃饭。”检查组曾看到很多吃奶小孩身上一线不挂，母亲整天揣在怀里，有百十岁的老太太没棉裤，有很多病人没钱看病，病人也得不到适当的照顾，已知最近自杀的人当中就有三、四个是孤寡年老有病没人管的人。馆陶各公社都已发了工资，有的已发三次，大人小孩平均起来每人每次约八角。但小孩多的和有病的就不够用。第三，对干部的强迫命令作风十分不满，有不少干部打人，有些公社和大队的领导也打人骂人。干部强迫社员脱光衣服干活，不脱光就是没干劲，强迫社员彻夜劳动、冒雨劳动。强迫青年妇女脱光衣服的也有好些村庄。有的对犯有错误的社员不给饭吃，甚至小学生不好好念书也不给饭吃。压制民主，打击报复的也不少，这次邓辰西同志和地委书记周海舟同志到问题最严重的南孙店访问之后，由于群众哭诉了实情，当天晚上该大队副支书王希海即开会斗争连队干部，追查反映问题的人。但是，由于群众觉悟高，饿的受不了，上述情况还是被揭发出来。当然发生强迫命令的原因和具体情况是不同的，将来处理时，还必须加以分析，不过问题确是严重的。第四，对劳动力安排不当，任务要求超过实际可能的现象也很不满。例如秋收种麦时，县里规定麦田必须深翻三尺，结果使秋收粗糙，损失粮食，群众很不满意。有些说：“秋粮烂在地里不收，却把劳动力集中起来去翻地三尺种小麦，没见过这样种庄稼的。”第五，对分配不满意，馆陶分配时，对丰收队没有奖励或奖励太少，有的公社把社员挖河工资及奖金一律归社，都影响群众的生产积极性。

根据上述情况，我们对该县工作作了如下的安排：

第一，立即组织粮食调运工作组，调拨粮食，各公社同时进行，一个食堂一个食堂的安排粮食，立即停止核实产量、反瞒产、私分的工作，就各社实际库存，按每人每天一斤计，先给每个食堂调够三个月的粮食，公社库存不足三个月者，由国库拨

给。同时发放两三万元的救济款，派出医疗队，解决困难户的衣着、治病问题。并派人赴邯郸、曲周等地慰问和领回逃荒群众。对外逃干部和群众，一律不加责备，对于偷人粮食者，不以偷窃处分，以安定人民生活，稳定群众情绪。现在停伙食堂都已开伙，都有了粮食，外逃群众已陆续返家。

第二，生活安排以后，立即组织冬季生产，特别是副业生产，以增加吃用品和收入。现在生产已部分开始。

第三，同时进行治水排涝规划，春节后组织劳力进行治水排涝工程，彻底消除该县水患。

第四，生产进入正常，群众安定之后，有领导、有计划的进行一段整顿组织、整顿作风和进行思想教育的工作，并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分清是非，教育干部。目前还须安定干部，鼓励信心，防止干部思想动荡、悲观失望，引起工作混乱。除了对于少数阻碍目前工作和严重脱离群众，群众十分不满的干部立即处理外，对一般犯有错误的干部，都采取保护安定的方针。对于到国务院反映情况的荣誉军人王书国同志，准备在适当时候向群众公布，给以表扬，并由县报销其赴京开支，以此作为克服浮夸作假，提倡实事求是作风的动力，教育干部。

从馆陶发生的问题中给了我们深刻的教训：

首先是，我们被全省大丰收所迷惑，有些盲目乐观，对于地区的不平衡性虽有注意，但检查不够深入，措施不够具体有力。早在秋收时候，我们对全省各县的生产、生活情况排了一次队，当时发现有金乡、微山、嶧县、齐东等八个县，平产减产粮食不够，有百分之五十社有各种不同问题，因而具体作了安排，同时也要求各地委、县委保证不死人、不逃荒和不发生事情，但是对于丰收的聊城地区认为不会有大问题，没有去深入地了解摸底，而问题就恰恰发生在这里。其次，对于干部的弄虚作假，窃取荣誉的不良作风，虽早有发现，也作过批评纠正，但估计不足，纠

正不力，因而没有早早改正过来。同时由于领导干部开会过多，下不去，从干部汇报中了解情况多，从群众中了解情况少，因而碰上弄虚作假的干部就上了当。直到十二月中旬，四级干部会议核实产量时，馆陶县委报告的单位面积产量还是六百斤。据这次了解，群众根本不承认。事实也证明，即便亩产三百斤，也不应该在现在就发生问题，而我们相信了县委的报告，根本没想到群众会没饭吃。直到中央、国务院转来人民来信，督促调查处理，才引起我们的注意。如果不是人民来信及中央的督促检查，问题将会发生的更大。第三，有些领导同志只愿听“喜”，不愿听“忧”，对于提出与自己不同的反面意见的人，不加调查分析，即扣上右倾或白旗的帽子，或者常以右倾、白旗这些帽子吓唬人，因而堵塞了言路。据这次了解，馆陶房寨、柴卜及魏僧寨公社的一些村庄没有饭吃的情况，有些在县里工作的干部早就了解，而且有在这些地方工作的干部，因为食堂停伙，和群众一道到河北曲周等地买饭吃，也不敢向县委、地委反映。另外，我们很感谢河北党，由于我们工作上的错误，给河北增加了很大麻烦，河北的同志对馆陶去的人，“以只要河北人有饭吃，山东人就要有饭吃”的精神，作了妥善安排，对偷窃者不捆不绑，不以偷窃处理，这种共产主义精神，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为了接受这些教训，十五日晚召开了在省开会的地委第一书记会议，听取邓辰西同志汇报，估计了全省的情况，作了全面安排，今晚又召开了一次电话会议，各地、县干部参加，以此教育全省干部，具体安排了工作。另外，我们已决定将原准备在春节后下放整社的干部（全省拟抽调两、三万人）提前立即下放；并推广博兴县各级干部轮流到公社当社员的经验，以便更有效更迅速地解决公社现存的问题。

以上报告是否妥当，请指示。

中共山东省委  
山东省人民委员会  
一九五九年一月十六日

附件 5:

## 汪锋同志关于农村 食堂问题向毛主席的报告

(一九六一年五月九日)

主席:

4月27日,我带了5个同志来到临夏。28日听了自治州党委同志的汇报,并且选定新集公社新一号生产大队作为调查研究的重点。29日我回兰州参加西北局召开的澜涛同志传达你和小平同志指示的电话会议,于5月1日返回,其他同志则比我先两天到达这个大队开始工作。

新一号生产大队是一个二类队(新集公社是一个三类社),是才在中央工作组的帮助下整顿过的。这个大队是在临夏最早的一个高级社的基础上成立起来的。这个大队的自然条件是很好的,今年的生产情况也不错。州、市机关的工作人员经常在这里进行试点。它的组织规模,于省的三级干部会议之后,很快即作了调整:原为570户,3327人;现为439户,2523人;原有土地4592亩,现有土地3738亩;原有13个生产队,划出去4个,又分出4个来,现仍为13个生产队。

按照我们原来的设想,这次调查本来是打算从摸清两个平均主义入手的。但是,当我们一接触到群众,经过向群众反复地宣读六十条,讲解党的政策,请他们发表意见的时候,立即发现这里群众最关心和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不是别的,却是食堂问题。

我们重点地摸了两个食堂:一个是第九生产队的食堂,大队

的和上面来这个大队工作的干部都在这个食堂吃饭，大队对这个食堂有许多照顾，因而这个食堂办得比较好。社员在这个食堂吃饭的，共有40户，196人。除过一个50多岁的单身汉表示“家里吃也成哩，食堂里吃也成哩，我一个人随大家”的意见外，全体社员都主张打粮回家吃饭，停办食堂。这个单身汉的名字叫尚贤，贫农成分，在食堂散了以后的第二天，他专门找到我们的干部说，他讲这个意见的时候，思想上还有顾虑，不敢说不在食堂吃饭，而实际上他是最不愿意在食堂吃饭的。另一个是第六、第七生产队的食堂，这个食堂没有什么特殊的照顾，办得不好。在这个食堂吃饭的共有61户，313人。除只有一个人主张在食堂吃饭外，其余全部主张打粮回家吃饭，停办食堂。这位主张在食堂吃饭的人，事后我们才知道原来是食堂管理员马合买的老婆。

群众对食堂真是怕极了，恨透了。群众说：“交朋友交个管理员，吃馍喝汤不作难”；群众说：“炊事员的肚子，饲养员的热炕，队长、管理员没定量”；群众说：“勺把子上有刀子”；群众说：“食堂是饭厅（打饭的地方）、法庭（灶管人员不顾群众困难，甚至打人、骂人态度恶劣）和花厅（队长、管理员专找漂亮年轻的妇女作炊事员，就在食堂里乱搞）。”例如，六队队长马培继和食堂管理员拜景义，贪污多占，克扣社员口粮，利用社员口粮诱奸、强奸妇女13人之多；1960年在这个食堂吃饭的共死了39人。群众对这些事情愤恨最大。这两个食堂已成为破坏社会主义、阻碍生产发展和党群关系中的疙瘩了。

根据群众的要求，在社员学习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之后，又经过了4个白天和3个晚上的访问、座谈和讨论，我们帮助生产队的干部分别召开了生产队的社员代表大会，通过了停办食堂的决议。社员对这次社员大会的评价很高，人人兴高采烈，他们说：“开这样的会开个整夜也行。我们这才是真的贯彻六十条，开社员代表大会来解决我们自己的大事情呢！”大会

除了对于食堂停办以后的问题都一一根据社员意见作了决定以外，还在贫、下中农小组的基础上选出代表（一个食堂选了10人，一个食堂选了11人），负责具体办理。以第九生产队的食堂断例：该食堂有菜地6亩半，社员一致主张由原来的专人经管，将来按粮食定量标准比例分菜，或卖菜分钱。食堂养猪3口，社员一致主张由种菜的人兼管起来，由生产队供饲料，公猪育肥吃肉，母猪生仔卖仔。食堂有兔子3只，折价卖给社员。食堂有糖萝卜和干菜8000斤，提出1000斤作为生产队的贮备，提出600斤补助进城积肥运肥的社员，提出170斤补助生产队的5个干部和两个看守母根的人，所余全部随粮食定量标准比例分配给社员。食堂有柴草4万斤，除留足牲口饲料，完成军草征购任务和留出一部分贮备草外，全部分给社员。食堂的炊具，借来的归还原主，平调来的退给原主，购置的折价优先卖给缺炊具的社员。食堂有现金390.50元，连同上述的猪肉款、仔猪款、兔子折价款、炊具折价款等均交生产队作为生产基金。食堂租用的房屋，决定退还原主，在租用期间化了些补修费，决定同房主协商从租金中扣除一部分。由于准备工作做得比较充分，在社员选出的代表的帮助下，社员应分得的东西，很快就分到手里，井井有条，散而不乱，大家都愿意。

食堂解散，大快人心。群众说：“这下可把勺把拿到我们手里了，他们再也卡不住我们的脖子了”；群众说：“回家做饭，锅也热了，炕也热了，我们的心也热了”；群众说：“过去三年食堂，两年糊糊汤，现在回家吃饭，天天过年（吃得花样多）。停办食堂，在我们开始酝酿的时候，一些基层干部是有思想顾虑的，他们怕群众不会计划用粮，吃过定量，怕群众自己做饭耽误劳动时间，怕把柴草分到每家每户不够烧用……等等。当把这些顾虑提交群众讨论时，群众的意见恰恰相反。事实也证明，这些顾虑是完全不存在的。两个食堂都是从5月6日停火的，三四天

来，我们了解到以下的情况：一位 70 多岁的老太婆（何成海的外祖母）把面粉打回家以后，全部用小碗量了一遍，干部问她为什么要这样做？她说：“孬娃说打回来 56 天的粮，我分一下好知道每天吃多少。”在两个食堂吃饭的社员，群众提出只有 3 户可能计划不好，一致同意给这 3 户 10 天打一次，其余绝大多数社员都是会自己安排得很好的。这几天来，男女老幼的心情特别舒畅，有的说：“家里有粮，心就放下了”；有的说：“都是那些定量，在食堂里吃把人饿下了，在家里吃把人饱下了”。参加劳动的人越来越多。本来不参加劳动的老太婆、小孩子也抱娃、送饭、挖菜、拾柴了。人人挖拾野菜，过去社员挖野菜要交食堂，有的自己挖到一些，还被管理员搜查没收，但是，食堂却把野菜不是扔掉，就是烂掉。做也做得很难吃。看来在家里作饭才能贯彻低标准、瓜菜代。饭食不那么单调了。5 月 7 日中午，第九生产队 34 名锄草妇女家里送来的面食，就有疙瘩、穷穷、棋花、菜面、馍馍、饼子六种，比起过去食堂的饭菜是好得多也干净得多了（群众反映在食堂吃饭时常吃出羊粪蛋子老鼠屎）。对于停办食堂，社员群众开始顾虑更大，他们主要是怕戴“反对政策”、“反对社会主义”的帽子，怕食堂解散不了，过后遭受干部的报复……等等。当社员大会宣布了食堂停办，并且把粮食、蔬菜、柴草真的领回家以后，一切顾虑都解除了。六队食堂在召开社员大会宣布停办食堂的时候，群众跑到炊事员的家里，把他们偷去的面粉和做下的馍馍、油拌干面等，连盆带锅，全部端来。并且当场对管理员、炊事员进行了斗争，这在过去是不敢做的。干部反映：“这下子把我们背上的包袱卸下来了，以后可以集中精力好好搞生产了”。群众说：“工作组的干部好象诊脉的先生，真正找到了病根”。

我们还粗算了第九生产队的两笔账：一是劳力账，一是燃料账。这个食堂 196 人吃饭，有固定大师傅 3 人，固定烧火的 1

人，种菜的1人（本为两人，因他们约有一半时间搞其他生产，折为1人），磨面、喂猪、打柴的1人（作这些事的有3人，按他们的劳动天数折为1人），这些都是头等的劳力，此外还有经常在食堂洗菜、削萝卜、打零杂的两人，加上管理员，就有9个整壮劳动力，占全队整壮劳动力74人的12.16%；根据第九生产队的情况，1960年每个整壮劳动力平均所做工日为240个，全队实做工日为16406个，食堂所用的工日，占全队实做工日的13.15%。这个食堂，原来平均每天烧麦草202斤，社员打饭回家，重做一道和烧开水需麦草220斤（根据3户、25人的调查推算出来的），两项合计422斤。食堂停办以后，全队每天共烧草282斤（根据上述调查推算的），比食堂未停办前节省33.1%。

从上述的情况看来，这两个食堂是势在必散的。我们也想在这个大队找一个能够继续办下去的食堂，看来是找不到的。在甘肃，比上述两个食堂不如的，还很多很多。因此，对于食堂问题，应当坚决地贯彻利于生产、利于生活和群众自愿的原则，绝不应当把食堂同社会主义联系起来，强迫群众非在食堂吃饭不可。特别是在象甘肃这样的粮食斗争极其尖锐的灾区，目前办好食堂的困难更多，而食堂又往往是坏分子借以违法乱纪、压制群众的工具，看来只要真正按群众的意见办事，解决食堂是没有什么害处的。

除了食堂问题以外，我们还摸了粮食、夺权、退赔和农村支部等几个问题。现在也简单地向你报告一下：

（一）粮食问题。三定落实和口粮划出个最低的线是群众的普遍要求。群众说：“只要再不编屁谎（指一次一次地增加征购任务），口粮订得低些，我们也有办法”。群众说：“只要心里有个底，做起庄稼来，劲头就大了”。

（二）夺权问题。这里的夺权问题很复杂。中央工作组在这

里整社时撤掉的坏分子和选掉的有错误的干部，新集公社共有208人（撤掉的161人，选掉的47人）。现在发现又复职的21人。其他地区也有这个问题，这是个极为严重的问题，对此我们已决定进行认真的查处。

（三）退赔问题。退赔得普遍不彻底，退赔的原物很少，退赔的价格很低。拆掉一间房子只赔25元（盖一间房子实需200多元），平调一付屋门只需两元，平调一个水缸只赔几角钱。从退赔的面来看是百分之百的退赔了，但是，从退赔的价格看，却又百分之百的没有赔够。这也是全省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我们将重新加以处理。

（四）农村支部问题。我们摸了一下新一号生产大队支部的情况。这个支部共有党员32人，27名是现任队干部，有两名是被选掉的，只有3名是不担任职务的党员；7个支委都是队干部，并且是支部书记指名选举的。这个支部的党员1959年以来就没有召开过支部会和小组会，说不上党员的权利和义务，还有的作风很坏，违法乱纪严重地脱离群众。对农村支部进行整顿，加强对农村党员的教育，健全农村党支部的生活，是我们当前一项迫切的任务。

（五）妇女病和生育情况。我们调查了新一号生产大队4个生产队的妇女病和妇女生育情况：第九生产队有青壮年妇女25人，闭经的12人，占48%；在通经的13人中，今年1月后才通经的8人；一贯通经的两人，1个是女队长，1个是炊事员；1959年以来只有脱产干部的家属生了1个小孩。第五生产队有青壮年妇女26人，闭经的21人，占81.2%；全队1959年以来没生一个小孩。第六生产队有青壮年妇女19人，闭经的13人，占68.4%；在通经的6人中，3个是炊事员，两个是女队长，一个是脱产干部的爱人；1959年以来生了两个小孩，1个是大队保管员的爱人生的，1个是生产队长爱人生的。第七生产队有青壮

年妇女 24 人，闭经的 16 人，占 66.6%；在通经的 8 人中，有 4 人是今年 1 月后才通的；一贯通经的 4 人，1 是炊事员，1 是生产队长的爱人兼炊事员，1 是脱产干部的爱人，1 是生产小组长的爱人；1959 年以来只有管理员的爱人生了 1 个小孩。从上述这个调查材料中，可以看出许多问题。

我们还就一些具体问题，召开了专门的座谈会，征求了许多社员的意见。并且作了记录。有些问题我们还正继续深摸，待后再给你报告。以上是否妥当，请予指示。

附件 6:

## 附：通渭县委关于通渭的 历史经验教训

(一九六五年七月五日)

地委并报省委：

(一)

通渭县位于甘肃的东南部，地处丘陵地带，是个纯农业山区。总面积 2880 多平方公里，地区辽阔，居住分散，地多人少，土地瘠薄，气候差别大，自然灾害多。年平均降雨量 350 毫米，蒸发量 140 至 160 毫米。现有总耕地面积 204 万亩，其中山地 189 万亩，占 93%。总人口 210352 人，劳动力 9.89 万多个，每人平均耕地 9.7 亩。牲畜 3.92 万多头，其中役畜 3.19 万多头，每头平均负担耕地 64 亩。主要出产为小麦、洋麦、莜麦、豌豆、扁豆、糜、谷、洋芋、胡麻等。

解放前由于剥削阶级高租重利的盘剥，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压榨，劳动人民常年过着食不充饥，衣不蔽体的悲惨生活。1949 年解放后，通渭和全国各地一样，翻开了历史上新的一页。全县人民在党的正确领导下，经过减租、反霸、镇压反革命、土地改革，推翻了封建统治，紧接着走上了合作化道路。生产逐年发展，人民生活日渐改善，各项建设事业有了很大发展，面貌发生了根本变化。农业生产上，到 1957 年，粮食总产由 1949 的 11111 万斤增长为 16423 万斤，增长了 48%；亩产由 55 斤增长为 85 斤，增长了 55%，大牲畜由 54728 头增长为 70379 头，净增 28.5%；羊由 102835 只增长为 122183 只，净增 19%；猪由

12106口增长为63483口，净增4倍多；兴修水利工程3700亩，植树造林8.9万亩，控制水土流失面积220平方公里。工业方面，建立了毛纺、印刷、被服、铁器等17个手工业生产合作社，产值由52068元增长为441458元，增长了7倍多；乡乡都通了电话，邮路总长度增长了60%，兴修了吉川、陇山、马陇等5条公路。财贸方面，建立了为人民生活服务的贸易、百货、花纱、服务等4个公司和供销合作社。由于生产的发展，人民群众收入的不断增加，购买力大大提高了，社会商品零售额由110多万元增长为683.3万多元，增长了5倍多。文教方面，除原有一所中学外，小学由73所增加为297所，中小学在校学生由3309人增加为23869人，增长了6倍多；还扩建了医院，建立了文化馆、剧团、电影队等。总之，通渭7年来的发展变化是突出的，取得的成绩是巨大的。这些巨大的变化和成绩的获得，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胜利，是广大干部和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正确领导下辛勤劳动的结果。

## (二)

1958年全县人民在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实现了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各个战线都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是，从1958年后期到1960年两年多的时间里，由于违背了党中央的方针政策和毛主席的指示，在工作中犯了一系列严重错误，使已经取得的成就受到了严重破坏，给通渭人民带来了一场巨大的灾难，使党的政治威信受到了极为严重的损害。主要错误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在农民问题上犯了极其严重的错误。全县从1957年到1959年，在大辩论、拔白旗、批判富裕中农冒尖人物中共错批判斗争农民10360多人。一个时期大平大调、大刮“共产风”，使农民受到了很大损失，从土地、劳力、畜力、农具、树木、房屋、家禽家畜，以至盆盆罐罐及其它财物，平调总值共达990多

万元。农民群众气愤地说：“这几年剥夺了农民的发言权、选举权”。“共产党变了，和以前不一样了”。“东西都被拿得一干二净，有啥心思搞生产，有啥信心活下去”！这样，就严重地破坏了生产，严重地破坏了工农联盟。

二、生产上瞎指挥，盲目蛮干，造成生产连年下降，粮食严重减产。从1956年起，瞎指挥就露头了，到1958年、1959年，发展到极为严重的程度。一方面是，不顾条件、地点，不经过试验，盲目地改革耕作制度，脱离群众，脱离实际，使土地大量荒芜。全县耕地面积，1959年比1958年减少了20万亩。另一方面，不顾实际可能，要求提倡一切大办，齐头并进。在大搞工业、大搞农田基本建设中，不顾当年生产，大批抽调劳动力，1958年春，抽调劳动力17900多人大办工业，5月抽调1.8万多劳动力投入引洮工程；8月正当田黄在地，不顾收割，为迎接中央水土保持检查团的检查，以十多天的时间集中5万多劳动力，从刘家埂到华家岭公路沿线，摆了一条120华里的长蛇阵，扎彩门，飘红旗，大字报满山，锣鼓喧天，搞形式主义，突击进行培地埂、打坝等水土保持田间工程；10月又抽调2.5万多劳动力，大战华家岭、史家山。1959年又抽调5万多劳动力，兴修6个大、中型水库。这样接二连三地反复大量抽调劳动力，使农业第一线的劳动力由1957年的54%减少为35%。这一系列的瞎指挥、盲目蛮干，农业生产遭到了严重破坏，造成了粮食产量大幅度下降。1957年总产16423万斤；1958年总产11576万斤；1959年总产8386万斤；1960年总产只有3632.4万斤了（数字看来不实，但减产是肯定的）。

三、大计划、高指标、高估产、高征购、上面逼、下面吹、弄虚作假，以致人口大量死亡和外流。1958年粮食计划亩产200斤，总产3.8亿斤，实际亩产61.5斤，总产11576万斤，而上报为2.6亿斤，征购4360万斤，实入库4154万斤，占总产量的

36%；1959年计划亩产140斤，总产2.4亿斤，实际亩产49斤，总产8386万斤，而上报为1.8亿斤，征购5400万斤，实入库3958万斤，占总产量的47.2%。由于产量逐年下降，征购任务逐年增加，实际上两年没有给群众分配什么东西，人民生活一年比一年坏，人口外流和饥饿死亡一年比一年严重。早在1957年征购粮入库中，有些地方粮食就已经很紧张，动员群众卖陈粮、吃陈粮，只分现金，不分粮食。1958年春季，碧玉、第三铺、义岗等地就发生了人口外流和死亡现象，到1959年情况就更严重了，当年冬季，全县162个大队中，有102个大队3个月没有给社员打过口粮，有些地方社员40天没吃到过粮食，以草根、衣草、剥树皮充饥。但是以席道隆同志为首的县委领导，一直不敢正视实际问题，哪里反映实际情况，缺粮、要求供应便扣上“在粮食问题上打小算盘，以粮食攻击县委，向县委闹粮，是富裕中农、怕死鬼”，以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反党分子”、“坏分子”、“放炸弹”、“动摇人心”等等政治帽子而顶了回去。把粮食问题一律看成是：“富裕中农和五类分子捣鬼，是两条道路的斗争，是敌我问题”，“剥树皮是冒尖人物的破坏，反革命分子有意把死人拉到路上”，“没粮是思想问题，不是实际问题”，“当前粮食赶不上去，主要是富裕中农和五类分子在一起捣鬼，要进行打击”。开全县电话会议，要求公社召开“万人斗争大会”，生产队召开“千人斗争大会”，以开展两条道路斗争和打击敌人名为名，大批地斗争要求供应粮食的群众和反映真实情况的基层干部。提出“对富裕中农要来个双倍打击、加倍赔偿，算清不劳动、破坏生产、不合法收入三笔帐，压在泰山底下，叫他几辈子翻不过身来”，结果不仅使中农受到打击，而且许多贫下中农被批判斗争。接着又组织“千人整社团”，在农村大搜大查，拷打群众，大挖粮食，挨逐户，翻箱倒柜，普遍搜查，斤两不留。一直到1960年，问题已经发展得十分严重了，县委领导同志和

地委工作组的一些同志，仍然不顾群众死活，只顾个人得失，搞假安排，写假报告。说什么：“闹粮凶的地方，查了一下，都有反革命集团”，碧玉公社赵河生产队已死亡 50 多人，生产处于停顿状态，他们却报告说：“社员情绪饱满，牲口体力壮，生产搞得较好”。给领导上建议：“思想要坚定，思想上要有粮食，要有最大的决心”。“装病、闹粮、剥树皮、要统销，不论耍什么花招，玩弄什么手段，我们心中有底。顶住了这股歪风，丝毫没有假象所迷惑，这是保证安排好生活的关键”。还将这些报告批发全县，实在害人不浅。

四、漠视人命，严重地违法乱纪。早在 1957 年农村大辩论中，部分地方对群众就有轰斗、推撞、毒打的非法行为，特别是 1959 年则发展到十分惊人的地步。全县在粮食入库、“万人斗争大会”、“举办劳教队”、“千人整社团”的过程中，普遍发生捆绑、吊打、扣押群众的严重违法乱纪行为。在粮食入库中，上面逼，下面就压，说什么“完不成任务，提头来见”。这样子就大大助长了基层干部的违法乱纪。有的公社领导干部提出“一个会场，十个战场”，“宁欠血债，不欠粮食，完成粮食任务就是血的斗争”；“决心要大，刀子要快，哪里挡住，哪里开刀，向小队长要粮，向资本主义要粮，为全县争光，为公社争光”。有的公社开万人斗争大会时，由民兵携带机枪、步枪、马刀警戒助威。马营公社党委书记张学圣亲自主持斗争，毒打群众 160 多人，当场扣押劳教的 66 人。在大轰大斗中，对被轰斗的干部群众滥施刑法，有竹签戳指头、站冰块、雪里埋人、打夯、拔胡子、戴纸帽子游街等 120 多种，有的人被整残、整死。全县在大搜查中，搞出粮食 1100 多斤（大部分被“千人整社团”的人吃喝挥霍浪费了）。打死、逼死 1300 多人。群众对干部的违法乱纪，比作为“秦始皇”、“活阎王”、“黄世仁”、“活剥皮”、“狼狗”等等。这种违法乱纪行为，使党的政治威信、党群关系受到了极严重的损

害。也使敌人钻了空子，进行阶级报复。地富反坏分子逼死、打死人的案件不断发生。什川公社组织 200 多人进行搜粮，其中有四类分子和四类分子家属以及由于民主革命不彻底混在基本群众内部的阶级敌人 30 多人，占 15% 左右。义岗公社文化大队段家西坡生产队漏划富农分子段汝西打死、逼死社员各 1 人。襄南公社干部、右派分子袁玉乾（开除留用）打死逼死 3 人。碧玉公社赵河大队姚家嘴生产队坏分子姚世禄活活打死了 4 人。

五、在党内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对好干部动辄就批判、斗争、撤职、开除、法办，以此来作为推动工作的手段，在斗争中普遍推、撞、斗、打，进行人格侮辱，肉体摧残，使有些人神经失常。造成了相互戒备，人人自危的紧张状态。从 1958 年开始，共批判、斗争、处理脱产干部 541 人，其中错案占 71%；基层不脱产干部 2062 人，其中错案占 36.2%。仅在 1959 年有 1109 名干部，因反映了农村实际情况而被整掉了。原县长田步霄同志因县委基建和城市建设用钱上与张峰同志有争执，这本是工作上的正常现象，但在反右倾运动中，以“1956 年未选上县委委员对党不满”，“历史未作结论，对审干不满”，“大办工业钱卡得紧，不满大跃进”等罪名批判斗争，致使自杀。商业局干部张国珍因不同意县委提出将该局负责人×××选为县党代会代表，就以反映了农村死人的情况是“丑化农村，不满领导”等批判斗争，下放劳动改造。但对于能迎合他们的一些人，不问政治情况如何，则受到提拔重用。因此，有许多部门和公社的领导权就落到了坏人手里。152 名公社主任以上领导骨干中，有敌伪党、团、军、警、宪骨干，特务、一贯道等 24 名，占 15.2%。30 名县委委员和候补委员中，有各种政治历史问题的 8 名，占 22.6%，原财贸部长×××，家庭是恶霸地主，本人曾因破坏我扩军运动，被判处徒刑 1 年，释放后混入我革命阵营，并包庇、窝藏他父亲、反革命分子×××10 多年。商业局负责

人×××，1947年当过伪保长，隐瞒了参加三青团，而他们竟以该局“是红旗单位”，“出席过全国群英会，给县委争了口气”，“听县委的话”为理由，要提选为县委委员，经商业局支部连选两次没有选上代表，则又指示组织部长在城关公社主持选为县党代表，就这样在1957年选为县委侯补委员了。计委副主任×××，历史上参加过三青团、国民党、复兴社、防共团，并怀疑参加过情报小组，其父曾杀过人，叔父系恶霸，均被我法办，但将X选成县委委员。农业局副局长×××是阶级异己分子，又一个副局长×××，是潜伏军统特务。义岗公社党委副书记×××，家庭是一贯道坛主，本人是站礼，有复道活动，而席道隆同志则称赞×××是“有政治头脑”，“肚子里有钢”的干部。席道隆同志还个人代替组织在陇川召开支部书记会议上一次宣布开除18名党员的党籍，撤销了公社书记和主任的职务。党内过火的斗争和重用纵容坏人，不仅干部队伍被打乱了，骨干被打掉了，组织被打散了，思想被打糊涂了，而且严重地破坏了党内斗争的原则、组织原则和民主生活的准则。

上述错误给通渭人民带来了一场大灾难，使通渭已经取得的成就，遭受了巨大的损失和破坏。全县人口死亡60210人；死绝了2168户，1221个孩子失去亲人成了孤儿；外流11940人；土地荒芜36万多亩；牲畜死亡3.3万多头；羊被宰杀4万多只，猪、鸡、猫、狗等家禽畜几乎绝了种。拆毁房屋5万多间；砍伐树木27万多株；农业生产处于停顿状态，学校、工厂关门，干部、群众思想非常混乱，社会秩序动荡不安。

为什么会犯这样严重的错误呢？除了执行了张仲良、窦明海等同志的一套错误主张外，主要是当时的县委领导同志有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只顾个人得失，不顾党和人民的利益，不按毛泽东思想、党的政策办事，在许多方面还发展了张仲良、窦明海等同志的错误。当然也有些错误是在没有经验的情况下发生的。

### (三)

1960年12月西北局兰州会议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议。它给通渭党的组织和人民重新带来了毛泽东思想和党中央的政策,纠正了错误,挽救了人民,使通渭的工作离开了错误的道路,重新回到了正确的道路上,它在通渭的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是全县人民和子孙后代永远也不能忘记的。

西北局兰州会议后,我们在党中央、西北局和省委的正确领导下,认真地贯彻了西北局兰州会议精神,向困难、向错误、向敌人作斗争中,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首先,集中全力,抢救人命,安排生活。全县近20万人没有饭吃,处在饥饿死亡线上,疾病蔓延,当时中央、省、地委派了250多人的工作组,128人的医疗队,调来医药136吨(价值47万元),食糖、蜂蜜、红枣、花椒两万多斤,粮食3370多万斤,救济款330多万元,棉布110多万尺,棉花6万多斤。迅速安排了群众生活,医治了8万多病人,把群众从死亡线上抢救下来了。我们永远不能忘记党中央和毛主席对通渭人民的关怀,永远不能忘记各兄弟地区和单位对通渭人民的支援,永远不能忘记工作组干部赴汤蹈火,与群众同甘苦、共患难的好作风。特别是医疗队王俊、刘春华(女)两同志辛勤工作,付出了自己的生命,是永远值得通渭人民纪念的。其次,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由于生产力遭到严重的破坏,劳畜力严重不足,农具残缺不全,籽种缺乏,土地大片荒芜,在此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国家从人力、物力、财力各方面进行了大力支援,先后发放各种贷款和补助款142万元,无偿投资270多万元,购买了牲畜4700多头,添置补修农具4万多件,这对组织生产是个很大的鼓舞和支持。我们始终教育干部和群众,长志气,鼓干劲,挺起腰干,发扬自力更生的精神,战胜困难。各级领导和广大干部深入生产第一线,和群众同甘苦、同劳动,没有牲畜,就组织人挖地、人拉犁耕种,就这样一个一个地克服了困难,有力地恢复和发展了农业生产。第三,开展了整

风整社,进行了夺权斗争。对犯有各种错误的363名干部,分别进行了处理。免于处分的171人,给予各种纪律处分的167人,给予刑事处分的25人。从而纯洁了组织,制止了“五风”。第四,贯彻执行了“十二条”、“六十条”、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减轻农民负担等一系列政策,调动了广大群众的生产积极性。第五,贯彻了国民经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停办了基建项目4个,地方工业厂矿由原来的7个调整为两个,学校由437所调整为104所。精减职工947人,压缩吃商品粮人口1200人,加强了农业战线。第六,大抓了政治思想工作,向党内外干部进行了党章、政策、形势、阶级、群众观点、自力更生等方面的教育,大大提高了政治思想水平,改进了作风。第七,纠正了党内民主生活不正常的状况,恢复和发扬了党内民主,活跃了党的民主生活,坚持了民主集中制原则,健全了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相结合的制度,一切重大问题都由集体讨论决定。为了健全党内民主生活,还作了25条规定,从组织上保证了党内正常的民主生活。党的民主生活趋于正常了。第八,认真进行了甄别工作,对过去错批判处理的2164名干部,逐个作了甄别、安置和恢复了工作。对错批判的群众10360人,也作了甄别平反。改善了关系,加强了团结,大大调动了积极性。几年来,在向困难、向错误作斗争的同时,对阶级敌人的各种破坏活动,进行了有力的打击,破获重大政治案件两起,刑事案件466起,有力地保证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1962年冬季以来,贯彻了党的八届十中全会精神,突出地抓了阶级斗争。在农村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城市开展了增产节约和“五反”运动,取得了显著成绩。

三年多来,正是由于高举了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高举了三面红旗,大力纠正了过去工作中的错误,认真贯彻执行了党的政策,大抓了阶级斗争,加强了调查,发扬了党的优良传统,生产得到了较快的恢复和发展。1963年粮食亩产85斤,达到1957年水

平,1964年虽然遭受病、虫、雹、洪等灾害,粮食亩产仍达71斤,总产1.09亿斤。3年净增牲畜9970头,羊2.2万只,1964年每户平均达1口猪,并出现了亩产百斤的公社3个,生产大队25个,生产队290个。每人粮食达到千斤以上的生产大队7个,生产队27个。并且有相当一部分队有了储备粮。其它各方面的工作也获得了显著的成绩。目前,全县的形势很好。农业生产今年种得多,种得细,生长良好。工交、财贸战线都超额完成了上半年计划。城乡人民的生活安排是扎实的。物价稳定,市场活跃。社会秩序是安定的。一个群众性的比、学、赶、帮社会主义竞赛运动正在深入开展,学习毛主席著作在不少地区已形成热潮。县委认为,虽然我县破坏严重,损失很大,底子薄,生产才恢复,人民生活穿的、用的、住的等方面还有不少困难,工作任务很艰巨。但是我们相信只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就会促进社会主义建设的大发展,一定由胜利走向胜利。

#### (四)

我们从通渭过去的错误中应该吸取些什么教训呢?

一、必须老老实实地按照毛主席的思想、党的政策办事。无数的事实证明,凡是按毛主席的思想、党的政策办事的时候,革命事业就无往而不胜,凡是离开了主席的思想、违背党的政策的时候,就会犯这样和那样的错误,给革命事业招致不应有的损失。通渭过去工作中之所以犯这样大的错误,就是离开了主席的思想、违背了党的政策的结果。西北局兰州会议后,我们纠正了不按照主席的思想办事、违背党的政策的错误,工作就获得了成绩。因此,我们必须教育干部,要老老实实地按照毛主席的思想和党的政策办事。认真学习主席的著作,把主席的思想真正学到手,用主席的思想来武装我们的头脑,用主席的观点、立场、方法彻底改造自己,把毛泽东思想贯串到一切工作中去,力求避免不犯或少犯错误。要教育干部,一切行动都要以党的政策为准则,老老实实地贯彻执行

党的政策。绝不能在党的政策之外乱立规章、乱出主意，绝不能违背党的政策。

二、必须彻底克服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是百病之根，万恶之源，它与我们共产党人的世界观是水火不相容的。通渭以席道隆同志为首的县委领导人，当1958年以前，工作中做出了些成绩，就沾沾自喜，他们不是把成绩归功于党，归功于人民，相反地记在个人的名下，骄傲自满。当1958年以后，工作中出了问题，发生了错误，就不顾党和人民的利益，顾个人面子，一味地保“红旗”，说假话，掩盖错误。当情况发展到了已经包不住的时候，一直考虑个人得失，又没有勇气起来揭发检查和纠正错误，仍然不顾人民的死活，大轰大斗，大搜大查，强迫交粮，漠视人命。事实证明，有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就不能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也就不能关心党和人民的利益。因此，我们要教育干部，用无产阶级的、人民的、党的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则同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进行坚决的斗争，彻底克服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任何时候都要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摆在第一位，抛弃个人得失，要有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精神。工作中有了缺点和错误，要敢于正视和揭露，尽快地改正错误，如果考虑个人得失，不检查改正就会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给党的事业带来严重损失。

三、必须坚持和发扬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坚决反对主观主义。毛主席说：“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这是一切共产党员所必须牢牢记住的最基本的工作方法。我们所犯的错误，研究其发生的原因，都是由于我们离开了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主观决定自己的工作方针”。通渭过去的工作恰恰和主席的教导相反，他们在领导工作中不实事求是，主观臆断，虽有调查研究，但都是先入为主。特别在指导农业生产上，不因地制宜，不顾自然条件，盲目改革耕作制度，不顾粮食生产，大调农业劳动力进行非农业劳动，延误了农时，严重地影响了农业生产，结果吃了大亏。因此，我

们必须教育干部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就必须经常深入实际,深入群众,用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加强调查研究,走群众路线。坚决克服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作风。

四、必须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毛主席说:“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这两类矛盾的性质不同,解决的方法也不同。简单地说起来,前者是分清敌我的问题,后者是分清是非的问题”,“凡属于思想性质的问题,凡属于人民内部的争论问题,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去解决,只能用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而不能用强制的、压服的方法去解决。”通渭过去的工作中,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在开展两条道路的斗争中把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当作敌我矛盾去处理,真正的敌我矛盾又没有抓住,因此,打乱了阶级阵营,这个沉痛的教训,我们要牢牢的记住,永远不要忘它。今后,在任何情况下,都要按照毛主席的教导,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团结干部和群众的大多数,共同对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保证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顺利进行。

五、必须严格的执行党的民主集中制。民主集中制是我们党的根本组织原则。通渭过去以席道隆同志为首的县委领导人,在党内实行家长式领导,作风极不民主,个人随意决定重大问题。只喜欢听好的,听成绩,不喜欢别人批评和提出不同意见,谁要不同意他们的主张,就戴帽子、抓辫子、打棍子,进行过火的党内斗争,这样不仅堵塞了党内的正常言路,而且破坏了党的民主集中制,犯了极其严重的错误。因此,我们必须严格执行党的民主集中制,严格执行党章,充分发扬党内民主,正确开展党内批评与自我批评,特别是鼓励和支持党员与党的各级组织自下而上的批评,使他们敢于和善于提出问题,发表意见,提出批评,对党的领导机关实行严格监督。在高度发扬民主的时候,要加强党的集中统一,反对只要民主、不要集中,只要自由、不要纪律的倾向。同时,还要反对和纠正不识大体、不顾大局的本位主义和分散主义倾向。要加强党

的集体领导,健全党委制,一切重大问题必须经过集体讨论决定,反对个人擅自决定重大问题。要经常检查党的政策执行情况,加强请示报告,反对事先不请示、事后不报告的无组织无纪律的坏现象。

六、要正确地进行党内的斗争。党内斗争是社会阶级矛盾和  
新旧事物矛盾在党内的反映,是不可避免的。党内矛盾、原则分歧  
和不正确思想意识的存在,只有经过党内斗争,才能解决和克服。  
采取敷衍了事和回避态度是错误的。我们在党内斗争的时候,要  
反对过去过火的党内斗争。正确地进行党内斗争,严格贯彻党的  
“团结——批评——团结”“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对待犯  
有错误的同志,要采取批评教育的方法,一看二帮,既要严肃,又要  
认真。只有这样,才能达到分清是非,弄清思想,团结同志的目的。

通渭的错误是严重的。给我们的教训十分深刻,我们必须教育  
广大党员和干部,牢牢记住这一沉痛的教训,并且一代一代地传  
下去,教育子孙后代,永远不重犯类似性质的错误。

通渭的错误已经得到纠正。几年来,在恢复和发展生产建设  
上已经取得了很大成绩。我们必须继续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  
旗,坚决贯彻党的总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奋发图强,艰苦奋斗,自  
力更生,兢兢业业地做好各项工作,以争取通渭社会主义革命和建  
设事业的新胜利。

## 主要参考文献

1. 李锐著《庐山会议实录》，湖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
2. 《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
3. (英) 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著《文化大革命的起源》，河北人民出版社，1992年出版。
4. 《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出版。
5. 《抚今追昔话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出版。
6. 康有为《大同书》，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出版。
7. 叶永烈著《反右派始末》，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年出版。
8. 《周恩来总理生涯》，人民出版社，1997年出版。
9. (美) 尼克松著《1999年：不战而胜》，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出版。
10. 《真相》，南方日报出版社，2000年出版。
11. 谢春涛著《大跃进狂澜》，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出版。
12.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出版。
13. (美) 莫里斯·迈斯纳著《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
14. 《社会主义时期中共北京党史纪事》，人民出版社，1998年出版。
15. 《毛主席和党中央领导同志在各地视察的重要讲话》，甘肃人民出版社，1958年出版。

16. 《渴望真理——刘少奇在 1961 年》，珠海出版社，1998 年。
17. 武文军著《甘肃六十年代大饥荒考证》，兰州文史资料第 20 辑，2001 年出版。
18. 柏杨著《中国人史纲》，时代文艺出版社，1987 年出版。
19. 马利《三千孤儿和他们的草原母亲》载于《新华文摘》，1998 年第 2 期。
20. 《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历史统计资料汇编》（1949—1989），中国统计出版社，1990 年出版。
21. 《甘肃省志·民政志》，甘肃人民出版社，1994 年出版。
22. 1961 年 5 月 11 日《刘少奇同志给毛泽东同志的信》，广西壮族自治区档案馆 29 号 47 卷。
23. 《河南省志》，河南人民出版社，1997 年出版。
24. 彭尼·凯恩著《中国的大饥荒》（1959—1961），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 年出版。
25. 《云南五十年》，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 年出版。
26. 《中共河南党史大事记》，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 年出版。
27. 《甘肃人口统计资料汇编》，甘肃省统计局、甘肃省公安厅 1988 年编印。
28. 《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历史统计汇编》（1949—1989），中国统计出版社，1990 年出版。
29. 1958—1961 年人民日报。
30. 1958 年—1961 年甘肃日报。
31. 1958—1960 年青海日报。
32. 《敦煌市志》，新华出版社，1994 年出版。
33. 《银川市志》，宁夏人民出版社，1997 年出版。

34. 《中宁县志》，宁夏人民出版社，1997年出版。
35. 《固原县志》，宁夏人民出版社，1995年出版。
36. 《固原地区党史资料》。
37. 《新疆省志》，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年出版。
38. 《哈密地区志》，新疆大学出版社，1997年出版。
39. 《信阳地区志》，三联书店出版，1992年出版。
40. 《通渭县志》，兰州大学出版社，1990年出版。
41. 《静宁县志》，甘肃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
42. 《海南州志》，民族出版社，1979年出版。
43. 《大同县志》，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
44. 《海西藏自治区志》，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出版。
45. 《轮台县志》，新华出版社，1991年出版。
46. 《伊犁人口》，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
47. 《塔城地区志》，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年出版。
48. 《靖河县志》，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年出版。
49. 《库尔勒志》，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年出版。
50. 《张家川回族自治县志》，甘肃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
51. 《临夏市志》，甘肃人民出版社，1995年出版。
52. 《张掖地区粮食志》，甘肃人民出版社，1995年出版。
53. 《甘肃农业合作化文件汇编》，甘肃人民出版社，1988年出版。
54. 《甘肃省引洮上山水利工程档案史料选编》，甘肃人民出版社，1997年10月。
55. 《甘肃农业大事记》，甘肃人民出版社，1992年出版。
56. 《定西县志》，甘肃人民出版社，1990年出版。
57. 《酒泉市志》，兰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出版。
58. 《华亭县志》，甘肃人民出版社，1996年出版。

59. 《泾川县志》，甘肃人民出版社，1996年出版。
60. 《甘谷县志》，中国社会出版社，1999年出版。
61. 《礼县志》，陕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
62. 《陇西县志》，甘肃人民出版社，1990年出版。
63. 《武威县志》，兰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出版。
64. 《岷县志》，甘肃人民出版社，1995年出版。
65. 《同心县志》，宁夏人民出版社，1997年出版。
66. 《渭源县志》，兰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出版。
67. 《高台县志》，兰州大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
68. 《武都县志》，三联出版社，1998年出版。
69. 《临洮县志》，甘肃人民出版社，1988年出版。
70. 《永宁县志》，宁夏人民出版社，1992年出版。
71. 《甘肃物资统计资料》，甘肃省物资局编。
72. 甘肃省档案馆，青海省档案馆，云南省档案馆，河南省档案馆等多家档案馆提供的第一手资料。

[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

书名 = 兰州文史资料选辑 第22辑 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考

作者 = 兰州市政协文史资料和学习委员会编

页数 = 234

SS号 = 12309532

DX号 =

出版日期 = 2002.08

出版社 =

前言

目录

- 一、中国历史上最悲痛的一页
- 二、重灾区的死亡惨案
- 三、天涯何处无饥寒
- 四、陇上大饥难
- 五、涕笑皆非的青海
- 六、陷入大跃进泥沼的河南
- 七、共产主义怪胎——公共食堂
- 八、流亡者的命运
- 九、是造银河天池还是劳民伤财
- 十、吹牛吹出了灾难
- 十一、左倾路线面面观
- 十二、“七分人祸”形成的三步曲
- 十三、前辙之鉴警示后人
- 十四、三年大饥荒引出的理论反思
- 十五、历史断笔实可哀